

WASHINGTON'S 戰爭 敘利亞

L O N G W A R O N S Y R I A



美國從不公開的
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

史蒂芬·高望斯——著 黃開——譯

Stephen Gowans



破解主流媒體版本， 直視地緣政治陰影下的國度。

| 推薦書評 |

「對關注敘利亞近年事件的人，高望斯這本著作提供了最及時與必要的背景知識。」

伊娃·芭蕾特 (Eva Bartlett)，加拿大獨立記者，長年親歷採訪中東，並曾於聯合國記者會揭露西方非營利組織及媒體對敘利亞戰事的誤導性報導。

「人們必然要問：何以西方國家如此處心積慮想要除掉阿薩德？……史蒂芬·高望斯經由精闢而全面的探討，為我們找到了答案。關於敘利亞境內的示威抗議，西方世界自有一套普遍流行的詮釋。《敘利亞戰爭》一書不僅提出與眾不同的說法，更重要的是，它也從歷史脈絡討論了西方國家對敘利亞的干預，這些在在都是在西方媒體前所未聞的。」

摘自榮恩·雅各布斯 (Ron Jacobs) 《Counterpunch》雙月刊書評

「事實上，敘利亞戰爭一直是『控制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鬥爭縮影——這也是實力下降中的美國最後一個終將失敗的帝國布局——阻止目前全球權力邁向新平衡的轉變。與眾多匆匆寫就敘利亞主題的其他著作不同，高望斯這部作品將會成為今後幾年敘利亞衝突的重要基礎與必讀。」

夏明·娜汪妮 (Sharmine Narwani)，記者、中東地緣政治分析專家

「史蒂芬·高望斯為我們描繪的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是一幅清晰無比的圖像；他也記錄了五角大廈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將它夷為平地。時下但見主流媒體全天候不斷鼓吹敘利亞改朝換代，相形之下本書更是非讀不可的著作。本書所訴說的，是敘利亞人民的故事，是他們奮鬥不懈、追求獨立與發展的故事，也是迫切需要被聽見的故事。即使是最熱衷干涉主義的人，本書也能讓他們開始質疑華盛頓的政策。高望斯挖掘出埋藏在西方國家深處的真相，想要了解世界大事，你不能不知道這些真相。」

卡勒伯·毛平 (Caleb Maupin)，記者及政治分析家

「美國何以大張旗鼓要推翻大馬士革的復興黨政府？《敘利亞戰爭》一書所提出的解釋不但經過縝密的研究，而且流暢易讀。關於敘利亞的故事，美國支持的童話版本說的是『一名殘忍的獨裁暴君如何血腥鎮壓民主抗議群眾，讓所有高尚的美國人士不得不想要前往救援』。然而，可想而知本書所說的版本和這一則童話故事徹頭徹尾都大異其趣。」

丹·拉查爾 (Dan Lazare)，記者及作家

WASHINGTON'S

LONG WAR ON SYRIA

WASHINGTON'S
LONG
WAR
ON
SYRIA

敘利亞
戰爭

美國從不公開的
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

史蒂芬·高望斯——著 黃開——譯
Stephen Gowans

種種侵略戰爭是為了殖民與利益嗎？

是的，想必是。然而許多發動這類國家罪行的侵略者，
會把他們真正的意圖隱藏在高調概念與理想口號的背後。

——加拿大戰地醫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寫于1939年

本書於二〇一六年的歲末脫稿。敘利亞的伊斯蘭叛變得到美國以及阿拉伯領袖盟友們撐腰，在當時已經邁入第五個年頭。自二〇一一年一直到二〇一六年底，發生了諸多衝突事件，與其說本書是針對這些事件而提出解釋，更是志在檢視該衝突形成的過程。本書也會探討三股政治勢力，它們為求控制敘利亞國家而縱橫捭闔，早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已然如此，並非從二〇一一年才開始的。這三股勢力為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遜尼派（Sunni）政治伊斯蘭和美國帝國主義。

本書的書稿自完成到付梓出版，其間容有四到五個月的時程，是在寫作當下方興未艾之事，到了出版時或有可能已是明日黃花；這是無可豁免的風險。如就分析而言，倒是仍不至於構成困擾。本書的重心在於橫跨數十年間的大小事件，則區區數月之間的活動實

難以動搖本書提出的詮釋。本書有個問題的是：描繪各大小事件時應以英文何種動詞時態為之？如果使用現在式，彷彿蔓延至二〇一六年年尾的戰事中，各種事件以及政治勢力之間的均衡關係，將會天長地久、亙古不變。如此一來，其風險在於本書自出版的那一刻起，它便已宣告過時；這一切取決於本書完稿之後到出版上市之間，世局會如何演變。

誠然，為了書寫正在進行中的重大事件，寫作的方式會是一大挑戰。我的對應之道是採用回顧的角度寫作：凡是直到二〇一六年年底以前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大大小小歷程，一律視之為歷史。從技術上來說，在本書付梓問世之時，它們確實已然成為歷史。

0 0 4	作者序
0 0 8	前言 當阿拉伯民族主義碰撞帝國戰略
0 3 6	第一章 阿拉伯主義之地
0 9 0	第二章 變天
1 2 2	第三章 二〇一一年大熱病
1 4 8	第四章 「溫和叛亂分子」的神話
1 7 2	第五章 復興黨的伊斯蘭盟友
1 8 2	第六章 華盛頓的伊斯蘭盟邦

1 9 8	第七章 分而治之
2 1 4	第八章 希特勒再現
2 2 6	第九章 華爾街帝國
2 4 6	結語
2 7 4	各章注釋

當阿拉伯民族主義 碰撞帝國戰略

華爾街是美國政治圈最舉足輕重的勢力，連續幾任的美國政府都是為他們出頭，向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敘利亞政權掀起戰火。

這些行動可不是為了傳播民主政治。敘利亞的民族主義派已經具有相當高度的民主，那些華盛頓方面所賞識的阿拉伯盟友們甚至還瞠乎其後。美國的行動只是為了剷平反對力量，維護以華盛頓方面為首的全球經濟秩序；萬般皆下品，追逐利益才是唯一要務。

自1963年起，敘利亞政府獻身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推崇的價值，亦即擺脫外國勢力控制而獲得自由，以及阿拉伯民族社會主義。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Ba'ath Arab Socialist Party）的成員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和他的兒子巴沙爾（Bashar）。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和伊朗結盟，伊朗和敘利亞一樣重視經濟與政治上獨立自主的價值，也是反對融入由美國監督指導的全球經濟秩序。他們亦和蘇聯

結盟（招致華盛頓方面的強硬派直指哈菲茲·阿薩德為阿拉伯共產主義者），蘇聯瓦解之後則是與俄羅斯續盟。在美國的戰略眼中，伊朗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均被視為美國的「同行冤家」（peer competitors），因此阿薩德與之結盟，無疑使華盛頓方面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領袖的敵意火上加油。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為美國的企業、銀行家與投資家在全世界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阿薩德所領導的敘利亞政府，偏偏擁抱與之抵觸的各種價值。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不願迎合華爾街方面的聖旨，他們一心一意只想要使敘利亞乃至最後是全體阿拉伯世界，都能脫離外國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操縱。

在2011年春天，阿拉伯世界因為多起動亂劇變而地動山搖，這場大熱病後來演變成如今為世人所知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2011年3月敘利亞也發生暴動，並且迅速轉化為叛亂。華盛頓方面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呼籲其阿拉伯宿敵巴沙爾·阿薩德下台謝罪。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告阿薩德政權已失去合法性，發生武裝叛亂就是有力的證明。

美國官方將阿薩德形塑成殘暴的獨裁者，同時支持針對他而起的武裝造反，以致華盛頓方面對阿薩德的一切反抗行動，在整個西方世界眼中，彷彿是出於唾棄暴政而熱愛民主。然而，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明顯看出來：華盛頓方面之所以支持對抗阿薩德政府的行動，其決策絲毫沒有考慮到推廣民主政治。

華盛頓方面的盟友們在戰場上與敘利亞政府對壘的，乃是伊斯蘭主義信徒而非民主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的目標是建立遜尼派伊斯蘭國家，這和沙烏地阿拉伯國家一樣，它們的立法基礎都是在於《可蘭經》，並非依據民主程序的決策。即使如「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在叛亂初期被吹捧成某種自由民主運動，事實上不僅它的成員包括伊斯蘭教徒，它更是受伊斯蘭主義控制的。¹《美聯社》的報導已經說了：「許多參與（自由敘

利亞軍」的團體「懷有「強烈的伊斯蘭主義計畫」。組成自由敘利亞軍的各個團體，絕大多數都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意識形態上系出同門，而穆斯林兄弟會則是蓋達組織（al-Qaeda）和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始祖。2《華爾街日報》亦指出：自由敘利亞軍不只「受伊斯蘭主義團體控制」，甚且「與敘拉陣線（al-Nusra）合作無間」，3 敘拉陣線正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再者，就政體而言，他們完全沒有計畫要建立多黨制或者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府。他們目標純粹是為反對而反對，歸根結底就只是要顛覆世俗派敘利亞政府。意思就是說，認為號稱「溫和」且「相對世俗」的自由敘利亞軍並非伊斯蘭主義者，無乃一大誤會。誠如資深的中東記者派屈克·寇克朋（Patrick Cockburn）之論：在伊斯蘭國、敘拉陣線，以及「美國口中據稱屬於溫和派的反對陣營盟友們」之間，實在是缺乏「涇渭分明」這回事。4

在當地與敘利亞交戰的國家之中，華盛頓的首要阿拉伯盟邦是沙烏地阿拉伯，而它本身即是個反民主的專制政權：不但在國內壓迫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行動，當它的鄰國巴林同樣發生示威，要求終止君主政體並過渡到民主體制，它也派出坦克鎮壓。沙烏地當局斬首傳教士尼姆爾·尼姆爾（Nimr al-Nimr），因為他是在沙國呼籲民主化的中堅分子。此外，連他年僅十七歲的姪子，也因為參與反對君主政體的示威，被判處釘上十字架的死刑。沙烏地王室對民主的蔑視以及對其人民的欺壓，美國的態度則是數十年如一日地選擇無視。

華盛頓方面對於富甲天下的沙烏地王室可說是偏袒有加，王室在美國的廣泛投資早已使他們得以晉身美國的經濟精英階層。美國致力於提昇企業追逐贏利的目標，沙烏地均能配合美國的相關政策，是以華盛頓方面才會縱容、姑息沙烏地王朝。一名美國的官員如此解釋道：「願與我們合作的國家就能獲得自由通行證。」5 說到與華盛頓方面打好關係，沙烏地作為合作伙伴，無人能出其右。

沙烏地王室坐擁舉世最大的石油礦藏，為美國的石油公司提供了豐厚的利潤。此外，他們藉由提高或縮減石油產量而控制全球的原油供應，進而操縱市場油價，在許多方面都是有利於美國的企業界。更重要的是，沙烏地王室甚至是美國軍火工業的頂級客戶，他們讓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波音（Boeing）、雷神（Raytheon）、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和其他軍火製造商猶如在石油汪洋上徜徉，並且能確保軍火業的股東們仍然可獲致豐厚的股息和資本收益。

沙烏地也為美國的形形色色秘密行動買單，那些秘密行動有助於美國達成其外交政策的目標。當美國的法律對中央情報局（CIA）綁手綁腳，沙烏地則是扮演起美國情報機構代理人的角色，出面從事各種秘密行動。投桃報李之下，美國則是提供沙烏地王室必要的保護，遇到沙烏地人民對政府當局有所不滿及反抗時，令王室得以鞏固其社會地位而高枕無憂。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試圖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油井從紹德王室（House of Saud）手中奪走，利用動員阿拉伯石油資源收益的手段，提昇阿拉伯國家的整體地位，而非只是讓阿拉伯王室以及他們在西方的石油公司伙伴，財富蒸蒸日上。在這方面，美國同樣維護著沙烏地專制政權，抵制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理想。

在這個區域，華盛頓方面所反對的其他國家，如伊朗、格達費統治的利比亞、薩達姆·海珊統治的伊拉克，它們就如同敘利亞，也是致力於經濟與政治獨立，以及由國家主導的發展。然而代表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的美國政府，它所偏愛的秩序典範卻是與之格格不入的。該典範所重視的，是開放市場、自由企業，還有積極歡迎美國人投資的商業環境，以上各項均不可或缺，再加上於軍事上和美國並肩合作。可是這些國家誰都不允許五角大廈染指，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在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被美國當成盟友、伙伴的國家，則是甘心接受美國的霸權、歡迎幾乎暢行無阻的外國投資，其中大部分國家更是在其境內駐紮美軍。它們幾乎清一色都是反民

主政體的國家，由國王、埃米爾（emir）、蘇丹（sultan）和軍事獨裁者所領導統治。

為求敘利亞的暴亂能夠獲得政治上的解決，在首都大馬士革的政府當局提議修憲，建立代議制民主政治系統，使敘利亞可以更接近西方人所喜愛的多黨政治。如此一來，目前由阿薩德所領導的執政黨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將不再擁有憲法所規定的一黨獨大地位。換句話說，它不再是號令全國的當然執政黨。已往的總統選舉係經由公民投票以同意或否決復興黨所推派的單一候選人，日後則可以開放多人參選，其資格也不再限於復興黨的黨員。

儘管有所讓步，叛亂依舊持續著。這一點再結合另一個事實來看，足以反駁叛亂的目的是追求民主政治的說法：這場揭竿而起的叛亂，是由遜尼派伊斯蘭教徒領軍的，他們的目标是創建遜尼派伊斯蘭國家，而非多黨民主政治。美國和那些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國王、埃米爾、蘇丹等等盟友，公然為遜尼派伊斯蘭激進分子供輸武器。華盛頓方面開口聲聲宣稱，支持敘利亞的暴動是為了聲援民主派以及反抗獨裁，這也同樣站不住腳。

無憑無據、宣告敘利亞總統喪失合法性

美國處心積慮想要除掉巴沙爾·阿薩德政府，這比爆發阿拉伯之春的時間還要更早許多年。穆斯林兄弟會以暴力手段反抗敘利亞政府的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63年，華盛頓方面亦是居中煽動的黑手。在2011年以前，華盛頓方面之所以企圖推翻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其動機起於大馬士革擁護反帝國主義和反猶太復國運動（Zionist）的立場，以及推行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計畫。敘利亞的政治方案中，以上這些要素皆是華盛頓方面所反對的。至於華盛頓方面支持2011年爆發的武裝叛亂，論其真正動機，也依舊是起於同一個反對的立場。華

盛頓方面同樣打算拉倒哈菲茲·阿薩德政權，肇因於他實施社會主義政策，更何況他的政權亦向蘇聯靠攏。哈菲茲與伊朗正式締盟，而伊朗又是華盛頓方面的死對頭。巴沙爾在許多方面父親子隨，華盛頓方面不滿他未能打破復興黨逢以色列必反的意識形態，竟然試圖使阿拉伯世界脫離西方的影響力而獨立，更要透過公有制及國家計畫型經濟等方式（美國的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會宣稱這是採用「蘇俄模式」），推動經濟發展。⁶

2011年春天，當時的敘利亞更接近西方模式的多黨代表制民主政體，其他任何阿拉伯國家均不足以與之相提並論。敘利亞的立法機構係經由民選的多黨代表組成，總統的合法性亦是來自全民投票中獲得的普遍支持。許多觀察家都同意的是，阿薩德確實能孚眾望。反觀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世界的首要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它可是堅守絕對的君主專制政體，在這個國家只容得下虛弱無能而難登大雅之堂的民主形式。在沙烏地阿拉伯，既沒有半個政黨、沒有像樣的立法機關，對於國家由誰領導，民眾也絲毫不能置喙。不僅如此，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並未受到人民的支持，尤其是什葉派（Shia）穆斯林教徒。什葉派穆斯林盤據盛產石油的東部省份，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當局把他們視為離經叛道的異教徒。根據美國情報界自己的看法，阿拉伯人眼中的沙烏地阿拉伯不過是個專制暴政國家（他們眼中的埃及、約旦、波斯灣阿拉伯國家與巴基斯坦等也不遑多讓；這些國家卻無一不是美國的盟邦）。⁷美國總統歐巴馬倒是在無憑無據的情況下就宣告敘利亞總統已經喪失在位的合法性，必須下台負責。然而美國的情報單位則是指出：真正缺乏合法性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領導階層，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的其他夥伴也不例外。歐巴馬卻從未明說更不曾暗示過，要求哪一個備受華盛頓方面重視的阿拉伯皇室退位。

美國的外交政策所專注追求的世界經濟秩序，乃是有利於美國貿易和投資的環境，因而必須強力掃除民族主

義障礙。此一外交政策的基礎，就是孜孜矻矻將本求利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使財富集中於銀行家、投資家和高階企業主管等等極少數人之手，這些人轉而利用在其控制下的財富和重要資產，干涉國家政策以投其所好。如此說法並非意指有一群富不可言的資本家慣於透過密會而決定美國政府的施政；反之，他們的作法是與其他團體競爭之時，善用各種手段以確保他們所偏好的政策能占盡上風。這些手段包括遊說以及透過選舉活動的政治獻金贏得對政治人物的影響力；他們同時亦建立交換條件，默許政治人物可在卸下政務之後，於企業內穩享肥缺，而政治人物則是在當權時與企業界維持沆瀣一氣，以此作為回報。

另一個手段便是企業界高階職位和政府高官之間的旋轉門。在美國政府的內閣成員和官僚體系的高層之中，企業總裁、大律師和高級商務人士所占人數，其相對比例已經大到無以復加。他們在政府任職、返回企業界的高位、再到政府任職，若干年之後則再度回鍋企業界，空降層峰高位。長此以往，企業界所在乎的價值、關心的對象以及追求的目標，遂能始終成為政府施政的當務之急。

何止如此。美國企業神通廣大，還能成立、支持各種智庫以提出政策建言，藉此設定意識形態味道濃郁的議程；同時，他們亦會利用捐贈大學的手段，使學術研究朝向迎合企業利益的康莊大道加速前進。美國企業也會透過旗下擁有、掌控的大眾媒體帶風向，營造符合其意識形態的環境。企業的能力既足以操縱意識形態化的議程，即意味那些靠選舉出身以及隨後在政府機關擔任公職的人，往往早已是親商之路的自家人。

最後一點：資本家階級掌握了龐大的經濟資源，儼然形成幫派。即使假設他們不曾對政府拍板叫陣，也早已具備了如此架勢，能令政府屈從於資本家陣營。舉足輕重的企業、銀行家和投資家長袖善舞，能強加帶衰經濟的壓力，以如同恐怖主義的形式迫使選民對政府施壓，進而放棄有損於商業利益的政策。

經由以上的所有機制，這批資本主義精英們遂得以主導公共政策之制定。2014年，政治學家馬汀·吉冷思（Martin Gilens）和班傑明·沛吉（Benjamin I. Page）針對一千七百多個政策議題進行研究，誠如他們所言：「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而獨立的影響力；一般公民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其影響力則是微乎其微或者完全談不上」。⁸

資本家階級在公共政策上呼風喚雨的能力也跨足到外交政策，其證據顯而易見：任何國家凡是能奉承美國經濟精英而建設對之有利的商業環境，即可獲得美國支持；若是以在地人民的福祉優先於美國企業、銀行和投資家的利益，這樣的政府必遭美國仇視。長年擔任辛巴威總統的羅勃·穆加比（Robert Mugabe）是非洲民族解放力量的英雄人物，他宣稱自己的國家遭受西方世界的嚴重經濟制裁，「原因在於他做了其他任何國家（份內應該）做的事，也就是關懷（它們的）人民並呵護人民的基本利益」。穆加比指出，美國和它的盟友們「採行這些經濟制裁，是要我們犧牲大多數人民的基本需求，反過來迎合它們的利益」。⁹另一方面，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這些國家，它們均能巧妙地安頓美國的商业利益，即可豁免於經濟制裁、戰爭威脅、顛覆推翻、動盪不安以及外力入侵。即使這些國家與自由民主的各種美德沾不上邊，而且它們的領導者也確實稱得上是殘暴的獨裁者而當之無愧，這些因素都不在考慮之列。

資本家對於商業議題的影響力，在外交政策領域比在國內政策方面更為強烈，因為一般平民百姓較少關心外交議題，或者比較不會感知到外交政策和日常生活之間有何關連。因此，會侵蝕人們切身經濟利益的國內政策容易招致反彈，然而外交議題如犧牲社會大眾而討好企業利益，卻不至於引起多大的阻撓。為了動員全體國人支持

其外交政策，美國的領導者善於利用神話以掩飾其追求私人經濟利益的侵略性行為。這個神話是這樣的：美國乃天性良善的泱泱大國，也是身先全世界的正義之師，因此美國所致力的目標當然是大公無私的。美國企業的片面利益能指揮外交政策卻不易引起巨大反對聲浪，另一個原因在此。¹⁰ 由此可見，美國外交政策的剝削本質，還有其政策與投資家、企業高層主管這類富豪的片面利益暗通款曲，大多數的美國社會大眾是聞所未聞的。

意識形態與敘利亞衝突

華爾街方面與敘利亞之間的戰爭，貫穿哈菲茲、巴沙爾·阿薩德父子前後兩朝。此中除了美國的帝國主義，另有四大意識形態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四大意識形態中，如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穆斯林兄弟會的遜尼派政治伊斯蘭二者，乃是起源於阿拉伯世界與歐洲殖民主義的正面衝撞。

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以追求大一統的阿拉伯國家為職志。帝國主義國家在它們的地圖室裡恣意擊劃邊界，將阿拉伯世界分割為多個國家。分居亞洲和非洲的兩大半土地，則是被以色列這個歐洲殖民主義遷占者國家（settler state）一分為二。1963年，一群隸屬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的軍官發動政變，此後敘利亞即是由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至今。復興黨人矢志追求阿拉伯國家的統一、擺脫外來勢力，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他們在阿拉伯世界裡針對美國和它的盟邦發起意識形態的挑釁，對以色列及早已和美國帝國主義水乳交融的阿拉伯君主政體也一視同仁。

如巴沙爾在內的復興黨人，對美國和它的盟邦同時造成遠在天邊和近在眼前的威脅。阿薩德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義信徒是遠程威脅的代表：他們渴望將全球將近四億操阿拉伯語的人口統一在一個龐大的國家之下，而且掌控阿拉伯世界無與倫比的石油資源。像這麼巨大的國家，複雜而精巧地結合了埃及、敘利亞、伊拉克以及石油財富連城的各個波斯灣阿拉伯國家，論其規模和財力，皆足以和美國在西亞及北非的霸權分庭抗禮。不僅如此，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阿拉伯超級大國，它的領土西起大西洋、東到波斯灣，蘊含大量石油與天然氣，勢必在世界舞臺上占有不容小覷的地位。它將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

美國政府採行如此野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其中與伊拉克有關者或許可謂始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亦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際。當時伊拉克政府係由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所統治，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致力於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等屬於復興黨的計畫。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此舉已開始威脅到美國於中東的優勢，而美國的目標就是要化解其威脅。華盛頓方面所憂懼的，是伊拉克入侵波斯灣國家的行動會使其勢力長驅直入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蘊藏量豐富的阿拉伯半島最後將無可避免地落入巴格達之手，也就是被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控制。如此一來，伊拉克併吞阿拉伯半島，或者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說法，則是為阿拉伯國光復領土，將會創造出泛阿拉伯國的核心。伊拉克已然與西方世界分道揚鑣，開始堅持其主權，並且和復興黨的理念互相聲氣。至此，伊拉克的石油資源猛然脫離西方石油公司的手掌心，不再容許他們予取予求地剝削伊拉克石油。阿拉伯半島不再隸屬於華盛頓方面無形帝國的一部分，等同美國讓失去了巨大的石油利潤，導致問題變得益加難解難分。

此外還有一項附加的危險：事實會證明這個**略具形貌的泛阿拉伯國家**，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吸引力將是**望風披靡、無人可及**，而且亦能鼓舞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士氣。一連串的骨牌效應將於焉上演：阿拉伯人起而反抗統治他們的國王、埃米爾和蘇丹，也就是那些在美國手中任其操縱擺佈的傀儡。在巴格達政府的領導之下，粗具

形式的泛阿拉伯國是否能成為激勵阿拉伯人心的一大良機，其關鍵在於：奉行阿拉伯社會主義綱領的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能不能善用國家的石油財富，為伊拉克的平民百姓謀福利，大幅提高其生活水準，遠遠超過前人作夢也想像不到的地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係以階級為基礎，然而阿拉伯社會主義與之不同。它是公有制以及後殖民經濟式計畫，其目標是克服阿拉伯世界被殖民而留下的落後、不發達後果。如果說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解放資本家剝削之下的勞工階級，那麼阿拉伯社會主義的目標就可以說是解放帝國主義剝削之下的阿拉伯人。只將阿拉伯社會主義計畫所涵蓋的範圍能擴及阿拉伯半島，並且以半島上不容置疑的石油財富挹注於盛大的基礎設施開發和社會福利計畫，則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便足以為他們的計畫樹立絕對可靠的信任。

如此一來，巴格達方面可堅守其承諾，以半島上的財富作為開發計畫的動力，全面提昇阿拉伯世界，就連石油稀缺的埃及這類地區也在所不棄。換句話說，紹德王室由於美國的羽翼才得以在沙烏地阿拉伯建立反民主王朝，此時將會交出被其壟斷的石油財富，成為全體阿拉伯國的公產。這樣的願景多麼振奮人心！但是華盛頓方面絕不允許它收服全球四億阿拉伯人的民心。因此，美國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入侵行動和經濟戰，其目的正是要讓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實驗落得一場空歡喜，最後則是徹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勢力和影響。這個進程有個正式的名稱：去復興黨化（de-Ba'athification）。本書的中心主題是：華爾街方面針對敘利亞的戰爭，也是出於上述相同的目標，亦即對敘利亞的去復興黨化，同時完全消滅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敘利亞境內的影响力。這是美國霸權剷平阿拉伯民族主義威脅的手段，不僅是在阿拉伯世界如此，在全世界亦然。

阿拉伯民族主義對美國的威脅，更迫在眉睫的是他們堅持要脫離外來勢力而獲得自由，這樣的意識形態自然不是華盛頓方面所能接受的。在華盛頓方面，帝國主義的思想無所不在，只不過被美國那一套世界領袖捨我其誰等等冠冕堂皇的修辭掩蓋了。復興黨在其創黨文告中呼籲阿拉伯人「發揮一切鬥爭的力量，徹底摧毀……國內每一股外來的政治和經濟勢力」。任何國家，只要是像美國那樣不斷在各種官方文件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乃「不可或缺」、¹¹「美國的領導地位至關重要」，¹²以及美國「將是全世界的馬首是瞻」，¹³都無法容忍復興黨那樣的要求。

美國自封為世界領袖，為了配合其地位，它也正式頒行全球經濟秩序，要求舉世接受開放市場和自由企業。華盛頓方面毫不掩飾地認為這些制度符合美國企業的利益，而且它們的目的正是提昇美國企業在全世界所能獲得的好處。美國確實也是要让這些制度成為它所稱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礎。美國國務院在《2004-2009年財政年度使命宣言》中宣示：美國將「更加大膽地促進世界……融入全球經濟」，美國也將會「提昇經濟自由」並「支持所有鼓勵……自由企業的方案」。更加大膽的表述，是美國在《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宣布：美國將會透過「開拓開放市場和整平美國企業在外國的……運作環境」，使美國「能夠、也將會領導全球的經濟」。華盛頓方面亦會致力於「（降低）美國產品的關稅，（以及破除）對（美國）產品和服務造成的障礙。」美國的領導地位將會連帶產生行動，用以阻撓「國家型資本主義」；它所參照的對象，是主導中國經濟的國營企業，國營企業在敘利亞的地位也同樣舉足輕重。

美國針對華盛頓領軍的全球經濟應如何組織開出了處方，我們也不妨將之與復興黨提出的經濟綱領並列合觀。後者指出：產業「將與國家生產力共同受到保護，免於面對外國生產力的競爭」；天然「資源和運輸工具應由國家直接管理」，以茲迎合公眾利益。勞工「應參與工廠的管理，並且獲得薪資，（外加）利潤分紅，此部分

由國家裁定」。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拉克政府於1990年所制定的臨時憲法宣告「國家負責規劃、指揮及引領全國經濟」。華盛頓方面以世界領袖自居，然而復興黨以上的作法卻有損於華盛頓方面推動的經濟政策。它們和華盛頓方面念茲在茲所要建立的全球經濟秩序格格不入。

「酸民」們或許仍會堅信：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對於社會主義的承諾不過是說一套做一套。但這種看法所忽視的事實，卻是規劃、指揮及引領阿拉伯經濟等等阿拉伯社會主義的主張，已在掌權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派手中實踐，這一點無可否認。攪起阿拉伯民族主義經濟政策骨架的意識形態，究竟能否被冠上社會主義之名，容或有爭議的餘地。然而包括敘利亞在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其經濟行動方針已被美國官方堅定地視為社會主義。如前文已經提到的，有些人甚至早就將阿薩德的父親哈菲茲貼上阿拉伯共產黨徒的標籤；還有一些人則是認為敘利亞在巴沙爾政府統治下所採行的經濟政策，是取法蘇俄的模式。

政治伊斯蘭

華盛頓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中，第二個重要的意識形態力量，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伊斯蘭。它崛起於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國家埃及，是為了反抗統治埃及的英國。一如阿拉伯民族主義，穆斯林兄弟會也是對於入侵阿拉伯世界的歐洲殖民主義作出回應。與之不同的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為了動員阿拉伯世界而推行的種種方案，其基礎是同文同種；但穆斯林兄弟會所追求的伊斯蘭大一統，其統一的基礎在於伊斯蘭認同，而非阿拉伯人身分。相對於西方文化，伊斯蘭教顯得衰弱不振，穆斯林兄弟會的振興之道是重返純粹的伊斯蘭教。所謂純粹的伊斯蘭教，

是指最初幾代穆斯林所奉行的教義，亦即原教（Salaf）。「原教主義」（Salafism）這個詞的意思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正是源自「原教」一詞。穆斯林兄弟會拒絕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認為它們是來自西方世界的異物，因此也是虛假的意識形態，盡是從人類的殘缺心靈所得到的產物。它們的來源並非《可蘭經》，世上唯有《可蘭經》中的一字一句才是完美真神的啟示。受穆斯林兄弟會影響的伊斯蘭教徒主張，西方人在穆斯林世界的居民身上所加諸的污辱，其解決的對策不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伊斯蘭教。此外，面臨左翼勢力積極計畫脫離西方國家的控制，西方國家政府正苦思對策欲解決問題。這些仇視西方國家的左翼意識形態順水推舟地成為伊斯蘭教徒可貴的同道。與此同時，同樣的西方國家政府則又必須妥善應對政治伊斯蘭，將之視為反帝國主義解放運動的替代方案。於是，對西方世界來說，政治伊斯蘭既是盟友也是對手。在1980年代，奧薩瑪·賓拉登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以及莫斯科方面在阿富汗的左派政權盟友；後來賓拉登則是武裝反抗美國駐軍在穆斯林世界。賓拉登的實例正清楚說明了政治伊斯蘭所扮演的雙重角色。

穆斯林兄弟會鼓吹嚴厲的清教徒式規範，同時提倡一種思想：主張單憑《可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紀錄，也就是伊斯蘭教的「教規」（Sunna），二者即足以管理現代社會的道德、政治和經濟生活。該組織的創始人哈桑·班納（Hasan al-Banna）為他的運動而頒布的座右銘如是說道：「真主阿拉是我們的目標，先知是我們的模範，《可蘭經》是我們的憲法，聖戰是我們的道路，為阿拉的事業慷慨赴義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渴望。」¹⁴ 想要理解穆斯林兄弟會的西方人，可以想像基督教的運動，並且帶有類似的座右銘如下：上帝是我們的目標，耶穌是我們的模範，《聖經》是我們的憲法，宗教之戰是我們的道路，為耶穌慷慨赴義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渴望。任職於中東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羅勃·巴爾（Robert Baer）指出：「九一一」劫機犯所奉行的生死準則，正是穆斯林

兄弟會座右銘發揮的實際作用。15

薩義德·庫特布 (Sayyid Qutb) 是穆斯林兄弟會運動在1960和1970年代的首要擁護者，而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尤其是庫特布的理论，確實嚴重影響了蓋達組織的世界觀。賓拉登身邊的中尉阿曼·薩瓦里 (Aymen al-Zawahiri) 繼賓拉登之後成為蓋達組織的首領，他在十四歲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蓋達組織的其他高階領導人物，同樣也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傑·所羅門 (Jay Solomon) 所報導的：「對西方及阿拉伯獨裁者發動聖戰時，賓拉登以及蓋達組織的其他領導們，都引用了穆斯林兄弟會昔日思想家庫特布著作，用以激勵軍心。」此外如埃及和敘利亞的兄弟會軍隊成員，同時也是賓拉登運動的中堅幹部。¹⁶

穆斯林兄弟會活躍於敘利亞，其歷史已經很悠久。1963年時軍隊中的復興黨成員掌握敘利亞政權，在此之前穆斯林兄弟會早已和復興阿拉伯社會黨的黨羽在街頭激戰多年。自從1963年之後，敘利亞兄弟會便開始與復興黨展開一場永無止境的生死纏鬥。在敘利亞，復興黨依舊穩占優勢，穆斯林兄弟會則是它最大的勁敵。這場戰鬥而如火如荼時而漸趨衰弱，以1982年在大城哈馬 (Hama) 的武裝暴動為嚆矢，到了2011年再度興起，則是遍及敘利亞全境。

頭號敵人

在敘利亞爭奪戰中，另有兩大政治伊斯蘭運動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們集中於兩個區域性的力量。

首先是**革命後的伊朗政權**。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與之結盟是其來有自的，因為他們共同尊崇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三大核心價值。這三大核心價值是：承諾解放中東，擺脫西方的控制；堅決反對巴勒斯坦的殖民定居（在統治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眼中，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國家；但是從伊朗的伊斯蘭教徒來看，則是穆斯林國家）；以及國家主導模式的經濟發展。敘利亞、伊朗以及真主黨 (Hezbollah) 這個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啟發的黎巴嫩伊斯蘭全國反抗運動，三方結合而形成所謂的「**反抗軸心**」 (Axis of Resistance)，聯手對抗西方國家在中東的控制。真主黨成立於1982年，目的是驅逐占領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人。猶太復國運動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的遷占者國家，美國乃是其背後的贊助力量。美國之所以能在西亞和北非強行施加其霸權，以色列居功厥偉。反抗軸心的一大重要任務，正是反抗猶太復國運動。

華盛頓方面從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中嗅到的危險之一，是此次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猶太復國運動意涵，或許對阿拉伯世界的人心將會產生激勵作用。以色列是歐洲殖民主義植入阿拉伯世界的遷占者，然而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力量仍未能將之拔除；由歐洲殖民主義所鑄鑄並由華盛頓方面維繫於不墜的枷鎖，他們也依舊無法全面突破。但是伊朗革命的形勢卻大相徑庭。伊朗原有的沙王 (Shah) 是美國扶植的傀儡獨裁者，竟然會在革命中被成功推翻，伊朗革命甚且將國家帶上了自主的經濟發展及政治獨立之路。寄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國王、埃米爾、蘇丹和獨裁者們，不過是華盛頓方面帝國主義老大哥們的區區代理人，被安排在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主持局面罷了，而伊朗革命將會鼓舞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揭竿而起，掙脫被統治者加諸一身的層層壓迫。真主黨（以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它是受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啟發而成立的巴勒斯坦全國解放組織）以身作則，證明伊朗革命足以激發阿拉伯人挺身而出，採取政治行動以反抗外來勢力對生活的干擾。

此外，哈菲茲·阿薩德的敘利亞政府則是作了另一項示範：只要都是為了從西方的控制勢力中解放，那麼在

共同的追求目標之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非常樂意和伊朗的政治伊斯蘭運動締結同盟。

在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中，伊朗就算不是主要目標，也是附加目標。就西亞石油蘊藏量豐富的區域而論，伊朗對於美國優勢地位的威脅，遠遠超過美國眼中的敘利亞。伊朗比敘利亞的國土更大、國力也更強，它以伊斯蘭為號召，在阿拉伯世界亦獲得眾多回響。美國對敘利亞發動戰爭，有可能讓德黑蘭方面一個最親密的盟邦筋疲力盡；縱然無法將之一舉消滅，亦可削弱伊朗的力量。再者，伊朗之所以能夠運送武器到真主黨手中，乃是因為敘利亞協助，得以取道位於二者之間的敘利亞國境，才能暢行無礙。因此，若能將這個阿拉伯民族主義共和國逐出反抗軸心，等於是將伊朗隔離於黎巴嫩的全國反抗運動，可藉此減弱其力量。

瓦哈比主義

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教是「瓦哈比主義」(Wahabism)，它的特色為清教徒風格加上以殘暴手段反對什葉派。依華盛頓的看法，阿拉伯是足以和伊朗的政治伊斯蘭勢均力敵的完美對手。

首先，瓦哈比主義有別於穆斯林兄弟會運動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它並不與西方的控制勢力作對。瓦哈比主義始於十八世紀，此一教派素行凶殘，對伊斯蘭教義的詮釋屬於基本教義派立場。它的淵源完全無涉於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與歐洲殖民主義的糾纏。它是一種沙漠型的意識形態，紹德王室利用它來強調對威權之服從，藉以合法化自身的統治地位。瓦哈比主義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提供宗教合法性，與帝國主義可謂相處融洽。西方國家勢力插手東中，瓦哈比主義完全不足為害，它不會鼓勵阿拉伯人造反，也不至於激發穆斯林革命。然而，瓦哈比主義和穆斯林兄弟會畢竟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返回伊斯蘭教昔日的生活形態。

不過，即使有相同的行動方針，瓦哈比信徒和穆斯林兄弟會卻是各有不同的理由。穆斯林兄弟會亟欲奉行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使徒所代表的原始伊斯蘭教，因為他們相信：唯有這條路才能逆轉伊斯蘭教相對於西方文化的衰落狀態。穆斯林兄弟會深信伊斯蘭教如今的地位沒落、喪失了往日榮光，純粹是因為穆斯林不夠虔誠；就像亞當和夏娃也是因為不遵從上帝的叮囑，才會被逐出伊甸園。(同理，某些馬克思主義派也是堅信共產主義的傾頹起因於馬克思主義者悖離了馬克思的原始思想。他們所崇仰的復興共產主義之路，是提倡回歸「純粹」的馬克思，並且揚棄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等諸如此類的「沉積物」。看來馬克思主義也有自己的「原教主義派」。)如果說疾病的病因確實是在於信仰已誤入歧途，那麼解藥之所在，正是重新回到那一條真實、純粹和原初的道路。因此，對穆斯林兄弟會來說，原教主義本身只是手段，反帝國主義才是目的。瓦哈比主義的原教主義派則與之相反。巡迴牧師阿布多·瓦哈比(Abd-al-Wahhab)深信某個版本才是伊斯蘭教唯一正確的教義。瓦哈比主義的原教主義派作為手段，目的全然是為了實現阿布多·瓦哈比所創建的教條，如此而已。

瓦哈比不僅自以為了解純粹形式的伊斯蘭教，並且認為凡是對伊斯蘭教的看法和他有所出入的人，若非異教徒則為叛教者，皆必須因為不聽從真主的言語而受到懲罰。他和紹德家族共組聯盟，紹德家族隨之建立一支民兵，名為伊赫萬(Ikhwan，意即「兄弟會」)。伊赫萬遂在阿拉伯半島掀起了恐怖紀元，他們任意屠殺非信徒、斬首「叛教者」，各式各樣的暴行罄竹難書，為二十一世紀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恐怖主義活動劈劃了先聲。1802年，兄弟會洗劫「現今屬伊拉克的什葉派聖城卡巴拉(Karbala)」，殘殺城中大部分居民，也摧毀了什葉派伊斯蘭創始人陵墓上的穹頂」。17

沙烏地王國挾其鉅大的石油財力，廣泛而深入地宣揚瓦哈比主義。伊斯蘭國的種種惡行，也有一部分乃是受到如此邪惡的教派意識形態薰陶。不過，這並非意味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是純粹的瓦哈比主義。伊斯蘭國並非瓦哈比主義。此一伊斯蘭組織固然擁護瓦哈比主義反什葉派的思想，另外它也融入了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元素，同樣反對為非穆斯林勢力充當代理人的政權。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為華盛頓方面經營衛星，就是一個活例。伊斯蘭國的徒眾譴責沙烏地王朝與西方國家及以色列狼狽為奸，同時認為沙烏地的君主政體乃是非伊斯蘭體制。

瓦哈比主義特別吸引美國的戰略專家，其原因在於瓦哈比主義反什葉派的立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領袖屬於什葉派穆斯林，而伊朗革命所可能吸引到的阿拉伯人與穆斯林之中，大部分穆斯林都是遜尼派。因此為了削弱其魅力，其中一個方法是助長反什葉派的仇恨心。對什葉派「叛教者」的憎恨之心使伊斯蘭國大為振奮，他們投入了大量精力，針對多處什葉派目標發動猛烈攻擊。如此一來，也造成什葉派對遜尼派的不信任和敵意。其結果便是升高教派之間的衝突，導致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崩離析，成員之間只顧著忙於彼此交戰，而非團結一致以擺脫共同的壓迫者。

分而治之

在被征服者之間進行新的分化，同時加深舊有的分歧，這些都是帝國主義者老掉牙的招術。羅馬人將這類刻意製造離心離德的手段稱為 *divide et impera*，意思是「分而治之」。呼籲阿拉伯團結的號角響著：「全世界的阿拉伯人聯合起來吧，你會失去的只是你的鎖鏈！」（這是套用《共產黨宣言》那一句著名的口號）然而，帝國主

義強權們心裡有數，只要阿拉伯人全心全意地為門戶之見而戰，對那樣的口號只會充耳不聞。這是無庸置疑的。在穆斯林世界也有類似的團結呼聲，而其遭遇也雷同。我們可以這麼說：瓦哈比反什葉派的思想得以在全世界散播，還有誰會比沙烏地王朝在華盛頓方面的贊助人來得更樂見？華盛頓方面所感興趣的，是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持續四分五裂下去，而且遜尼派也同樣繼續反對由什葉派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伊斯蘭革命。

「阿拉維派」(Alawites) 則是什葉派伊斯蘭一個非正統分支的追隨者，隸屬於敘利亞的少數族裔，卻意外變得舉足輕重。以他們相對的人數來說，在復興黨的統治之下他們具有過度的代表性。在敘利亞，阿拉維派有史以來均遭受遜尼派多數族群歧視。因此，一旦有政黨採取明確的世俗立場、反對教派對立，而且其追求的目標是超克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分裂，這樣的政黨便能吸引他們投效。復興黨的創黨元老們強調阿拉伯人的民族身分優於教派認同，並且以此作為阿拉伯的統一之路。阿拉伯世界在強勢的遜尼派當權之下，弱勢的宗教派別備受歧視已久，它們的信眾自然會被復興黨吸引。復興黨的目標以及讓阿拉伯世界不再有教派歧視的偉大願景，感動了哈菲茲·阿薩德，同樣也感動了阿拉維派。

出身於貧窮社群的人若是能在從軍生涯中躋身軍官階級，即可脫離窮困的生活。這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乃是真實不虛的，對阿拉維派中具有才幹的人而言也一樣千真萬確。相反地，比較富裕的遜尼派是經商的主力，而且屬於地主階級，他們不太可能會投身軍旅。於是，阿拉維派（以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成員在敘利亞的軍官階級和復興黨的黨員中，占有極不成比例的強大多數；而遜尼派的代表性則是弱勢，同樣非常不成比例。因此很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若是發生了軍事政變，政變的首領會代表少數社群，而且擁護復興黨支持少數族群和反教派對立的意識形態。

1963年，有一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軍人集團在政變中奪權，他們都是出身敘利亞的少數族群以及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哈菲茲·阿薩德也是這場政變的首領之一。七年之後，阿薩德領軍進行第二次政變，這一次是針對他原來的同志。他稱呼此次政變為「矯正」。阿薩德決心要帶領國家前進的方向，和他的前同志們所走的相比，是比較不強硬的左翼路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政府的施政已經疏遠了大多數的人民。他認為應該利用說服的方式去贏得保守穆斯林的民心，而非以力服人。因此，他呼籲採行緩步前進的作法。

一旦參與了宮廷算計，阿薩德深知務必在身邊佈滿忠心耿耿的心腹，否則他能在朝中掌權的日子將會如同曇花一現。阿薩德最能信任的人，理所當然正是他的親友；而他的親友也理所當然都是出身他自己的阿拉維社群。因此，最高的國家安全職位都是任命阿拉維派成員。他們這些阿拉維派被選任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阿薩德看上他們的宗教認同，而是因為他們是親戚關係或者有深厚交情。迄今為止敘利亞始終是個極其不穩定的國家，為了能夠延續政治生命，阿薩德不得不毅然決定在身邊廣佈親信。隨之而來的，正是阿拉維派在重要的國家安全職位占有過高的比例。

話雖如此，國家安全機構的眾多高層職位都被阿薩德的親友們接管，對穆斯林兄弟會而言無疑是天降福音，同時也是阿薩德政府的一大致命傷。這個事實讓兄弟會得以向占多數族群的遜尼派大肆宣傳其無稽之談：阿薩德政府是接受教派綱領指導的工具，其目的是遂行阿拉維派的統治。二十世紀中葉，在美國人口中猶太人所占的比例並不多，相對來說他們在美國共產黨卻有過高的比例。因此，美國共產黨即遭到指控，斥責他們是在追求猶太人計畫。這就像指控「復興黨是阿拉維派的工具」，二者可說是如出一轍。

指控哈菲茲和巴沙爾兩任阿薩德政府是教派工具，這樣的神話持續了數十年。它之所以能如此綿延不絕、歷久彌新，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歸功於華盛頓方面及其遜尼派伊斯蘭盟邦們能善用它的政治效益。北美和西歐的新聞媒體利用這一則神話含沙射影：它們往往藉此栽贓巴沙爾·阿薩德的敘利亞政府，將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說成是敘利亞的教派衝突而引發的內戰，是敘利亞被少數族群阿拉維派奪權後，為了擴大其教派利益而不惜犧牲遜尼派多數族群的利益。

因此，西方媒體總是以「阿拉維派領導的」來描述敘利亞政權，至於武裝反抗軍陣營，則只是用「遜尼派為主」來輕描淡寫。這種說法所忽視的現實是：「敘利亞阿拉伯軍」(Syrian Arab Army)以及阿薩德的內閣，同樣也是以遜尼派成員為主；而且這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和伊斯蘭聖戰士(有美國和它的盟邦在背後撐腰)雙邊的政治(而非教派)衝突。在西方論述中，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被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描繪成因為古老的種族間仇恨而四分五裂的區域。將敘利亞戰爭渲染成教派戰爭的神話，可符合此一偏見；而且，使美國這個以世界的正義之師自居的勢力得以師出有名，必須親自介入以維持秩序。基於以下幾個理由，美國的策略專家們認為宣傳以上的認識方式是十分有利的：

首先，它可以鞏固**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戰略**。西方媒體所傳遞的意識形態綱領不僅西方的閱聽人會收到，西方以外的閱聽人亦然，其中也包括敘利亞人。敘利亞的遜尼派多數族群對敘利亞政府的認識，假使能被導向將之視為阿拉維派社群的工具，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會更有幫助，有利於根除敘利亞國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勢力。

其次，把阿薩德政府打成阿拉維派的壓迫工具，此一神話能掩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在中東和阿薩德政府中所扮演的中堅角色**，藉此混淆敘利亞衝突的真正政治意涵。阿薩德政府對於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的價值所作的承諾，也就是解放外國勢力的控制、由國家主導、規劃與控制的經濟形態，以及追求阿拉伯國家之大一統，凡此

種種，據我所知西方媒體從未有任何著墨。如果能夠認可敘利亞政府所奉行的意識形態架構，而不是將敘利亞的領導者說成利慾薰心、為了擴張教派利益而充當阿拉維派少數族群的馬前卒，則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即可化身為理性的行動家，許多人將會同意他們所追求的目標雖不值得鼓勵，至少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為了能夠有助於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美國戰略家所偏愛的作法，是將阿薩德塗抹成渴望權力的阿拉維派暴君形象，遮蓋其政權的真正主旨乃是阿拉伯民族主義。

第三，假造阿薩德政府的動機，將它說成是受到教派驅使而非出於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計畫，能夠促進世人諒解美國所領導的行動，亦即以西方的力量干涉敘利亞政治，實有其必要性而且是民之所欲：敘利亞正發生宗教少數派壓迫多數派的情事，導致國家動盪不安，而美國此舉是基於崇高的人道主義理由，是要為敘利亞帶來和平的王師。

簡而言之，營造「阿拉維少數派壓迫遜尼多數派」的神話，既可激化種族衝突的現象，更能隨之合理化美國的行動，由它領銜督軍，以政權變革計畫解決其內戰問題。

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所追求的計畫，與美國帝國主義的目標水火不容，華盛頓的終極目的當然是維護自身在敘利亞的領導地位。華盛頓方面已宣告其行動意圖是「大膽地促進世界……融入全球經濟」，而那樣的經濟結構是為了提昇美國的商业利益。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徹底否定美國的優先地位，尤有甚者，他們所偏好的統制 (dirigiste) 經濟更是與華盛頓的意圖南轅北轍。美國在敘利亞從事去復興黨化行動，不僅能移除美國在黎凡特 (Levant) 地區領導地位的障礙，同時也能削弱敘利亞的波斯盟邦伊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夢想建立泛阿拉伯超級大國，既是讓阿拉伯世界從外國勢力數百年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亦是挑釁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國的去復興黨化行動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將是致命的一擊，欲讓它一蹶不振。

至於德黑蘭方面的伊斯蘭革命家們，也和他們在大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盟友一樣：一方面對於美國自以為是的全球領袖地位強烈地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也同樣贊同以國家之力穩健干預的經濟。伊朗的革命家們將民營企業劃入附屬地位，必須聽令於國營事業。從華盛頓方面華爾街所定義的經濟正統觀點來看，這確實是大逆不道的眼中釘、肉中刺。華盛頓方面才宣稱「美國能夠、也將會領導全球的經濟」，¹⁸ 大馬士革和德黑蘭卻異口同聲、斬釘截鐵地打臉美國。往後有關敘利亞和伊朗經濟的決策，將分別歸入兩國的決策機制，不再讓渡給華盛頓方面以及它的華爾街金主。

阿薩德曾向阿根廷的記者強調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對敘利亞獨立自主的承諾：「敘利亞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不會讓人民為西方國家的利益而活。」¹⁹ 華盛頓方面要求所有國家一律對美國俯首稱臣，阿薩德卻是毫無保留地大唱反調。

定義戰爭

「戰爭」往往如同英國科學家兼社會科學家霍爾丹 (J.B.S. Haldane) 所說的，是軍人朝敵人身上推刺或投擲金屬物的殺戮事業。²⁰ 但是，偉大的波斯戰爭理論家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 另有不同的看法。他對戰爭的定義較為寬鬆：即致力於將自身的意志施加在敵人身上。²¹ 據此定義，軍事的行動僅是戰爭的種種可能方式之一。封

鎖或圍困是企圖以饑餓迫使敵人順服的手段，這是自古以來屢見不鮮的戰爭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海軍封鎖德國，據估計餓死了75萬名德國人民的生命，²²即使在簽署停戰協定之後，英國仍堅持進行其封鎖戰事。

時至今日，「經濟戰爭」這種形式往往就如同政治學家約翰·穆勒（John Karl Mueller）與卡爾·穆勒（Karl Mueller）所稱的「大規模毀滅式制裁」。²³ 1990年代，當時的伊拉克是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統治之下，即遭受過以美國為首的政權惡意的制裁。制裁的目的表面上是逼迫伊拉克銷毀其生化武器的軍火庫；然而基於政治理由，卻故意誤稱之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核子武器的毀滅能力相比，生化武器根本微不足道；也唯有核子武器才稱得上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當之無愧。

讓我們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說明：需要耗費7萬噸的毒氣，才能造成廣島區區一顆原子彈所達到的死亡人數。²⁴換個說法：才一顆原子彈就在廣島當場殺死了7萬條人命。²⁵相對來看，如果是在理想的天氣狀態下（即天色陰霾而且風平浪靜）、投放在人煙稠密之處、而且是針對毫無防護的人群，則一架負荷典型載重量神經性毒氣的火箭將會使108到290人喪命。只要吹起和風或者出現陽光，那麼死亡人數將是11到29人。²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殺死的人數，是數以萬計或以數十萬計的，可不是幾十或幾百。

巴格達並無名符其實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而此一事實讓華盛頓方面的宣傳家無動於衷。當下的重點，是務必使伊拉克軍方看起來像是**唯一的威脅**。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消耍一點小計謀就夠了：那就是賞給伊拉克的生化武器一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高帽子。這樣的作法就好像指稱玩具手槍是大砲，可是它真的奏效了。於是，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在一夜之間變成世界和平迫在眉睫的威脅。

根據兩位政治學家穆勒的觀察，有史以來可歸咎於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造成的人命損失，還不如此次各種制裁導致伊拉克人民死亡的人數。²⁷美國國務院稱這些人命「值回票價」。換句話說，在富藏石油的阿拉伯世界，為了能夠繼續保有美國的霸權，那只是一筆小小的代價。為了美國……那真的不過是一筆小數目。華盛頓方面對伊拉克發動封鎖戰，從華爾街的銀行家到華盛頓的官方人員，乃至其他任何美國公民，確實並無一人因此而喪生。如果你正在規劃著美國的外交政策……這是值得的，當然沒錯。

許多和平運動者欣然接受以制裁作為軍事的替代手段。軍事的行動是朝敵人推刺或投擲金屬物，和平運動者遂誤以為制裁不是任何形式的戰爭，而是以和平的方式達到強制的目的。和平運動者不知道的是，這些手段所造成的毀滅後果就算沒有比前者來得大，至少也是一樣嚴重。進行封鎖行動，是將美國的意志施加於伊拉克，因而形成了重大傷害。依照克勞塞維茨的定義，制裁就是一種戰爭形式，這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若是將戰爭定義為：以製造傷害或威脅的方式，將自身的意志施加於敵人身上，則戰爭涵蓋了廣泛的活動，包括：

- 威脅進行核子殲滅
- 訓練及武裝遊擊隊員，對敵人發射金屬物
- 經濟制裁
- 威脅入侵
- 支持內部反對團體從事活動以造成內部動亂
- 暗中破壞

依照以上定義，美國對敘利亞發動戰爭的時間，比2011年還早了許久。

當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在大馬士革取得政權之際，他們立下座右銘並決心在這個願景引領下戮力以赴，使阿拉伯世界脫離外來強權長達數百年的控制，重獲自由。這則座右銘是：「**統一，自由，社會主義。**」

從那一刻起，這場戰爭就開始了。

阿拉伯主義之地
THE DEN OF ARABISM

西方強權國家厭惡馬克思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不樂於見到阿拉伯世界有一天竟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或者說得具體一點：掌控他們的石油。

復興黨的黨章開宗明義就說道：「阿拉伯人屬同一民族，得生活於統一的國家之下，乃其天賦的權利。」僅此一句公開宣言就足以讓華盛頓感受到滿滿的敵意。它所懷抱的願景是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迥異於2011年當時中東和北非既有的局面，也有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而鄂圖曼帝國瓦解之際，英法兩國聯手打造出來的阿拉伯世界。

據阿拉伯語的人口大約有四億，他們居住的領域西面起自大西洋，一路伸展到波斯灣。復興黨人所設想的，是將這片廣袤土地上的群體團結成為統一的國家，亦是繼中國的漢朝之後，世上第二大的泛種族集團，不再是分裂為二十二個小國，非但虛弱不振，彼此之間更是紛紛擾擾不休。不僅如此，復興黨人也相信：阿拉伯超級大國應該具有真正獨立的地位，擺脫外國勢力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干預。時下在波斯灣和北非遍佈美國（以及其他外國）的軍事基地，而復興黨的願景意味此一軍事鏈宣告壽終正寢。

同樣重要的是，它也代表全體阿拉伯人將會接管該區域龐大的石油礦藏，而非壟斷於國王、埃米爾和蘇丹之手的資源，他們不過是由英國扶植及美國掌控的石油王國。還有一點亦令華盛頓方面備感震驚：為了建立獨立而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復興黨所要採取的手段是公有制和計畫經濟，也就是透過社會主義方法。社會主義是華爾街方面深惡痛絕的思想，美國政府當然也隨之感到難以忍受，畢竟華爾街對美國政府擁有強大無比的影響力。

敘利亞人薩推爾·胡蘇里（Sati al-Husri）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第一代思想家之一。阿拉伯人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長達四百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帝國崩毀為止。在大戰的最後幾年，夏里夫·侯賽因（Sherif Hussein）領軍反抗土耳其政權，志在跨越黎凡特地區及阿拉伯半島，建立政治上獨立自主的大阿拉伯國家。叛軍領袖們在大馬士革建立了一個王國；然而「協約國」（Allied Powers）對於阿拉伯世界的未來卻是另有

盤算，包括將猶太人的祖國植入其中。在胡蘇里眼中，阿拉伯世界「是天造地設的文化實體，擁有政治主權乃是其不可剝奪的權利」；英國和法國則是在倫敦與巴黎的地圖室裡恣意籌劃國界，將之瓜分為眾多分裂國家；至於當地阿拉伯居民的意願為何，全然不在其考慮之列。這些分裂而成的國家之中，有一些在本質上是強權大國的殖民地，其他則不過是圍繞在油井四周的領土，由若干君主統治，以迎合倫敦方面的旨意為尚。

阿拉伯國的雄圖

在鄂圖曼帝國境內，敘利亞的版圖幅員廣大。英法兩國在私心的驅駛之下，將之分割為現今的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約旦等四個國家。其中敘利亞和黎巴嫩淪入法國的統治之下，1920年法國入侵位於大馬士革的王國，使敘利亞成為其實質殖民地。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從事了許多改變政權的行動，正是發軔於此。此外，巴勒斯坦和約旦乃劃歸英國治理。倫敦方面承諾讓巴勒斯坦成為猶太人的祖國，移居此地的人口主要來自歐洲，而原來居住於當地的阿拉伯人唯有被迫遷離。

胡蘇里指出，這些外來的殖民強權刻意分裂阿拉伯人的國土，目的是閹割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一旦將阿拉伯世界分化為眾多國家，每個國家都會有各自關心的在地議題，並且會致力於維護本國的主權，則同屬阿拉伯民族的所有國家之間，勢必不斷發生矛盾衝突而永無寧日。如果想要大舉挑戰歐洲勢力對阿拉伯國家的控制，阿拉伯眾國家之間務必彼此互相配合及團結，然而要達成此一目標無異癡人說夢。

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國家，對於擊退外來的入侵者同樣也是無能為力。這些入侵者之中有歐洲的猶太人，他們

所進行的殖民計畫，是在阿拉伯人國土的心臟地帶建立遷占者國家。胡蘇里認為，除非阿拉伯民族的各個國家能合併成為統一的阿拉伯國，否則阿拉伯人將任由敵人予取予求，永世不得翻身。為了證明他的論點，他提出這樣的大哉問：在1947到1948年的戰爭中，為何七個阿拉伯國家聯手卻在猶太復國運動中落敗？答案是：阿拉伯國家一共有七個。⁴胡蘇里亦認為，為能克服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在解放殖民統治的戰爭中獲勝，以及贏得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阿拉伯人必須團結、統一成單一的阿拉伯國，才能通力合作，集中力量以提昇其軍事和經濟；唯有如此，始能建立並確保阿拉伯人的自主權。阿拉伯世界的獨立之路，只有統一、合作、領導中心和國家規模一途。

胡蘇里的分析並非無的放矢。以巴勒斯坦來說，它是阿拉伯人國土上微小卻重要的一部分。居住於此地的阿拉伯人之所以未能贏得獨立自主，巴勒斯坦族群內外部的各種分歧難辭其咎。歷史學家拉希德·卡里迪（Rashid Khalidi）指出，在1947到1948年的戰爭中猶太復國運動的勢力於阿拉伯世界望風披靡，很大的原因在於猶太復國派擁有領導中心、能互相配合，也有一致的目標。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一無所有的。

「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均服膺猶太復國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整齊劃一。反觀巴勒斯坦人，他們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諸如鄂圖曼阿拉伯思想、伊斯蘭教、基督教、在地巴勒斯坦思想和歐洲思想等等元素，可謂無所不包。在巴勒斯坦一地，猶太復國運動派族群受到歐洲猶太族群感召，主要是因為其中的世俗因素。然而，因為伊斯蘭與基督教的宗教基礎不同，巴勒斯坦人內部卻是壁壘分明。猶太復國運動派具有建立組織的傳統，此一傳統表現在強大的工會、合作社運動和社會主義取向的農業定居等方面。

相對地，巴勒斯坦人大多數都是務農為生，缺乏任何正式組織的傳統。猶太復國運動派已發展出政府官僚體系、代議機構和核心的正規軍隊。凡此種種，在巴勒斯坦社會同樣付諸闕如。猶太復國運動派唯一的認同和目標，就是猶太人能在巴勒斯坦建立祖國。反之，巴勒斯坦人固然早已開始從民族的觀點反思其身分，但這只不過是好幾個重疊的身分認同其中的一個。那些身分認同包括大敘利亞（Greater Syria）一分子、大阿拉伯民族，以及宗教、地方與家庭方面的各種身分等等。」⁵

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能登上國際舞台而獲得關注，巴勒斯坦人萊拉·卡列德（Leila Khaled）居功厥偉。她指出巴勒斯坦人缺乏領導中心、權威、協調和團結，阻礙了政治目標的實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無法成功保衛及光復自己的國土，讓她在自傳《我的同胞一定要活下去》（My People Shall Live）一書中引以為鑑，認為這是在警示缺乏組織所造成的危險處境。她說道：「巴勒斯坦人民正是渾沌社會的活生生寫照，由於缺少權威和領導中心，其下場就是淪為猶太復國運動壓迫者的俎上之肉。」⁶

敘利亞的復興黨創立於1940年代，創始人為米歇爾·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和薩拉·阿比特爾（Salah al-Din al-Bitar），他們都畢業於法國的索邦（Sorbonne）大學，是大馬士革的學校教師。素來謠傳復興黨的建黨目的是為了促進阿拉維派的利益，實情正好與此相反：阿弗拉克是基督徒，阿比特爾則是遜尼派穆斯林，他們兩人均將教派意識、門戶之見視為該黨創黨宗旨的死對頭。復興黨的主要目標，是以阿拉伯人共同的民族認同為基礎，超越教派和其他種種隔閡，建立統一的國家。

復興黨的起源十分類似民族主義兼共產主義者胡志明所發起的越南革命運動：兩者均是反抗法國的殖民主義、創始人皆是在法國受教育的知識分子，而且都是要使國家脫離法國的統治。然而，他們同時也都希望國家能

夠仿效法國而達到現代化；

對阿弗拉克和阿比塔爾而言，「分崩離析的局面務必被克服，解決之道在於實行改良版的社會主義以弭平貧富差距、採用修正後的伊斯蘭理念以整合穆斯林和少數族群。依他們所見，必須從政治的角度思考伊斯蘭，將它視為阿拉伯民族的具體實現，而非一門宗教。是以他們高呼要建立的社會，應是現代的（例如女性可獲得平等權利）、世俗的（將宗教信仰局限於個人事務），並且是以『阿拉伯主義』文化為依歸，超越傳統的種族觀。」。

1950年代早期，阿弗拉克和阿比塔爾將他們的「阿拉伯復興黨」（復興黨黨名中的 Ba'ath 一詞是「復興」，或「復甦」的意思）與阿克拉姆·阿胡拉尼（Akram Hawrani）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黨」（Arab Socialist Party）合併，成為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Ba'ath Arab Socialist Party）。在敘利亞的分支中，哈菲茲及巴沙爾·阿薩德父子均扮演重要角色。

復興主義（Ba'athism）的核心價值有三：那就是**阿拉伯民族的統一、阿拉伯民族從外國勢力統治下解放，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內涵意即國家規劃，也就是說：藉由指導及控制阿拉伯的經濟，克服阿拉伯世界因殖民傳統所遺留下來的落後開發。

阿拉伯社會主義黨認為，現今阿拉伯世界的一切分歧應屬「一時的假象」；換言之，這些分歧在政治上無關緊要。該黨對於統一的承諾正是基於這樣的觀點，但此一觀點與政治伊斯蘭的立場並不一致。後者主張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所應該追求的組織原則，是伊斯蘭身分認同，並非民族性。復興黨眼中的敵人，是西方帝國主義以及為虎作倀的鷹犬，其中最為重大的，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遷占者國家的以色列，以及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的附庸國沙烏地。復興黨認為，帝國主義勢力將阿拉伯世界分化為多個國家，才能遂行經濟和政治上的操縱，同時也倚

賴以色列及阿拉伯國王們充當工具，在當地助其強化霸權。

復興黨人以統一為手段，冀望阿拉伯民族能達成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標。復興黨在黨章中宣告：「阿拉伯民族應竭盡全力打擊國內的殖民主義、領土侵占，以及外來勢力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徹底摧毀這幾大支柱。」此處所謂的「殖民主義」和「領土侵占」，其所指包括以色列。以色列是猶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橫空植入的國家，因此阿拉伯人務必盡其所能將之消滅。至於「外來勢力的政治影響」，如沙烏地和埃及這兩個美國附庸國即是，它們不僅與華盛頓方面配合無間，對於在經濟和政治上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前殖民強權，同樣裡應外合。復興黨堅信：「阿拉伯國土屬於全體阿拉伯人，他們有權管理阿拉伯的事務、財富，以及〔實現其〕發展潛力」，猶太的遷占者、阿拉伯世界的國王、埃米爾、蘇丹及獨裁者均無權過問。復興黨人確實認為，殖民主義「和相關的一切行動都是罪大惡極，阿拉伯〔民族必須〕採取所有可能的手段〔與之對抗〕。」最重要的是，這代表富藏龐大石油資源的阿拉伯領土將歸屬阿拉伯人治理，唯阿拉伯人的權益是從。各大外來強權在阿拉伯世界所扶植的內應王國，能繼續獲得華盛頓方面支持而不墜，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美國企業追求利益的目標。但是，這些王國將不再有權參與支配阿拉伯的資源。

復興黨意識形態的第三大支柱是社會主義，意即由國家指導的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復興黨規定經濟制高點，也就是天然資源、運輸和銀行等，必須由國家管理。他們亦承諾將會致力發展國家產業，而他們的方法是營造貿易環境，使本地企業能在關稅屏障之下成長，不會因為外來的大型競爭對手具有百年基業的優勢而窒息。

復興黨的黨章言之鑿鑿：「阿拉伯國土內的財富分配不公，因此必須重新審視並公正地分配給全體公民。」為能糾正如此不公的失衡狀態，復興黨的創始人提議的作法是利潤分享以及工人參與管理決策。

因此，復興黨的中心目標就是提昇阿拉伯民族的地位，並且克服其經濟落後的困境。為了達成此一目標，必須團結阿拉伯人，打破外來強權的控制，重新掌握阿拉伯境內的資源及內在的發展潛能。在阿拉伯人的政治控制之下，以關稅壁壘保護，加上政府補助以及針對經濟制高點的国家規劃和國有權，全國的經濟將可以順利成長。藉由以上的作法，阿拉伯世界即足以建設現代化經濟，既提昇自身的地位，更能擺脫數百年來的外來壓迫。

美國所鍾愛的，是對其他國家有利的經濟模式，也就是由美國監督指導的全球經濟模式，它的基礎是自由貿易、自由企業和開放市場，並且與美國的政治領導地位及軍事控制密不可分。復興黨的計畫處處與之衝突，這是不言而喻的。復興黨的意識形態徹底顛覆華盛頓方面所建立的經濟規範，尤其是在一個蘊涵豐富石油的地區，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華盛頓方面願意包容這樣的意識形態。復興黨所掀起的運動主張世上石油產量最大的地區屬於全體阿拉伯人（而非美國的石油公司），同時宣稱唯有阿拉伯人有權管理阿拉伯自身的事務，更企圖脫離外來勢力的控制。別忘了華爾街方面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既強大而且無所不在，因此我們不必指望華盛頓方面會同情復興黨的運動。華盛頓方面早已宣告了要「領導全球經濟」的意圖；宣稱歷史（千真萬確）已經「證實市場經濟乃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¹⁰而且宣佈它將促使「資源豐富的國家更加擁抱」美國投資。¹¹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則是在社會主義原則的主導之下，呼籲在地化的控制權。美國如此大膽、全球化的願景，自是與之水火不容。

敘利亞的1973年憲法

1973年，當時哈菲茲·阿薩德已擔任敘利亞總統三年，參與敘利亞的領導事務則已經十年。阿薩德年輕

時曾是復興黨的積極分子，如今更進一步，領導由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執政的敘利亞。在他的主導之下，敘利亞擬訂了新憲法草案，將復興黨的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三原則正式化。

敘利亞在新憲中宣告了國家使命，那就是促進阿拉伯民族團結、脫離外來勢力的控制，並且克服殖民主義下的開發落後。後者將是透過計畫經濟和國有經濟等方法實現，亦即採行社會主義路線。阿薩德指出，欲阻撓敘利亞完成其國家使命的勢力有三：首先是帝國主義，或者說，是外來的政治和經濟控制；其次是猶太復國運動，以歐洲移民為主的猶太人在阿拉伯被殖民的領土上建立遷占者國家；第三則是對阿拉伯世界的剝削。

在復興黨人主政之下，敘利亞共和國肩負了國家使命。這種思想在憲法開門見山的正文中即可見出端倪。敘利亞共和國在這一文件建國的政治文獻中召喚薩推爾·胡蘇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它昭告天下：「阿拉伯仍為統一民族之時，致力於建立人類文明而貢獻良多。（然而正當它）維繫民族凝聚之力遭外力削弱、其文明之地位衰退，並且殖民者之征服勢力濤濤不絕，席捲而來，終使阿拉伯民族之團結土崩瓦解，領土為人侵占，資源亦難逃受掠奪之命運。」

直到敘利亞的制憲者在憲法中明文記載復興黨的座右銘「統一，自由，社會主義」，世人已能徹底相信：敘利亞將會依據復興黨的各項原則進行核心的政治安排，再無任何疑慮。敘利亞在憲法中宣告：「阿拉伯之社會大眾未視獨立自主為目標及犧牲之終點，乃視之為鞏固其奮鬥之手段。為求阿拉伯民族得實現統一、自由及社會主義之目標，於愛國與進步力量的領導之下，針對帝國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和經濟剝削等勢力的戰鬥永無休止，而阿拉伯民族之獨立自主亦為此戰鬥之下一進境。」

敘利亞的制憲者認為自己是個民主國家，他們在憲法中如是闡述國家的政治原則：「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是

民主、人民及社會主義的主權國家。」由於敘利亞的民主政體並非複製美國、英國或法國的政治體系，就其國名中「共和國」一詞的概念而言，如果想要合法地稱之為民主，幾乎是毫無基礎的。敘利亞憲法承諾國家乃遵行「多元主義原則」，而且已為選舉產生的成員備妥運作的立法機關，同時允許許多黨形式的合法競選。2011年爆發伊斯蘭復興運動之後，西方國家的領袖們總是夸夸而談，各自提出使敘利亞過渡到多元、民主國家的政治願景。數十年來，多元主義和民選立法機關早已是敘利亞政治系統的一部分，這個事實卻受到這些領袖們刻意混淆。然而，敘利亞的民主政體畢竟在兩個方面有別於西方的體系，這兩大差異正是復興黨的國家使命所導致的結果。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團結統一、領導阿拉伯民族脫離外來勢力控制，以及透過由國家指導、規劃及控制的經濟，達到經濟發展。

第一政黨的地位與非西方式民主

第一大差異，是明確禁止以民族分支為基礎而成立政黨。採取這項手段，是為了避免造成阿拉伯民族分裂及妨礙團結。因此，敘利亞正式杜絕「以宗教、種族、區域、階級（或）專業（身分）為基礎而從事任何政治活動或籌組政黨、團體；或者因性別、出身、種族或膚色而產生歧視」。敘利亞人的身分只有阿拉伯人一項，沒有女人、工人、遜尼派或某某行業人士等等區別；至少在政治上的情況如此。雖然現今存在性別和階級的壓迫，敘利亞仍以解放民族壓迫為當務之急。

殖民主義強權國家沿襲羅馬人稱為「分而治之」的古老帝國主義招術，往往在他們所統治的國家內部尋求可供利用的差異，再放大政治上無關緊要的分歧，以免被壓迫的族群有機會團結一致對抗共同的殖民壓迫者。由於民族性或宗教所形成的分歧隨處可見，分而治之的作法之一，就是根據群體中的種族、教派身分而分配官職的名額，藉此將原本在政治上並不顯眼的差異，徹底轉化成不可逾越的鴻溝。伊拉克就是這項作法的一個惡劣實例。美國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並推翻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之後，藉由殖民總督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之手成立了治理委員會，其組成方式即明明白白地係以種族、教派和性別為依歸。布雷默告訴伊拉克人：「無論你是什葉派、遜尼派、阿拉伯人或庫德族（Kurd）……男性或女性，都能在委員會擔任代表。」¹²有一部分被任命的委員就是依據他們的宗教身分而分類，即使他們未必認為自己屬於某個宗教派別亦在所不論。

舉例來說，哈米·毛薩（Hamid Moussa）被任命為什葉派的委員代表，事實上他卻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¹³納粹獨夫阿道夫·希特勒的作法跟布雷默正好遙相呼應。布雷默將毛薩歸類為什葉派，希特勒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指定為猶太人，無視於馬克思是無神論者，而且以共產黨員自居。在這兩個實例中，都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將宗教標簽附加在非宗教人士的身上。布雷默深信，絕不能讓伊拉克人將民族之間的衝突看成他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對抗。換言之，不可以看到伊拉克和美國，或者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反之，應該去看伊拉克內部的種種極端對立，例如阿拉伯人對庫德族、遜尼派對什葉派、女性對男性。因此，布雷默想要伊拉克人關注的，是伊拉克內部的差異，而非伊拉克和它新的太上皇帝國之間的衝突。

布雷默的作法與納粹可說是並駕齊驅。德國人在思考政治時，主要是以德國社會內部的階級差異為依據。納粹所採用的計畫是以政治意識形態替換階級差異，而其意識形態乃是以種族差異為優先，促使「德國人」對抗猶太人及其他民族，例如被納粹定義為次等人類的斯拉夫人。若要追究納粹的理由，首先要指出的是：納粹是馬克

思主義的死對頭。依馬克思主義的定義，納粹在德國內部尋找任何方式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唯獨將階級除外。也就是說，你可以動員德國人這個「高級」種族取代低劣民族以贏得生存空間，而非發動工人階級推翻資本家統治。納粹的作法能讓德國的實業家和金融家從中獲利，並且取得新市場及投資機會。

既然美國已經對伊拉克發動師出無名的侵略戰爭，已經率軍占領了伊拉克，而且也已經重組伊拉克的經濟模式以迎合美國投資家的需求，諸如此類的作為可想而知必然會招致伊拉克人民的反抗。因此，布雷默的任務便是找出伊拉克人身份認同的替代品，使它成為伊拉克政治上的組織原則。伊拉克將依據種族、教派而被重新組織安排，藉以鼓勵伊拉克公民互相爭奪國家資源，無暇團結一心以對抗美國和英國等占領者。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統治下的伊拉克，其政治組織一律以伊拉克人的身份認同為依歸。然而在美國的控制之下，政治上的組織則是依照遜尼派對什葉派、阿拉伯人對庫德族，以及男性對女性等方式。換句話說，布雷默對臣服其腳下的伊拉克所施行的，正是哈菲茲·阿薩德在敘利亞所明令禁止的：那就是利用被壓破民族的差異而建立正式的政治分隔，以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對抗外來統治。

布雷默的計畫遭受絕大多數伊拉克人反對。在2003年9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29的伊拉克公民同意，由教派代表擔任政治領導人是很重要的。以理念為基礎的政治，比起根據種族和教派成員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政治，更讓伊拉克人感興趣。「穆斯林學者協會」(Association of Muslim Scholars)的會長哈里斯·達里(Harith al-Dhari)即反對布雷默的計畫，譴責該計畫是煽動族群間敵意的奸計。他說：「該委員會以族群及種族為準而劃分伊拉克，這在伊拉克前所未見，是占領伊拉克的外來勢力所創造出來的結果。組成該委員會的團體，不論是遜尼派或什葉派，均無法代表所有伊拉克人民的意志。」他指出：「委員會組成的基礎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劃分方式，因為它將伊拉克區分為各種族群及民族的團體，無異是在社會上、在人民心中播下仇恨的種子。」¹⁵

伊拉克的新政府當局從事正式化的種族、教派劃分，華盛頓方面曾對此公開表態，指出該措施是為了糾正伊拉克表面上所見由遜尼派少數統治什葉派多數的狀態，而且華盛頓方面更指控復興黨政府從中強化了此一統治形勢。這項無稽之談的唯一依據，是伊拉克的領袖薩達姆(Saddam)乃是遜尼派穆斯林，而且他所任命的重要國家安全職位，其中有許多人亦是隸屬於相同教派。然而隨後所揭露的事實顯示，薩達姆只是任命他能信任的人，而這些親信恰巧與他有部族和家族關係。這些人和他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乃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並非出於刻意設計。僅憑這一點，實不足以構成證據指稱伊拉克政府是在貫徹遜尼教派的主張。更何況伊拉克過去是由復興黨執政，它在意識形態上乃是屬於世俗派，與宗教門派毫無關係。

薩達姆政府的立場與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致，同樣譴責教派分裂是統一大業的絆腳石。誠如薩繆爾·黑爾方特(Samuel Helfont)及麥克·布里爾(Michael Brill)兩位學者所說：「薩達姆明確表示過，他的願景使國家更進一步邁向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他所宣揚的觀點，是民族主義能夠緩和門戶分歧與教派主義造成的影響。」此外，復興黨當初即是由什葉派引進伊拉克的，早期的領導人絕大多數均屬於相同的多數教派。再者，於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五角大廈發行了一套共五十五張的撲克牌，確認薩達姆政府成員中的「頭號要犯」名單，其中每三人即有兩人是什葉派。華盛頓方面對於伊拉克政府的教派失衡極盡誇張之能事，但是不論其失衡程度如何，都不能歸咎為復興黨政府精心算計的結果。它只是薩達姆的用人之道所產生的附帶現象，而他無非是為了在身邊安排能夠推心置腹的人員。

因此，為了避免阿拉伯民族性以外不相干的身分成為正式政治劃分的基礎，進而導致分化和明爭暗鬥，復興

黨於制定1973年憲法時即已明文規定，禁止任何政黨挑戰阿拉伯民族性的首要地位。復興黨以促進阿拉伯統一為使命，視之為克服外來勢力控制的必要條件；這一點與復興黨制憲時的作法具有內在一致性。

敘利亞的民主政體有別於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其第二大差異體現於敘利亞1973年的憲法之中，它是第一項差異的延伸。既然阿拉伯民族性的地位優先於其他一切政治身分，則代表阿拉伯民族抱負的政黨必須同樣擁有優先地位。此一政黨正是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至少這是制憲者的看法。因此，1973年憲法的第八條規定，復興黨將是「社會與國家之執政黨」。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由復興黨提名總統候選人，而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他會是復興黨的黨員。該名候選人必須在全國大選中獲得多數票，才能當選總統。若是候選人未能獲得多數票，將會被否決並由復興黨提名另外一位候選人，直到被提名的候選人能夠贏得大多數選民同意為止。即使它不同於西方式兩人或多人競選的作法，但是它也絕非西方國家在政治宣傳中所指控的獨裁政體。

甚至可以說，相對於美國在阿拉伯的主要盟邦那種絕對的君主政體，敘利亞的政體還更接近西方國家所支持的多黨選舉制度。在敘利亞至少有多黨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而且人民對於總統能夠行使「消費者選擇權」，即使這不算是「消費者主權」。（所謂消費者選擇權是指敘利亞人可以選擇接受或否決候選人。至於消費者主權，若是敘利亞人能夠擁有此權利，則表示敘利亞人能決定候選人的人選，然後再進行選擇。）

部分熟稔西方國家選舉式民主政治的評論家會認為，儘管敘利亞和美國的民主政治表面上看似有所差異，這兩個系統在基礎上卻是類似的。我們可以確知的是：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會有兩名或多名候選人供選民投票；在敘利亞則是推出單一候選人，由選民認可或否決。然而，美國的選民通常實際上僅有兩名候選人可選。比起敘利亞依據1973年憲法所進行的單一候選人制度，美國也只是允許多一名候選人而已。美國在總統大選所推出

的候選人，是由極少數精英級的有錢投資家透過有效的方式欽點的。這些投資家屬於美國的企業圈，總統候選人必須討好他們，才能獲得選舉贊助。

至於如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則是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候選人本身必須口袋夠深，深到足以支應自己的選舉所需。候選人端出來的政見，若是以促進美國普羅大眾的利益為依歸，則面對收入頂層出身的競爭者時，將是極其不利的態勢。道理很簡單：精英級的投資家和商業人士是競選資金的最大宗來源，而他們不會提供第一種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所需要的金錢、資源和人脈。普羅大眾的財力不大，對於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他們贊助選舉資金的能力薄弱；或者如自力更生的候選人，其財力亦可能極為有限。這個事實並不足以保證最能諂媚美國首富的候選人，對上完全倚賴大量選民以小額捐款打選仗的候選人時，絕對能大獲全勝。但是，畢竟能大幅提高致勝的機會。在實務上，以奉行1973年憲法的敘利亞總統大選，對比當今美國的選舉，其間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由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選出候選人，目的是執行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使命；後者卻是由美國的資本家階級指定候選人，目的是實現美國的帝國主義任務，迎合資本家的利益。敘利亞的制度至少代表敘利亞全體人民，也就是一部分受壓迫的阿拉伯民族，這是其優點。相反地，美國的制度無法避免選出這樣的候選人：他們所承諾的政策最有可能是對美國的首富階級有利，卻是犧牲投票給他們的選民。

復興黨被提昇到第一政黨的地位，是出於該黨的馬克思主義派盟友的建議。馬克思主義派認為，若在敘利亞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城市大地主、實業家和商人可透過其資金力量以及對重要經濟資產的支配，使議會成為他們的工具。城市精英階級將會運用其財富左右議會選舉的結果，在國內豢養其代議士，實施對之有利的政策。因此，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只是少數人的民主。

在敘利亞，宗教和階級之間具有密切關連。復興黨的願景之一是讓社會免於教派歧視，被他們吸引的宗教少數族群通常出身於低微的農村背景。相反地，住在城市的精英階級則主要是遜尼派成員。復興黨對於社會主義的承諾乃紮根於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目標。不僅如此，復興黨的信條亦包含社會主義的支柱，基於另一個更加切身的理由而招徠了黨員：那就是復興黨將會解決階級壓迫問題。因此，復興黨能吸引宗教少數族群，是因為他們遭受到雙重壓迫：一是因為宗教、一是來自階級。

舉例來說，阿拉維派社群的物質條件惡劣，被視為敘利亞社會的最低下階層，復興黨實施的社會主義計畫使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改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敵對方即引用此一事實作為證據，攻擊復興黨是掛著阿拉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羊頭，實際上卻賣著教派利益的狗肉。歸根結底，在復興黨主政之下誰最得利？宗教少數族群多為貧窮的農村勞工，而復興黨的社會主義政策即是以提昇他們的生活為目標。敘利亞的所有宗教少數族群都因為復興黨的政策而改善了生活水平，這個事實是對手的批評所忽略的。阿拉維派受益於復興黨的統治，並非因為他們是阿拉維派，而是因為他們是被壓迫的階級。

要提昇農村貧民的生活，其前提條件之一，是防止遜尼派精英階級利用財富和經濟所有權，控制選舉式政治。為了消解地主和商人的影響力，復興黨所要創建、經營及維護的政治體系，是由普及於農民、勞工、學生、女性、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各种組織所構成的。復興黨宣稱其共和國是人民的民主政體，正是這個意思。

敘利亞1973年憲法也宣告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是一社會主義國家。憲法中表明，敘利亞的經濟「為計畫型社會主義經濟，以終結各種形式之剝削為職志」：天然資源和公共事業必須依法收歸國有；稅制應採累進制；國家應該「為所有公民提供工作」，並且保障社會安全；所有教育都是免費，同時由國家保證醫療服務。

以上這些並非政黨為了贏得選票而信口開河，否則在當選之後即可能會被漠視；就算能付諸實踐，也很容易淪於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反之，它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大法中所明文規定的。我們當然知道，這些社會主義原則雖能在憲法中形諸文字，並不必然表示會在現實中被信受奉行。然而，一個公開宣稱社會主義立場的政黨，在憲法中審慎載入這些社會主義原則，僅僅這個事實，就象徵了在其統治之下國家的運作方向。不僅復興黨的領導政權自認為是在推行社會主義綱領，華盛頓方面的官員也和他們有共同見解。CIA的官員羅勃·巴爾指出：「以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的強硬姿態而論，他們正是阿拉伯共產黨。」¹⁸巴爾自己即是以「社會主義敘利亞」稱呼哈菲茲·阿薩德所領導的國家。¹⁹

社會主義容或有多樣的定義，但是若將之定義為經濟制高點納入國有，並且以經濟計畫為輔，那麼實行1973年憲法的敘利亞即已明確符合此一社會主義定義。然而，以馬克思主義者所認可的分類來說，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從來不曾是勞動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反之，它是一個**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其目標是阿拉伯的政治獨立自主，以及解決阿拉伯民族長久以來的發展落後。

在1973年憲法的制憲者眼中，社會主義是實現民族解放和經濟發展的手段。他們如此寫道：「我們勇往直前，建立社會主義秩序」，這是「全體阿拉伯人在猶太復國運動和帝國主義引發的戰鬥中，欲發揮所有潛能的基本要件」。馬克思社會主義關心的，是剝削的資產階級和被剝削的勞動階級之間的鬥爭；阿拉伯社會主義則是強調剝削與被剝削民族之間的鬥爭。這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所針對的，是不同層次的剝削。但是西方國家的銀行、企業和主要投資家放眼全球而追逐獲利時，全然無視於它們的差異。對美國的企業與金融精英而言，不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終結勞動階級的剝削問題，或是解決帝國主義對民族團體的壓迫，都同樣妨礙了他們追逐利潤的興致。

政治上救亡圖存的因應之道

任何國家凡是敢於反抗美國的領導，明知華盛頓要求唯命是從，卻妄想在這樣的世界裡走自己的路，那就註定了它岌岌可危的命運，除了努力求生，再沒有其他選擇。只要能夠出手阻止，華盛頓方面就絕對不會允許其他國家採行經濟自決政策。

美國在《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即已毫不掩飾地宣告，它有能力、也將會「領導全世界」。這個宣告扼要總結了美國的目標，它也正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南。像敘利亞如此弱小而不發達的國家，若想要和美國的宣言大唱反調並宣誓其真正的主權，這項任務將會是十分巨大的挑戰。此時，其內部若有反對聲音，只會成為雪上加霜，對於先鋒黨（vanguard party，譯註：指帶領工人階級革命、擔任先鋒的政黨）而言，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在這場戰鬥中，敘利亞的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如果不能自居於以黨領政的角色，它將一無是處；換言之，它是負有天命的政黨。）為了維護主權，敘利亞外部的強大對手有美國、以色列和一向不懷好意的阿拉伯世界眾多統治者。這些阿拉伯統治者的政權，其存在目的只是為了博取美國歡心。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的主要任務是傾其全力與外部對手周旋，再沒有餘暇分心應付內部的反對勢力。華盛頓方面要求所有國家臣服在它的領導權威之下，唯唯諾諾，這是對於敘利亞獨立自主的外部威脅。此一威脅不僅有害於多黨競爭的國家，對於開放社會同樣不利。

開放社會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或者對於民族獨立自主計畫缺乏責任心的內部力量，將能利用這些保障，組織反對勢力以對抗民族自決的目標，阻礙其實現。果真如此的話，捍衛人民不受外來勢力控制及提昇物質生活水平的計畫，必會大受打擊。因此，執政黨為了讓國家能免於外來勢力壓迫而面臨強大障礙，若是在大功尚未告成之前就放棄以黨領政的角色，一切都會化為烏有，而民主政治將是永遠遙不可及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原始意義，正是指國家由被壓迫的人民統治。民主政治理論家麥弗森（C.B. Macpherson）強而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這樣的新生國家可謂百廢待舉，然而這些任務的罪大惡極之處，是它們會以兩種方式發揮作用，強化新國家成為非自由國家的傾向。首先，如果這些任務的重要性能擄獲全國民心，或者是全體活躍分子的民心，他們即有可能會全力支持其領導者，以及領導者創建新國家的運動，同時也可能會認為多黨競爭的體制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另一項相等的作用是：即使這些任務未能爭取到全體人民的積極支持，國家還是會往同樣的非自由國家方向發展。姑且假設有一部分人民對於現代化並未抱持相同的熱情，或者假設另一種司空見慣的情況：即各階層的人民固然都有共同的目標，卻因為種族、宗教或語言的差異，以致不願意在同一執政黨的領導之下同舟共濟，進而尋求機會成立或支持反對運動、政黨。在這些情況下，他們的反對立場容易被視為跡近叛亂。新獨立的國家就算不必在戰鬥中求生，至少也必須付出心力才能維持其地位。它務必奮力向前，推行現代化，同時亦處在重新落入外來勢力控制的風險之中。新獨立的國家始終會擔心淪入他們所謂的新殖民主義之手，因此，凡是與執政黨針鋒相對，看起來都會像是扼殺國家未來的機會，而且有些時候確實如此。就以上各種情況來看，反對派均會如同叛國。如果有證據顯示反對派為外國人服務，這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不必因此讓反對派形同叛國，卻依舊會火上加油。

「新獨立的不發達國家有其與生俱來的強大壓力，乃至於反對自由民主政治的體制。這樣的壓力不止會妨礙

多黨競爭的政治體系，也不利於維持現實的公民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和免於任意逮捕與拘留的自由，就像結社自由一樣，均會面臨相同的壓力。」²⁰

政治往往會被化約，成為政治鬥爭中領導人物個人心理層次的現象，這種作法實在毫無益處。後殖民社會所建立的國家，其政府體制如採取非自由、單一政黨形式，會被當成是革命領袖的權力慾望有以致之，而非革命時勢之下應運而生的結果。這一類說辭確實屢見不鮮，它呼應一個普遍存在的論述，亦即堅信革命是孕育獨裁者的胚胎。

虛張聲望的自由和民主

另一個看法認為，有些政治規劃會比其他的更適合於某些形勢。義大利哲學家兼歷史學家多門尼柯·勞瑟多（Domenico Losurdo）主張極權主義是總體戰爭（total war）之意識形態。換言之，極權主義並非內在於意識形態，而是隨著政治形勢水到渠成。²¹不論政府的政治立場為何，在遭逢重大危機的時刻都會變成極權主義。

然而，自由派人士往往將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政府掛鉤，視為它們所專屬的特質。但是，將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建立獨家聯結，其實是大錯特錯的。當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有必要鞏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統一目標以及維持民意，那麼自由民主政體也會化身為極權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就負有接近獨裁者的權力，他們所主政的國家是全國統一而且幾乎可以稱為一黨政治的政府。他們的政府完全掌控經濟、能不經審判就拘禁可疑的第五縱隊成員；在美國方面，則是將日裔美國人強制送

入集中營。

1917年，布爾什維克派的革命家在俄羅斯奪權成功，以議會為基礎建立了多黨制政治制度，最終卻證明只是曇花一現的試驗。到了1921年，布爾什維克派已放棄當初所接受的多黨政治安排，轉而支持一黨制國家政體。這是何故？其理由不在於意識形態，卻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派當時的處境，大環境的結構形勢使它不得不然。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不久，列寧完成《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一書。他信奉分散式工人公社國家的理念，利用在蘇維埃所投注的工人自我管理制度和政治權力為基礎，開始著手建立分散式社會主義模式，但是很快就被布爾什維克派棄之不顧。他們發現，以當時俄羅斯的局勢而論，這個模式並不合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沉重壓力，使經濟幾乎一蹶不振，加上內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為了壓制方興未艾的革命，更有十幾個國家已經入侵俄羅斯。列寧和他的革命伙伴面臨的棘手問題層出不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卻完全無用武之地。1917年革命的元素，諸如蘇維埃的權力、工人控制工業、廢除常備軍等等，當國家遭逢嚴重威脅之際，都證明發揮不了作用。布爾什維克派必須養活全民、贏得內戰、打擊協約國（Entente）的侵略，並且要求由上而下的控制和團結。²²曾有人非常生動有力地形容過：現實經驗如同打磨用的浮石，布爾什維克的幻想很快就被消磨得一乾二淨。

布爾什維克派領悟到二十世紀的成功革命家都能明白的結論，那就是多黨政治會加深分裂與對抗：為了能在選舉中爭取到更多支持，各個政黨會互相較勁；或者是在最迫切需要團結合作的時刻，各擁目標而相持不下，最後落得分道揚鑣。²³因此，在危急艱困的情勢下，建立單一政黨制或是以黨領政的國家是不可或缺的，亦即以一黨獨大，其他政黨僅為附屬地位。這是政治上唯一的生存之道。

美國的宣傳家竭盡其所能為美國歌功頌德，虛張美國對於自由和民主的奉獻；相對的，那些已經打破資本主義剝削、不受外來勢力控制的共產主義及後殖民國家，則是被塑造成「獨裁」政權。他們的論述方式能助長以下這樣的看法：國家有能力隨意選擇「民主和自由」，正如同有能力決定是否限縮公民的政治自由；絲毫不念及那些國家的處境所面臨的大局為何。這些宣傳家刻意不提的是：非自由、單一政黨國家的興起，乃是為了因應巨大的政治挑戰，必須有強勢的領導中心以及團結一致的目標才行。他們也不會提到：共產和殖民國家正遭受列強激烈的反對，唯有為生存而戰。當美國所遭遇的形勢還不如這些國家來得嚴峻時，往往就已經會讓它脫離自由民主制度。誠如勞瑟多提醒我們的，美國的情況是：

「雖然美國居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屏障之中，事實上每當它感受到威脅，不論該威脅是真是假，這個位於北美的共和國會斷然採取措施，或多或少地加強總統的權力；對於結社和新聞自由，也同樣會有或大或小的限制。舉凡法國大革命〔當時美國有法國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而它同時也受到《外僑和煽動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影響〕、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其隨後的幾年均是如此，沒有例外。即使時至今日亦然：在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位於古巴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的美國海軍基地集中營隨即開張，被拘留者無論老少均不必經過審判即遭監禁，也不會被告知具體的指控。恐怖主義固然可怕，但是相較於軍事入侵和占領，其威脅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更遑論被核武毀滅的威脅。」²⁴

至於敘利亞，我們須知**以色列對它的威脅是無時無刻不在的**。例如敘利亞的領土「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在1967年被以色列入侵之後，至今仍在其軍事占領之下。以色列這個充滿敵意的遷占者國家，其領土擴張和侵略的事蹟可謂罄竹難書；不僅如此，它還是擁有核武的國家。另外，如美國的核武乃世界上首屈一指(亦堅拒成為第一個放棄使用核武的國家)，而它竟然公開致力於推翻大馬士革方面的政權。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在2002年5月6日收到美國所下的實質戰書，它早已被美國列入「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國家的名單。而且，敘利亞更是曾經兩度遭遇核武毀滅的威脅：一次是1970年來自美國，另一次是1973年來自以色列。²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既不曾面臨核武毀滅威脅，也從來沒有遇到真正的侵略威脅，當然更談不上有哪個仇視它的國家能在軍事上比它強大數倍。即使是在九一一恐攻之後，也是如此。

換句話說，美國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九一一恐攻之後，無論它所遭遇的威脅有多麼巨大，一旦與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所面對的相提並論，其威脅性頓時顯得輕微不少。雖然如此，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依然具有近乎獨裁的權力；在九一一恐攻之後，美國的反應則是加強警察國家的權力。在總體戰爭的情況下，華盛頓方面隨即採行極權主義式的權力體制。如果這是確實有其必要而無可厚非的，那麼換成敘利亞有相同之舉，我們是否也能贊同它確實別無選擇？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使國家在後殖民狀態下，有必要採行非自由、黨國體制。麥弗森解釋道：在後殖民國家，「需要建立對於國家的普遍忠誠，而非忠於部族、族群或在地社群」。²⁶單一政黨體制才有能力超越國家內部的分歧，凝聚全體國人的力量，對抗共同的敵人。

不真實的民主

我們很多人都是生長於自由民主的社會，以上一切只怕都是難以理解的。一黨獨大或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

怎可能談得上民主？更何況它連公民和對手的政治自由都不允許。當然，唯有能全民參與、定期選舉，以及有兩名或更多名候選人，才稱得上是民主國家。何謂「民主」？我們有各式各樣的理念，而且理應如此。然而，通常我們是以兩種方式定義民主的：民主是經由一套既定程序，從一組候選人之中選出公職人員；或者，民主是一種社會類型。民主的原始意義比較接近於第二個定義，也就是指一種社會類型。更具體來說，它是由已往被壓迫的階級或人民所治理的社會。

大約150年前，貴族們認為民主是個非常可怕的理念，它和「惡人政權」(kakinocty) 就算不是同義詞，至少不相上下，二者都是讓下流人民統治國家。（相對地，貴族政治則是表示由「高級人士」治理國家。）對於新興的資產階級參與民主政治，他們也同樣有所保留。除非參與者限於有財產的人民，而且由精英階級指定代表組成機構，對這些被選舉出來的議會，進行審慎覆核而加以控制；唯有如此才能讓貴族安心。民主政治獲得普世贊同（華盛頓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它的阿拉伯國王及穆斯林聖戰士等等盟友對此不以為然，這當然不用多說），也不過是近二百年來的事。

如今，經由既定程序而由全民選出公職人員的民主政治，在自由民主世界被資本主義精英吹捧上了天。其實資本主義精英會竭誠歡迎的民主政治，不太可能是真真實實由社會大眾所統治的體制。否則，一切決策的目標將會是促進及維護下層民眾（員工或已往被殖民者）的利益，處處與精英階級（雇主或帝國主義強權）作對。資本主義精英支持第一種意義的民主政治（有一套既定程序），對第二種意義的民主政治（一種社會類型）卻表示遺憾。

只需檢視當選人是誰、當選代表所推行及通過的政策為何，即可得到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事實：無論是哪一種意義而論，多黨競爭式選舉制度所選出的代表，從未代表投票給他們的下層民眾而治理國家。與企業團體有關係或者獲得他們支持的人，才有可能贏得選舉。這一點幾乎沒有例外。當選政客所施行的政策偏袒企業團體的利益，這一點也同樣幾乎沒有例外。

吉冷思和沛吉指出：「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而獨立的影響力；一般公民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其影響力則是微乎其微或者完全談不上。」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嚴重質疑美國這樣的社會型態，是否稱得上是民主政治。華盛頓方面的徒眾或許會認為美國是舉世數一數二的民主國家。然而，假使一般社會大眾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無力左右國家大政，這樣的政治如何配稱為民主？當民主政治的理念受到污衊時，精英階級曾經有過恐懼的是：在多黨競爭式的選舉制度之下，下層民眾透過投票的方式取得統治權，將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事實證明這是莫須有的恐懼。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下，經由既定程序而選舉代表的民主，無法轉化為第二種意義的民主，也就是視之為一種社會類型，社會上的一般大眾以及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對於政府的施政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資本主義社會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許多障礙，阻止第一種意義的民主政治變成第二種意義。其中最為明顯的障礙，是有錢的投資家能夠塑造選舉結果，因為他們是競選活動經費最有力的來源，也是對於選舉過程最有能力的投資者。然而，另外還有一些機制，使收入頂層的階級得以限制代議式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讓公共政策始終都能符合他們的利益。

我們會在下文各章詳論這些機制，但是現在我們已有足夠的憑據可以說：自由民主政治從沒有為了勞動階級的繁榮，犧牲過企業、銀行和有錢投資家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以程序式選舉制度的民主架構而言，下層民

眾很少能在政治競賽中勝出。

不僅如此，無論企業精英階級的利益蓬勃發展到什麼程度，下層民眾的利益總是一以貫之地被漠視。西方方式的多黨選舉制度，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取得被統治者的許可。因此，經由既定程序選舉公職人員，這樣的民主政治似乎能產生合法的結果。是誰投票選出親商的候選人？終究還不是社會大眾自己。

然而，將民主與選舉公職人員的一套既定程序劃上等號，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選舉程序只是手段，是通往結果的途徑，其結果正是可以稱之為民主的一種社會類型。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永遠無法企及的目的地。若是有幸能夠達到某個層面的真正民主，那通常是因為下層民眾採取選舉之外的手段，對決策者施壓。例如：罷工、暴動、示威、公民不服從，甚至叛亂。換句話說，他們拒絕在選舉競技場受到限制，決定將競賽舞台拉到街頭，在街頭上他們再也不會受到程序式民主的局限。當收入頂層階級和決策者的關係密不可分，下層民眾唯有一概反抗到底，並且以自己的規則取而代之，才能達到全面的民主。

在外國統治勢力的枷鎖之下，一旦被壓迫的人民能夠終結壓迫，重新掌控自己的命運，就是實現民主政治。也就是說，當外來勢力的統治被一個以自決為基礎的新型態社會取代，即是實現民主政治。自由解放當然不會是一蹴可幾的，它是個漫長的歷程：必須搗毀千千萬萬道壓迫的鎖鏈，抵抗新殖民主義，以及克服停滯的國家發展，那是外來統治勢力幾乎無可避免都會留下的後果。基於這些理由，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在1973年憲法之下宣告，其建國原則乃是人民的民主政治。

敘利亞的2012年憲法

若謂1973年當時復興黨處境的大局勢有利於先鋒黨以及限縮公民自由，則2011年敘利亞的大勢所趨，是有助於鬆綁各種限縮，呼應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普遍要求，也就是在政治上更加開放。但是，以下數事仍是極為必要的：即防範國家陷入新殖民控制的風險、抵禦猶太復國運動的遷占者國家更深入掠奪敘利亞領土、光復被侵占的敘利亞領土戈蘭高地、協助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運動、進一步實現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各大目標，以及阻止美國的武裝侵犯。而且，使國家繼續維持先鋒黨領政、限制對手無法假藉各種自由而阻撓執政黨實現目標，凡此種種均有利於以上的各大目標。

復興黨所面對的外在局面，有美國在其他國家強迫推行其政治與經濟計畫、歐洲的前殖民強權國家勾結美國的全球控制計畫而狼狽為奸、以色列的擴張主義傾向，還有親帝國主義的阿拉伯石油王國各種政治上的反應，諸如此類，莫不是比敘利亞更加強大而難以應付的惡勢力。若是開放敘利亞社會，讓政治上的反對派毫無節制，將會危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計畫。就如布爾什維克派初建國之際，四周有強敵環伺，每個國家都比布爾什維克派強數倍。列寧指出，在此情勢下讓革命的敵人擁有成立政治組織的自由，無異自掘墳墓。布爾什維克派的領導人堅稱：「這是自殺式的行為，因此我們不會做。」²⁸然而，到了2011年的敘利亞，抗議者要求取消對政治對手的各種限制；所以列寧的看法必須經過調節，才能適應敘利亞的新環境。復興主義在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中存活下來，如今必須具有彈性。因此，復興黨作了許多讓步，而且不是對反對派虛應故事或者有所保留。

首先，過去因為有「緊急狀態法」(emergency law)授權，長期以來剝奪了公民自由，如今已經獲得取消。敘利亞當初藉助於緊急狀態法，是因為它實質上正處於和以色列的交戰中，這項法源賦予大馬士革政府必要的權

力，能在戰時保衛國家安全。這是戰爭中國家經常會採取的措施。然而，畢竟有許多敘利亞人因之感到憤怒，認為它過度限制了自由。敘利亞政府順應民意，解除這項安全措施。

第二，敘利亞政府提出制定新憲構想，將解除復興黨的特殊地位。除此之外，總統職位開放任何人參選，只要符合居住、年齡和公民身分等基本要求即可，不再限於復興黨的黨員。總統選舉為普選制度，每七年舉行一次，以秘密投票方式進行。

透過這些讓步，如西方媒體和官員們所說的（事後證明大錯特錯），復興黨正在實現多黨式民主政治，回應抗議者喧囂的要求。隨後新憲付諸公投並獲得通過，也已舉行過多黨式新國會的選舉。總統大選定在2014年舉行，可有多名候選人參選（後來由阿薩德舉辦並輕鬆獲選）。

儘管有以上種種措施，叛亂仍日益加劇，因為有沙烏地阿拉伯、卡達（Qatar）和土耳其這些外在的強權國家，持續對他們挹注金錢。叛亂分子不接受改革，宣稱改革來得太晚。事實上實施改革的時間根本無關緊要。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名健康保險的唯一給付人來到美國，試問美國公民是否會說他來遲了幾十年，因此拒收？除了叛軍，華盛頓、倫敦和巴黎等方面同樣也拒絕接受敘利亞政府的讓步措施。他們說道：那些讓步「毫無意義」，但一句解釋也沒有。」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卻又一再指稱，反對派所要求的就是那些改革。不禁讓人困惑：這真的是他們要求的嗎？如果說某甲要求A，你給了他A之後，他又拒絕。那麼他是真的想要A嗎？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想過要A？不知道是否曾有人對這場敘利亞國內暴動進行過嚴謹的研究，記錄參與的群眾到底渴望什麼目標？據我所知並沒

有。大概只有示威者自己才會知道，引爆這場示威真正的原因為何。這場街頭暴力示威是個難以捉摸的現象，其實是西方媒體為它定型的，宣稱抗議者的目的是要求民主和公民自由。果真如此的話，何以政府方面同意更加民主以及更加開放之後，這些讓步的措施卻又被說成毫無意義？目前為止，西方國家自稱是這些「反抗軍」的擁護者。若是敘利亞政府的讓步真的如它們所說，是毫無意義的，則復興黨政府斷言「這場反動背後真正的動力不是為了追求民主」，那麼西方國家能苛責復興黨嗎？

對此，敘利亞總統還有深入闡述。他說：「在抗爭之初，其要求似乎很明顯是針對改革而來。抗爭被利用，儼然危機的關鍵是政治改革。我們確實已採行新政策，從制定新憲到眾多立法以及法律相關措施，進行大規模的政治革新，包括取消緊急狀態法、與全國所有政治反對團體展開對話。令人驚訝的是：隨著改革的進程一步一步展開，恐怖主義的程度也同時在升高。」³³

不會讓人民為西方國家的利益而活

從華盛頓方面來看，新憲開啟了其他替代政黨運作的空間。華盛頓方面可以暗中支持對美國立場有利的政黨，利用敘利亞的新開放政策，取得對敘利亞的影響力。這是附加的一大好處。在敘利亞境內，幾十年來伊斯蘭派一直都是主要的勢力。敘利亞的開放政策對伊斯蘭派來說，卻簡直一無是處。第一，新憲是世俗派立場，並非以伊斯蘭為依歸。第二，凡是基於宗教、教派、部族、地區，乃至性別、出身、種族或膚色而組織政黨或從事運動，它都一律倡議禁止。如此作法之下，若有政黨係以建立伊斯蘭國家為目標，它即能有效制止。

在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台拉維夫方面，同樣也是覺得壞處很多。

首先，新憲的前言即是接續1973年憲法中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使命，在新憲中敘利亞的定位是「阿拉伯主義的心臟」和「對抗猶太復國運動敵人的最前線，同時亦為抵禦殖民主義霸權之磐石，保衛阿拉伯世界及其力量與財富」。如此一來，跟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的目標及計畫已是水火不容。西方世界的目標是收服敘利亞，成為以色列「聽話的小弟」；而他們的計畫則是在阿拉伯世界遍佈新殖民主義的觸角。

其次，新憲正式確立敘利亞復興黨的政治立場。阿薩德如此總結該黨的政治方向：「敘利亞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不會讓人民為西方國家的利益而活。」³²因此，新憲明文規定敘利亞經濟的重要領域保持國有，並且只為敘利亞的整體利益服務。在敘利亞經濟的主要領域，西方國家的公司遂因而和獲利機會完全絕緣。這樣的未來，是華盛頓方面非常不樂見的，畢竟華盛頓方面的決策向來是由華爾街利益所主導的。

復興黨社會主義一貫都是華盛頓方面的眼中釘。在復興黨主政之下，它善用企業所有權、補助國內的私人公司、限制外國投資以及限制進口，對敘利亞的經濟發揮了長足影響力。復興黨認為，這些措施都是後殖民國家不可或缺或經濟工具。唯有如此，才能從已往殖民強權國家的手中奪回經濟命脈，並且脫離外國利益的宰制，規劃國家發展道路。

然而，華盛頓方面的目標和復興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使命格格不入，這是不言而喻的。華盛頓方面不准敘利亞培養工業和積極保護其獨立自主，它要的是為美國舉足輕重的銀行家和大投資家的利益服務，也就是開放敘利亞的勞動力任其剝削，以及讓外國勢力能夠取得敘利亞土地和天然資源的所有權。歐巴馬政府在2015年時曾發出鄭重宣告，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的計畫乃聚焦於降低美國產品的關稅、打

破我國產品和服務所遭遇的障礙，以及設定更高的標準，整平美國……公司的競爭環境。」³³華盛頓方面堅稱它有能力、也將會「領導全球經濟」；³⁴但大馬士革方面並不買單。

先是華盛頓的強硬派認為哈菲茲·阿薩德是阿拉伯共產黨，美國官方則是接著將他兒子巴沙爾當作是他的意識形態信徒，才會無法放棄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綱領的第三大支柱，也就是社會主義（當然也沒有放棄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這兩大立場）。美國的國務院不滿敘利亞「未能加入日益密不可分的全球經濟體系」，其言外之意就是說，敘利亞不肯將國有企業轉成民營，此舉不符合華爾街方面的利益。令美國國務院不滿的地方還有：基於「意識形態理由」，阿薩德阻撓敘利亞的經濟自由化、「國營事業民營化仍不普及」，經濟「依舊是在政府的高度控制之下」。³⁵華盛頓方面認為「市場經濟才是最好的經濟，而非受到政府重度干預、指揮及控制的經濟」，並且稱之為「歷史的教訓」。³⁶但是很顯然阿薩德完全不吃這一套。阿薩德起草新憲，授權敘利亞政府仍將繼續主導國家經濟，以敘利亞人民的利益為依歸；而且，敘利亞政府絕不會使人民為西方國家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的利益而活。這是阿薩德對敘利亞獨立自主地位的宣言，反對華盛頓方面「開拓開放市場和整平美國企業在外國的……運作環境」諸如此類的計畫。³⁷

此外最為重要的是，**阿薩德將特定社會權利寫入新憲，例如疾病、殘障與年老者的安全保障、獲得醫療保健，以及所有層級的免費教育；這是他向社會主義價值宣誓效忠的舉動，直接衝撞華盛頓方面所謂的「自由經濟」之「道義責任」。**³⁸這些權利將持續保持其不可侵犯的地位，立法者和政客別妄想能輕易犧牲這些價值，試圖利用政治手段創造低稅、有利於外國投資的經濟環境。阿薩德亦保留1973年憲法對於累進稅率的承諾，這是更進一步冒犯華盛頓方面親商的正統教條。

最後，是復興黨領袖巴沙爾在新憲法中納入的一項規定。那是他的父親哈菲茲於1973年所引進的作法，使敘利亞可以進一步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華盛頓方面的決策者和銀行、企業界有盤根錯節的關係，這項規定是他們絕對無法容忍的，那就是新憲中要求「人民大會」(People's Assembly)的成員至少須有一半是選自農工階級。

以上各項，才是華盛頓、倫敦和巴黎等方面反對敘利亞政府的真正理由。敘利亞政府所捍衛的，是敘利亞及阿拉伯人民的利益；華爾街方面以及在巴勒斯坦歷史故土上建立遷占者國家的猶太人，其利益全然不在敘利亞政府的眼中。復興黨改革的困難不在於民主化程度不夠，真正的關鍵是太民主、太專注於保護及促進敘利亞人的利益，而非讓敘利亞變成華爾街、華盛頓與台拉維夫等方面的馬前卒，為他們的利益奔走。

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利比亞

回到1969年，一名年輕的利比亞軍官穆安瑪·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發起一場政變，成功推翻英國支持的國王伊德里斯一世(Idris I.)。格達費曾受到兩個人物啟發：第一位是烏瑪爾·穆克哈塔(Umar al-Mukhtar)。他是反帝國主義的愛國者，因為好萊塢1981年的電影《沙漠雄獅》(Lion of the Desert)，讓他永垂不朽。他率領一支穆斯林聖戰士，對抗在利比亞執行殖民統治的義大利法西斯。當時法西斯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夢想將利比亞納入新的羅馬帝國。啟發格達費的第二位人物是偉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賈邁勒·阿卜杜·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他同時也是埃及總統。「格達費對納塞爾的崇拜之情無庸置疑，在奪權的那一刻他和同伴們就想讓利比亞成為埃及的一部分，並且投效到納塞爾麾下。」⁶⁶

格達費為新國家所擬定的憲法中，這位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所標舉的革命目標為自由、社會主義和團結。這三大目標與1940年代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所宣告的，以及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在1973年憲法中所奉行的，完全一致。從波斯灣到大西洋這一區域，有史以來即是阿拉伯人的居住地。

格達費承諾，「在阿拉伯國家每一個角落的任何人，只要是為了光復每一寸國土而奮鬥，不願讓它再受到帝國主義褻瀆，並且致力於消除一切障礙，使波斯灣到大西洋的阿拉伯領土回歸大一統」，利比亞「就是你們的兄弟」。此一承諾代表團結以及免於外來勢力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計畫。關於第三項目標社會主義，格達費宣佈，利比亞將會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家規劃系統」；事業之私有權亦可允許，只要屬於「非剝削」性質即可。此外，利比亞將努力達成「充足生產力」的目標，也就是盡其可能脫離對於工業化國家之依賴，邁向以「平等分配」為特色的公正社會。

最後，格達費宣誓要與全球南方並肩作戰。他承諾，全世界的人民凡是正和帝國主義對抗的、凡是能夠「徹底了解無論擁有多麼豐富的自然資源，反動力量與帝國主義的結合，是造成國家開發落後的原因」，利比亞將與這些人民緊密合作。不論是先前的歐洲殖民主義強權國家，或者是美國這隻新興的帝國主義巨獸，它們的精英階級理所當然都不會喜歡這一類計畫。西方強權國家厭惡馬克思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不樂於見到阿拉伯世界有一天竟能掌控自己的命運，或者說得具體一點：掌控他們的石油。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利比亞移交給聯合國。在聯合國的安排之下，扶植了一名統治者，他在戰爭期間一直受到英國的保護。這名統治者即是後來的伊德里斯一世國王。很快地，美國空軍便接手靠近的黎波里(Tripoli)的英國空軍基地。這個基地讓五角大廈的決策者垂涎不已，因為它與蘇聯的距離夠近，美國的战略型轟炸機很容易

易即可抵達位於蘇聯的目標。後來，格達費驅逐了此地的美國人。

1959年，利比亞發現石油。伊德里斯一世國王和他的朝臣壟斷湧入利比亞的金錢，此舉激怒了格達費。「如格達費的父母，窮人家庭住在帳篷搭建的村落。統治者的作風如同在傷口灑鹽。」⁴⁰

格達費掌權之後，重新調度利比亞的石油財富，用來提昇利比亞人的生活。這些作法，正是信守他在憲法中所承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計畫。根據美國國務院一名前官員所說：在1963年時，「的黎波里是一座貧民窟城市，許多房子都是以殘料廢物建成的，而且大部分缺水缺電。」格達費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計畫「大幅改善沿海居民的生活」。在格達費政府的治理之下，他們的生活「遠遠超乎父親及祖父那一輩的想像」。⁴¹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利比亞確實「在每個層面都表現出令人驚歎的發展紀錄，從教育、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到就業機會創造，均是如此。而且，往往都具有值得稱讚的社會公平性」。⁴²

格達費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創造了人類發展的傲人紀錄，歸功於他對國家經濟進行「利比亞化」。如此一來，他也激起了華盛頓方面的敵意。華盛頓方面喜愛的外國政府，是能迎合美國的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美國化」該國經濟的。格達費因此成為美國顛覆政權行動中的目標，不足為奇。美國的顛覆行動在2011年獲得成果。當時在利比亞有伊斯蘭戰士反抗格達費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尋求在當地建立伊斯蘭國家。美國即領導北約(NATO)部隊加入伊斯蘭戰士一方。

格達費政權被推翻一年之後，《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私人石油公司對於格達費政府時代雙方所談判的親利比亞石油交易大表憤怒，「希望利比亞變天之後……已往他們」與利比亞國營石油公司「在合作協議中同意的某些強硬條款，可以獲得讓步」。⁴³數十年來，歐洲石油公司在利比亞油田享盡好處，可以從中獲得一半的高品質原油。然而，格達費與這些公司重新談判，將它們從每一座油田所能分到的原油，一口氣調降到百分之十二的低比例。⁴⁴至於利比亞的各項核心事業，這位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同時也禁止外國勢力染指。例如占利比亞石油生產大宗的陸地油田，仍保留為國營石油公司所有。

令外國石油公司感到氣餒的還有：利比亞的國營石油公司「明文規定外國公司必須聘用利比亞人擔任重要職位」。⁴⁵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11月的一份電報中即抱怨：「在能源業，利比亞的政治和經濟領導階層，正在追求更為民族主義的政策」，「利比亞的資源民族主義，證據越來越多」。⁴⁶電報中引用格達費在2006年的一場演說，他提到：「石油公司掌握在外國人之手，他們因此賺到數以百萬計的財富。此刻，利比亞人必須取代他們，從這筆金錢中獲利」。⁴⁷格達費政府同時要求這些公司，必須以利比亞名稱為當地子公司命名。對石油公司來說，更糟糕的是：「勞動法經過修法，使經濟變得更加『利比亞化』」，也就是說，變得更有利於利比亞人。「事實證明，格達費上校是令這些跨國石油公司頭痛的合夥人，經常提高費用和課稅，並會提出各種要求」。⁴⁸

格達費被罷黜，隨後被北約撐腰的伊斯蘭教徒謀殺。聯合國發出聲明，感嘆利比亞的「國家發展因為計畫經濟而大受阻礙」，又因為國家的「投資、價格控制和補貼」而停滯不前。⁴⁹利比亞本是貧民窟等級一貧如洗的國家，連首都都沒有自來水和電力。然而，格達費這個受到烏瑪爾·穆克哈塔和邁勒·阿卜杜·納塞爾啟發的統治者不知有何本事，竟能將它改頭換面，達到利比亞的祖先們作夢也想不到的地步。即使是美國國務院的前官員都不得不承認，在格達費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統治下，利比亞的發展締造了令人驚豔的紀錄。

聯合國的評語不值一哂，阻礙利比亞發展的不是阿拉伯社會主義，而是唯利是圖的西方國家石油公司。

如今，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提出的利比亞願景，是：「移除土地所有權和銀行業對外國人的限制，修訂勞工法規，提供商業運作所需的彈性，以及採行統一稅率，取代累進稅率」。⁵⁰換句話說，就是廢除利比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路線，將它推回來勢力的控制之下。

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

如同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利比亞，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也是在相同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原則領導之下，建立其國家路線。這一切並非機緣湊巧。和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一樣，伊拉克1979年到2003年的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也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兼復興黨的信徒。伊拉克的1990年臨時憲法與敘利亞的1973年憲法十分相似，在總統的就職宣誓中即總結了該憲章的取向：「吾以全能上帝之名立誓……將實現阿拉伯國統一、自由與社會主義之目標。」此處我們再次看到復興黨的三重承諾，亦即促進阿拉伯統一以實現脫離外來勢力控制的目標，並且利用經濟之國有權、規劃和干預等手段，克服殖民主義所遺留下來的開發落後。敘利亞的1973年憲法也有幾乎雷同的誓言：「吾以全能上帝之名立誓……為實現阿拉伯國統一、自由與社會主義之目標奮鬥不懈。」

復興黨人薩達姆主政下的伊拉克肩負著阿拉伯民族主義使命，從憲法所設定的國家教育目標亦可獲得明證。這些目標是創造「民族、自由、進步的一代」，「為實現阿拉伯統一、自由與社會主義之目標，勇敢戰鬥……對

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剝削、反動、猶太復國運動及帝國主義」。莫瑟·瑪奧茲（Moshe Ma'oz）指出，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在各級學校所推廣的，也是類似的價值觀，對學生灌輸「敘利亞愛國主義、復興黨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反猶太復國運動」。⁵¹如此堂而皇之推崇反帝國主義、親阿拉伯與親社會主義等價值，華盛頓方面的反應可想而知。越戰期間，當時美國的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曾經強調：除非國際環境的意識形態能達到安全無虞，否則美國的安全即無法獲得保障。但是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完全不配合魯斯克所定義的計畫。反之，它們在阿拉伯兒童身上所培養的價值觀，恰好與美國的思想對立，不同意由華盛頓方面所領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是理所當然而且令人嚮往的，也不認為美國的領導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伊拉克追隨薩推爾·胡蘇里的思想，其阿拉伯民族主義憲章設定了「實現單一阿拉伯國家」的遠大目標。此時此刻，薩達姆政府將集中心力於伊拉克內部的團結一致。復興黨鼓勵人民將自己視為伊拉克人，而非任何家族、部族或教派的一分子。為能有助於達成這項目標，伊拉克禁止使用家族和部族名稱。世人所知的薩達姆只有單名，就是這個原因。若非如此，薩達姆的全名是薩達姆·海珊·瑪吉德·提庫里提（Saddam Hussein al-Majid al-Tikriti），其中包含他的名、父親的名、他的家族名以及部族名。禁用家族和部族名之後，他的名字剩下自己的名「薩達姆」或父親的名「海珊」兩個選擇。一般人普遍誤以為海珊是薩達姆的姓氏，實則並非如此。薩德姆自稱「薩達姆」，幾乎所有伊拉克人也是以這個名字認識他。⁵²

社會主義也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在1990年憲法中即已顯著地強調，甚至將實現社會主義提昇為伊拉克共和國主要的目標之一。根據該憲法，伊拉克立國的理由之一，正是「建立社會主義體系」。憲法明文規定，伊拉克的天然資源和「基礎生產工具」等經濟制高點，均「為全體人民所有」，國家將「負

責全國經濟之規劃、指導與引領」。雖然國家亦許可「私人所有權和經濟上的個人自由」，但是它們係隸屬於國營部門，凡事以國營為優先。唯有能和「經濟與總體規劃」配合，才可以從事民營事業之任何活動。

復興黨將工作視為權利，「確保……所有公民皆能享有此權利」。至於教育，則是「在小學、中學和大學階段，全體公民均可獲得免費教育」。此外，國家將「持續擴充預防、治療與醫藥等方面的免費醫事服務，負起保護社會大眾之責」。換言之，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伊拉克將其承諾正式載入國家憲法，願為它的國民提供完全就業、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等社會條件。它的前提是國家經濟能保持國有，並且遵循規劃以謀全民之福祉，凡是能隸屬於國營部門管理的民營事業也是在歡迎之列。

伊拉克人民熱愛他們的社會主義系統，但美國官方當然十分不悅。

對一般伊拉克人民來說，國營經濟是伊拉克的偉大成就，復興黨使伊拉克石油公司國有化，更「可說是薩達姆最受歡迎的政績」。⁵⁴復興黨利用收歸國有的石油產業，改造了整體伊拉克社會，建立龐大的新基礎設施。「彷彿一個黃金時代就此展開……學校、大學、醫院、工廠、戲院和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就業普及亦使勞力短缺的問題獲得改善」。⁵⁵

國有經濟是伊拉克人民之福，然而國營事業的蓬勃發展卻讓華盛頓方面難以高枕無憂。其理由有二。

第一個理由：復興黨的社會主義政策使伊拉克從此脫離美國的手掌心，這一個領域不再是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謀取利益的地方。由於國營制度排除私人所有權，只要伊拉克的經濟是掌握在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手中，對美國的商人來說，都是大失良機。

第二個理由：復興黨伊拉克揭露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一大真相，那卻是華盛頓方面所極力想要掩蓋的。這個真相是：阿拉伯人可以擁有超乎他們夢想的美好未來，只要他們能團結一致，使他們的國土免於外來勢力的控制，並且藉由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發揮他們的天然與人力兩大資源，克服殖民主義所造成的開發落後。

伊拉克和敘利亞都是由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所統治的國家，他們都承諾實施國有制和計畫經濟。但是伊拉克推行「保健、教育和社會計畫」，這一點「遠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更為先進」，包括敘利亞。⁵⁶不可否認地，敘利亞「具備一套了不起的社會計畫，包含比美國更完善的保健系統，以及普及的免費教育」⁵⁷；但是復興黨統治的「伊拉克在社會及經濟方面，都比阿薩德的敘利亞更進步很多」。⁵⁸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是石油：伊拉克的石油藏量豐富，但敘利亞則是付諸闕如。

如果說，在復興黨的統治之下，只是伊拉克就能創造新的黃金時代，那麼我們不妨想像一下：換成是從伊拉克到阿拉伯半島再到北非的這一片阿拉伯家園，只要能夠妥善運用它全部的石油財富，將會創造出怎樣的成就？羅勃·德瑞福斯（Robert Dreyfuss）在《惡魔的遊戲》（Devil's Game）一書中提出這一點，它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來說是激勵人心的願景，對美國還有波斯灣地區各個國王、埃米爾及蘇丹而言，則是一項致命的威脅。若不是仰賴美國的保護，那些國王、埃米爾和蘇丹豈有能力對抗他們的國民。

「這些石油國家的君主政權是由一群皇家惡棍統治著，他們的權力缺乏合法性，完全是靠外在的軍事保護才能維繫其命脈。大多數阿拉伯人心知肚明，了解這些君主政體不過是帝國主義扶植，目的是全面包圍油井。阿拉伯人若是能將包括伊拉克在內各個中心的健全設施和眾多人口與沙漠王國的石油財富結合，則阿拉伯人將可獲益良多。如位於埃及的阿拉伯人中心擁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藏量則高達二千億桶。若是能結

合埃及首都開羅和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亞德 (Riyadh)，將可形成一個無與倫比的重心，影響力無遠弗屆。」⁹⁹

美國的「外交關係協會」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智庫，外交關係協會的學者伯納德·路易思 (Bernard Lewis) 曾在協會的機關雜誌《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撰文，簡述美國在1991年以軍事干預波斯灣的理由。他在文中即提到，該地區占世界石油供應的極大部分，美國務必保護其安全：

「如果繼續放任薩達姆·海珊為所欲為（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他將掌控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石油資源。假使波斯灣地區的其他國家看見他自作主張也不會受到懲罰，剩下的國家很快就會任他長驅直入，即使是沙烏地阿拉伯也唯有屈服或被推翻兩條路可走。該地區的石油占全世界產量的極大比例，因此真正的危機在於壟斷石油的控制權。」¹⁰⁰

2006年8月，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迪克·錢尼 (Dick Cheney) 也借用類似的理由，為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動自圓其說：「薩達姆·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軍火庫，並且坐擁全球百分之十的石油藏量，極有可能會企圖掌控整個中東地區，進而控制全世界的能源供應。」¹⁰¹

取締復興主義

華盛頓方面兩度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並且在兩次戰爭之間祭出制裁措施重挫伊拉克。一般人難免會認為，美國的動機和保衛美國的石油供應安全，沒有太大的關係。

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以2012年來說，占進口總量的百分之43。¹⁰²來自波斯灣六個供應國的比例，則相對只有百分之22。¹⁰³美國本身也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¹⁰⁴而且，「獨立於外國的能源供應，是美國自理查·尼克森 (Richard Nixon) 以來，對歷任總統頗有吸引力的目標。美國近年來由於石油產量提高以及消費量減少，竟意外地使美國大為接近這個目標」。¹⁰⁵

美國始終都不像外界所普遍相信的那樣，仰賴波斯灣的產油國。身為重要的石油生產國，美國對於波斯灣產油國的依賴程度，確實並不顯著。直到1970年代中期，美國的石油消費開始超過國內產量，它才開始向波斯灣國家進口石油。社會學家艾伯特·齊曼斯基 (Albert Szymanski) 於1983年所提出的觀察心得，如今看來仍十分正確：「許多人都認為，美國必須依靠波斯灣地區的石油。但是，試想美國的石油公司在該地區的石油產業仍持續保有主導地位，並且獲得巨額利潤，可見美國事實上並不是特別依賴波斯灣進口的石油。」¹⁰⁶無庸置疑的是：

「美國的跨國石油公司控制中東地區的石油財團，時間已經長達一個世代之久。即使如此，直到1970年代中期，中東地區所生產的石油很少進口到美國。在這一段期間，美國的跨國石油公司是將地底下所抽取出來的石油，賣到歐洲和日本（以及其他開發較為落後的國家），從中獲得龐大利潤。這些利潤有很大一部分被匯回美國。」

「1976年……美國在中東的石油公司所輸出的石油，進口到美國的不到百分之7，賣給第三國家的卻高達百分之82。」¹⁰⁷

美國入侵伊拉克，副總統錢尼為了自圓其說，指稱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有可能掌控世界的能源供應，美國的行動是在回應這一大警訊。錢尼的警告有兩個問題。他將波斯灣的石油和「世界的」能源供應混為一談，

這是大錯特錯。我們已經指出，波斯灣的石油只占世界總量的一小部分，而且美國並未特別仰賴波斯灣石油。第二，若是錢尼所設想的情況屬實，美國即不可能斷絕它從中東所能取得的那一小部分石油。由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在伊拉克所開創的黃金時代，極為仰賴石油銷售，能持續在全世界的市場供應石油，才是符合伊拉克的利益。從華盛頓方面的觀點而論，問題並不在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會切斷美國取得中東石油的管道，而是美國的石油公司再無法將阿拉伯石油賣到西歐和日本，損失的可是巨額利潤。

在華盛頓方面看來，路易思所談到的才是真正的危機。萬一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成功征服科威特，即有可能壟斷阿拉伯在西亞故土上的石油控制權。這意味阿拉伯的國營部門控制將從伊拉克延伸到科威特，再到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可利用這些新取得的國有資源，實施各種受意識形態啟發的政策，提供完全就業、免費醫療保健和免費教育，還有大量擴充的新基礎設施計畫，範圍能遍及全區域。

然而，美國的銀行、企業和投資家在這一切行動中卻完全分不到一杯羹。因此，華盛頓方面真正關心的，不是美國人民會因為缺乏能源而在暗夜中受凍、在加油站大排長龍，而是美國的石油公司對中東石油的控制權旁落，轉移到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人卻可以利用這些資源提高阿拉伯民族的地位。其結果就是：阿拉伯石油的絕大部分利益將會流向合法的阿拉伯擁有者，輪不到美國企業分食。

巴格達方面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有可能示範給一般阿拉伯百姓看，告訴他們：只要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能夠追隨世俗民族主義派的統一計畫，讓阿拉伯民族的資源和命運回歸自己的掌握，那麼，大家的生活水準就能大舉提昇。

我們可以這麼說：美國長期以來征戰復興黨統治的伊拉克，它的目的百分之百就是為了消除這樣的威脅。華盛頓方面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隨後大肆占領，並且重組伊拉克的經濟和政治。它的目標同時也是在於顛覆伊拉克的國營經濟制度，為美國商業創造新的獲利機會，這樣的機會是已往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主政時完全被杜絕的。為了避免阿拉伯民族主義捲土重來，華盛頓方面也一併取締復興主義，以求斬草除根。

美國殖民總督保羅·布雷默對於伊拉克的社會主義絲毫不感興趣，任何人即使可能會懷疑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是否為社會主義派，也不必懷疑美國官方已經一口咬定它就是。令布雷默不滿的是：「一旦能進入（復興黨統治下的）伊拉克，舉目所見都是徹徹底底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主義經濟。」他譴責伊拉克的國有石油產業，稱它是復興黨「邪惡社會主義招牌」的化身。在美國官方眼中，薩達姆和阿薩德半斤八兩，都是阿拉伯共產黨。至少，薩達姆的政策對美國商業利益所造成的影響，跟真正共產黨會實施的政策沒有兩樣。

華盛頓方面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重挫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時也希望這股意識形態無法再領導伊拉克。布雷默成為伊拉克的新軍事獨裁者，他所發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伊拉克社會之去復興黨化」。這道命令解散了復興黨，並且徹底清除伊拉克全國職位的復興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人員。布雷默所提出的理由，是保護「伊拉克的人民，因為過去多年來伊拉克在復興黨的統治下，他們的人權受到大規模的蹂躪與剝奪」。不過，布雷默的理由完全無法取信於人。美國和復興黨政府之間，長期以來一向都有合作關係，由美國配合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打擊共產黨在伊拉克境內的影響力，以及挑戰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對於美國所憎惡的個人、團體和運動，復興黨主政的伊拉克大舉侵犯他們的人權，美國並沒有太多異議。巴格達方面對伊朗開戰，美國也未曾表示反對，因為當時伊朗才剛經歷伊斯蘭革命，已是美國仇視的對象。

華盛頓非但沒有反對兩伊戰爭，甚至協助伊拉克作戰到底。布雷默之所以發出反復興黨的肅清命令，更為可

信的解釋，是華盛頓方面對復興黨的意識形態取向大多不以為然：例如它承諾要解放外來勢力的控制、它建立泛阿拉伯超級大國的遠程目標，以及採行社會主義路線。我們可以這樣看：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以及華盛頓方面要求「阿薩德下台」，只不過是布雷默的伊拉克聯軍臨時管理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在敘利亞比照辦理的第一條政策。此舉的目標正是：敘利亞之去復興黨化。

伊拉克的新憲是美國所批准的后阿拉伯民族主義憲法，它嚴禁任何「機關團體或計畫」以「煽動、頌揚、推廣或證明」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為目的，「無論其所採用之名義為何」。因此，凡促進團結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等作為，都是明令禁止的。憲法更明確指出，復興主義「不得納入伊拉克政治多元性之一部分」。唯一能被允許的，是順服於美國帝國主義強權的意識形態。如果說列寧曾決定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對手不得自由安排其身後事，美國則是決定美國帝國主義的對手，不得在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上自由組織反帝國主義的反對黨。如此一來，在后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所謂多元主義有了特別的內涵：它既非親阿拉伯也不是世俗民族主義。在2009年的選舉中，有超過560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伊拉克人被褫奪參選權。這是奉行華盛頓方面批准的憲法，執行去復興黨化條款的規定。於是，選舉遂完全成為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的天下。⁷¹若是西方人相信，教派團體在后復興黨的伊拉克崛起，足以證明世俗民族主義在伊拉克已得不到民意支持，那是大錯特錯的。世俗民族主義致力於統一、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以上的一切卻表示它和伊拉克的政治已經永遠絕緣。此後伊拉克的政治只能任由教派團體控制，未來也只剩下宗教分裂一途。對華盛頓方面而言，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從伊拉克的政治領域被永遠剷除之後，美國的占領機構當局著手羅織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所犯下的罪行，也就是他們如何阻礙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獲利。

「布雷默先生所頒佈的政策，乃是出於布希政府的精心算計。它的核心是一系列動作，有效地「去國有化」伊拉克的經濟。該政策不僅被導向國營企業之民營化，而且允許外國的利益團體百分之百收購。布希政府的政策，目的是讓伊拉克成為完美的範例，落實《經濟學人》（Economist）所說的『資本主義之夢』。事實上它不止是資本主義之夢，更精確地說，是外國資本主義之夢。」⁷²

隨著伊拉克大部分的經濟被轉移到民營部門的控制之下，布雷默亦頒佈政策，「取消進口貨物的所有限制」。這些法令相當有效。當時伊拉克的經濟因為戰亂而殘破不堪，在地企業和工廠處於極端不利的地步。他們往往缺乏適當的機械，也無法取得原物料，根本無力和廉價的進口貨物一較高下。⁷³同時，美國公司「占盡優勢，能取得一切重大重建工程的合約，大多數伊拉克公司及其他國家的公司」則完全沒有資格參與。⁷⁴這些政策在在顯示：從華盛頓方面的觀點來看，伊拉克不過就是美國企業的投资場域罷了。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即強調過這一點，她說：「美國差不多該開始思考，把伊拉克當成做生意的機會。」⁷⁵看起來她忽略了一件事：美國始終都是把伊拉克看成生意機會，從未停過。

阿曼

英國對阿曼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發起一場秘密戰爭，戰爭的目的是保衛一名被唾棄的傀儡統治者。這場戰爭呈現了一個長期存在、也將繼續存在的衝突：衝突的一方是西方國家及其代理人，另一方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他們之間的問題在於：蘊藏於阿拉伯土地之下的豐厚石油財富，應該如何利用？石油的利益，是屬於那些在

西方石油公司占有股份的投資家？抑或應該用在土生土長的阿拉伯人民開發所需？

阿曼位於阿拉伯半島的東南端，君臨具有重要戰略地理地位的「荷姆茲海峽」。每天通過荷姆茲海峽運送的原油，數量大到難以估計。兩個世紀以來，英國都能掌控阿曼的歷任蘇丹。英國以金錢籠絡阿曼的統治者，並且在他們身邊安插英國的顧問和內閣部長，藉此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例如1960年代中期，賽得·賓·塔穆爾（Said bin Taimur）蘇丹的收入有一半以上直接來自英國。到了1967年，阿曼發現石油，這樣的局面才開始產生變化，阿曼的蘇丹們不再需要英國的津貼來支應豪華的生活。⁷⁶

阿曼在形式上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實際上卻是英國的殖民地。它的國防部長和情報部門主管，都是英國的軍官。阿曼政府的所有內閣部長都是英國人，只有一名例外。蘇丹的首席顧問聽命於英國外交部，軍隊的指揮官則是每週與英國大使會面、每天和英國的軍方專員會面。蘇丹國只有和一個國家有正式關係，那當然是英國。理論上蘇丹擁有絕對的權威，實際上不過是一名傀儡。為了要製造國家獨立的假象，蘇丹的地位只是權宜之計。唯有如此才不會被看穿，它其實只是英國外交部轄下的一個部門。⁷⁷

阿曼人既貧窮又缺乏教育。1960年代中期，全國只有一所醫院、三間初級學校，沒有中學、沒有電話，也沒有基礎設施。阿曼全國人口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四分之三人口死於夭折。阿曼是世上唯一可以合法蓄奴的國家，倫敦方面在阿曼的代理人蘇丹，正是大奴隸主。⁷⁸

蘇丹的統治風格苛刻而且任性。他禁止收音機、自行車、足球、太陽眼鏡、鞋子、褲子和汲取井水用的電動泵。違反規定者會被公開處決或是囚禁在地牢。蘇丹共有500名奴隸，其中有150名是婦女，被他留置在宮中，可想而知是供其荒淫取樂。蘇丹的人民對他恨之入骨，而且恨屋及烏，也同樣痛恨支持他掌權的英國。⁷⁹

阿曼國的處境，和利比亞舉目可見的情況，以及激發格達費發動革命的背景，其實並無太大差別。它們的國王都是有英國在背後圍事，也都是在一貧如洗的人民中享受窮奢極侈的生活

阿曼人曾經多次揭竿起義，對抗他們的蘇丹。然而，這些傀儡統治者都是依賴英國的武力，才能平息每一次動亂。到了1966年，阿拉伯民族主義革命爆發，其背後的支撐力量是中國。革命派威脅將要奪取阿曼新油田的控制權，並且用來提昇阿曼人民的生活，不再滿足西方的資本擴張，以及養肥蘇丹和他的人馬。倫敦方面的恐懼油然而生，擔心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將會脫離英國，落入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手中，也就是被當地渴望自決的人民掌控。

英國對革命的反應快狠準：村莊被夷為平地、牲畜被屠殺殆盡，無論是叛亂分子或非戰鬥平民，一律被當成敵人而不留餘地。英國記者以恩·寇本（Ian Cobain）寫道：「英國在阿曼扶植及資助蘇丹，但人民起而反抗殘酷無情的暴君。英國率領的軍隊決心平亂，他們在井水下毒、燒毀村莊、摧殘農作物，並且射殺牲畜。他們審訊叛亂分子，並且因而精進了刑求的招式……平民居住的區域全數變成可以自由開火的戰區。」⁸⁰

到了1970年，英國鎮壓叛亂的殘暴行動顯得蹣跚不前，叛亂越來越強大。為了動搖叛軍的士氣，倫敦方面試圖採取和解手段。於是軍情六處、外交部和國防部聯手，密謀一場宮廷政變。阿曼的蘇丹賽得·賓·塔穆爾是阿曼人民（以及英國）怒火的眾矢之的，隨後遭到罷黜，另外扶植他的兒子卡布斯·賓·賽得（Qaboos bin Said）繼位。新任蘇丹在英國顧問的要求之下，廢除奴隸制度，並且開始將國內的部分石油收入用來開發基礎設施。同時，英國派遣SAS（特種部隊）到阿曼，擔任新傀儡的禁衛軍。⁸¹

如今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卡布斯·賓·賽得仍是阿曼的獨裁國王，擁有絕對權力，透過詔書頒

行法律。他繼續維持對政黨的禁令，由自己身兼武裝部隊參謀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他所制定的法律，理論上是參照《可蘭經》。

卡布斯·賓·賽得蘇丹在英國的「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受教育。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是英國皇室各式各樣成員的訓練基地，許多以西方利益馬首是瞻的阿拉伯君主，也是這個學院出身的，包括沙烏地的多位國君、科威特的埃米爾、約旦國王和巴林(Bahrain)國王。

在蘇丹國家，婦女於法律上只有從屬地位，一般人咸信阿曼監獄使用酷刑的情況十分普遍。阿曼境內有兩座美國空軍基地，2016年5月英國也宣佈將在阿曼設立一座軍事基地。⁸²

穆安瑪·格達費與薩達姆都是出身寒微，迥異於卡布斯·賓·賽得以及其他的阿拉伯國王們。格達費與薩達姆都崇尚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國家的天然資源全是被用在提昇人民的地位。當然，他們也不像阿拉伯世界現今在位的統治者那樣，在桑德赫斯特吸收帝國主義的價值觀之後，從此深植在心中。

資深駐外記者派區克·寇克朋(Patrick Cockburn)的評論說道：「後殖民政府如格達費或薩達姆，他們取得權力之後，雖成為專制獨裁者，但是他們別有懷抱：領導者都自知是未開發國家，因此他們將一切資源投注在新取得國家主權並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們有具體的目標，如同在利比亞或伊拉克，均是志在掌控石油，然後才能造福利比亞或伊拉克人民。」⁸³

敘利亞可供開發利用的天然資源比利比亞和伊拉克來得少，因此，改善社會的可能性較為有限。雖然如此，在復興黨的統治之下，鄉村的貧民生活已獲得大幅提昇。誠如美國國務院的前官員威廉·波克(William R. Polk)所觀察到的，復興黨國家敘利亞「具備一套了不起的社會計畫，包含比美國更完善的保健系統，以及普及的免費

教育」。⁸⁴東歐的共產國家，儘管在物質財富方面不及北美、歐洲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對手，他們在人類發展上所創造的成績，和有錢有勢的資本主義大國所能做到的，同樣令人激賞。⁸⁵革命派利用規劃及公有制原則組織經濟，並且其明確的目標都和公共福利有關。革命派證明了一件事：以物質條件來說，革命派所治理下的人民可以獲得更多好處。

革命派的目標是追求民主政治，它所謂的民主是克服壓迫與剝削，提昇全體人民和階級的地位。馬克思和阿拉伯式兩種社會主義國家都獲得了真正民主政治的成果，相形之下美國的政治是非民主的。它雖有投票機制，但是所有層級的醫療保健和教育都不是免費的，完全就業也不屬於它所關心的事項。相反地，只要是堅定地置身在以華盛頓方面為首的全球經濟秩序中，任何國家的政策，從移民、貨幣到財政，莫不是經過處心積慮的設計，其目的正好是避免完全就業，確保隨時都有眾多失業人口等待工作。藉由這樣的作法，能讓勞工死心塌地留在工作崗位，並且能維持壓低薪資的力道。

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給予自由通行證

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拉克這三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都拒絕聽令於華盛頓方面，不願被納入美國所督導的全球經濟秩序之中。一旦融入華盛頓方面所代表的實質帝國，等於將自身的發展權利拱手讓給華盛頓方面以及它的婢女，也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如此一來，又進一步表示它們被迫必須實施的政策，全是為了圖利西方銀行、企業和投資家而設計的，無視於阿拉伯人試圖脫離西方殖民主義留下的開發落後結果。

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所嚮往的，是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唯有如此才能發展經濟，造福全體人民。因此，他們否決美國為了自由貿易、自由企業和開放市場而提出的經濟計畫，也禁止美國軍隊踏足阿拉伯國土。「在美國本土以外，大約在160個國家或領土都可以見到美國軍隊或其他軍方人員」，⁶⁶但是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敘利亞、格達費的利比亞或者薩達姆的伊拉克，絕對沒有他們的蹤影。

格達費和薩達姆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政策，無異於華盛頓方面的眼中釘、肉中刺。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追求利潤的野心貪得無厭，社會主義政策卻大大限縮了他們可以操縱的空間。而且，阿拉伯社會主義成功提高了伊拉克人和利比亞人的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他們的祖先作夢所能想像的地步。阿拉伯社會主義的成功構成了對美國的威脅，因為它極可能激勵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人民，使他們願意加入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領導的國家。

華盛頓方面遭遇到的危機是：其他阿拉伯人可能會發動革命，推翻外國勢力的控制、將美國的軍事基地逐出阿拉伯領土，此舉將會更加縮減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版圖。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拒絕被併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經濟秩序，終於導致格達費和薩達姆成為美國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

這就如同阿薩德父子也是華盛頓方面的剷除目標，而且理由一模一樣。如果我們相信美國官方的說法，會認為美國強迫巴沙爾·阿薩德下台的行動是2011年才開始的，而且，唯一的理由是關於阿薩德政府如何回應2011年3月爆發的動亂。事實正好相反，華盛頓方面想消滅阿薩德，其動機純粹是因為阿薩德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威脅到了美國企業在阿拉伯世界追求利潤。

華盛頓方面不辭辛勞地要讓全世界認為，敘利亞國內的叛亂，是因為殘酷的獨裁者在惡毒地鎮壓支持民主的異議人士。這不僅是歪曲事實（這場叛亂是受伊斯蘭激發的，就算跟民主有關，也是微乎其微的），更是虛偽的作法，代表華盛頓方面完全缺乏真誠。華盛頓方面對於惡毒鎮壓支持民主的異議人士，其實並沒有特別反感。它在阿拉伯的小弟們全是反民主的國王、埃米爾、蘇丹和軍頭，他們正在做的事，恰好就是華盛頓方面對阿薩德政府的指控；只不過這時候美國卻掉頭不顧。「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給予自由通行證；對於其他政府，我們嚴厲譴責到底。」這是一名美國官員的誠實自白。⁶⁷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巴林、土耳其、埃及和約旦，這些國家無不密切配合華盛頓方面，保護美國銀行、投資家，以及美國在中東的企業，並且致力促進他們的利益。唯獨敘利亞我行我素。因此，華盛頓方面在當地的盟友可以獲得免死金牌，對異議人士大開殺戒，擋我者死。然而，當敘利亞城鎮爆發劇烈的街頭動亂，敘利亞的處理方式無他，只是如同美國當局對付街頭暴動時所會採取的作法，敘利亞卻受到美國嚴厲譴責。

在沙烏地阿拉伯及巴林發生示威，抗議君主暴政並支持代議制民主，但是西方國家大眾媒體對他們的關注，遠遠不如對敘利亞叛亂的關心。沙烏地阿拉伯及巴林發生的示威，華盛頓方面的盟友們採取暴力鎮壓，包括出動坦克。華盛頓方面默不作聲。相反地，對於大馬士革方面處理敘利亞境內叛亂的措施，美國官方卻是用盡慷慨激昂的措辭，目的就是為了塑造輿論風向，引導世人對它的認知。因此，諸如「殘暴」、「惡毒」、「鎮壓」、「獨裁者」和「強人」，這類辭彙即毫無節制地四處散播著。在敘利亞發生反政府示威，誠然屬實。但是，那是暴力示威，有警察被殺、政府單位的建築物被燒毀，所以敘利亞政府不得不採取武力方式應對。試問，有哪個國家不會以武力方式應付暴動？話雖如此，政府對於街頭暴動採取正常的應付方式，卻遭到西方國家官員描述成非法且殘暴的鎮壓，連大眾新聞媒體亦是在火車車廂大肆放送。夫復何言？

除此之外，我們還被告知鎮壓行動是由惡毒的「獨裁者」所下的命令。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他們所謂的獨裁者是在全國大選中獲得多數票的人，他的領導地位是經過人民同意的。反觀華盛頓的阿拉伯盟友名單，從國王、埃米爾、蘇丹到那些軍事現場指揮官，無人可以與這位「獨裁者」相提並論。大馬士革方面的復興黨人奉行的意識形態是阿拉伯統一、免於外國勢力控制，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這一點讓華盛頓方面感到十分不悅，而非將他們徹底清除不可。

但是，無論怎麼看，華盛頓方面的行動都不是從2011年才開始的。當時雖是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發聲，要求阿薩德引咎下台；事實上，美國的行動早在更早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假如你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鐵鎚，那麼所有問題就必須看起來像釘子才行。

有兩股勢力亟欲顛覆復興黨所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它們各有不同的理由。相同的是，它們都下定決心要終結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敘利亞的影響力。它們都厭惡復興主義，基於同仇敵愾，往往會有臨時結盟之舉，以求行事方便。然而，除了對復興黨敵人有共同的反感，這兩股勢力其實是水火不容的。

復興黨人抗拒美國對阿拉伯民族的控制，承諾推行經濟上獨立自主的政策，使得美國對他們恨之入骨。復興黨的政策讓西方國家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獲利的空間大幅縮水。華盛頓方面一向重度傾向華爾街方面的勢力，因而贊成讓大馬士革方面改朝換代。

暗殺與策亂

2003年英美聯手入侵伊拉克，隨後舉世知名的巴勒斯坦籍學者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對此表示：「美國政策的任務」，是在敘利亞和利比亞扶植親美政權，「使〔阿拉伯世界〕成為清一色都是親美政權」，與波斯灣的各個君主國家如出一轍。波斯灣各君主國的統治者都是出身桑德赫斯特學院，這些國家無不死忠力挺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霸權。他們的統治者固然在國內不得民心，但是只要仰賴華盛頓方面的保護傘，他們的政治生命即可高枕無憂。但是，政治分析家莫瑟·瑪奧茲對此卻有不同的觀察。他認為：從華盛頓方面的觀點來看，美國敵視復興黨統治的敘利亞，其根本原因在於它將會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戰鬥的焦點，集結反抗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這是美國方面的危機。

從華盛頓的觀點來看，美國敵視復興黨統治的敘利亞，其根本原因在此。美國出手清除復興黨在大馬士革的勢力，其時間要比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更早數十年。1957年，美國總統德懷特·愛森豪(Dwight Eisenhower)和英國首相哈洛德·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批准一宗暗殺計畫。這宗計畫是由雙方的情報機構共同擬定的，目標是暗殺敘利亞政府領導階層的復興黨與共產黨成員。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攜手合作，對它們而言，在敘利亞政府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高層有：敘利亞軍事情報局長阿布戴爾·哈密德·薩拉吉(Abdel Hamid Sarraj)、敘利亞參謀總長阿非夫·阿爾·必茲里(Aff al-Bizri)和敘利亞共產黨主席卡里德·巴克達希(Khalid Bakdash)。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都相信，這三人集團正在大馬士革方面推動的政策，將會助長人民反抗西方國家支持的各個阿拉伯政府。這些政府將可能會被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取代，進而和蘇聯沆瀣一氣。西方國家有不少企業投資中東地區，以西方國家的立場而論，上述可能性已經逾越底線，將會造成令人遺憾的後果。

暗殺行動由CIA中東部門的主管克爾密特·羅斯福(Kermit Roosevelt)負責策劃。他是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之孫，曾領軍1953年的伊朗政變，推翻總理穆罕默德·莫沙德(Mohammed Mossadegh)。莫沙德使伊朗的石油產業國有化，因而導致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極度不滿。羅斯福等人唯恐敘利亞的復興黨和共產黨結盟，將會使整個中東地區遍地開花，激勵更多仿效莫沙德的政策。同時，也會促進全民發動改朝換代，更進一步產生有利於獨立自主的政策。

另外還有一事令西方國家感到不安：連接歐洲與伊朗的主要油管，其中有一條是行經敘利亞。對美國與英國來說，油管的控制權淪入馬克思和阿拉伯這兩派社會主義強人之手，是西方國家石油利潤的一大災難。

羅斯福的計畫，是在敘利亞內部掀起暴動，同時徵召敘利亞國內的穆斯林兄弟會助陣，因為他們是復興黨與共產黨勢力在敘利亞國內最大的對手。他也密謀組織武裝的非法軍事團體，在國內發動內戰。

後來，敘利亞在2011年發生暴動，羅斯福計畫的多項特色均在此刻顯現。羅斯福的1957年計畫要求出資成立「自由敘利亞委員會」(Free Syria Committee)，當時並初步規劃成立各種由西方國家出資的委員會，委員會的宗旨只是為了促成敘利亞改朝換代；這一類委員會在2011年左右即紛紛湧現。CIA和英國軍情六處也在敘利亞境內組織非法軍事團體，這不禁讓人想起：於2011年之後出現的反政府打手，他們的資金就是由CIA暗助、五角大廈明助的；還有，也是CIA居中協調，從土耳其、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調配武器，運送給穆斯林聖戰士非法軍事團體。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同時也在敘利亞涉及「煽動內部暴動」以及「慫恿大馬士革方面的穆斯林兄弟會造反」。

羅斯福的如意算盤並未能付諸實現，因為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無法保證可以獲得約旦及伊拉克支持。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原來的打算，是以恢復秩序為藉口，由約旦和伊拉克配合土耳其出兵入侵敘利亞，一舉推翻復興黨和共產主義控制的敘利亞政府。

華盛頓方面反對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個中理由已經昭然若揭。華盛頓方面堅持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但阿薩德及其他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卻不以為然。他們所決心採取的路線，是解放阿拉伯世界，免於外國勢力的控制。再者，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決定實踐社會主義道路，與美國的需求正好針鋒相對。美國強烈要求的是：所有國家均納入全球經濟秩序中，接受美國督導；各國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和鼓勵自由企業；以及任由美國「領導全球經濟」，所有國家唯命是從。明知美國要求的是開放市場、為美國在海外的商業整平競爭環境，加上廢除「國家資本主義」，然而，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仍堅持反其道而行：以關稅作為屏障，孕育國內產業；以補貼在地公司的方式，使它們有能力和巨大的外國競爭者在國內一爭長短；此外更利用國營企業和經濟規劃等手段，克服殖民主義在阿拉伯世界所遺留下來的落後開發。這些政策是阿拉伯產業、商業和人民第一，無視於華盛頓方面的要求，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的利益，從此再也沒有優先地位。

要伊斯蘭，或要復興主義

有第二股勢力想要消滅復興黨在敘利亞政治上的影響力，那就是遜尼派伊斯蘭，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即是這個教派的具體象徵。埃及社會在英國的控制下，伊斯蘭的特色逐漸流失。1928年，年輕的伊斯蘭學者哈桑·班納在埃及創立穆斯林兄弟會，起初就是為了挽回這個趨勢。班納特別關心的，是埃及法律的基礎中，伊斯蘭的成分日益遭受侵蝕。英國勢力影響所及，埃及法理中的伊斯蘭精神不斷失守，法律之制定越來越不參照《可蘭經》或伊斯蘭教規(Sunna)。不只如此，英國亦限縮伊斯蘭宗教法庭的管轄權，而且推翻伊斯蘭對於高利貸和飲酒的禁令。

政治伊斯蘭教徒堅信，凡是在伊斯蘭傳統範圍內的國家，不僅道德和宗教的規範，即使法律和政治體系亦然，均必須以真主啟示的《可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典範作為基礎。政治伊斯蘭奉行一個無懈可擊的邏輯，它的前提是：如果我們接受上帝是完美的，而且已在《可蘭經》啟示了對於人類的計畫；那麼，在這個前提之下即可以推論出：以《可蘭經》為基礎的法律和政治安排，必然優於凡夫俗子所構思的任何系統及法律。穆斯林兄弟會依據上述邏輯，否定世俗主義、馬克斯主義和民族主義，視之為漏洞百出（因為不是由真主所啟示）、非伊斯蘭（因為不是出於《可蘭經》），以及穆斯林世界的異類（因為它們源自西方世界）。

政治伊斯蘭的所有派別，都同樣反對法律以任何意識形態作為基礎，唯獨以伊斯蘭思想者可以例外。因此，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重視阿拉伯身分而輕伊斯蘭信仰，並且根據這個組織原則進行政治動員，對抗外來勢力的控制，這一點讓穆斯林兄弟會感到深惡痛絕。更重要的是，復興主義派承諾實踐世俗主義，拒絕以《可蘭經》和教規作為法理的基礎，也因而導致復興主義派遭受穆斯林兄弟會撻伐。此外，於哈菲茲·阿薩德在位期間，復興黨統治的敘利亞和無神論國家蘇聯結盟；再加上阿薩德的宗教屬於阿拉維派信仰，是兄弟會眼中的異教；這兩項因素雪上加霜，對於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兄弟會的敵意更加昇高不少。

1964年，在「要伊斯蘭或要復興主義」(Islam or Ba'ath)的大纛之下，穆斯林兄弟會於敘利亞全國各地發起種種抗議、罷工、示威和暴動。貫穿整個1960年代，兄弟會領導的騷亂不斷在各大城市上演，並且在1965、1967和1969年聲勢達到最高點。他們的行動訴求始終都是反對世俗主義政府「目無真主」(Godless character)。1967年，敘利亞在「六日戰爭」中被以色列擊潰，兄弟會隨即誓師聲討異教徒，對世俗主義復興黨發動聖戰。⁸

在1970年代，穆斯林兄弟會與世俗主義敘利亞政府的戰役中，有三次重大事件。

第一次事件的起因，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計劃刪除憲法中一項歷史悠久的規定，亦即敘利亞的總統必須為穆斯林；新憲同時也要取消以伊斯蘭思想構成法理基礎。因此，爆發了一系列激烈的暴動。敘利亞政府計劃根除有史以來伊斯蘭對於政治的影響力，使憲法能有穩固的世俗主義立場。此舉形同直接冒犯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以致引起反彈而一發不可收拾。穆斯林兄弟會痛斥哈菲茲·阿薩德是真主阿拉之敵，並且宣告要對他的「無

神論」政府發動聖戰。面對伊斯蘭教徒的憤怒，阿薩德不得不恢復憲法中的伊斯蘭條款，然而於事無補。伊斯蘭教徒對政府的敵意持續有增無減，確實更趨激烈。

到了1970年代中期，穆斯林兄弟會對抗敘利亞世俗主義派的行動邁入新的階段。「暴動將由武裝鬥爭接手，其目的是推翻阿薩德的世俗主義派政府，並且依據伊斯蘭教律法(Sharia)建立伊斯蘭國，取而代之。」⁹兄弟會建立一支地下軍隊，稱為「戰鬥先鋒隊」(Combat Vanguard of Fighters)。這支軍隊在國外受訓並獲得武裝，返回敘利亞即展開一波大規模的城市遊擊戰，暗殺復興黨領導人、國家官員、軍官和蘇聯顧問，無所不用其極；同時，他們也轟炸軍事設施和政府機構。¹⁰戰鬥先鋒隊的養成模式創下先例，2011年時美國和它的武裝盟友遜尼派穆斯林激進分子也有樣學樣，對敘利亞政府發起大型遊擊戰。

在1970年代後半，遊擊戰越演越烈，直到1979年7月達到最高峰。當時有一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滲透潛入軍隊，在敘利亞位於阿勒坡(Alppo)的一所軍校，屠殺了三十餘名學員。攻擊者區隔阿拉維派和非阿拉維派學員，再將阿拉維派學員關進一棟房子，以機關槍和燃燒彈處決。犯下這樁教派暴行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名為易卜拉辛·阿爾·尤瑟夫(Ibrahim al-Yousef)，2016年聖戰士以他為名在阿勒坡再次發動一起攻擊，表明伊斯蘭教徒對於敘利亞「異教徒」政府的怒火依然旺盛。¹¹

伊斯蘭教徒以武裝鬥爭對抗復興黨世俗主義派，在1980年代再創新高。CIA的前官員羅勃·巴爾曾在中東度過數十載，他形容敘利亞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中心。我在1980年初次踏入大馬士革，當時的我推估哈菲茲·阿薩德大約會在三、四年內垮台，因為穆斯林兄弟會已接管街頭，清真寺學校教起了聖戰……清真寺的公共廣播系統大肆放送著仇恨和報復的訊息……我想，他很快就會像大多數敘利亞人一樣，流落大馬士革市中心，

在街燈下悽悽遑遑。」¹³

聖戰士企圖使國家陷入教派內戰，藉此拔除阿薩德。為了實現目標，他們以越來越暴力的行動挑釁阿薩德政府，希望他會被迫調動軍隊平亂。屆時，政府平亂的方式會被視為阿拉維派打擊遜尼多數派，即可望逆轉民意，共同反對政府當局。敘利亞阿拉伯軍大多數是遜尼派成員，穆斯林兄弟會也能利用阿拉維派壓迫遜尼派的相同說法，動搖軍心倒戈相向。¹⁴

以上的精心算計不禁讓人聯想到：2011年之後伊斯蘭發動戰爭反抗哈菲茲·阿薩德的世俗民族主義繼承人，二者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若不是有前車之鑑歷歷在目，敘利亞的戰事會被當作獨一無二的孤立事件，殊不知它的真面目其實是一場歷時久遠、綿延不絕的權力爭奪戰，交戰雙方是敘利亞的世俗主義派和伊斯蘭教徒。

1980年10月，兄弟會成立「敘利亞伊斯蘭陣線」，目的是集結遜尼派反對力量，組成單一的反復興黨聯盟。聖戰士的戰爭宣言公開聲明：這場聖戰絕不輕言放棄，直到復興主義在敘利亞徹底消聲匿跡為止。¹⁵ 穆斯林兄弟會的背後有約旦和以色列奧援，聖戰士的訓練營即設在約旦，幾乎是人盡皆知。三十年後，約旦和以色列也共同支持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同樣的角色在此時就已經約略可以看出端倪。

1982年2月，穆斯林兄弟會控制了敘利亞第四大城哈馬(Hama)。哈馬正是遜尼基本教義派在敘利亞的大本營，也是聖戰士主要的運作基地。由於誤傳阿薩德已經被推翻，消息一來，讓穆斯林兄弟會歡欣鼓舞，開始在整座哈馬城到處燒殺肆虐，掀起一場狂歡式的暴亂血洗。他們攻陷警察局、對復興黨領袖抄家滅族，連政府官員和軍人都沒有放過。在某些情況下，受害者被斬首示眾。¹⁷ 相同的作風，幾十年後也在伊斯蘭國戰士的手上公

然再現。留在哈馬的復興黨官員，則是被趕盡殺絕，無一倖免。¹⁸

後殖民世界的痛苦

西方世界如果有人記得1982年的「哈馬事件」，通常不是因為伊斯蘭教徒犯下的暴行，而是記得敘利亞軍方所採取的回應方式。

敘利亞軍方的行動包括使用武力，在叛亂分子控制的勢力範圍光復主權。這是對任何軍隊都可以預期的作法。敘利亞派出數千名士兵，才從穆斯林兄弟會手中奪回哈馬。在美國國務院前官員威廉·波克的筆下，敘利亞軍隊之襲擊哈馬，和2004年美國軍隊猛攻伊拉克城市法魯加(Fallujah)，兩地在戰後的景況其實不相上下。¹⁹ (當然其中還是有所不同的：敘利亞軍隊是在擁有主權的領土內合法地行動，美國軍隊卻是非法的侵占勢力，以武力鎮壓反對美國占領的當地人民。)然而，在哈馬的攻擊中究竟有多少人喪生？至今眾說紛紜，各種數據頻出。

「《時代》雜誌最先的一則報導指出，有1萬人被殺。大多數觀察家則估計約有5千人死亡。至於以色列的消息來源和穆斯林兄弟會，他們則是指控死亡人數超過2萬人。」²⁰ 以色列和穆斯林兄弟會係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宿敵，因此大有可能會浮誇受害者人數。羅勃·德瑞福斯曾經撰文談到西方國家與政治伊斯蘭並肩合作，企圖打垮穆斯林世界的世俗民族主義派以及共產黨員。他認為，西方國家的消息來源蓄意誇張死亡人數，才能妖魔化復興黨人，說成人人都是冷血無情的殺手。復興黨人也樂於順水推舟，贊同這場騙局，因為如此一來可以威嚇穆斯林兄弟會。²¹

哈馬攻擊過後，敘利亞軍隊在斷垣殘壁中清理戰場。他們發現了證據，證明有外國政府向哈馬的叛軍提供金

錢、武器和通訊設備。波克寫道：

「阿薩德見識到了外國人藏在人民之中製造事端。這畢竟是殖民統治所留下來的情緒和政治後遺症，在絕大多數的後殖民世界，這類令人痛苦的後遺症舉目可見，西方世界的人卻是鮮少能注意及此。這類後遺症並非子虛烏有，它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往往要等到事過境遷的許多年後，我們才能從官方文件獲得證實。哈菲茲·阿薩德並不需要等到官方文件揭密，他的情報機構還有國際媒體的記者，早已爆料過不計其數的意圖，那全是來自保守派、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國、美國和以色列，目標自然是要顛覆他的政府。這些企圖大多涉及『奧步』、宣傳，或者是金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82年的哈馬暴動中，政府軍一共捕獲了超過1萬5千挺機槍是由外國供應的，被下獄的囚犯中則是包括約旦及CIA訓練出來的非法軍隊（非常類似媒體在報導2013年的敘利亞時所出現的聖戰士）。他在敘利亞的所見所聞，印證了他所了解的美國如何顛覆其他國家的政府。他想必也知道CIA試圖暗殺埃及總統納塞爾，以及英美聯手扳倒了伊朗總理穆罕默德·莫沙德的政權。」²¹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從貝魯特到耶路薩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一書中提到，我們可以如此看待哈馬大屠殺：「敘利亞是相對來說新生的民族國家，它的領導人正致力於追求現代化，要將敘利亞建設成為二十世紀的世俗派共和國。然而有種種因素（此處所指的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企圖破壞他所達到的成果，阻撓他的道路。為了避免不進則退，這是他合情合理的反應。」弗里曼繼續說：「若是哈馬大屠殺之後有人在敘利亞進行民意調查，阿薩德處理暴動的作法很有可能仍會獲得絕大多數敘利亞人民認可，甚至包括遜尼派也不例外。其中的原因就在這裡。」²²

1980年代爆發遜尼派伊斯蘭聖戰，反抗敘利亞政府。此一事實挑戰了以下觀點：「黎凡特地區的遜尼派伊斯蘭激進分子，是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國占領當局的親什葉派政策，共同造成的結果。」這樣的看法可以說是缺乏歷史深度，無視於遜尼派政治伊斯蘭是黎凡特地區政治領域的重要勢力，而且已存在長達數十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敘利亞脫離法國統治，正式獨立建國。從那一刻起，歷經二十世紀的數十寒暑，直到進入下一個世紀，在敘利亞境內的競爭勢力，一向都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政治伊斯蘭。誠如記者派區克·寇克朋於2016年所述：「敘利亞境內的武裝反抗軍，是由伊斯蘭國（ISIS）、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Ahrar al-Sham）所控制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以外〕唯一可替代的統治者，是伊斯蘭派」。²³長久以來的局面一貫都是如此。

穆斯林兄弟會在哈馬敗北之後，與其他反抗敘利亞政府的伊斯蘭團體結盟，組成「敘利亞解放全國聯盟」，到了1990年進而成為「敘利亞拯救全國陣線」（National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Syria）。這個陣線組織有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刺殺哈菲茲·阿薩德，為死於哈馬叛亂中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復仇。第二個目標是翻轉敘利亞的世俗主義特色，奠定伊斯蘭的國教地位，並以《可蘭經》和教規作為法理基礎。²⁴

根據學者里亞德·波拉特（Liad Porat）的觀察指出：為了對抗敘利亞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穆斯林兄弟會合縱連橫，直到本世紀依舊努力不懈。²⁵西元2000年代中期，伊斯蘭教徒領銜起草《大馬士革宣言》，公開要求改朝換代。²⁷2007年，兄弟會和敘利亞前副總統合作，成立「全國拯救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該陣線與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以及由美國政府資助的「中東夥伴關係計畫」（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過從甚密。²⁸其中的中東夥伴關係計畫即是公開執行已往CIA必須暗中操作的行動，也就是

針對美國所反對的政權，以金錢和專業知識協助該國第五縱隊。

到了2009年，離阿拉伯世界全面爆發動盪不安還有兩年，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控訴巴沙爾·阿薩德是敘利亞社會中充滿敵意的外來毒素，務必斬草除根，才能天下太平。根據兄弟會的思想，阿拉維派族群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利用復興主義作為掩護，卻是在暗中推動教派綱領。阿拉維派的目標，是藉由打壓「真正的」（亦即遜尼派）穆斯林，從內部瓦解敘利亞。因此，以伊斯蘭之名，非推翻其異教政權不可。³⁹

民主云云，從來不是原因

就在2011年敘利亞全面爆發暴力衝突的前三個月，波拉特為美國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皇家中東研究中心」（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撰寫過一篇短文，他總結指出：「反抗運動的各個領導人不斷表示，希望在敘利亞內部能發起全民革命，而且在革命行動中，『敘利亞人將會替天行道，解放敘利亞，免於暴政和腐敗的政權統治』。」穆斯林兄弟會強調，他們和巴沙爾·阿薩德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之間，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戰；他們和政府沒有政治和解的餘地，因為當今政府的領導者並不是遜尼派穆斯林敘利亞民族。兄弟會主張，唯有真正的穆斯林才稱得上敘利亞民族，阿拉維派信奉外來的非伊斯蘭信條，例如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這是異教作風，不配在敘利亞民族占有一席之地。⁴⁰

美國國防情報局在2012年證實，當年在三個月之後所爆發的暴動中，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是其中的主力。情報局流出的報告指出，敘利亞的叛亂是由穆斯林兄弟會以及伊拉克的蓋達組織領軍，後者正是伊斯蘭國的前身。

報告繼續指出，在叛亂分子的背後，有西方國家、阿拉伯波斯灣產油國以及土耳其的支持。情報局的分析正確預見了「薩拉菲斯特公國」（Salafist principality）在東敘利亞形成，亦即伊斯蘭國堂堂問世。該分析認為，這樣的發展是叛軍的海外金主想要的，他們樂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被孤立，從此斷絕和伊朗的關係。⁴¹

有美國國會研究人員於2005年所撰寫的文件顯示：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反抗運動之前，美國政府即已積極強調敘利亞應改朝換代。過去一般人認為：美國之所以支持敘利亞的反叛分子，是基於信守「民主起義」的精神；此一說法已禁不起挑戰。文件中表明：美國長久以來均處心積慮要顛覆大馬士革方面的政權，它支持敘利亞的叛亂，只不過是既有政策的延伸。這些研究者承認，美國政府意圖推翻大馬士革方面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它的動機確實完全無關於促進中東地區的民主。他們提到，事實上美國偏愛的，是世俗派的獨裁政權（如埃及）和君主政體（如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目標，是加強以色列的地位、鞏固美國對伊拉克的控制，以及鼓勵開放市場、自由企業經濟；因此，美國執著於讓敘利亞改朝換代，動機不過是為了要掃除阻礙其目標的種種路障，民主云云，從來不在考慮之列。⁴²

若謂美國的外交政策和民主有任何關聯，確實連正統沙文主義立場的美國媒體界也同樣大表懷疑，對此不以為然。共產主義國家北韓就如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敘利亞，這兩個國家完全無意被納入華盛頓方面領導的全球經濟秩序。《華爾街日報》的安德魯·布朗（Andrew Browne）曾評論美國的北韓政策，他指出：在東亞，「有許多政治強人獲得華盛頓方面的支持，從韓國的朴正熙、台灣的蔣經國到菲律賓的馬可仕都是」。⁴³此一現象的言外之意是：既然華盛頓方面能和亞太地區的眾多專制領導者你儂我儂，那麼它對北韓的仇視，與北韓拒絕成為多元、多黨的民主國家，根本毫無關係。

且讓我們對照以下事實，這個論點就會更有說服力：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世界偏袒桑德赫斯特學院出身的國王、埃米爾和國君，縱然他們的人民渴望民主，這些領導者可是徹底底沒有任何動搖的意思。

然而，美國長期以來即炮製出一則神話，也就是聲稱美國的外交政策乃是「身先全世界的正義之師」，而且美國是一個「天性良善的泱泱大國」。³⁴ 美國在《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宣稱：「美國的領導地位，是全球的正義之師」。2016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內最後一次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重申這個論點，並且延伸指出，他深信美國「始終堪稱人類歷史極為罕見的超級強權國家，只要美國能置狹隘的自私自利於度外」。³⁵

問題在於：除了不斷被這類鬼話疲勞轟炸的美國人，誰也不吃他這一套。「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副主任傑若米·夏皮洛(Jeremy Shapiro)痛批這個觀念是「大謬不然」，「只有美國人才會信以為真」。另外，他也告訴《紐約時報》：「在世人眼中，這個想法不僅大錯特錯，而且極其危險」。夏皮洛以美國人的身分解釋道，炮製這則神話的目的，是利用它動員人民，支持美國充滿侵略性的外交干預政策。「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發展出這個自我概念，藉以超越它在地理上的孤立狀態。凡是美國企圖干預遙遠國家的危機時，美國總統為了獲得國內人民支持……他們『總是必須在其外交政策中注入更為強烈的道德色彩，壓過其他國家的現況，使師出有名』」。³⁷ 以敘利亞來說，利用道義理由當藉口的慣用伎倆再度派上用場，這一回的說辭是：罷黜「政治強人」。

前述的美國國會研究人員透露：美國在2003年領軍攻打伊拉克之後，隨即開始盤算揮軍入侵敘利亞。但是，為了平定伊拉克，其沉重負擔已超乎預期，因而妨礙了繼續進軍敘利亞的人力與金錢開支。美國所採取的替代方案，是透過制裁手段以及支持各種團體反抗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雙管齊下向大馬士革方面施壓。³⁸

他們亦揭露：早在伊斯蘭國和努斯拉陣線崛起之前將近十年，美國政府即已注意到，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最主要的勁敵；而且，美國也擔心若是伊斯蘭叛變捲土重來，有可能使遜尼派基本教義分子在大馬士革方面奪權。這批研究人員說明了美國的策略是：強制敘利亞的伊斯蘭派和世俗派交戰雙方進行談判而達成協定，藉此化解伊斯蘭派全盤掌控敘利亞的機會。美國要的協議結果，是敘利亞的治安、軍事、司法和行政等功能得以保留，但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統治階層則必須下台。

若是阿薩德和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同伴果真屈從而交出權力，後續發展將會如何？這些國會研究人員並未提出任何揣測。然而，我們可以相當確定的是：敘利亞會開始實施伊拉克模式的去復興黨化。如此一來，美國在敘利亞的運作空間即可門戶大開：復興黨分子既然奉行阿拉伯統一、脫離外來勢力控制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等等價值，並且支持敘利亞獨立，這批人必然會遭到撤換。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乖巧聽話的代理人，甘於作牛作馬助美國心想事成。

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式武器和經濟改革

2005年，美國國會研究人員的報告指稱：華盛頓方面已獲致共識，認為改變敘利亞勢在必行，至於應採取何種手段以遂行目的，各方仍有歧見。報告中說：「有些人主張在敘利亞進行一系列的內部改革，或者設法取代現今的政權亦可。」³⁹ 無論華盛頓方面將走上哪一條路線，美國的決心已經非常清楚：敘利亞政府必須被改變，

不論是改變其政策、領導階層或者一石二鳥，兩者同步改變亦可。這比起2011年時敘利亞發生內亂，歐巴馬公然要求阿薩德下台，時間還早了六年。

報告中將阿薩德政府形容為「美國實現目標的絆腳石」⁴⁰。至於美國的目標有哪些？報告中臚列了以下各項：解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縮小「武器擴散」、建設「和平、民主而繁榮的伊拉克國家」，以及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企業經濟。⁴¹

姑且撇開華麗的辭藻不論，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形形色色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大馬士革方面臣服於以色列的軍事霸權，以及華爾街方面的經濟霸權。如此而已。具體來說，敘利亞為了不至於阻擋美國實現其目標，讓美國不再對它充滿敵意，它應該做到以下各項：

- 接受以色列建立猶太國家的權利，認同以色列從巴勒斯坦人手中奪取領土、分裂阿拉伯世界的家園。至於以色列從1967年起即占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並且在1987年正式併吞迄今，毫無反轉可能；這一點，大馬士革方面最好也能唾面自乾。
- 終止支持激進組織追求巴勒斯坦人民自決。黎巴嫩民族反抗組織真主黨，是反抗以色列向黎巴嫩擴張的重要堡壘。敘利亞也必須斷絕和真主黨的關係。
- 美國和它的中東盟邦，包括以色列，對敘利亞紛至沓來的侵略，敘利亞務必更加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敘利亞甚至必須放棄生產化學、生物和核子武器的能力（但是容許以色列和美國維持大量生產這類武器的權利）。
- 停止反抗美國所控制下的鄰國伊拉克。

美國國會研究人員指出，敘利亞主要仍為國有型經濟，「其經濟基礎係以蘇俄模式為主」⁴²。敘利亞必須須力行政改，使國有型經濟轉型，便利美國企業與投資者剝削。

換言之，復興黨必須翻轉它們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一次髮夾彎式的改變，成為非復興黨並加入親帝國主義的立場。舉凡承諾解放外來勢力控制下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對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堅持，他們都不得不一概放棄。所謂敬酒不吃則吃罰酒，敘利亞若想避免被迫改朝換代，唯有自動自發改朝換代。它必須效法華盛頓方面所扶植的政權，採行親西方國家、親外國投資，以及親以色列的各種施政。從今以後，像是「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這類字眼，將在這個國家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分裂」、「順服」和「自由企業」。

美國政府對敘利亞政策的不滿，可以用三個美國定義的標題涵蓋：即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式武器和經濟改革。這三個標題可以分別翻譯如下：猶太復國運動征服阿拉伯領土的行動中，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反抗力量的主要支持者；自我防衛能力；以及經濟主權。

國會研究人員的報告談到，敘利亞固然「未曾直接涉及1986年以來的恐怖主義行動」，但是它為追求民族自決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支援和安全庇護」，還讓「他們得以在大馬士革成立辦公室」。光是這一點，已足夠美國將敘利亞貼上恐怖主義贊助國家的標籤。研究人員繼續說道：大馬士革方面除了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主義者」，同時也允許「伊朗經由大馬士革輾轉獲得真主黨的補給，而真主黨是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激進組織」，也就是說，敘利亞藉由這樣的形式支持了黎巴嫩「恐怖主義者」⁴³。

2003年5月3日，美國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遠赴大馬士革。針對追求巴勒斯坦自決的激進組織，鮑爾以個人身分要求大馬士革方面斷絕和這些組織的關係，並且停止在大馬士革提供他們運作的辦公室。

2004年2月12日，鮑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他抱怨「我方要求敘利亞永久關閉這些辦公室，並且將一千人等驅離大馬士革，但是敘利亞充耳不聞」。⁴⁴

敘利亞政府拒絕為真主黨和巴勒斯坦激進分子戴上「恐怖分子」的大帽子，甚至認為這些團體的行動代表合法的不服從。⁴⁵ 華盛頓方面的居心卻十分明顯，凡是追求巴勒斯坦自決以及黎巴嫩主權的活動，一律都被污蔑為恐怖分子。

「2002年5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約翰·波頓(John Bolton)在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將敘利亞、利比亞及古巴歸類為流氓國家……他們正在研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⁴⁶ 同一年稍晚，波頓告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布希政府十分憂心敘利亞的核彈及導彈計畫。到了2003年9月，波頓提出警告：「敘利亞有一系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計畫」。⁴⁷

敘利亞擁有化學武器，這一點毋庸置疑(稍後已銷毀)，然而和美國、蘇俄相比(連它在當地的宿敵以色列很可能也可以算在內)，簡直小巫見大巫。(以色列已簽署禁止生產及使用化學武器的全球公約，卻從未正式批准生效。)國會研究人員引用《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指出敘利亞「面對勁敵以色列的核彈能力，試圖增強其製造化學武器和導彈的能力，以此作為『勢均力敵的籌碼』」。⁴⁸ 可是，要說化學武器足以當作籌碼和核子武器勢均力敵，不僅站不住腳，而且貽笑大方。

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 W. Bush)的角色是負責妖言惑眾，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概念演繹成鬼話連篇。他擴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範圍，把化學藥劑也納進來。在布希之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個術語，是指對於未來環境的殺傷力，和核子武器一樣大或者類似的武器。為了對伊拉克宣戰，布希貶抑了這個術語的定義。伊拉克這個富藏石油的阿拉伯國家，膽敢挑戰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導地位。正確地說，伊拉克的軍力其實比美國弱小得多。但是布希必須虛張聲勢，把伊拉克膨脹、轉化為美國的重大威脅。

1989年，布希曾保證會在1999年之前銷毀美國的化學武器。直到2016年，五角大廈卻仍然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軍用化學藥劑庫存。美國的盟邦以色列和埃及，同樣也擁有化學武器。2003年，敘利亞曾在聯合國安理會提案，要求使中東成為無化學武器地區，但這項提案遭到美國封殺。

美國的用意很可能是為了庇護以色列，讓它不必銷毀庫存的化學武器。另外還有多次呼籲，希望宣告中東為無核子武器地區，當然也被華盛頓方面封殺。我們相信，這是再次獨厚以色列不必拆解核武軍火庫。對美國的無形帝國而言，以色列的角色是五角大廈的延伸，它可說是美國的航空母艦，部署在蘊藏豐富石油的阿拉伯世界中心。華盛頓方面和以色列這個遷占者國家之間，有長期的軍事援助協議。在二十一世紀前十五年，美國提供以色列的軍需總額高達每年30億美元。2016年，歐巴馬政府和以色列重新議定一項十年計畫，將撥款提高到每年38億美元。除了金援以色列國防部，華盛頓方面也向以色列供應五角大廈的最先進武器。例如，2016年時，以色列是美國以外排定第一個收到F35噴射戰鬥機的國家。華盛頓方面在以色列投注巨資，使以色列成為它的代理軍力，對抗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擁護獨立的各種力量。

「非市場」國家

波頓是布希政府惡名昭彰的鷹犬之一，抹黑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伊拉克，指控它暗藏聯合國安理會指定

銷毀的武器。安理會隨即採取實際行動要求伊拉克交出武器，等到伊拉克聽命行事之後，美國繼續誣賴它陽奉陰違。美國正是利用這樣的藉口入侵伊拉克，如今的伊拉克可說是被廢盡武功，成為完全沒有防禦力量的國家。波頓可能也想要對敘利亞重施故技，造謠它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藉此博得入侵同意。但是，國會研究人員指出：「雖然有些官員……主張在敘利亞進行『改朝換代策略』」，也就是採取軍事手段，「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卻迫使美國的決策者不得不另闢蹊徑」。如此一來，波頓的指控變成一席空話。

理論上說，只有核子武器才能被稱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且，更沒有證據足以證實敘利亞具備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遑論擁有核子武器。既然如此，敘利亞從來就不是真正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美國要將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限於它的盟邦小圈子，敘利亞完全威脅不到美國的目標。不僅如此，華盛頓方面宣稱它的真正目標是阻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這一點也是很可議的。若是如此，美國即不該封殺使中東成為無化武、無核武地區的提議。美國封殺提議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讓以色列逍遙法外。以色列儼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航空母艦，美國要確保它不動如山，不必交出最致命的武器。

更正確地說，美國的目標是：針對將來可能會被它入侵的國家，阻撓核子武器在這些國家擴散。美國的作法，是有助於它入侵之便的手段。更惡劣的是，美國的雙重標準令人瞠目結舌。華盛頓方面始終保持世上最大庫存的核子、化學和生物武器；同時竟要求其他國家解除武裝，或者全面放棄國家發展，只因為這些國家拒絕順從它自封的全球領導地位。這一切顯然只是自私自利的行為，無關乎促進世界和平，而且無一不是為了增強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美國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敘利亞的不滿，其中一項只不過是敘利亞不願意接受美國這位國際獨裁者。

關於敘利亞妨礙美國在中東實現其目標，「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2005年提出對敘利亞經濟的觀察，文中指出：敘利亞「主要為國有型經濟」，其經濟「由國營部門控制，僱用了全國73%的勞力」，它的「基礎係以蘇俄模式為主」。依國會研究人員的看法：華爾街方面奉行的典範是開放市場和自由企業，敘利亞經濟模式和華爾街典範的歧異，不足以合理化美國政府企圖在敘利亞發起「改革」。但是，在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眼中，改變敘利亞的經濟政策是徹底底理直氣壯的目標，有何不可？畢竟，在美國官方的文件中，美國的目標已極為明確。這些文件包含《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依舊認定美國的領導地位意即「塑造新興的全球經濟秩序」，反映美國的「利益與價值」。然而，這些利益與價值和「其他較不開放的模式」卻是大相逕庭，例如「蘇俄模式」，而它正是敘利亞經濟的基礎。

如果外國政府能夠自行決定國家經濟的方向，美國願意允許它們展現國家主權嗎？唯有涉世未深的人才會天真到相信美國。華盛頓方面偏好的典範是自由企業以及開放市場，其他外國政府所施行的經濟政策若是無法契合這樣的典範，華盛頓方面勢必堅決反對到底。美國有許多制裁法律都是針對「非市場國家」，證明以上所言不虛。舉例來說，在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的2016年報告《北韓：經濟制裁》中，就包含了一系列詳盡的制裁措施，全是因為北韓實施「馬克思、列寧式」經濟。換句話說，其他國家組織經濟的方式如果令美國不滿意，美國就不惜對它們的人民發動經濟戰。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民主以及帝國主義的仇恨，莫此為甚。

華盛頓方面容不下經濟干預制度，這一點我們也在美國的政策文件中再次證實。文件中聲稱：「政府補貼以及貿易壁壘是虛假的安慰」，堅持這一套政策的國家，讓華盛頓方面深感不以為然。文件中也指出，美國下定決心要領導全球經濟，表示美國將會促進「海外國家的經濟自由」。⁵²

以下整理美國和敘利亞對於涉及雙邊的議題，各自的立場：

- **以色列：**以色列以暴力手段，從阿拉伯居民手中非法搶奪土地，建立遷占者國家。若要接受以色列有權如此作為，敘利亞就必須和以色列串通，共同否定巴勒斯坦人具有民族自決的基本權利。大馬士革方面在權利談判中拒絕隨以色列起舞，但華盛頓方面仍強力要求敘利亞妥協。
- **真主黨：**以色列積極向黎巴嫩擴張領土，並且渴望將黎巴嫩納為附庸國。但是，真主黨是以色列霸權之路的主要障礙。大馬士革方面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反抗組織，華盛頓方面則反對到底。以民族自決的原則而論，阿薩德政府的立場正義凜然，反觀連續幾任的美國政府卻是一錯再錯。
-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敘利亞有權選擇自我防衛的方式，任何國家要求它放棄這項權利，都是無稽之談。即使是美國和它的盟友，也都同意自我防衛權利是不言而喻、不容妥協的原則；但這項權利並不限於美國和它的附庸國獨享。
- **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2003年，出於非法而且莫須有的名義，美國主導了侵略伊拉克的行動。這次行動造成大規模毀滅以及人命傷亡，是一樁令人髮指的國際級龐大罪行。此處視之為無與倫比的國際罪行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根據「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的標準。若是這起侵略行動的凶手被告上國際法庭提告，而且適用紐倫堡大審的原則，他們逃不過絞刑。1990年代以來，美國不斷攻擊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甚至動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制裁」，造成數十萬名伊拉克人喪生。伊拉克對美國並無實質威脅，美國仍不顧一切對伊拉克開戰，此舉甚至還是美國國務卿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口中「值回票價」的行動。如果說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對於美國社會的「某些」層面沒有造成「某些」威脅，誠然也是違心之論。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薩達姆的職志是實現阿拉伯民族主義目標。他企圖以軍事征服手段，為全體阿拉伯民族光復阿拉伯半島土地，以及它豐富的石油礦藏。在華盛頓方面眼中，這可是一大危機。所以，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之所以構成威脅，並非威脅到美國本土，而是踩到美國石油公司的底線。美國為了追求石油公司的利潤，即便是在國土並未遭受任何實質威脅的情況下，也不惜發起侵略戰爭。這場戰爭純屬美國的選擇，並非無可避免，卻是因此蓄意造成人道災難，其不公不義的程度無以復加。大馬士革政府反抗這樣的不公不義，華盛頓方面則是要求它投降歸順，並且認同美國的罪行是替天行道。試問，我們應作何感想？
- **在敘利亞執政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一向有鮮明的立場，不曾動搖。他們的立場即是傳統上所謂的政治左派：**支持民族自決以及國有制和計畫型經濟，反對侵略戰爭和帝國主義。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政治左派到右派的光譜上，復興黨所占的是極左派位置。縱使美國的強硬派說得天花亂墜，但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完全稱不上是共產黨。然而在華盛頓方面眼中，阿薩德和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信徒們，已經左傾到教人難以容忍的地步。復興黨的口號是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充分表現出敘利亞政府擁抱傳統左派的立場。長久以來美國一直緊盯敘利亞不放，個中原因確實就在這裡。2003年12月12日，美國總統布希簽署《敘利亞責任法案》(Syria Accountability Act)，正式對敘利亞展開制裁，除非敘利亞願意聽從美國的種種要求，例如終止支持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反抗組織，以及停止「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國的制裁行動包括：禁止對敘利亞出口軍事裝備和可能被作為軍事用途的民用物品（換言之，形同一切物品都在禁止之列）。隨後還有附加的禁令（大致上是多此一舉），進一步加強上述制裁：美國不僅

以下整理美國和敘利亞對於涉及雙邊的議題，各自的立場：

- **以色列：**以色列以暴力手段，從阿拉伯居民手中非法搶奪土地，建立遷占者國家。若要接受以色列有權如此作為，敘利亞就必須和以色列串通，共同否定巴勒斯坦人具有民族自決的基本權利。大馬士革方面在權利談判中拒絕隨以色列起舞，但華盛頓方面仍強力要求敘利亞妥協。

- **真主黨：**以色列積極向黎巴嫩擴張領土，並且渴望將黎巴嫩納為附庸國。但是，真主黨是以色列霸權之路的主要障礙。大馬士革方面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反抗組織，華盛頓方面則反對到底。以民族自決的原則而論，阿薩德政府的立場正義凜然，反觀連續幾任的美國政府卻是一錯再錯。

-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敘利亞有權選擇自我防衛的方式，任何國家要求它放棄這項權利，都是無稽之談。即使是美國和它的盟友，也都同意自我防衛權利是不言而喻、不容妥協的原則；但這項權利並不限於美國和它的附庸國獨享。

- **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2003年，出於非法而且莫須有的名義，美國主導了侵略伊拉克的行動。這次行動造成大規模毀滅以及人命傷亡，是一樁令人髮指的國際級龐大罪行。此處視之為無與倫比的國際罪行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根據「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的標準。若是這起侵略行動的凶手被告上國際法庭提告，而且適用紐倫堡大審的原則，他們逃不過絞刑。1990年代以來，美國不斷攻擊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伊拉克，甚至動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制裁」，造成數十萬名伊拉克人喪生。伊拉克對美國並無實質威脅，美國仍不顧一切對伊拉克開戰，此舉甚至還是美國國務卿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ine Albright)口中「值回票價」的行動。如果說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對於美國社會的「某

些」層面沒有造成「某些」威脅，誠然也是違心之論。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薩達姆的職志是實現阿拉伯民族主義目標。他企圖以軍事征服手段，為全體阿拉伯民族光復阿拉伯半島土地，以及它豐富的石油礦藏。在華盛頓方面眼中，這可是一大危機。所以，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之所以構成威脅，並非威脅到美國本土，而是踩到美國石油公司的底線。美國為了追求石油公司的利潤，即便是在國土並未遭受任何實質威脅的情況下，也不惜發起侵略戰爭。這場戰爭純屬美國的選擇，並非無可避免，卻是因此蓄意造成人道災難，其不公不義的程度無以復加。大馬士革政府反抗這樣的不公不義，華盛頓方面則是要求它投降歸順，並且認同美國的罪行是替天行道。試問，我們應作何感想？

- **在敘利亞執政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一向有鮮明的立場，不曾動搖。他們的立場即是傳統上所謂的政治左派：**支持民族自決以及國有制和計畫型經濟，反對侵略戰爭和帝國主義。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政治左派到右派的光譜上，復興黨所占的是極左派位置。縱使美國的強硬派說得天花亂墜，但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完全稱不上是共產黨。然而在華盛頓方面眼中，阿薩德和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信徒們，已經左傾到教人難以容忍的地步。復興黨的口號是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充分表現出敘利亞政府擁抱傳統左派的立場。長久以來美國一直緊盯敘利亞不放，個中原因確實就在這裡。2003年12月12日，美國總統布希簽署《敘利亞責任法案》(Syria Accountability Act)，正式對敘利亞展開制裁，除非敘利亞願意聽從美國的種種要求，例如終止支持真主黨和巴勒斯坦反抗組織，以及停止「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國的制裁行動包括：禁止對敘利亞出口軍事裝備和可能被作為軍事用途的民用物品（換言之，形同一切物品都在禁止之列）。隨後還有附加的禁令（大致上是多此一舉），進一步加強上述制裁：美國不僅

禁止食物和醫藥以外任何物品出口到敘利亞，同時也禁止敘利亞飛機降落美國，或飛越美國領空。⁵³ 在以上各項制裁措施之外，布希又追加兩項。美國財政部援引《愛國者法案》，通令美國的金融機構和敘利亞商業銀行（Commercial Bank of Syria）斷絕往來。⁵⁴ 再者，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美國總統宣佈：敘利亞人如支持敵視美國的政策，即一律凍結其資產。也就是說，敘利亞人如支持真主黨以及為巴勒斯坦自決而奮戰的團體、拒絕承認以色列利用侵略戰爭奪取的土地是合法領土；還有，敘利亞人如果根據蘇俄模式而發展經濟，以國有制、國家規劃經濟為主；那麼，與上述事項有關的敘利亞人，一律凍結其資產。⁵⁵

這些制裁措施讓敘利亞家破人亡。2011年10月的《紐約時報》報導，敘利亞經濟「在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之下一蹶不振」。⁵⁶ 到了2012年春季，因為制裁而造成的金融大失血，「迫使敘利亞政府不得不在國內的某些地方，終止提供教育、醫療保健和其他重要的服務」。⁵⁷ 到了2016年，「根據一份聯合國流出的報告指出，美國和歐盟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導致一般敘利亞平民深陷極大的痛苦，而且阻止進行人道救援」。

⁵⁸ 報告中揭露，救援組織根本無法為醫院取得藥品和醫療設備，因為制裁措施禁止外國公司和敘利亞從事商業活動。

五年內，剷平七國

1990年代，華盛頓方面即曾經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伊拉克發動經濟戰爭；如今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讓人感到似曾相識。我們看到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為國家帶來「黃金時代」，我們也眼睜睜看著那些制裁措施讓它化為灰燼。記者派區克·寇克朋寫道：「美國與歐盟的制裁措施」正如同當年對伊拉克政府的制裁手法，「是對敘利亞的經濟圍城」。據他推測，經濟圍城已使無數敘利亞人民因為疾病和營養不良而喪生。⁵⁹ 可以確定的是，對伊拉克的經濟圍城手段致使伊拉克人民因饑餓和疾病等因素而死亡，人數至少高達數十萬。如今大規模毀滅式的經濟制裁也降臨敘利亞，同樣造成悲慘的人道後果。

為了加強敘利亞內部的反政府力量，布希總統簽署《外交作業、出口融資和相關項目撥款法案》（Foreign Operations, Export Financing, and Related Programs Appropriations Act）。本法案要求至少應有660萬美元準備金，「無論任何方案，凡是支持」敘利亞內部反政府團體，即可從中獲得金援，「另有限定金額的附加資助」。⁶⁰

直到2006年，布希政府「早已暗中培養了不少對抗敘利亞政府的個人和政黨，藉此打擊」阿薩德總統領導的政府。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是透過「國家拯救陣線」執行，該陣線的成員包含穆斯林兄弟會。2006年時，陣線的代表會在白宮「至少參與兩次會議」。⁶¹ 另一個接受美國資助的穆斯林兄弟會陣線組織，是正義與發展運動（Movement for Justice and Development）。這個組織是由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的前成員所創立，公開鼓吹改朝換代。華盛頓方面為這些伊斯蘭派提供金援，讓他們得以架設衛星頻道，向敘利亞人民播放反政府消息。⁶² 因此，如《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所說：從2005年開始，美國政府即秘密資助「敘利亞的政治反對團體和相關計畫」，目的是顛覆敘利亞政府。⁶³

那麼，為了推翻敘利亞政府，美國政府的極致作為就是和伊斯蘭派勾結。伊斯蘭派是敘利亞國內長期以來的

叛亂分子，但此時距離他們在2011年捲土重來，還早了六年。到了2011年春季，敘利亞國內發生暴動。華盛頓方面所建構的神話是：它之所以要求阿薩德下台，乃是不滿意阿薩德在暴動時的回應方式。但是，這個神話已禁不起挑戰。事實上，華盛頓方面始終和伊斯蘭派狼狽為奸，圖謀將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者趕下台；而且，在2003年更計劃進行軍事干預，一舉顛覆阿薩德政府。

關於美國和敘利亞之間的衝突，2011年之後產生了一個新的說法，這個說法卻對眾多事實視而不見。例如：遜尼派政治伊斯蘭為了罷黜大馬士革方面的領導中心，數十年來即不斷發動鬥爭。其次，敘利亞政府是穆斯林兄弟會口中的「邪惡」復興黨人，穆斯林兄弟會誓言對他們發動永不罷休的聖戰。再者，華盛頓方面在2011年之前就與穆斯林兄弟會串通，聯手破壞世俗派國家敘利亞的社會穩定。以上這些事實同樣都不被承認。其他被忽視的事實還有很多，均是為了使下面這樣的論述變得可信：美國之所以捲入敘利亞的家務事，是出於崇高而偉大的動機；而且，敘利亞國內的叛亂是因為反對派渴望民主，絕不是迫切想要建立伊斯蘭國。總之，這一切在顯示：華盛頓方面的外交政策，長久以來的目標一直都是讓敘利亞改朝換代。正如資深駐外記者派區克·寇克朋所觀察到的：華盛頓方面「想扳倒阿薩德的意志始終如一」。⁵

2007年3月，「當前民主」(Democracy Now!)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艾咪·古德曼(Amy Goodman)訪問美國的退休陸軍四星上將衛斯理·克拉克(Wesley Clark)。克拉克曾於1999年指揮北約的軍隊，無緣無故對南斯拉夫發動一場空戰。他透露：2001年9月蓋達組織攻擊紐約和華盛頓，造成所謂的九一一事件。隨後布希政府即針對七個國家擬訂了一套作戰計畫，其中一個國家就是敘利亞。2001年9月下旬，克拉克曾拜訪五角大廈。克拉克回憶此行：

「九一一事件發生十天後，當時我前往五角大廈，見到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以及副部長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我走到樓下，去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幾位老朋友打招呼，他們以前曾是我的部屬。其中有一位將軍把我喊進去。他說：『長官，您一定要進來跟我聊幾句再走。』我說：『你一定很忙吧。』他說：『哪裡，哪裡。』又說：『我們已經決定對伊拉克開戰了。』當時大約是9月20日左右。我說：『我們要對伊拉克開戰？這是為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接著說：『我猜，上面的已經沒有牌好打了。』於是我說道：『上面的不是找到線索，顯示薩達姆和蓋達組織有關係？』他說：『不是。』又說：『那方面並沒有新進展。反正，上面的決定要對伊拉克開戰就是了。』他繼續說道：『我想，這就像我們拿恐怖主義分子沒輒，但是我們的拳頭夠大，有本事摺倒其他國家的政府。』他又說：『這麼說吧，假如你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鐵鎚，那麼所有問題就必須看起來像釘子才行。』⁶

幾星期之後，克拉克又回到五角大廈，和同一名將軍聊天。當時美國已經對阿富汗開火。

「我問：『我們還是要對伊拉克開戰嗎？』他回答：『喔，比那樣還嚴重。』他到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說道：『我今天剛剛從樓上拿到這份文件。』他說的『樓上』是指國防部長辦公室。他說：『這是份備忘錄，裡面說到我們要如何五年內剷除七個國家。我們先從伊拉克開始，然後是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最後打完伊朗就可以收工。』⁷

克拉克的爆料顯示：至少從2001年開始，華盛頓方面就已經構思要讓敘利亞改朝換代，比2011年3月敘利亞國內再度爆發伊斯蘭叛亂更早整整十年。2002年5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約翰·波頓將敘利亞加入「邪惡軸心國」名單，更是再次強調我們的論點：亦即早在阿拉伯之春遍地開花之前整整十年，美國就想要摧毀

阿薩德政府。在六個邪惡軸心國當中，伊朗和利比亞這兩個國家都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而且都有強大的國有制經濟，也都在美國將它們列入邪惡軸心國之後，隨即被美國帶頭的軍隊入侵，推翻了政權。如果我們斷言大馬士革政府就是下一個被美國消滅的對象，可謂持之以故，言之成理。況且，正如我們所見：美國在剷平伊拉克及阿富汗時遭遇的困難出乎意料，若非如此，五角大廈方面揮軍入侵敘利亞的行動不至於被拖延下來。

名單中的其他國家又如何呢？北韓及古巴早就陷入以美國為首的經濟戰，這些經濟戰同時還夾帶不可告人的目標，那就是讓它們的共產黨政府垮台。自從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始終無法避免成為美國的目標。美國精心策劃了格調低劣的戰爭，它所發起的行動漫無止境，目的都是打倒支持獨立、支持巴勒斯坦的伊朗。名列邪惡軸心國的每一個國家，都反對美國自封的全球領袖地位，都拒絕被併入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秩序，而且都是美國戰略家所稱的「重視政府強力操縱的經濟體制」。華盛頓方面將這些國家貼上「邪惡」的標籤，這是從布希的觀點衍伸而來的結果。

布希政府曾大言不慚地表示：「經濟自由」的定義是「自由與公平貿易、開放市場……以及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經濟自由乃是「道義責任」。這些國家主張經濟的國有權、規劃和指導，因而反對「經濟自由」，即是自甘下流，乃至成為邪惡國家。到了歐巴馬政府，它所推動的全球經濟秩序自然仍是以華爾街的利益馬首是瞻，然而它避免訴諸道德原則，而是引述它所謂的「事實」。2016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告訴聯合國大會：「開放市場的原則……依舊是人類進步最堅固的基礎」，這是鐵錚錚的事實，絕非「理論或意識形態」。依歐巴馬之見，事實也顯示：「由中央規劃主導的經濟是一條死胡同」，而且，克服開發落後的「答案」，「並非一味拒絕和全球融為一體即可」。

宣傳家的工作：妖魔化敘利亞政權

「阿拉伯之春」暴動發生之前整整十年，敘利亞就已經遭華盛頓方面點名，將它編入華盛頓方面企圖改朝換代的國家之列。這一點足資證明：2011年的動亂，或者精確地說，大馬士革方面回應動亂的方式，並未推波助瀾，使華盛頓方面因而決心顛覆敘利亞政府。華盛頓方面在2003年時即構思以軍事力量介入敘利亞（如果我們不是根據衛斯理·克拉克的回憶，將時間算到更早的2001年），並且在2005年開始資助敘利亞境內的反對團體，包括穆斯林兄弟會；以上事實能強化我們得到的結論。

敘利亞政府標舉阿拉伯統一、擺脫外來勢力控制，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等價值觀，莫不衝擊華爾街方面的利益。華爾街方面因而動用巨大的影響力，強烈要求華盛頓方面弔民伐罪，推翻大馬士革的復興黨政府。外國政府若是膽敢敵視西方國家、採行的任何政策有礙於西方國家的商業利益，華盛頓方面即會出手教訓，推翻這些政府。關於這一點，華盛頓方面的紀錄稱得上不勝枚舉，例如伊朗的莫沙德即是因為推行石油業國有化，很快就被美國趕下台。我們的論點再次獲得有力的支持。

在敘利亞執政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他們所堅持的各種價值觀，或許會讓美國公民感動，進而反對美國以行動迫使阿薩德下台。因此，華盛頓方面為了遂行敘利亞改朝換代，不得不編造種種令人擔憂的議題，掩飾背後真正的經濟理由。華盛頓的宣傳家仍必須進一步確認：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執政者真正的意識形態為何，世人無從知曉。因此，為使華盛頓對敘利亞的敵意看起來合情合理，華盛頓方面隨即著手引導世人去注意敘利亞的化學武器軍火庫，同時暗指敘利亞正秘密發展核子武器，更抹黑它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妖魔化敘利亞既已大

功告成，那華盛頓對大馬士革政府的敵意，即可化身為大慈大悲的表現，「對抗邪惡勢力捨我其誰」。

後來，美國官方又將世人的注意力導向新的目標：亦即2011年時敘利亞政府動用國家安全部隊遏止街頭暴動。這原本是一次正常的國家安全應對行動，經華盛頓方面扭曲之後，竟成為「殘酷的獨裁者」，以冷血凶暴的手段鎮壓合法的異議分子。實則「殘酷的獨裁者」一語用在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身上，比形容敘利亞更為貼切。如我們所見，敘利亞總統在全國大選中獲得多數票，其統治權具有人民授意的基礎。反倒是美國的盟邦沙烏地阿拉伯及巴林，兩國的國王都只是君主政體的統治者。在沙烏地和阿拉伯，街頭示威者的訴求是從君主政體過渡到民主國家；反觀敘利亞，則是伊斯蘭派帶頭鼓吹，在街頭製造暴動。

為了鎮壓支持民主的異議分子，沙烏地阿拉伯與巴林的皇家獨裁者不惜出動坦克。華盛頓方面對其暴動不置一辭，卻誣指敘利亞抑制暴力示威的行動是非法鎮壓。華盛頓方面刻意誤導，稱敘利亞的暴動是「合法」的抗議，進而遙相呼應他們的訴求。美國即是利用這種虛假的同心同德，掩蓋對敘利亞的敵對態度。

同時，美國的外交政策則是呈現出正義正辭嚴的面貌，如此一來，就沒人會知道它真正的目標，其實是鞏固美國企業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如果美國真正的目標曝光，美國官方推行反敘利亞的政策，即很有可能無法得到全民支持。美國的宣傳家似乎認同希特勒的主張：人民會支持為理想而戰，而非為利益而戰。（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寫道：「人們不會因物質利益而犧牲自我。能使他們奉獻生命的目標，是理想，不是商業。」）

第三章

二〇一一年大熱病
THE 2011 DISTEMPER

「2011年期間各種反抗運動，都有非常周延的公關操作。」

關於2011年敘利亞發生暴動的起因，計有三種看法。這些看法廣泛流傳的範圍，和它們被批判檢視的程度，恰好成反比。而且，這三種看法都極有商榷的餘地。

第一個可商榷的觀點是：2011年春季爆發針對阿薩德政府的遊行示威，它與敘利亞境內反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的主要勢力，也就是和遜尼派政治伊斯蘭，並無關係。然而，證據顯示抗議者的要求具有伊斯蘭色彩。證據指出，**暴動的前驅是聖戰士組織**，他們在2011年的年初就已經開始活動。這是在暴力抗爭大舉發生之前，而非之後。因此，若是說伊斯蘭分子「綁架」全民的叛亂，這樣的說法是很可議的（證據也質疑這是一「全民」叛亂的說法）。證據也說明：由於抗議活動具有遜尼派的特徵，足以反映政府方面獲得非正統穆斯林及基督教社群，毫無保留的支持。宗教少數派社群心裡有數：一旦激進分子成功奪權，將會建立遜尼教派的伊斯蘭國，他們這些少數派會被粗暴地劃入異端和叛徒。有些人主張：這一場抗議的動機是出於對民主政治的渴望。該論點缺乏牢不可破的基礎。若是敘利亞人果真渴望民主，這樣的渴望理應遍及敘利亞的各個階層和教派，豈會集中於遜尼派穆斯林社群。更重要的是：抗議群眾的訴求與民主的關係微乎其微，反倒是要求釋放獄中的伊斯蘭教徒以及取消層層限制，允許伊斯蘭教派能有更大的合法操作空間，籌劃各種行動以對抗世俗國家。

第二個觀點很明顯是站不住腳的，亦即認為**那是非暴力抗議。恰好相反，它從一開始就是充滿暴力**。美國政府早期的說法也承認這個事實，後來美國官方卻又故意模糊其說，寧可改稱暴動「大致上」是和平理性的。抗議者之中當然有人並不訴諸暴力，而且他們可能占多數。但是，不能因此否認少數人放火燒燬建築物和車輛、與警方發生衝突，最後甚至造成大量警察死亡。在這場抗議中確有少數人參與暴力行為，既然抗議活動中含有暴力元素，即使暴力分子只占少數，如此的抗議活動仍是暴力抗爭。

第三個大可商榷的觀點，是認為**叛亂得到了全民廣泛的支持**，阿薩德政府已遭敘利亞人唾棄，失去其合法地位。反政府暴動發生於2011年3月中旬，在此之前有連續幾個月，西方國家主流媒體的報導，其內容正好相反。那些報導中說，阿薩德是能孚眾望的敘利亞合法領袖；至於橫掃埃及、突尼西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全民暴動，不可能會蔓延到敘利亞。（然而，這並非意味伊斯蘭派不會趁機發動游擊戰。讓敘利亞社會陷入亂世狀態的，往往是這類行動。）從2005年起，華盛頓方面就為遜尼派伊斯蘭教徒舉行講習會，並且資助他們成立的陣線組織。在1956年，克爾密特·羅斯福曾計劃顛覆大馬士革方面的三人領導中心。有另一個觀點指出，華盛頓方面乃是讓羅斯福的一部分計畫死灰復燃，也就是爭取遜尼派伊斯蘭教徒的助力，在敘利亞內部製造動亂。羅斯福於1950年代中期未竟的計畫，正是如此。華盛頓方面將暴動形容成廣獲全民支持，宣稱這已足夠證實阿薩德總統失去其合法統治地位，必須引咎下台。在敘利亞發生暴動之際，華盛頓方面立即公開支持武裝激進分子。現在，它即可藉由這樣的說法，合理化這是促進民主政治的一項行動。

在2011年1月底，有人於臉書成立一個粉絲專頁，名為「2011年敘利亞革命」。它宣告將在2月4、5兩日舉辦「憤怒之日」（Day of Rage）活動。據《時代》雜誌報導，抗議活動「逐漸破滅」，憤怒之日最後演成「冷漠之日」（Day of Indifference）。而且，它和敘利亞之間的關係並不明朗。當天到場參加抗議的人數不多，他們所呼喊的口號主要都是針對利比亞。當時格達費政府正遭受伊斯蘭激進分子包圍，憤怒之日的抗議者也是要**求穆安瑪·格達費下台**。抗議者計劃在3月4、5兩日發動另一波行動，但是同樣只獲得極少支持。

《時代》雜誌記者蕾妮雅·阿保柴德（Rania Abouzeid）認為：抗議行動的主辦單位希望能吸引廣大回響，最後卻流於失敗收場，個中原因可歸諸於大多數敘利亞人並不反對他們的政府。阿薩德的聲望頗佳，尤其是在三十

歲以下的族群，他的支持度高達三分之二；而且，阿薩德的政策也都能獲得廣大支持。阿保柴德寫道：「即使批評家也承認阿薩德非常受到人民歡迎，認為他在感情上和意識形態上都能貼近國內廣大年輕人的民意；當然，他受到的支持也隨著年輕人一起成長。」她還補充說：阿薩德不像「突尼西亞與埃及被罷黜的親美領導者，他的外交政策對以色列充滿敵意，他也堅定支持巴勒斯坦以及哈馬斯（Hamas）和真主黨等激進組織，卻都能符合敘利亞人民的情緒。」換言之，阿薩德的地位完全合法。這位《時代》雜誌記者連帶提到，阿薩德「在二月時曾驅車前往奧米亞大清真寺，參加紀念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的禱告會。他也輕裝簡從，散步穿越擁擠的哈瑪迪亞市集」，這些「都有助於使他個人更受人民愛戴」。

在以上的描述中，敘利亞總統是一位深受人民愛戴的領袖，而且在意識形態上能夠與敘利亞人民的情緒亦步亦趨。兩個星期後，在敘利亞城市達拉（Dara）爆發暴力抗爭。隨後所產生的說法，卻是和上述描寫扞格不入。但是，在達拉城爆發各種重大事件的前夕，敘利亞的平靜仍是令人津津樂道。阿保柴德的報導說：沒有人「希望敘利亞發生大規模暴動，儘管偶爾會有異議人士上街抗爭，也很少人想要參加力挺」。¹⁴一名敘利亞年輕人告訴《時代》雜誌：「政府在很多方面對年輕人的幫助非常大。政府提供我們免費書籍、免費教育和免費大學。我們何必鬧革命？只有百分之二的可能吧。」，《紐約時報》也有相同的看法，它說：敘利亞「看起來對於瀰漫阿拉伯世界的暴動免疫」。敘利亞不會染上大熱病。

然而，就在3月17日，達拉發生了暴動。至於暴動是因為何人或是何事而發生的，可謂眾說紛紜。《時代》雜誌的報導指出：「有少數幾名年輕人被捕，理由是在牆上繪畫反政府塗鴉。此舉引發達拉的暴動」；但是《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羅勃·費斯克（Robert Fisk）的說法略有出入。他的報導是「有數名小孩在城牆上繪

畫反政府塗鴉，遭政府當局的情報官員毆打及殺害」。另外一個說法認為：引爆當天暴動的原因，是敘利亞當局處理反對小孩被逮捕的遊行示威時，使用極端而且不成比例的武力。「有幾名年輕人在牆上噴繪塗鴉畫，因此被逮捕及囚禁。他們的父母要求領回這些孩子時，遭到維安部隊極為強硬的反擊」，還有一個說法是來自敘利亞政府，政府當局否認發生上述任何事件。事件發生過後五年，阿薩德在受訪時告訴訪問者：「並沒有發生那件事。一切只不過是宣傳伎倆罷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確實聽說了那件事。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到當時因為塗鴉被逮捕囚禁的那些孩子。所以，它從頭到尾都是憑空捏造的謊話」。

扭曲、不受廣大支持的暴動

暴動的起因或許人言人殊，但是它的暴力程度則是有目共睹。《紐約時報》的報導如此描述：「抗爭群眾放火燒執政的復興黨總部以及其他政府機關建築物……他們與警方發生衝突……除了執政黨的總部，抗爭者也燒燬城內的主要法院以及敘利亞電信公司的分部」。《時代》雜誌補充說，抗爭者也燒燬地方行政官的辦公室以及第二大手機公司的分公司。¹⁵敘利亞政府的通訊社SANA在網站上貼出燃燒中的車輛照片。¹⁶很顯然的，這絕非如後來被洗白的那樣，是一場和平的遊行示威；而且，它也不是大規模暴動。《時代》雜誌指出示威者有數百人，並非數千或數萬人。¹⁴

阿薩德迅速回應達拉的動亂，宣佈「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公職人員待遇、媒體和政黨可以獲得更大自由，並且將檢討緊急統治狀態」。¹⁷他所說的緊急統治狀態是指戰爭期間對於政治和公民自由的限制，起因於敘

利亞與以色列正處於交戰狀態。四月底之前，敘利亞政府將會廢止「立法長達四十八年的緊急狀態法」，並且關閉「國家安全最高法院」。¹⁶

何以敘利亞政府作出這些讓步？因為這是達拉的抗議者提出的要求。抗議者「聚集在達拉的奧瑪里（Omari）清真寺內外，高喊他們的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廢止敘利亞使用了四十八年的緊急狀態法；更大的自由；以及杜絕無處不在的貪污腐敗」。¹⁷這些要求和二月初臉書粉專「2011年敘利亞革命」所闡述的呼籲前後一致：亦即「終止敘利亞的緊急狀態及根除貪污腐敗」。¹⁸臉書上也公佈一封眾多教士聯署的信件，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些教士的要求包括取消「緊急狀態法、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安全部隊騷擾，以及打擊貪污腐敗」。¹⁹在敘利亞，聖戰士是主要的反對勢力。因此，被監禁的政治犯最有可能是聖戰士。

換句話說，**釋放政治犯意即釋放聖戰士**。如果用西方國家當今的正式名稱，也可以說他們是「恐怖分子」。所以，這些教士要求大馬士革方面釋放所有政治犯，如同伊斯蘭國要求華盛頓、巴黎和倫敦等方面，釋放被美國、法國和英國拘禁的恐怖主義罪犯。這樣的要求並非為了更加民主的政制體制，因為他們要求釋放的乃是一群激進主義分子，他們追求的目標是在敘利亞建立伊斯蘭國。至於呼籲廢除緊急狀態法，同樣也是無關乎促進民主政治，實際上是為了擴張聖戰士的運作空間，便於他們合謀組織反對力量，對抗敘利亞這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

達拉的暴動發生過後一星期，《時代》雜誌記者蕾妮雅·阿保柴德報導：「敘利亞國內並沒有普遍出現改朝換代的呼聲，阿薩德擁有相對較多的民意支持，也無人要求他下台」。²⁰抗議者和教士們提出的各項要求，確實不包含呼籲阿薩德卸任。而且，敘利亞人民依舊支持阿薩德。「在敘利亞首都也出現對立的遊行示威，表態支持阿薩德總統」。²¹在達拉暴動中燒屋毀車、衝撞警察的抗議者約有數百人，但是根據報導，在首都反示威遊行的

人數遠遠超過此數。²²

到了4月9日，距離達拉事件還不到一個月。當時的《時代》雜誌報導：有一連串的抗爭事件此起彼落，伊斯蘭教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穆斯林兄弟會為了對抗「異教」復興黨政府，數十年來組織過接二連三的罷工、示威、暴動和叛亂。如果我們熟稔這一段過程，即可看出歷史正在敘利亞重演。此時抗議者的規模尚未達到關鍵多數；相反地，誠如《時代》雜誌所說：敘利亞政府依然沉醉在「大多數人民」對領導者「忠心耿耿」的情境中。²³這一場暴動中，阿薩德擁有廣大的民心、抗議者始終未能達到關鍵多數，以及抗議者的伊斯蘭色彩，處處都與西方國家大眾媒體在後來所描述的南轅北轍。它並非具有廣大民意支持、追求民主的揭竿起義；對立的另一方，也不是喪失民心的政府。它就是聖戰士為了建立伊斯蘭國而發起的暴動，如此而已。

這場抗爭缺乏廣大的民意支持。為了強調這個論點，我們可以看到：在4月22日，也就是抗議事件的兩星期之後，《紐約時報》的記者安東尼·沙迪德（Anthony Shadid）寫道：「至目前為止，抗議活動似乎仍見不到埃及和突尼西亞那種全面性的革命動盪」。換句話說，在達拉的抗爭暴動之後已經超過一個月，參與的人數依然只有區區數百人，而非數千或數萬。像阿拉伯之春的遍地動亂，在敘利亞還沒有任何跡象。這一場暴動的格局仍然有限，它的性質還停留在伊斯蘭教專屬的活動。相反地，在大馬士革已經掀起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但它們的目的是擁護政府，而非反抗政府；阿薩德的民意基礎依然穩如泰山。根據沙迪德的報導，阿薩德政府同時也獲得「基督教和非正統穆斯林教派」竭誠效忠。²⁴西方國家的記者，除了沙迪德，還有其他人也報導了政府仍然獲得阿拉維派、伊斯瑪儀派（Ismailis）、德魯茲派（Druze）以及基督教等教派的強力支持。《時代》雜誌的記者蕾妮雅·阿保柴德同樣注意到：復興黨「有能力號令敘利亞重要的少數族群挺身而出」。²⁵

一般人不禁會感到困惑：既然西方國家的媒體已經承認，阿薩德能受到全體敘利亞人歡迎。那麼，為何要引導人們去注意宗教少數族群對政府的強烈支持？為何沒有同時指出，敘利亞政府也能得到遜尼派認同？或許原因在於：西方國家的記者已經接受遜尼派的論調，相信復興主義只是個幌子，實則是在追求教派目的，壓抑遜尼派穆斯林多數族群。在隨後的幾年裡，西方媒體所採納的分析，當然是完全符合穆斯林兄弟會的觀點；也就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和遜尼政治伊斯蘭在敘利亞的權力鬥爭，事實上只是「統治階級」阿拉維少數派和「被壓迫階級」遜尼派穆斯林多數派之間的教派衝突。

就這方面而論，美國的報紙即經常標榜阿薩德是阿拉維派，而聖戰士是遜尼派。至於敘利亞最大的軍隊敘利亞阿拉伯軍，是以遜尼派士兵為主所組成的，它們卻完全不置一詞。根據遜尼派伊斯蘭教徒所述，阿薩德這位偉大的阿拉維教派信徒，他的妻子正是遜尼派。指稱復興黨政府是「阿拉維派政權」雖是誤導的說法，卻是西方記者和激進遜尼派穆斯林共同的偏好。這個說法另外有其政治目的：亦即暗示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意識形態其實只是虛張聲勢，它真正的目的是掩護宗教少數派的教派計畫；如此一來就能抹黑阿拉伯民族主義派。

1930年代，罹患「猶太人恐懼症」的人也做過相同的勾當。他們將美國總統羅斯福政府的重大施政計畫貼上「猶太政策」(Jew Deal)的標籤，還稱呼他「羅神肥」(Rosenfeld)總統，因為「羅斯福總統最親近的幕僚中，放眼所見都是猶太人」。²⁶阿薩德身邊確實仰仗許多阿拉維派親信，但是復興黨堅定反對教派門戶之見，因此阿薩德政府絕非阿拉維派，就像羅斯福政府也不是猶太派。雖然遜尼派伊斯蘭教徒主導了暴動，不能因此就說遜尼派社群全體都支持伊斯蘭聖戰。理由很簡單：並不是所有遜尼派都是伊斯蘭激進分子，連大部分遜尼派是伊斯蘭激進分子都談不上。

知名調查記者西莫·赫許(Seymour Hersh)曾經揭發「美萊村大屠殺」(My Lai Massacre)一案，因而獲得國際報導類普立茲獎。他對阿薩德的評語是：「如果你聽說在敘利亞人人都不齒阿薩德，諸如此類的說法盡是一派胡言」。赫許告訴「當前民主」節目說：阿薩德「備受當地人民支持，連遜尼派穆斯林都不例外。在敘利亞的遜尼派穆斯林既非瓦哈比派，也不是原教主義派，他們不是極端主義分子。許多遜尼派都是溫和敦厚的普通人，他們深信一旦伊斯蘭團體的勢力掌權，他們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凡是不認同伊斯蘭極端觀點的穆斯林，遲早會被他們揪出來秋後算帳。因此，阿薩德的支持者真是多到令人難以置信，大多數人想都想不到」。²⁷

正如前文所引述的，《紐約時報》的沙迪德已經指出敘利亞政府能贏得基督教徒和非正統穆斯林教派效忠。此一事實表示敘利亞的宗教少數派能夠認清暴動的另一面向，而這個面向被西方媒體忽略了，那就是暴動背後的動機乃是實踐遜尼派伊斯蘭的目標。如果他們的計畫得以落實，任何不被他們視為「真正」穆斯林的人，都會遭遇不幸的結果。基於這個理由，阿拉維派、伊斯瑪儀派、德魯茲派和基督教才願意不分彼此，共同支持復興黨。我們不要忘了，復興黨的目標是促成阿拉伯統一，它實現承諾的計畫，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力求各大教派能捐棄成見。

在遊行示威早期，示威者的口號是一句這樣的標語：「阿拉維派去死，基督徒滾到貝魯特！」²⁸這句口號恰好證實我們的論點：遜尼派政治伊斯蘭誓言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發動殊死戰，這一場暴動不過是延續他們不死不休的宿仇，絕非追求民主的大規模動亂。這場暴動是為伊斯蘭國而戰，不是為民主國家。正如我們所見，一個大致上堪稱民主的國家，事實上早就已經存在眼前了。

「阿薩德政府從一開始即表示，他們正與激進伊斯蘭派交戰。」²⁹伊斯蘭派以暴動方式反抗復興主義的立場，

在2011年以前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當然表示這一次很有可能也是如出一轍。而且，從這一場暴動後續的發展形式來看，正是伊斯蘭派帶頭開戰，對抗世俗阿拉伯國家。這一切在在可強化我們的觀點。阿薩德認為敘利亞國內正遭受聖戰士攻擊（過去已一再發生），還有其他積極和消極的證據，足以證明他不是空穴來風。西方媒體的眾多報導顯示，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深得民心，人民對它忠心耿耿。這即是消極證據，可證明這場暴動雖引起社會動盪不安，卻不是有民意支持的一方反抗不得民心的政府。反政府的遊行示威、暴動和抗議，都是小規模的活動；相反地，在大馬士革政府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卻能吸引遠遠多於前者的參與人數。敘利亞的情勢並非普遍的社會動亂，自然不同於埃及和突尼西亞。再者，抗爭者的要求集中於釋放政治犯（其中多為聖戰士），以及終止使用「戰爭時期」名義限制表達政治異議；他們並沒有呼籲阿薩德下台，或者要求總統選舉開放複數候選人。積極證據則是在於西方國家新聞媒體的解釋：西方媒體認為伊斯蘭在暴動中的角色十分突出。固然一般人也普遍相信，從2011年春天開始的暴動，直到尾聲時武裝伊斯蘭團體才加入，而且藉此「綁架了」一次「全民起義」。

接著，這些人變成激進分子……

在2011年之後，以武裝革命方式對抗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各種行動中，有兩個聖戰團體的角色舉足輕重，它們是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和努斯拉陣線。事實上，它們在2011年初就已經非常活躍。根據《時代》雜誌報導，達拉暴動發生於「2011年3月中旬」，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開始著手建立軍隊的時間則更早

許多」。³⁰至於努斯拉陣線，它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於2012年1月底宣佈成立，在此之前沒沒聞……但是，更早幾個月前它已經非常活躍」。³¹

指稱在暴動伊始就有激進派伊斯蘭涉足其中，或者至少可以說，抗議行動從一開始就滲入了暴力手段；我們有其他證據與上述觀點並行不悖。證據指出：「有跡象顯示，在抗議行動才剛起步，已有武裝團體參與」。記者兼作家羅勃·費斯克回想曾經看過一段影片，「內容是關於『起義』剛剛開始那幾天所發生的事。影片顯示在達拉的遊行示威群眾中，有多人攜帶手槍和卡拉希尼科夫槍」。他回憶發生於2011年5月的另一次事件：當時「半島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拍攝到，在距離北方黎巴嫩邊界幾百公尺處，有多名武裝人員對敘利亞軍隊開槍射擊。但是，電視台拒絕播放這段影片。後來有電視台的記者播給我看」。³²大馬士革方面自認為被捲入武裝叛亂的戰爭中。美國官員對敘利亞政府一向不懷好意，若是他們對大馬士革方面的想法不以為然，也是意料中事。然而，即使美國官方都「承認遊行示威並非和平活動，其中摻雜一些武裝的抗議人士」。³³到了九月，敘利亞當局公佈：已有超過500名警察和軍人在游擊戰中喪生。³⁴再到十月底，遇害人數已經加倍。暴動在一開始只有燒毀復興黨建築物和政府機關辦公處，以及衝撞警察。才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規模已經演變成游擊戰。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如果目標是針對西方國家，勢必會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

阿薩德後來對此頗為不滿：

「在敘利亞的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所說的每一件事，他們全都後知後覺，到後來才跟著附和。他們說它是和平示威，我們說，它不是和平示威。他們說這些人是和平示威者，事實上這些人大開殺戒，毫不手軟，有多少警察死於非命！接著，這些人變成激進分子。他們才說，是的，這些人是激進分子。我們說，它是恐怖主義。

他們說，不是，它不是恐怖主義。後來，當他們也說它是恐怖主義，我們卻說，它是蓋達組織。他們說，不是，它不是蓋達組織。看吧，無論我們說什麼，他們在後來也跟著說。」³⁶

2011年發生的暴動，主要是武裝聖戰士所領導的伊斯蘭派激進分子對抗全民支持的政府，何以會被當成是全民起義對抗不得民心的政府？根據派區克·寇克朋的說法，其中一個理由是「2011年期間的各種反抗運動，都有非常周延的公關操作」。³⁷這些公關運作的贊助人，主要是美國政府以及它的反民主盟友，也就是在阿拉伯世界的那些君主。美國政府為自身的利益著想，領銜負起責任，勢必讓敘利亞去復興黨化。它顛倒黑白，誣指敘利亞國內的動亂是全民奮起反對離心離德的政府。它必須確保這樣的論述能夠放諸四海，才能爭取美國公民支持，或者至少被動接受，認可美國支持阿薩德倒台的運動。

當一切跡象日趨明顯：武裝叛亂團體的中堅分子是殺人斬首不眨眼的純種聖戰士，他們的目標是將先知穆罕默德在中世紀建立的穆斯林聖城麥地那（Medina），原原本本在敘利亞重現；此時美國的宣傳家便杜撰了一個「溫和」叛亂分子的概念，藉以緩和人心，不去探究美國支持蓋達組織及其分身的行為。於是現在的說法變成了：美國只是支持溫和派，卻不去細問「溫和派」的定義云何。根據美國情報局總監詹姆士·克雷帕（James Clapper）的說法：所謂的「溫和派」實際上是指伊斯蘭國以外的所有叛亂分子。³⁸華盛頓方面當然堅決反對伊斯蘭國，因為它威脅要奪取伊拉克豐厚油田的控制權，並且企圖推翻沙烏地王朝。除此之外的任何團體，無論它們的手段、目標、意識形態或路線為何，均可經過消毒、漂白、稱之為「溫和派」。

若說美國手上有一本《動物寓言集》，努斯拉陣線則始終都是書中的食人魔。它事實上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機構，蓋達組織則是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罪魁禍首。因此，美國豈能讓人看出它支持蓋達組織的分支機構？

然而，這一切其實不痛不癢，畢竟美國所支持的「溫和派」與努斯拉陣線糾纏不清，也在戰場上和蓋達組織合作無間，更是能共享美國所提供的武器。換句話說，不論我們如何稱呼「溫和派」聖戰士，都改變不了美國利用這批人的事實。這批聖戰士與努斯拉陣線從意識形態到行事作風，完全不分軒輊，他們都是華盛頓方面的管道，為美國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襄助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行動。因此，當阿薩德指出：正和他的政府交戰的伊斯蘭教徒，與激進的蓋達組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儘管美國官員以及媒體名嘴連番砲轟阿薩德的說法，但他從頭到尾都說得沒錯。蓋達組織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後裔，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幾十年來的宿敵，同時也是華盛頓方面剷除阿薩德的工具。

有關敘利亞政府回應達拉暴動的作法以及它所產生的後果，最後有幾個重點必須釐清。有一部分人士主張：達拉暴動的導火線，是敘利亞當局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鎮壓，不論其目的是為了處理年輕人在牆上繪畫反政府塗鴉，或者是應付隨後發生的暴力抗爭。假設塗鴉事件真有其事，而且政府對於該事件以及後續聲援年輕人被羈押的抗議，其應變方式不成比例；在此我們提出兩個質疑：

- 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力，會隨即引爆戰爭；此說是否不合情理？
- 敘利亞政府遇到對其權威的挑釁，採取強力的方式回應；這是否能夠預見？

關於第一點：若說在敘利亞的達拉城，有民眾挑釁政府的權威，而安全部隊的反應過度，竟因而引起一場大型的戰爭，不但牽涉眾多國家，而且動員了來自許多國家的聖戰士；如此論點真是天方夜譚。即便只是想要讓這樣的見解看起來有些微可信度，我們都必須對許多彼此矛盾的事實視而不見。

首先，我們必須忽視的事實，是阿薩德政府深得民心，而且是合法政權。如果政府極度不受人民歡迎，而且對於挑釁權威的行為，縱使只是雞毛蒜皮之舉，它都睚眦必報，一律以霸道的方式回應。那麼，確實很有可能因之點燃普遍的叛變。但是，就算美國總統歐巴馬一再堅稱阿薩德缺乏合法性，然而並無證據足以證明：在2011年3月當時的敘利亞，已經是民怨沸騰，隨時可能爆炸。正如《時代》雜誌的蕾妮雅·阿保柴德所述：「即使批評家也承認阿薩德非常受到人民歡迎」，而且「沒有人希望敘利亞發生大規模暴動，儘管偶爾會有異議人士上街抗爭，也很少人想要參加力挺」。

其次，我們必須視若無睹的，是達拉暴動僅有數百人參與。《時代》雜誌的尼古拉斯·布蘭福德(Nicholas Blanford)提到：它完全談不上規模龐大，即使是隨後所上演的各次抗議活動，也吸引不到多數人參加。同樣地，《紐約時報》的安東尼·沙迪德也發現：甚至在達拉暴動發生過後超過一個月，仍舊缺乏證據顯示敘利亞社會有過普遍的動亂。華盛頓方面的宣傳家對於敘利亞境內的阿拉伯之春，自有一套天花亂墜的說辭；然而事實的發展恰好相反：聖戰士採取游擊戰方式，開始攻擊敘利亞的安全部隊。而且，到了十月時已經造成一千名以上的警察和軍人死亡。

第三，我們必須忽略的是：1957年時美國政府和它的英國同夥已擬定好計畫，將要徵召穆斯林兄弟會協助，先在敘利亞內部慫恿暴動，進而引發戰爭。如今達拉的暴動以及後續和警察與軍隊發生的衝突，正好呼應了顛覆政府專家克爾密特·羅斯福當年所研擬的計畫。我們並不是說CIA讓羅斯福的提案重見天日，並且在2011年回鍋再利用。我們只是指出：羅斯福的計畫表示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若是聯手，確實有能力規劃出破壞行動，先是安排穆斯林兄弟會帶頭叛亂，最後拔除敘利亞政府。我們還必須無視這樣的事實：從2003年開始，可能應該回溯到2001年，美國的戰略專家即已計劃妥當，決定要迫使阿薩德和他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意識形態在敘利亞失勢；而且更從2005年開始資助敘利亞國內的反對勢力，包括穆斯林兄弟會相關的團體。由此可見，華盛頓方面長久以來即孜孜矻矻要消滅阿薩德政府、追求敘利亞去復興黨化的目標。

無論敘利亞政府處理達拉暴動的方式過當與否，由伊斯蘭派主導的游擊戰，展開對敘利亞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鬥爭，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了。遊戲早已開打，藉口正在炮製：達拉的暴動來得正是時候。因此，聲稱在達拉有兩名男孩因為在牆上塗鴉而被捕，居然足以引發重大的衝突。這樣的說法如果可信，就如同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純粹只是因為奧匈帝國的皇儲法蘭茲·斐迪南大公被暗殺。

新聞界往往譴責敘利亞是警察國家，這是出於大國自以為是的宣傳技倆，而非冷靜的報導。敘利亞確實是警察國家，然而，任何國家都是警察國家，只是程度不同。基於沙文主義心態，西方國家不會承認這個事實。每個國家皆有執行政治監控的機關：例如美國有聯邦調查局(FBI)，它政治監控異議人士的歷史悠久，被監控的對象主要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公民權和黑人權積極分子，還有工會積極分子，近來又加上伊斯蘭教徒。

在英國則有政治部(Special Branch)、加拿大有騎警(Mounties)和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CSIS)。在法國，惡魔島(Devil's Island)直到1953年都是監禁政治犯的地點。九一一恐攻之後，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為了因應「恐怖分子」的威脅，莫不紛紛加強其警察國家的力量。有些評論家因此批評：這些國家日益成為「相似」的警察國家，不復昔日的面貌。總而言之，警察國家由來已久，來自內外部對國家權威的挑戰有時強有時弱，其政治監控的權力也會隨之增長或消退。

若是異議者造成的威脅變大，國家的警察國家權力也會提高。若是外來威脅為數較少、內部的意見分歧也微不足道，警察國家的程度就會減輕。有的國家需要應付的威脅不多，因此能使警察國家的權力限縮到最小。一旦有機會，它們會傾向於譴責敵視的國家是強勢的警察國家。政治宣傳的重點，是將社會的開放程度錯誤地歸諸於意識形態的作用，卻不指出這些國家能享有相對較為安全、穩固的環境。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

以美國為例：它的左右有兩個大洋屏障，使它免於外來的軍事入侵威脅；更加上它有令人畏懼的軍力作為後盾。因此，美國有條件維持程度較低的警察國家權力，其他許多國家無法享有如此珍貴的環境安全，自然是望塵莫及。

至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由於我們前述的各種理由，若要說客觀上極不安全的國家，敘利亞堪稱典型的象徵。美國的警察國家權力相對而言程度較低，美國官方的話術，是將它連結到對於開放和公民自由等等意識形態的虛假承諾，隻字不提美國相對來說並沒有威脅。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其警察國家的權力相對較高，美國官方當然也不忘栽贓，將它歸諸於敘利亞依賴鎮壓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念及它處於危險不安的環境中。

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隨時必須應付岌岌可危的環境，它和美國仇視的其他國家有相同的處境。然而，敘利亞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美國所賜。凡是不願意被併入美利堅帝國的國家，華盛頓方面就會在它的周邊建立軍事基地、武裝它的敵人，並在它的國內煽動衝突，藉由各種手段製造威脅。美國在全世界從事政變、暗殺和秘密干政，其數量之多足以證明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若是不肯投靠美國、聽命於美國領導，華盛頓方面即有能力大幅威脅其政權的存亡。根據威廉·布拉姆（William Blum）的統計，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

政府企圖顛覆的外國政權超過五十個、企圖暗殺的外國領袖超過五十人，至少也在三十個國家極力干預選舉。⁴⁸

為了應對美國所製造的威脅，被鎖定的國家會強化警察國家的權力。此舉固然能夠增加政權存續的機率，卻是讓華盛頓方面的宣傳家有機可乘，受到威脅的國家會被醜化成以鎮壓為治國之本。既然美國能誤導視聽，將社會的開放程度說成是意識形態使然，與強大而安全的環境無關；同理，遭受美國仇視而且警察國家權力強大的國家，也可以被扭曲成該國領導階層的意識形態有以致之，無關乎它們的環境充滿危險和不安，而且美國還是罪魁禍首之一。如此作法對華盛頓方面有兩大好處：

第一個好處：被美國鎖定的國家，美國會操縱認知，將它強大的警察國家權力和領導者的意識形態取向掛鉤。與美國唱反調的意識形態，會被抹黑成具有內在的專制與壓迫特性，於是美國的意識形態便能夠以重視社會開放的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第二個好處：被美國鎖定的國家，美國會將它的領導者貼上專制獨裁的標籤，然後冠上「強人」頭銜，再宣稱他漠視人權、奉行具有壓迫特質的意識形態。華盛頓方面可以順勢編造人道主義藉口，同時對鎖定的國家升高威脅。美國也可以讓制裁措施變得更加繁重，表面上看是為了懲罰目標國家領導者「不乖」的行為；另一方面，對反政府勢力的資助也可以提高，達到相同的目的。同時，華盛頓方面也不介意讓新「強人」了解，美國掌握他的生殺大權，他必須好自為之。這些行動的目的地純屬升高威脅，讓目標國家的環境安全更雪上加霜，以致更迫切需要強大的警察國家權力。美國對目標國家的威脅越大，對方就越會加強警察國家的權力，而華盛頓方面施加的威脅也會得寸進尺。

警察國家有兩面：一面是想像，一面是現實。現實中每個國家都是警察國家，想像中我們卻認為只有敵對的國家才是警察國家；但是，它們的強大警察國家權力，往往只是為了回應我們所製造的威脅。這一點值得再三強調：縱觀歷史，美國從來不需要為了自保而成為強大的警察國家，美國已有兩個大海洋作為屏障，保護它免於外來的威脅。在少數情況下，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它也面臨過不同程度的威脅。它和其他國家沒有兩樣，也曾大幅提高警察國家的權力。九一一恐攻之後，縱然它受到的威脅遠低於許多國家所面對的，華盛頓方面仍然立即採取相應措施，例如限縮公民自由、在海外以無人機非法擊斃美國公民、刑求恐怖分子嫌疑人、可疑的激進分子不經判刑就被囚禁在古巴關達那摩灣；不僅如此，如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所揭露的，美國政府還從事史上最密集的監聽計畫。

四面楚歌的國家

在伊斯蘭教徒造反以及恐怖主義之外，敘利亞亦處於外力入侵和軍事占領的威脅之下，此外更有兩度面臨核武毀滅威脅，一次是1970年來自美國，另一次是1973年來自以色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面對三股重大的反對勢力，分別對應復興黨的三大價值觀：政治伊斯蘭反對其世俗主義、以色列和美國反對其阿拉伯民族主義，華爾街方面則是反對其阿拉伯社會主義。

如我們所見，遜尼派政治伊斯蘭能汲取波斯灣國家的財源挹注，是1963年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崛起以來，復興黨國家可望馬到成功的一大威脅。敘利亞內有遜尼派政治伊斯蘭讓它身處險境，對外則是從1948年

開始與以色列陷入交戰。以色列背後有來自美國每年30億美元的軍援，2016年開始再提高為每年38億美金。它在敘利亞面前，簡直是強大的軍事集團。以色列和敘利亞已經有過三次主要戰役，敘利亞因此失去領土戈蘭高地。最後是美國：它擁有史上最可觀的軍力，長久以來一直串通政治伊斯蘭對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2002年，華盛頓方面將敘利亞列入邪惡軸心國家名單，形同對敘利亞宣戰；在2003年美國與伊拉克開戰之後，也曾公開籌劃入侵敘利亞。此外，美國甚至從2005年開始資助敘利亞國內的反對勢力。假使美國本身曾經遭遇到如此規模的威脅，它也會提高警察國家的權力。比起四面楚歌的敘利亞，美國的警察國家權力可能達到何種地步？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即便沒有高於敘利亞，至少也會不相上下。這是形勢使然，不得不如此做。

敘利亞的處境無比艱辛：它既面臨多重威脅，而且穆斯林兄弟會已誓言對復興黨發動聖戰，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同樣不容小覷。因此，敘利亞當局對於任何挑釁國家信心的行為，務必採取強硬方式回應，這是可想而知的。我們若是再考慮其他兩點，就能更加堅信這個看法。被「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外交文件透露：敘利亞的情報機構知道，華盛頓方面金援敘利亞國內的反對勢力。⁴⁵

此外，伊斯蘭教徒在2011年初對利比亞政府開戰，決心消滅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伊斯蘭教徒的行動很快即獲得北約支持。那一次行動的目標是將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從利比亞連根拔起，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很有可能因此相信，美國將會在敘利亞依樣畫葫蘆。我們可以合理假設：隨著威脅節節升高，大馬士革方面在如此情勢之下，唯有加強鎮壓異己一途。列寧也曾面臨類似的處境，他說：「這是自殺式的行為，因此我們不會做。」列寧所說的是開放蘇俄社會，任由比他更強大許多的政治反對勢力，隨意決定他的命運。⁴⁶ 記者派區克·

席爾 (Patrick Seale) 專精中東事務，他曾提到：敘利亞政府相信它是「為生存而戰，它的對手不只是國內的反對勢力，還有外來的陰謀集團，以美國為首（受以色列煽動），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卡達、英國及法國均參與其中」，「這個事實足以解釋，但不是開脫」它採用武力方式處理抗爭行動。⁴⁷

我們也同樣要問：敘利亞政府採用武力手段平息達拉的暴動，是否合法？其他國家的維安單位在處理類似的情況時，是否也會採取強勢作為？阿薩德問道：「當群眾在街頭恣意燒殺，你有何應對措施？」

「難道要告訴他們：你們可以為所欲為，我沒有意見，我不會干涉你們？那是不對的。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制止他們，不能讓他們繼續殘害民眾。而且，他們擁有機槍，我們投擲氣球是沒用的。我們必須動用槍械，因為他們全是激進的好戰分子。除此之外，當時的我們別無選擇。」⁴⁸

華盛頓方面的阿拉伯盟友們遇到國內的動亂，他們是如何處理的？這個問題有兩層重要的意義。第一，它的答案能為我們說明：以這些鄰國的標準來看，大馬士革方面處理敘利亞國內暴動的作法是否過當。第二，它的答案也能為我們釐清一個現象：華盛頓方面認可它的盟友們以武力壓制異議行動，卻用更高而且不可能達到的標準，批判大馬士革方面的應付方式。華盛頓方面是不是雙重標準？莫非華盛頓方面所期望的，是敘利亞當局向武裝叛亂分子投擲氣球？

敘利亞的抗爭群眾向警察開槍，同時也開始放火燒建築物。就在前一天，巴林的皇家獨裁者是以暴力方式鎮壓全民起義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坦克和美國製造的武器裝備都上場助陣。《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D. Kristof) 沉痛表示：「美國的盟邦巴林」出動「美國製造的坦克、槍枝、催淚瓦斯，以及外籍傭兵，強力掃蕩爭取民主的運動」，然而華盛頓方面「幾乎不聞不問」。⁴⁹ 克里斯托夫說，他「看見許

多抗爭者的屍體是在近距離遭到射殺，有一名少女被亂棒毒打後痛苦地扭動身軀，還有一名救護車工作人員被痛毆，只因為他想拯救抗爭者」。美國一向以至世界民主國家的龍頭老大自居，卻和獨裁者稱兄道弟，遑論是一名會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克里斯托夫對此並沒有任何解釋。他只是提出一個牽強的藉口，認為美國的「罪行，是夾在它的道義盟友和自身的崇高價值之間」。他的意思彷彿是說：華盛頓方面沒有選擇盟邦的機會，而且那些盟邦就像大自然的力量，例如地震或颶風，你唯有逆來順受。

與此同時，葉門政府「過度使用致命武器對付溫和的遊行示威群眾，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整體而言，當時的情況是眾多葉門人以和平方式要求更多自由、終止貪污腐敗，以及依法行政。但是他們遭遇的政府，卻是對他們過度而且不成比例地使用致命武器」。⁵⁰

2011年2月，沙烏地阿拉伯的東部省爆發動亂，抗議群眾要求政治改革以及釋放政治犯；動亂延燒一整年未見平息。10月，動亂開始轉向暴力，抗議群眾對警察局開槍及丟擲汽油彈，造成十一名員警受傷。⁵¹ 為了平定動亂，沙烏地阿拉伯的維安部隊出動坦克並大量逮捕群眾，其中有許多抗議者被判處死刑。⁵² 沙烏地的人權運動積極分子在社群網站流傳影片，片中顯示裝甲車對民眾開火；他們也公佈抗議群眾遭沙烏地阿拉伯當局殺害的照片。⁵³

敘利亞政府以武力方式鎮壓暴動，美國的盟友們也使用相同方式處理內部動亂，其中卻有三點差別。

第一，美國的盟友們是以嚴峻的方式回應，這一點不容置疑。在巴林的起義中，有超過一千名沙烏地阿拉伯兵力投入平亂；為了防止更多動亂，事後他們仍滯留在巴林。⁵⁴ 這場事件總計有三十六名抗議者喪生，將近三千名群眾被捕。⁵⁵ 關於美國所支持的葉門，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葉門政府過度而且不成比例地使用致命武器。

最後是沙烏地阿拉伯：在沙烏地阿拉伯有國民警衛隊 (Saudi Arabian National Guard)，它成立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在內部動亂時保護皇室家族的安全。在沙烏地的內亂中，警衛隊的裝甲車即開槍射殺抗議群眾。同時，還有數千名抗議者被逮捕及判處死刑，包括傳教士尼姆爾·尼姆爾和他的姪子。尼姆爾是抗議行動的中堅分子，因此被斬首示眾；至於他的姪子，是被判處釘上十字架的死刑。

其次，並沒有證據顯示沙烏地曾經對抗議者讓步；但阿薩德則是回應抗議者的要求，立即取消國家安全法，並且修憲使政治更為開放。

第三，美國的盟友們惡意使用致命武器，美國卻沒有表示異議，更沒有向抗議者及武裝團體提供援助，對抗它的附庸國。反之，華盛頓方面毫無保留地譴責阿薩德政府，宣稱他已經喪失合法地位，還命令他即刻下台。阿薩德並沒有聽從美國的要求，美國遂提高對敘利亞反抗勢力的外援。直到2015年，CIA已經培訓及武裝將近一萬名戰士，並且「每年耗資近十億美金」資助反政府戰鬥勢力。華盛頓方面在美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土耳其等盟邦，已經訓練及武裝五萬名反抗敘利亞的暴動分子。⁵⁶相反地，從未花費任何一分錢支持巴林和沙烏地王國內部的反對派。美國倒是支付過一名國王的贖金，以便在阿富汗扶植附庸政權，而且這是一個缺少合法性的政府。

正如《華爾街日報》所說：「阿富汗政府以及它的維安部隊，完全仰賴美國和美國盟邦的施捨維生」。⁵⁷在美國總統口中，他的敘利亞對手已經喪失合法地位；根據《時代》雜誌以及《紐約時報》的說法，事實卻是阿薩德備受歡迎，而且深得大部分敘利亞人民效忠。美國總統歐巴馬同時也利用美軍的兵力在喀布爾 (Kabul) 培養政權，但是因為它不得民心而無法自立，必須依靠美國強力支持才能生存。

假動亂與偽研究

敘利亞在2011年發生的暴動，關於它的起源，還有最後一個重點必須一提。在《美國國家科學院會議論文集》(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中，部分社會科學家和分析家指出，「乾旱是造成敘利亞動亂的一項因素」。根據這個說法，乾旱「造成農作物歉收，迫使150萬人從農村遷往都市地區」，再加上由伊拉克湧入的難民，使得都市地區稀有的工作機會競爭更加激烈，敘利亞因此成為社會與經濟局勢緊繃的大鍋爐，隨時就要沸騰。⁵⁸這個論點聽起來的確十分順耳，更何況它還是「科學研究」。但是，它所嘗試說明的現象，也就是敘利亞的大規模動亂，實際上並不存在。

我們已經看到，在西方國家媒體的報導中，並沒有提到大規模動亂。相反地，媒體記者本來以為會遇見敘利亞發生大規模動盪不安，卻是因期待落空而感到吃驚。西方媒體記者所見到的，反而是敘利亞舉國上下平靜得令人嘖嘖稱奇。其他還有：臉書粉專「2011年敘利亞革命」的主辦單位發起的遊行示威落得黯淡收場、評論家承認阿薩德深得民心、記者報導敘利亞人不相信革命近在眼前。達拉事件不過涉及數百名抗議群眾，在大馬士革發動的挺政府大遊行則有數萬民眾參與，讓它相形見绌。即使達拉事件發生過後已經一個月，《紐約時報》派駐敘利亞的記者沙迪德指出，到處都見不到任何跡象顯示，會有突尼西亞和埃及那種大規模社會劇變。「奧瑪·納夏比 (Omar Nashabe) 長期觀察敘利亞，而且是貝魯特阿拉伯語日報《新聞報》(Al-Akhar) 的記者」；2011年2月初，他告訴《時代》雜誌：「在敘利亞大約有14%人口受貧窮所苦，失業率也有20%；儘管如此，阿薩德仍然獲得人民信任」。⁵⁹

在敘利亞，確實有飽受乾旱之害的鄉村人口遷移到都市，也確實有伊拉克的難民大舉湧入，兩者相加相乘之後，在國內形成了經濟壓力。但是，並沒有證據指出它造成了大規模社會動盪，因為根本沒有大規模社會動盪。在敘利亞所發生的，是一場叛亂，它的主要目標是實現伊斯蘭思想。領導叛亂的武裝團體隸屬於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則是與華盛頓方面暗通款曲已久。從一份美國國防部情報局流出的文件中，我們得知：直到2012年為止，「主導叛亂的主要勢力」，有「原教主義派、穆斯林兄弟會，以及AQI（伊拉克蓋達組織）」。⁶⁰我們也因而知道，最重要的幾個反抗團體，都是「兄弟會附隨組織」（Brotherhood-affiliated）。這是《華爾街日報》的中東專家亞洛斯拉夫·特洛菲莫夫（Yaroslav Trofimov）給它們的稱號。我們還知道，兄弟會誓言對大馬士革的世俗派政府發動聖戰，不達目的絕不罷休。而且，從2005年開始兄弟會即接受華盛頓方面資助。不止如此，2002年起敘利亞被美國名列邪惡軸心國之一，從此美國政府即公然要求敘利亞改朝換代。因此，需要被闡釋的現象，不是全民起義反抗喪失民心的政府，而是帶有伊斯蘭色彩、背後有華盛頓方面撐腰的武裝叛亂團體，對抗一個全民政府。

對於複雜的社會現象，例如大規模動亂，有時候人們會在無以名狀的社會和經濟力量裡，小心翼翼地探求答案；不至於想在美國（或其他）政府的勾心鬥角中尋找解釋。這真是良好的心態。但是，在敘利亞的例子卻是例外，因為沒有證據顯示暴動是遍地開花，或者政府已不得民心。反之，證據倒是和以下的情節更加相互輝映：有一個政府承諾要實現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目標，而在石油儲藏量豐富的阿拉伯世界，美國的主導地位備受其意識形態威脅。因此美國政府攏絡政治伊斯蘭協助，對這個讓它感到芒刺在背的政權發起游擊戰。遜尼派政治伊斯蘭之所以能夠得到華盛頓方面青睞，原因在於它是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頭號的反對勢力。論及與

穆斯林聖戰士合謀，聯手顛覆世俗派左翼政府，這一類勾當華盛頓方面可謂前科纍纍。美國在阿富汗即用過這招：它結合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甚至與聲名狼藉的奧薩瑪·賓拉登合作，資助、武裝及組織了一場聖戰，對抗阿富汗政府，因為阿富汗政府是「無神論」蘇俄共產黨和它的「異教」世俗派左翼盟友所組成的。CIA故技重施，也支持聖戰士在敘利亞從事同樣的活動，顛覆阿拉維派「異教徒」巴夏爾·阿薩德所領導的「異教」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

或許有人不以為然，不認為美國會想要煽動穆斯林兄弟會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仇恨，因為如此一來將會激發猛烈衝突，造成無數人命浩劫。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接受法國新聞週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訪問時，被問到美國在阿富汗支持聖戰士一事，是否令他感到遺憾。布里辛斯基回答：「在世界歷史上，哪一樣比較重要？……是一部分被鼓動的穆斯林？或是中歐解放以及冷戰結束？」⁶²華盛頓方面在敘利亞煽動部分穆斯林，我們大可相信，布里辛斯基的繼任者也會有類似的態度。

在世界歷史上，哪一樣比較重要？他們或許會問：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加上數十萬條人命灰飛煙滅（其中的美國人少之又少），或者是消滅一項運動，不容它挑戰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瑪德琳·歐布萊特擔任美國國務卿時，認為美國主導的制裁措施造成五十萬伊拉克兒童因此喪生，是「值回票價」。當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復興黨，威脅到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為了消除這一項威脅，伊拉克的人命是必要的代價。如果說，一部分「被鼓動的穆斯林」和五十萬人因為制裁措施而喪生，是值回票價的；那麼，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們去想：從美國官員的角度來看，區區數十萬敘利亞人的生命損失，不也是值回票價的？

「溫和叛亂分子」的神話
THE MYTH OF THE MODERATE REBEL

這批聖戰士將會被冠上「溫和派」的頭銜，藉以造成幻覺：讓世人以為美國所支持的對象，僅限於世俗派的軍力，而且他們的目標都是為了實現民主和多元政治。這個幻覺和另一則更巨大的神話遙相呼應：那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崇高的美德……，在中東和北非實現民主政治。

敘利亞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控制之下，於1945年脫離法國而獨立。伊斯蘭教徒希望奉行《可蘭經》為基礎，建立伊斯蘭國，因此成為復興黨在國內的首要勁敵。如前文所述，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是伊斯蘭重要團體，1980年起它誓言對世俗派復興黨政府展開永無止境的聖戰。穆斯林兄弟會視敘利亞政府為阿拉維派異教徒領導的異端政權，以上種種，美國政府莫不瞭若指掌。美國國務院的一份研究報告總結道：「遜尼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長久以來一向是復興黨政權最為重大的威脅」。

2009年，距離阿拉伯世界全面爆發動盪不安還有兩年，穆斯林兄弟會控訴世俗派國家敘利亞是充滿敵意的外來毒素，務必斬草除根，才能天下太平。² 2011年，就在敘利亞發生暴動前僅僅三個月，「兄弟會的運動領袖」仍不斷「高聲呼籲，希望敘利亞掀起全民革命，『推翻獨裁腐敗政府，解放敘利亞，人人有責』」。

2011年三月中旬，達拉發生暴動。當時，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這兩個武裝伊斯蘭團體已經成立，它們在反抗敘利亞政府的戰爭中，居於主導的地位。隨著暴力事件逐漸擴散，至少有一家西方媒體已經注意到，伊斯蘭在其中的角色非常突出。不到一年，美國的國防情報局即有報告指出：這場叛亂的主要力量，是原教主義派、穆斯林兄弟會，以及伊斯蘭國的前身伊拉克蓋達組織。

自由敘利亞軍

儘管有證據指出叛亂行動是由伊斯蘭主導，其目的乃是建立伊斯蘭國；在一般論述中卻滲入了一則神話，聲稱以武裝反抗復興黨政府的，是一批世俗派的「溫和」叛亂分子。這樣的神話正好切合阿拉伯之春那一套說詞：

原本是伊斯蘭領軍的城市游擊戰暴動，對抗世俗派敘利亞政府，被扭曲成全民渴望民主如大旱之望雲霓，因此毅然決然起義反抗不得民心的政府。事實上這是一場造反，它的動力是渴望建立伊斯蘭國，恪遵《可蘭經》指導；所謂民主政治的決策風格，在他們眼中根本不值得一提，早已棄如敝屣。這可是編劇大人的一大挑戰。如果人人心中的一把尺都能正確丈量，看出這場動亂是伊斯蘭對於世俗派國家的攻擊，而且那個國家的領導者還是獲得人民認可授權的；那麼，華盛頓方面竟爾公開支持叛亂分子，其立場真是情何以堪？

叛亂打從一開始，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即是主角，穆斯林兄弟會在反抗組織「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同樣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委員會成立於2011年10月初，甫一成立，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們已迫不及待冊封委員會是敘利亞國內「反抗力量與國際社會的主要對話者」。西方國家宣稱，敘利亞全國委員會將是「全體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它目前是流亡中的潛在政府。

「自由敘利亞軍」是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的軍事分部。出身土耳其的敘利亞自由軍指揮官阿瑞夫·漢茂德（Aref Hammoud）上校告訴《華爾街日報》：「我們的目標，是聯合敘利亞全國委員會所代表的政治分部，以及自由敘利亞軍所代表的軍事分部，共同進行革命。」。

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的資金排山倒海而來，「有來自富豪的，也有來自波斯灣國家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美軍在中東地區最大的基地，正是設在卡達境內」，卡達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捐助從來不落人後，不論是對敘利亞或任何地方的兄弟會均一視同仁。它也不吝於對各地的伊斯蘭組織提供金錢援助。正如當時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主席伯翰·加利昂（Bunhan Chaloun）對《華爾街日報》所說，大部分的資金都是用於「協助自由敘利亞軍建立軍備」。

自由敘利亞軍的資金也可能會直接來自「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敘利亞全國委員會，該委員會擁有「為數可觀的伊斯蘭教徒」。¹⁸ 穆斯林兄弟會在新「候補政府」中的代表地位確實氣勢如日中天，以致西方國家的官員不禁開始擔心，反抗敘利亞政府的力量「有落入伊斯蘭教徒掌握的風險，劇平阿薩德之後推出穆斯林兄弟會政府」。¹⁹ 默拉姆·杜若比 (Molham al-Drobi) 是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的資深委員，也是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在委員會的代表，他告訴《華爾街日報》：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的資金之多，高達每個月四千萬美元。²⁰ 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是國君、埃米爾和國王，他們偏好的治國之道不正是「朕即王法」、厭惡任何民主形式的參與？這是一個所謂聲援民主的運動，但是這群合夥人的組合，多麼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自由敘利亞軍是敘利亞全國委員會的軍事工具，從命名開始就充滿巧思。敘利亞的反抗勢力抹黑大馬士革方面是專制獨裁政府，而自由敘利亞軍之名暗喻它能擺脫敘利亞政府的魔掌。話雖如此，一旦剝除花言巧語的包裝，我們就會清楚看到：這支自由敘利亞軍其實並無法在波斯灣國家的庇蔭下享有自由，那些受美國提攜照顧的反民主王國，全是它的衣食父母。**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以及它的軍事部門自由敘利亞軍，都得仰仗波斯灣的反民主國家資助才能作戰。**許多西方人被誘導，相信這股反抗勢力是在追求民主政治，渾然不知其革命之路的終點，是在大馬士革建立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政府。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曾有一針見血的觀察：「你是知道的，我們開始幫助反抗勢力，不管造反的一方是誰都無所謂。他們當然不是為了民主而戰，想想看他們的贊助國家是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就一切盡在不言中了。」²¹

自由敘利亞軍何止並非為民主而戰，它連世俗派都談不上。敘利亞暴動的神話如是說：在革命的早期階段，自由敘利亞軍是世俗派的代表，直到革命被努斯拉陣線及伊斯蘭國「綁架」為止。然而，自由敘利亞軍分明是以伊斯蘭教徒為主，而且暴動自始至終沒有被任何人綁架，從第一天開始它就是伊斯蘭教徒的行動。

自由敘利亞軍剛剛誕生的時候，是眾多游擊戰團體的廣泛總稱，而這些團體乃是以伊斯蘭教徒為數最多。「它徹頭徹尾都是遜尼派阿拉伯人所形成的現象」，²² 推崇它展現敘利亞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渴望，這樣的說法十分可議。

敘利亞大約有百分之30的人口不屬於遜尼派，若自由敘利亞軍果真是挺民主政治的軍隊，何以幾乎見不到非遜尼派的代表？莫非民主政治是遜尼派專屬的熱情？我們還要點破的是：民主這一項不在自由敘利亞軍的目標清單裡。據說這個團體夙夜匪懈都是為了全民政治而奮戰，目標清單中卻不見民主一項，豈不是非常古怪？自由敘利亞軍所標榜的，是殺氣騰騰的目標，那當然是推翻阿薩德政府，絕口不提創建民主國家的積極理想。再者，「在自由敘利亞軍隨處可見宗教話彙，並且絕大多數軍旅是以遜尼派伊斯蘭歷史上的豪傑志士或英雄事蹟命名」。

¹⁸ 美聯社的報導說，參與自由敘利亞軍的團體，有許多均懷抱著伊斯蘭計畫；《紐約時報》也指出：「自由敘利亞軍當中，有一部分團體和努斯拉陣線有類似的意識形態，而且奉行原教主義派對伊斯蘭的嚴格詮釋」。¹⁹ 穆斯林兄弟會本身當然也是自由敘利亞軍的成員。根據穆斯林兄弟會一名兄弟的說法：穆斯林兄弟會「存在的基礎」即是構成「自由敘利亞軍整體的基礎」。²⁰ 統一旅 (Tawhid Brigade) 或稱統一部 (Tawheed Division) 是附屬於穆斯林兄弟會的游擊隊，就是它領軍在阿勒坡與敘利亞政府對戰。²¹ 《紐約時報》報導，自由敘利亞軍的指揮官對新兵的訓話說：「不願為真主奉獻者，最好解甲歸田。願為真主奉獻的，你要加入聖戰的行列；你會獲得來生，並且在天堂享福。」²² 這一番話絕非世俗派的講道。

自由敘利亞軍的一名長官米斯卡爾·阿爾巴塔希 (Mikhail Albataish) 准將對《華爾街日報》說：自由敘利亞軍不僅是「由伊斯蘭團體主導」，而且「與努斯拉陣線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²² 努斯拉陣線正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當時的真實情況的確如《時代》雜誌所報導的：「叛亂分子的攻擊行動，是自由敘利亞軍戰士、伊斯蘭教徒、原教主義派，甚至包含極端團體努斯拉陣線等，共同策劃的聯合作戰」。²³ 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有許多報導也處處呼應《時代》雜誌。例如《華爾街日報》提到：「自由敘利亞軍指派一部分成員……與努斯拉陣線並肩作戰。自由敘利亞軍的同一批團體成員之中，有一部分既接受美國奧援，也同時和努斯拉陣線往來密切，合作無間」。²⁴ 《華爾街日報》也在其他幾處同樣提到：「努斯拉陣線與……西方國家支持的自由敘利亞軍同心協力」。²⁵ 「CIA支持的自由敘利亞軍陣營，與極端分子如努斯拉陣線及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長期合作」；²⁶ 以及「努斯拉陣線和西方國家援助下的自由敘利亞軍」默契良好。²⁷ 《時代》雜誌的觀察是：自由敘利亞軍和努斯拉陣線的關係深刻，已經到達水乳交融的境界，即使雙方分享武器、彈藥也不足為奇。CIA供應自由敘利亞軍的武器，想要避免落入努斯拉陣線手中，無異癡人說夢。²⁸

虛有其表的穆斯林西方國家的代理人

自由敘利亞軍不只是以伊斯蘭教徒為數最多，它也絲毫稱不上溫和派。美聯社報導過，有一部分自由敘利亞軍部隊，「其交戰手法凶殘，勢必能讓他們背後的金主不寒而慄」。²⁹ 他們的作戰方式，順手捻來一種，即為西方社會大眾絕對不會認同的：那就是**自殺炸彈客**。提起那些執意採用這種作法的自由敘利亞軍團體時，《時代》

雜誌的記者蕾妮雅·阿保柴德曾用很酸的口吻說：「還是所謂的溫和派呢」。³⁰ 她還提到，有一些自由敘利亞軍的單位對外自稱是世俗派，一說到「宗教少數派的時候，卻是教派的下流語言滔滔不絕，極盡妖魔化之能事；針對阿薩德的阿拉維派成員時，詆譏更是無以復加」。³¹ 這讓她不禁要問：難道「溫和派」和「世俗派」這兩個標籤只是刻意用來誤導視聽的工具，目的在於掩飾這場叛亂的伊斯蘭立場，否則無法贏得西方社會大眾的支持？事情的真相是：自由敘利亞軍並非世俗派的游擊隊；後來的伊斯蘭國那種令人痛恨的殘暴野蠻作風，自由敘利亞軍當時不遑多讓。聯合國任命的委員會，記錄了許多樁自由敘利亞軍動用酷刑和草菅人命的案例，讓它的真面目更加無所遁形。³²

這一支偽世俗派軍隊「在2013年底的時候已跡近全面瓦解」，改由中情局接手，直接指揮各個單位。³³ 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也難逃相同命運，因為非伊斯蘭派指控它是在「穆斯林兄弟會掌控」之下的「專制獨裁」組織，³⁴ 穆斯林兄弟會意圖公器私用，利用委員會為候補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效命。³⁵ 從那時起，伊斯蘭叛亂團體即不再由穆斯林兄弟會主導，轉由它的意識形態嫡系組織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挑起大樑。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串通勾結，從叛亂一開始就不是秘密。自由敘利亞軍和伊斯蘭國都是蓋達組織衍生出來的產品，而穆斯林兄弟會在靈感啟迪以及人力資源兩方面，都讓蓋達組織受益匪淺。

根據美國國防情報局的說法：努斯拉陣線成立的宗旨，是在伊拉克國內部署蓋達組織的側翼。在叛亂初期，努斯拉陣線和穆斯林兄弟會都是在背後運作的主要力量。努斯拉陣線的首要目標和自由敘利亞軍並無二致（當然也和華盛頓方面、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卡達、約旦，還有以色列等等國家的主要目標沒有差別）：都是要逼迫大馬士革方面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交出政權。不過，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敘利亞軍的伊斯蘭教徒，還有另一

個毫不避諱的共同目標：亦即「在敘利亞建立奉行原教主義的遜尼派伊斯蘭國家」。³⁶

瓦哈比意識形態正是沙烏地阿拉伯國教的基礎，一般人往往認為蓋達組織概括承接了瓦哈比意識形態。我們知道：蓋達組織和瓦哈比主義都是原教主義派，而且均反對什葉派。但是，蓋達組織在思想上與穆斯林兄弟會更為近似，尤其是二者都融入了薩義德·庫特布所提出的創見。薩義德·庫特布的思想，是1960和1970年代穆斯林兄弟會運動的主要意識形態領導者。

至於瓦哈比主義，據《紐約時報》史卡特·謝恩（Scott Shane）的觀察，它是「屬於部族、沙漠型的伊斯蘭……相較於各大貿易城市如巴格達和開羅的都會型伊斯蘭，二者大異其趣」。³⁷崛起於阿拉伯大沙漠的政治伊斯蘭，其誕生的緣由是為了合法化紹德王室的統治地位。相對地，在埃及發跡的政治伊斯蘭，則是源自伊斯蘭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反抗。蓋達組織的意識形態直接涉及穆斯林世界備受西方國家宰制的問題，這一點是追隨穆斯林兄弟會所關心的議題。庫特布主張：所有穆斯林均有義務發起聖戰，打倒伊斯蘭領域內的一切非伊斯蘭政府，包括名義上的穆斯林。名義上的穆斯林虛有其表，實為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協助外國利益和教條，在穆斯林世界維持高高在上的地位。蓋達組織的獨到之處，是將穆斯林追求祖國解放的攻擊力量，導向「遠方的敵人」，也就是美國以及它在西方的附庸國。奧薩瑪·賓拉登振臂高呼：它們「將穆斯林世界裂解成眾多弱小的國家……因此，將敵人美國從這片神聖領土上徹底清除殆盡，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偉大任務」。³⁸

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哈桑·班納為穆斯林兄弟會設計的口號是：「真主阿拉是我們的目標，先知是我們的模範，《可蘭經》是我們的憲法，聖戰是我們的道路，為阿拉的事業慷慨赴義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渴望。」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羅勃·巴爾（Robert Baer）認為，這一則口號「事實上正是九一一恐攻時，令劫機犯為之赴湯蹈火的座右銘」。³⁹巴爾更堅信的是：「儘管媒體一貫以蓋達組織稱呼九一一事件的攻擊者」，事實上九一一恐攻「徹頭徹尾」都是穆斯林兄弟會的行動，至少是受穆斯林兄弟會啟發的。他進一步補充：美國為了對付世俗派的左翼運動和政府，曾經「在葉門、阿富汗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從事骯髒的勾當」，兄弟會兼蓋達組織，就是當時美國所利用的「原班人馬」。⁴⁰2007年時，《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說：「奧薩瑪·賓拉登和蓋達組織的其他領袖，向西方國家與阿拉伯的獨裁者們發起聖戰，穆斯林兄弟會已故思想家薩義德·庫特布的著作，是他們汲取靈感的共同來源」。報導繼續說：「埃及和敘利亞兄弟會的成員也被延攬，在賓拉登的運動中擔任高級職位」，其中包括賓拉登的下一任繼承人阿曼·薩瓦里，他在十四歲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⁴¹

在這裡我們須注意的重點是：蓋達組織以及由它衍生的團體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全是從穆斯林兄弟會一脈相承而來的。遜尼派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具體顯化於自由敘利亞軍、蓋達組織、努斯拉陣線及伊斯蘭國的政治綱領之中，代表它們的核心價值無他，唯穆斯林兄弟會的創會天命而已。

遜尼派政治伊斯蘭念茲在茲的目標，是在傳統穆斯林世界保衛及推廣遜尼派伊斯蘭，並且以之作為中心原則，組織社會和政府。因此，它處處反對非穆斯林的統治，其他穆斯林也一律被斥為異教徒或叛教者（包括什葉派），不配稱為伊斯蘭。在傳統穆斯林的領土上，從外國勢力占領，到名義上為穆斯林政府，實為非穆斯林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在本地的代理人，或者名義上為穆斯林政府，實則以非伊斯蘭之道治國者，再到世俗派政府、由非穆斯林或以穆斯林自居、實為邪派異端分子所領導的政府，乃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世俗民族主義，凡此種種，遜尼派政治伊斯蘭無不堅決反對到底。

許多伊斯蘭教徒拒民主政治於千里之外，因為它並非伊斯蘭思想。伊斯蘭教徒所提倡的是：「反對以『人的

律法』為基礎的一切政治制度，取而代之以『真主律法』為理論基礎所建立的體系」。⁴²

在遜尼派政治伊斯蘭內部，立場也不見得一致。對於努斯拉陣線來說，只要能在敘利亞境內建立伊斯蘭國，他們即心滿意足，別無所求。然而，在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統治下的伊拉克蓋達組織，它決心要建立的伊斯蘭國，除了以黎凡特為限，是沒有國界的。⁴³伊拉克蓋達組織籲令努斯拉陣線解散，併入伊斯蘭國，努斯拉陣線卻裹足不前，一方面誓言效忠蓋達組織，隨後則成為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部。後來，它正式中斷與蓋達組織的關聯，巴望華盛頓方面能將它從美國的恐怖主義名單中除名。但是努斯拉陣線的外交策略不過是真心換絕情，華盛頓方面斷定這只是新瓶裝舊酒，拒絕接受它虛晃一招。與此同時，蓋達組織的領導階層切割伊斯蘭國，對於巴格達迪熱衷攻擊非正統穆斯林的作風，他們也深表難以苟同。

CIA 武裝培訓清單

大致上，努斯拉陣線仍是在華盛頓的羽翼之下安然無恙，雙方維持積極合作的關係。凡是被華盛頓方面冠上「溫和派」的團體即可獲得資助，這些團體實際上全是蓋達組織分部的跑腿小弟。我們已經提過，自由敘利亞軍與努斯拉陣線你儂我儂，在戰場上既分享武器也互相支援。他們若不是同樣信持穆斯林兄弟會的意識形態，絕無可能如此同心協力。經由CIA武裝、培訓的反抗團體竟與努斯拉陣線緊密合作，在西方媒體上可是屢見不鮮的報導。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有一部分團體「既接受美國奧援，也同時和努斯拉陣線往來密切，合作無間」，

“許多「得到美國支持的溫和叛亂分子，跟努斯拉陣線是同一陣營的。大多數戰場指揮官都能獲得行動支援，乃是美國和努斯拉陣線配合調度」。⁴⁴它還提到：「努斯拉陣線……和西方國家撐腰的……叛亂分子……並肩作戰」；「與努斯拉陣線通力合作的叛亂團體，其背後的支援來自美國和它在當地的盟邦」；⁴⁵以及「極端主義團體如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與CIA所支援的派系自由敘利亞軍……聯手作戰」。⁴⁶

《紐約時報》揭露：蓋達組織的分支「（與接受西方國家援助的團體）合作關係匪淺」，許多「反抗阿薩德政府的團體一方面與美國志同道合，另一方面也和努斯拉陣線聯合作戰」。⁴⁷《紐約時報》的記者解釋：「叛亂分子暗中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他們與立場更強硬的伊斯蘭團體，例如蓋達組織的分支努斯拉陣線，不是關係密不可分，就是在戰場上並肩合作」，⁴⁸「華盛頓方面認為相對溫和的叛亂團體……其實和努斯拉陣線同心同德，交織成一片」。⁴⁹

《華盛頓郵報》則指出：努斯拉陣線「與溫和叛亂分子的勢力交互穿透，盤根錯節」，⁵⁰《獨立報》的記者派屈克·寇克朋也提到：「小型的武裝團體有時候能拿到美國供應的優良武器，它們的角色是協助努斯拉陣線和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後者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另一個相關團體）。⁵¹

努斯拉陣線組織並領導一支叛軍聯盟，稱為「征服軍」（Jash al-Farah），成員包括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如《紐約時報》記者班·胡巴德（Ben Hubbard）所述，其他成員還有「較為溫和的叛亂派系……它們皆是從美國及其盟邦的情報機構，暗中獲得武器和支援」。⁵²俄羅斯曾以空襲攻擊聯盟軍隊的兵士，引起華盛頓方面不滿，因為俄羅斯攻擊的目標是「美國暗助的團體」。⁵³但俄羅斯同時也針對美國所支持的麻吉戰友努斯拉陣線動手，努斯拉陣線卻是被美國財政部欽點為外國恐怖分子的組織。⁵⁴

不僅如此，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伊斯蘭國的時候，努斯拉陣線也赫然陪榜。美國為努斯拉陣線戴上恐怖分子的帽子，「此舉意在警告中東地區的反對派和其他政府」，讓他們知道：「等阿薩德政府一如預期被推翻之後，華盛頓方面所能接受的政府，不得由極端派的伊斯蘭勢力主導」。⁸⁸華盛頓方面和安理會點名指責努斯拉陣線，等同將它逐出家門。受CIA支援的蓋達組織同志們因此爆發強烈不滿，在敘利亞的多個城市展開抗議行動，他們高舉的布條寫著：「我們都是努斯拉陣線」。⁸⁹後來，華盛頓方面與俄羅斯達成協議，決定合作空襲努斯拉陣線的據點；此項協定迅即遭五角大廈否絕。五角大廈是努斯拉陣線組織在美國的支援主力，五角大廈破壞協定，也表明了「不同意空襲行動應該單獨針對努斯拉陣線作為目標」。⁹⁰

華盛頓方面的態度非常明顯，它對努斯拉陣線另眼相看，並未將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並列。首要證據是：CIA所培訓及武裝的叛亂分子，其實皆融入了努斯拉陣線，而且看起來與伊斯蘭國完全無關。遍尋西方媒體的報導，凡是提到西方國家資助的叛亂分子，均沒有提到任何人與伊斯蘭國有關。

相反地，卻有非常多報導指出：**美國所支援的叛亂分子與努斯拉陣線聯合行動**。顯然，華盛頓方面是真的唾棄伊斯蘭國；但是美國官方對於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正式分部，卻是有另一套完全不一樣的看法，這一點誰都看得出來的。當俄羅斯加入敘利亞的戰火圈，並且聲明它的目標是消滅恐怖組織；此時華盛頓方面的反應讓它口嫌體正直的態度更加無所遁形，儼然忘了努斯拉陣線才被它抹上了恐怖分子的印記。

招惹華盛頓方面抗議的是，俄羅斯豈可針對恐怖分子。如果那真的是俄羅斯的目標，它應該只攻擊伊斯蘭國才是。情況看起來似乎是這樣：美國至少非正式地認為，努斯拉陣線是「溫和」叛亂集團的一分子而已。因此，被問及不斷被提到的溫和派究竟有哪些團體，美國的國家情報局總監詹姆士·克雷帕（James Clapper）如是說道：

「近來溫和派的範圍已越來越廣，只要不是伊斯蘭國的同夥，都可以稱之為溫和派」。⁹¹也就是說，對華盛頓而言：任何一個非伊斯蘭國的武裝團體都算是溫和派，包括努斯拉陣線。美國自己曾經指稱這個蓋達組織的分支是恐怖組織，而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攻擊，蓋達組織正是罪魁禍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大的一部分；然而，以上這些都不影響努斯拉陣線在美國眼中的溫和派地位。

美國區隔伊斯蘭國和反抗敘利亞復興黨政府的伊斯蘭叛亂團體，並且將伊斯蘭國定位成非溫和派，它的理由是：伊斯蘭國不同於努斯拉陣線和CIA所武裝支援的蓋達組織眾多附隨小弟，**伊斯蘭國渴望取代的政府之多，已超出華盛頓方面可容忍的程度**。華盛頓方面的目標是敘利亞去復興黨化，凡是和華盛頓方面有共同目標的團體，它都樂於互相合作，但前提是這些團體的目標必須適可而止。例如，巴格達的政權是美國扶植的，利亞德的阿拉伯王朝是美國的重要盟友，卻被伊斯蘭國斥為非伊斯蘭政府。若有任何組織企圖推翻這一類政權，華盛頓方面絕不會縱容。

華盛頓方面的目標，是消滅敘利亞國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這項行動中，努斯拉陣線會是很有用的工具。因此，美國才會接納努斯拉陣線。美國的策略是：為努斯拉聯盟提供支援，但是僅足夠它們有效拖垮敘利亞政府，讓復興黨同意讓出政權即可。美國所提供的支援絕不會過度，復興黨不至於被迫將政權直接移交給伊斯蘭派。換言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遜尼派政治伊斯蘭之間的鬥爭，固然歷時已長達數十載，華盛頓方面並不希望見到任何一方勝出。華盛頓方面的如意算盤，是讓他們雙方鬥到兩敗俱傷，而且在雙方已經奄奄一息之際，再以「公道伯」之姿入主敘利亞，開始為美國的商業利益鋪路。

華盛頓方面對伊斯蘭國的手段也是如法炮製，只不過它沒有對伊斯蘭國提供任何支援，因此談不上調控支援

的層級；但它調控的是對伊斯蘭國的打擊程度。五角大廈方面對伊拉克的伊斯蘭國痛下重手，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卻不動它一根寒毛。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對伊斯蘭國的空襲集中於伊拉克，因為「美國若是在敘利亞境內打擊伊斯蘭國，如同以軍事方式幫助了巴沙爾·阿薩德總統的政權」。⁶²同樣地，法國也「避免轟炸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團體，擔心如此一來會便宜了」敘利亞政府。⁶³

英國也不例外。它的空戰行動幾乎完全集中在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針對敘利亞境內伊斯蘭組織據點的行動，比例不到一成。⁶⁴《紐約時報》報導：「在敘利亞，以美國為首的空襲行動……主要集中於遠離政府控制的地區，避免……幫到被歐巴馬總統要求下台的領導者」。⁶⁵因此，美軍聯盟的「空襲，針對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的部分……如此有限，看起來比較像是象徵性的動作而已」。⁶⁶各國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虛晃一招，羅勃·費斯克以尖刻的嘲諷總結說道：「所以說，我們到了敘利亞戰伊斯蘭國。當然啦，要是他們正在攻打阿薩德政府，我們就會樂得袖手旁觀。」⁶⁷

是誰在支援蓋達組織的敘利亞分部？它的主要資源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卡達的直接金援。派屈克·寇克朋的報導說：「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一向支援努斯拉陣線」，《華爾街日報》亦爆料土耳其和卡達「與努斯拉陣線直接往來，因為相信這個叛亂團體有利於它們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能幫助它們推翻阿薩德政府」。⁶⁸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為我們證實了這些評語。2014年10月，他在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Kennedy School）發表演說，告訴台下的學生：「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等，他們要拉倒阿薩德政權的決心堅定無比。在遜尼派對什葉派的戰爭中，它們都稱得上有實質代理人參與其中。它們已經投入了數億美元的金援，以及數十萬噸的武器，凡是敢跟阿薩德唱反調的，都能雨露均霑，但努斯拉和蓋達組織的人除外」。⁶⁹然而，拜

登半句不提努斯拉陣線這個蓋達組織分部所得到的間接金援。努斯拉陣線的間接金援是來自CIA所支援的幫手團體，也就是著名的「溫和派」。這些幫手取得美國供應的武器，再與努斯拉陣線互通有無，並且加入征服軍的行列。

克雷帕對「溫和派」一詞的定義認為，只要不是伊斯蘭國的狐群狗黨，任何叛亂團體都可算是溫和派。克拉伯的定義方式消極，但除此之外，這個詞的內涵也曖昧得近乎毫無意義。《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桑格（David Sanger）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這個外交政策機構的影響力十分巨大，而且與華爾街的關係匪淺。大衛·桑格承認：「誰都說不準誰才是『溫和派』」。⁷⁰根據派屈克·寇克朋的說法：土耳其對「溫和派」一詞的定義包括「立場極端的聖戰士組織，例如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它即經常與蓋達組織的分支努斯拉陣線協同作戰」。⁷¹他也提到，土耳其認為努斯拉陣線乃是溫和派團體。⁷²

至於《衛報》的記者伊溫·麥卡斯基（Ewen Macaskill），他的立場或許是基於一個算是合理的預設：「溫和派」一詞的認定，應該依據該團體的行事風格和意識形態為準。他指出「美國和西方國家盟邦所認定為『溫和』的團體，其中有一些實在沾不到『溫和派』的邊，因為他們與蓋達組織的意識形態一致」。⁷³英國的國防部長承認，有一些被視為溫和派的團體「其行動也會讓人不以為然，或者與它們結盟的團體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極端主義分子」。⁷⁴

5億美元，4名「溫和派」戰士

當華盛頓方面脫口而出「溫和派」一詞，我們會以為是聽見「抱持多元和民主計畫的世俗主義派」；然而

「溫和派」一詞真正指涉的，是對世俗派敘利亞政府啟動聖戰的戰士，而且他們所獲得的武器，是藉由 CIA 從中調度支援的。若是根據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知，那麼能與「溫和派」一詞勉強拉上關係的團體，恐怕屈指可數。2013年，班·胡巴德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寫道：「在敘利亞，凡是叛軍控制的區域，沒有任何一支世俗派的戰鬥勢力可稱之為溫和派。反對勢力的伊斯蘭特色即反映在叛軍的主要組成分子上：叛軍從一開始就是敘利亞的遜尼派穆斯林多數派在領導的，他們主要是屬於保守且邊緣化的領域」。

依莉莎白·歐貝吉 (Elizabeth O' Bagy) 曾代表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多次深入敘利亞，訪問過叛軍的多名指揮官。歐貝吉告訴胡巴德：據我所知，「沒有所謂的世俗派」，在西方國家眼中，穆斯林社會存在所謂的「世俗主義派敘利亞叛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的伊斯蘭教徒卻覺得這是個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概念。或許，他們是認為西方世界無知，才會有這樣的觀念。在敘利亞國內，遜尼派政治伊斯蘭是復興黨政府統治下最主要的反對勢力。西方世界不了解政治伊斯蘭在阿拉伯世界的角色，對於遜尼派如此強烈的立場更是一無所知，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果說，「溫和派」的意思是親民主政治的世俗主義派，數量會少得可憐。英國前首相大衛·卡麥隆 (David Cameron) 曾號稱有7萬人，這是浮誇之論，不值得一顧。當然，在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眼中，正因為他們為數有限，即使為他們提供武裝也起不了大作用。歐巴馬告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他的執政團隊「很難募集、訓練及武裝人數充裕的世俗派敘利亞反抗軍；歐巴馬承認：『生產能力不如預期』」。某位美國將軍坦承：耗資五億美元的訓練成本，最後只在敘利亞得到四名「溫和派」戰士。這位將軍的言論補強了歐巴馬的說法。羅勃·費斯克也駁斥「溫和派」的概念，批評它簡直就是無稽之談。他寫道：「你能在敘利亞找出700名『溫

和派』步兵嗎？我很懷疑。」而且，「我已經很客氣了，真正的數字可能更接近70人吧」。

在伊斯蘭叛軍背後有多國組成的聯盟，共同提供資助、武裝，並且與他們密切配合，而幕後操作的首席正是華盛頓方面的勢力。華盛頓方面也擔任監督指導的角色，協調武器供應以及決定運送哪些武器、由哪些團體接收。這筆經費由沙烏地阿拉伯負責大部分，卡達、土耳其和約旦也共同分攤。美國也會支付叛軍運作的一部分成本。此外，華盛頓方面和經過篩選的西方國家盟友，也為伊斯蘭戰士提供軍事訓練，地點是在約旦和卡達的基地。土耳其毗鄰敘利亞，土耳其允許伊斯蘭叛軍自由通過邊界；在叛亂發生初期，土耳其更允許自由敘利亞軍從土耳其境內攻擊敘利亞。

在具體作為方面，首先是由美國坐鎮指揮，指派它的盟友們各司其職，分工合作支援叛亂行動；這些盟邦幾乎都是反民主的獨裁專制政權。不止如此，華盛頓方面也透過 CIA，聯手「英國、法國和約旦的情報機構，在約旦及卡達的軍事基地訓練叛亂分子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各項行動的金援，由沙烏地阿拉伯負責其中一大部分」。

2013年，CIA 發起一項秘密計畫，為叛亂分子進行訓練與武裝；此項計畫占美國年度預算將近10億美元。沙烏地、卡達、約旦和土耳其也參與了資助計畫，其中沙烏地貢獻的部分，估計約有數十億美元之譜。到了2015年中，「經由 CIA 培訓、武裝並送入敘利亞的戰士，總數已將近1萬名」。若是將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土耳其的成果合計，它們已經組建的叛軍人數則約有5萬名。

沙烏地金援努斯拉陣線的征服軍，已經行之有年。資助各種游擊隊反抗左派運動以及和華盛頓方面作對的政府，已經是沙烏地王國習以為常的作風。如今它又加入美國的計畫，只是重操舊業而已。

美軍在中東地區最大的基地駐紮於卡達，針對敘利亞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的武裝反抗軍，卡達也貢獻良多。這個酋長國「為突尼西亞、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境內的伊斯蘭教徒提供金援，一向不落人後；它也經常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和它的附屬組織」。⁹⁶卡達王朝並且追隨沙烏地，傾注無數資金贊助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部努斯拉陣線，以及努斯拉陣線成立的征服軍聯盟。此外，卡達還在國內建立基地，專門訓練敘利亞叛亂分子。⁹⁷

伊斯蘭國的關係圈

支持伊斯蘭叛軍對抗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土耳其的角色最為多樣。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本身即為伊斯蘭教徒，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深厚。土耳其政府不僅開放邊界，讓叛軍得以暢行無阻，長驅直入敘利亞；它也資助叛亂分子並提供武器，而且在土耳其為美國成立監督指揮中心，負責調度叛軍。

從2011年開始，土耳其讓自由敘利亞軍在境內駐紮，允許它「在土耳其軍隊保護之下，從土耳其的軍營跨國攻擊敘利亞」。⁹⁸從當時起直到2014年中，安卡拉政府的政策是：「凡是想要進入敘利亞攻打阿薩德政府的，歡迎借道土耳其」。⁹⁹到了2014年中，華盛頓方面認為伊斯蘭國已經尾大不掉，因此土耳其的國界管理應該加強，阻斷新兵流入伊斯蘭團體的管道。

土耳其以軍事力量護航自由敘利亞軍，而且協助聖戰士侵入敘利亞；與此同時，安卡拉政府也「直接與努斯拉陣線往來」。¹⁰⁰記者西莫·赫許指出，「美國的情報部門已經收集了截聽和人員情報，足以顯示埃爾多安不僅長年支持努斯拉陣線，而且……對伊斯蘭國亦然」。¹⁰¹

安卡拉政府並不偏心，它對其他的伊斯蘭叛亂分子也一樣灑錢不手軟。埃爾多安一方面提供武器給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¹⁰²另一方面也樂於贊助CIA的秘密訓練及武裝計畫。¹⁰³

「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是埃爾多安政府的執政黨，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密切。土耳其政府對伊斯蘭叛亂分子的支援不遺餘力，因此正義與發展黨於2015年11月的大選中獲勝時，「各方熱烈慶祝的賀辭湧入，在敘利亞國內的非伊斯蘭國武裝反抗團體，共襄盛舉的不下於十五個。這些恭喜埃爾多安總統的賀辭之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來自蓋達組織分部努斯拉陣線的「征服軍聯盟」。¹⁰⁴

相形之下，約旦的份量雖然較輕，但是伊斯蘭派在敘利亞推翻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的戰鬥中，它也付出重大的貢獻。約旦提供「作戰平台，讓叛軍和他們的外國支援勢力，在敘利亞南部建立了作戰前線」。¹⁰⁵約旦亦參與執行CIA的秘密計畫，在國內成立聖戰士的訓練和武裝基地；約旦當然也少不了贊助CIA的計畫。¹⁰⁶

此外，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開放其補給管道給叛亂分子，供其利用各項資源。這些資源係來自富豪的私人財產和波斯灣國家的龐大金援，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¹⁰⁷

華盛頓方面對武裝叛亂分子的支援，僅限於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以外的團體，因為它已正式將這兩個團體名列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的成立宗旨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的落差甚大，以致美國無法順水推舟與之結盟。反之，努斯拉陣線的野心有限，僅止於推翻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而已；努斯拉陣線的計畫與華盛頓方面的目標顯然較為相似。然而，一旦這些團體已經被烙上恐怖主義的印記，即不可能再獲得美國公然支持。更何況，它們與蓋達組織的淵源頗深，而蓋達組織早已被美國描繪成典型的邪惡化身。

努斯拉陣線雖是蓋達組織衍生的團體，但是它所使用的方法沒有被劃入「恐怖主義」。在努斯拉陣線的個案，美國官方的態度可謂條理分明。美國官員說，他們正式制裁努斯拉陣線，目的是要傳遞出一個信號，那就是美國絕不容忍在大馬士革出現極端伊斯蘭派的政府。然而，努斯拉陣線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即使採取暴力手段對付敘利亞人民，美國官方卻並沒有說不會容忍。因此，努斯拉陣線無論以任何方式對抗敘利亞政府，都不會被譴責是恐怖主義。

將努斯拉陣線歸類為恐怖主義團體，不過是華盛頓方面在政治上所玩弄的權宜之計，目的是塑造對自己有利的局面。而且，華盛頓方面未將自由敘利亞軍列為恐怖組織，雖然這個山寨版世俗主義團體也會使用自殺炸彈客，而且他們在戰場上更是與努斯拉陣線攜手合作，聯手作戰。事實已經證明：這兩個組織的作戰手法相同。

華盛頓方面雖然無法公然支援努斯拉陣線和伊斯蘭國，它的盟友們卻不在此限，華盛頓方面顯然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詹姆斯·斯塔夫瑞迪斯 (James Stavridis) 曾任北約最高聯盟指揮官，他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亞洛斯拉夫·特洛菲莫夫，他並不認為沙烏地、卡達和土耳其對努斯拉陣線的資助，「對美國而言是精彩萬分的表現」。實情確如斯塔夫瑞迪斯所說：「我們當然不可能和努斯拉陣線並肩作戰，然而，換成是我們的盟邦與他們合作，倒是可以接受的。」¹⁰⁶

努斯拉陣線的最大贊助者，或許非沙烏地王室莫屬。長久以來，凡是由於法律限制或者格於形勢，導致美國無法親自出馬的行動，一向仰賴沙烏地王朝拔刀相助。例如，在1970年代末期，CIA因為歷年的濫權事跡被揭發，以致其活動受到的監督越來越嚴格，使CIA的處境日益左右綑。於是CIA轉向沙烏地王室，組織了一個多國聯盟，名為「薩伐旅俱樂部」(Safari Club)，成員有摩洛哥、埃及和法國。這個俱樂部的目的，是代替華盛頓方面在非洲從事地下活動。¹⁰⁷如今華盛頓方面為了推翻敘利亞的左派民族主義政府，再度依靠沙烏地王室出資贊助敘利亞的蓋達組織分部；對華盛頓與利亞德雙方政府而言，這不過是歷史淵源的延續罷了。只要是華盛頓方面認為不宜明目張膽涉入的行動，利亞德方面就會挺身而出。

華盛頓方面不只利用沙烏地作為白手套，支援努斯拉陣線；它也透過相同手法訓練及武裝叛亂團體。這些團體接受努斯拉陣線指揮作戰，但是經過改頭換面以掩藏真正的身分。也就是說，由CIA訓練及武裝的團體，在戰場上與努斯拉陣線既共同作戰，也共用武器。這些團體已經和蓋達組織融為一體，難分彼此。它們可當作努斯拉陣線的軍火供應管道，也能襄助努斯拉陣線對抗敘利亞政府。換言之，CIA所訓練及武裝的叛亂團體，事實上就是努斯拉陣線的戰士，只過他們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組織。CIA的作法可以製造錯覺，讓世人相信華盛頓方面並沒有支援被它正式制裁的團體。

記者派區克·席爾寫道：「世俗派復興黨成立於1940年代，伊斯蘭教徒和復興黨之間的戰火，當時就已經點燃了。敘利亞的叛亂是最為激烈的一次暴動，但我們應該將它看成這一場長年戰事的最新篇章。而且，他們之間的戰爭如今已演變成生死戰，不死不休。」¹⁰⁸艾隆·魯恩德 (Aron Lund) 曾經針對敘利亞的聖戰，為瑞典國際事務研究院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撰寫調查報告。席爾引述魯恩德的報告，指出：「各個武裝叛亂團體的成員，幾乎清一色都是遜尼派阿拉伯人；戰爭的主要戰場，僅限於遜尼派阿拉伯人的地區，阿拉維派、德魯茲派或基督教徒居住的地區，則是顯得被動參戰或者支持政府當局；反叛敘利亞政權的人民，可以說全是遜尼派；伊斯蘭國或支持伊斯蘭國的組織和個人，不斷為叛軍注入金援、武器和志工；這次叛亂運動最為重要的公分母，只有宗教一項。以上種種現象，無不令人感到驚訝不已。」¹⁰⁹

所謂的「溫和叛亂分子」，不過是一樁神話。1963年，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在大馬士革贏得政權，伊斯蘭派的反抗便已開始，延續至今而形成了叛亂。至於伊斯蘭派的反叛，則應該追溯到1945年。當年法國的殖民勢力剛退出敘利亞，各方的在地勢力隨即展開群雄逐鹿，莫不想要取得國家的第一次政權。伊斯蘭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這兩股運動爆發激烈衝突，它們的戰爭持續不斷，終於演化成現今伊斯蘭派對敘利亞政府的叛亂。

到了2005年，華盛頓方面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遂與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狼狽同盟，合力要推翻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但是，美國的戰略家卻遇到了**公關難題**。華盛頓方面豈可公然支持好戰的伊斯蘭派？觀諸九一一恐怖攻擊，華盛頓方面正式向恐怖主義宣戰。企圖推翻世俗派敘利亞政府的聖戰士，與九一一恐攻的恐怖分子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既然華盛頓方面已對恐怖主義宣戰，即等於同時也向敘利亞的聖戰士宣戰。華盛頓方面所宣戰的對象，是使用恐怖主義手段的伊斯蘭教徒。然而，與敘利亞政府對戰的叛亂分子，也是使用恐怖主義手段的伊斯蘭教徒。為了擺脫進退兩難的困境，華盛頓方面精心擊劃了一場騙局：由美國直接供輸武器給蓋達組織在敘利亞分部的戰士，假使會有諸多不便，那麼就改由它的眾多盟友聯合承擔這項任務。

此外，美國也會對聖戰士提供訓練、武器和金援，再由他們配合蓋達組織作戰。不過，這批聖戰士將會被冠上「溫和派」的頭銜，藉以造成幻覺：讓世人以為美國所支持的對象，僅限於世俗派的軍力，而且他們的目標都是為了實現民主和多元政治。這個幻覺和另一則更巨大的神話遙相呼應：那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崇高的美德，其動機恆是基於神聖而超凡的宗旨。以敘利亞案例來說，美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協助達成阿拉伯之春的目標，在中東和北非實現民主政治。

但是，誠如我們所見：相較於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世界的盟邦，敘利亞是更接近西方模式的多元、多黨制民主政治國家。而且，執政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已在2012年修憲，同意複數候選人制的總統大選。如此一來，距離西方模式的民主又跨近了一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極大的反諷：敘利亞國內發生的叛亂，若真的是代表人民對民主政治的吶喊，它應該是發生在其他阿拉伯國家才對。至少以西方國家的標準而言，那些阿拉伯國家的民主早已滅頂。

這一場叛亂的真正動機，其實是為了推翻敘利亞的民主政治，並以反民主的伊斯蘭國取而代之。

在阿拉伯世界，支持這場叛亂的國家盡是反民主政治的君主政體。再者，儘管華盛頓方面夸夸而談支持敘利亞的民主，它實際上支持的卻是蔑視民主的聖戰士；而聖戰士在阿拉伯世界所得到的支援，全是來自國王、國君、埃米爾和蘇丹，這些統治者也同樣都不屑民主政治於一顧。

復興黨的伊斯蘭盟友
THE BA'ATHISTS' ISLAMICALLY

伊朗究竟是「國家或事業」？這是伊朗不斷面對的抉擇。

在中東地區，有兩個被正式認知的伊斯蘭國，它們在敘利亞的衝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它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附庸國，也是絕對君主政體的國家。另一個是遭到美國敵視的伊朗。伊朗是反對君主政體的國家，它的政治統治基礎，是由教士監督的代議制民主。

石刑 vs. 消滅帝國主義憲法

沙烏地阿拉伯皇室幾乎已經和美國的金融界精英階級合為一體，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完全配合華盛頓方面的意向，為保衛及提昇美國的無形帝國而不遺餘力。至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它誕生於揭竿反抗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政府。巴勒維是美國扶植的君主，代表美國的利益治理伊朗。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則是在憲法中承諾，要「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及防止外來勢力的影響」。

沙烏地管轄麥加和麥地那兩處穆斯林聖地，渴望能領導遜尼派伊斯蘭。美國是沙烏地的保護國，因此沙烏地無時無刻不是竭盡其所能為保護國的利益而努力。相反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卻賦予德黑蘭使命，「務必勵精圖治，實現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統一」，以求擺脫「霸權主義超級強國」所加諸的「一切形式統治」。

沙烏地奉行原教主義形式的伊斯蘭，禁止女性駕車、隔離兩性，而且規定以斬首、釘十字架和石刑 (Lapidation；以鈍石擊斃) 等手段懲罰罪犯；沙烏地認可這一類中古世紀的惡行，認為它們是祛除邪惡的魔法。在伊朗則不同，女性穿著罩袍，但是可以駕車以及和男性一起工作。

沙烏地強烈排斥什葉派，而且鼓勵仇視什葉派的情緒。伊朗的領導階層雖然以什葉派為主，卻極其小心地避免教派主義，對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協助一視同仁。伊朗也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派運動；這些運動以反抗外來勢力的控制為目標，如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以及巴勒斯坦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 均是。

沙烏地斥資數十億美元武裝及訓練遜尼派聖戰士，目的是推翻大馬士革的復興黨政府。伊朗則是提供敘利亞政府資金、武器、軍事顧問、民兵，甚至是正規的特種部隊人員，協助敘利亞抵禦以美國為首的戰爭，捍衛獨立自主。聯合國派往敘利亞的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圖拉 (Steffan de Mistura) 估計，伊朗每年向敘利亞提供的軍事與經濟援助，金額高達 60 億美元。

伊朗憲法所頒佈的國家目標有：「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及防止外來勢力的影響」、「在科學、技術、工業、農業和軍事領域，達到自給自足」，以及「規劃正確而公平之經濟秩序……以創造社會福利、消除貧窮及廢除糧食、住宅、工作、醫療保健等一切形式之剝削，並且提供全民社會保險」。世上有多少國家的憲法是以消滅帝國主義為目標？遑論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世上有多少國家願意承諾消滅貧窮、糧食短缺、不當住宅，以及醫療保健的剝削？再者，世上又有多少國家公開聲明反對帝國主義，並且指定糧食安全、庇護和醫療保健等人民需求，將之視為政府的職責？這樣的國家竟然讓華盛頓方面充滿敵意。難道帝國主義和對於福利國家的憎恨，在美國已是被崇拜的美德？

雖然伊朗是伊斯蘭共和國，而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拉克則是世俗派國家，它們同樣都在憲法中承諾，國家的運作係以三個廣泛的領域為依歸：亦即促進統一；脫離外來勢力影響，達到獨立自主；以及利

用國家之力指揮經濟發展，克服殖民主義留下的落後開發後果，提昇全民福祉。這些共同點其來有自：它們都曾經有過被外來強權國家統治的歷史；它們都曾經奮鬥不懈，只求能擺脫外來控制；而且，它們都努力避免國家再度淪入新殖民主義之手。復興黨的座右銘是「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它雖然並未明文載入伊朗的憲法，卻已隱含在其中。

促進阿拉伯民族的團結統一，是各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均高度重視的目標。它本身既是目的，也是全面動員阿拉伯世界資源的手段。阿拉伯的資源西起大西洋、東至波斯灣，有助於阿拉伯自決計畫，使成功實現的機會達到最大。伊斯蘭派伊朗固然也強調促進統一之重要性，但是身為伊斯蘭國，其焦點是穆斯林世界的統一，而非以民族和語言為基礎的小範圍整合。因此，敘利亞復興黨憲法的承諾，是大馬士革政府將致力於「支持阿拉伯世界合作，促進整合及達成阿拉伯民族統一」；伊朗的憲法則是責成德黑蘭政府「務必勵精圖治，實現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統一」。

德黑蘭的重心集中於泛伊斯蘭主義（不同於敘利亞的泛阿拉伯主義），同時伴隨著一項普世的承諾，亦即願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奮戰。伊朗的憲法宣告，它將支持「全球每個角落」[*mustad'afun*（被欺壓、低下階層、溫和的人民）]「對抗 *mustakbrun*（驕傲而強大的勢力）」，「進行公平的戰鬥」。憤世嫉俗的酸民或許會批評：所謂承諾與被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只不過是漂亮卻空洞的詞藻。首先，西方的政治分析家們並不盡然確定這些字眼是空洞、沒有內涵的。

至少，有一名伊朗專家曾經提到：「伊朗究竟是『國家或事業』？這是伊朗不斷面對的抉擇」；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德黑蘭方面的領導階層對其承諾的態度是嚴肅的。當前的世界狀態並不能歸咎於伊朗，而伊朗要難如登天，甚至已經常常讓它覺得是癡人說夢。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阿里·哈米尼（Ali Khamenei）是目前伊朗的最高領袖，他自稱是「革命派」。他的外交政策，一如美國的國會研究服務處所下的結語，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基於以上理由，伊朗在憲法中宣告支持被壓迫的人民，其承諾即不應被我們視為譁眾取寵的言論。其次，伊朗支持大馬士革的復興黨政府，即足以證實我們的看法：伊朗的領導階層正視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並且支持以公平鬥爭的方式，對抗高傲而強大的勢力。

德黑蘭方面是巴勒斯坦自決抗爭的有力支持者，這個例子可以歸因於伊斯蘭教徒徒想統一伊斯蘭世界的渴望。將猶太復國運動所建立的國家逐出伊斯蘭的歷史領土，徹底改變耶路薩冷被猶太化侵犯的現狀，保存「穆斯林聖所」（*Haram al-Sharif*）遺址，亦即據信先知穆罕默德升天之處，這將會是穆斯林世界重新整合的一項重大成就。但是，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都是穆斯林，而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民以穆斯林為數最多，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那麼伊朗支持巴勒斯坦人所追求的目標，只是為穆斯林著想嗎？答案幾乎是肯定的。被以色列遷占者趕出殖民領地的居民中，也有非穆斯林。德黑蘭方面不太可能為他們提供相同程度的支援，讓他們不至於在穆斯林世界以外流離失所。

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後來加入遜尼派聖戰士陣營，共同對抗德黑蘭方面在大馬士革的盟友。但是在此之前，德黑蘭方面一向大方資助哈馬斯，世俗派的 PFLP 卻輪不到。敘利亞的復興黨曾經是哈馬斯最熱情的支持者之一，同意哈馬斯派政治勢力在大馬士革成立辦事處。因為這項決定，大馬士革方面必須承擔美國還有它的軍事代理人以色列的不滿；即使這兩個國家相加，實力比敘利亞還要強大數倍有餘，亦在所不惜。哈馬斯的想

法是：有機會在敘利亞參與建立遜尼派伊斯蘭國，比起和長年的支持者站在同一陣線，前者的誘因更大。哈馬斯的領導階層可能會認為，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建國之後，會像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一樣，支持哈馬斯。伊朗、敘利亞和真黨等，都是美國能否完全控制中東地區的阻力，被稱為「反抗軸心」。

無論如何，哈馬斯一脫離反抗軸心，德黑蘭方面隨即轉而提供「資金和後勤支援給 PFLP 的政治和軍事部門」。PFLP 不算是伊斯蘭派，它的主張，是在巴勒斯坦這一片歷史古地上，建立單一的世俗民主國家，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均可享有平等的權利。換言之，這是屬於所有人的民主國家，而不是給猶太人的民主國家，或是給阿拉伯人的猶太國家。德黑蘭方面對 PFLP 的看法，和華盛頓方面對敘利亞伊斯蘭戰士的看法，極有可能非常相似；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固然令人反感，卻不失為有用的武器，可用以對付共同的敵人。

犯下天條的石油政策

伊斯蘭革命的承諾，是從外來勢力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也有類似的承諾，二者稱得上此呼彼應。第一個例子是：「任何形式的協議，凡是允許外國公司控制國內的天然資源、經濟、軍隊或文化」，均屬違憲，因此都在伊朗的禁止之列。

所以，在伊朗境內不得設立外國的軍事基地；這項作法和它的波斯灣鄰國卡達、巴林、科威特、阿曼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異其趣，它們對美國軍隊可說是倒屣相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利比亞，驅逐了靠近的黎波里的美軍基地；復興黨執政的伊拉克以及敘利亞同樣不允許美國在境內建立軍事基地。最重要的是：敘利亞、

利比亞、伊拉克和伊朗，它們都曾經有過直接或間接受外國勢力控制的歷史。總之，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下的三個阿拉伯共和國，加上在伊斯蘭派統治下的伊朗共和國，皆同聲反對外來勢力入侵它們的內政。相反地，波斯灣國家一貫都是世界首席強權國家的附庸，先是英國，再來是美國。

義大利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洛蘇爾多 (Domenico Losurdo) 認為，自從 1990 到 1991 年的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以來，美國的一連串侵略行動其實都只是同一個行動，亦即以美國為首的全世界再殖民化戰爭。華盛頓方面堅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重要」而且「不可或缺」、堅信它有能力和也將會「領導全球的經濟」，以及它將「動員全世界配合」美國的行動；以上種種當然完全對應洛蘇爾多的論點。

華盛頓方面積極要將伊朗納入它的控制之下，最重要的事件當屬 CIA 於 1953 年策劃的政變。當時伊朗總理穆罕默德·莫沙德決定將石油產業國有化，一舉得罪了美國和英國；於是 CIA 即著手推翻莫沙德的行動。本書在前面章節已經提過，這場政變是由克爾密特·羅斯福所安排的。

短短幾年後，羅斯福重作馮婦，又草擬了一份計畫，欲顛覆大馬士革政府的共產黨與復興黨三人領導中心。《華盛頓郵報》報導：「據解密文件所記載，CIA……承認：推翻莫沙德『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行動之一，在 CIA 的指揮之下完成。此行動係由美國政府最高層峰構想及核准』，並有英國祕密情報機構從旁提供協助。」「美國和英國從不曾因為策動政變而道歉」；莫沙德的目的，是利用伊朗的石油資源造福伊朗人民，**不允許西方國家的投資家鯨吞伊朗天然資源的利益**。莫沙德因此被推翻，利比亞的格達費也因為犯了同樣的反帝國主義「天條」，賠上他的性命。伊朗是一個活生生的鮮明實例，美國對伊朗的外交政策證明了一個事實：美國的利益（具體來說**是和攸關美國企業的利益**）和伊朗的利益是水火不容的。伊朗和美國的利益衝突，導致伊朗的政治和軍事領導階

層，堂堂進入華盛頓方面推動變天的打擊名單。美國官方決心要扭轉伊朗的經濟，將主要利益從伊朗轉向美國的銀行、企業和投資家。有鑑於此，在伊朗的革命派眼中，「美國在波斯灣和其他環繞伊朗的國家，保持大量軍事部署」，正反映了美國對伊朗革命的敵意，而且企圖伺機剷平伊朗革命。

哈米尼峻拒「伊朗融入全球經濟」的要求；同時緊密依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的呼籲：「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及防止外來勢力的影響」和「在科學、技術、工業、農業和軍事領域，達到自給自足」。伊朗憲法明文規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在其他依據之外，將以「防止外國經濟操控本國經濟」為基礎，並藉由經濟規劃「達到國家經濟自主，免於一切依賴」。根據哈米尼的願景，德黑蘭政府將致力於「伊朗的科學與技術之進步發展，以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再以自給自足之科技，進而達到經濟之獨立自主；最後是以獨立自主之經濟，達到政治之獨立自主」。德黑蘭方面欲脫離外來勢力控制的決心，呼應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計畫，亦即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免於外來強權控制，最後達成政治自決的目標。

根據 CIA 的說法，伊朗領袖雖不可能以「社會主義」一詞形容伊朗的政治經濟體系，但是伊朗的經濟「特色正是社會主義政策」。伊朗政府直接擁有及控制數百家國營企業，同時亦能間接控制許多公司。美國的情報機構指稱：在伊朗，「民營企業的活動」，僅限於「小型的工廠、農場、部分製造業，以及服務業，此外還有中型的建築、水泥生產、採礦和金屬加工業」。美國銀行、企業和富有的投資家想要從中獲取可觀利益，機會只能緣木求魚。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承諾，德黑蘭政府將「規劃正確而公平之經濟秩序」，其目標在於促進社會福利、消除貧窮及廢除「糧食、住宅、工作、醫療保健等一切形式之剝削，並且提供全民社會保險」。伊朗的經濟結構分為國家、企業和私人等三個領域：國家領域「包括所有大型和母產業、外貿、主要礦產、銀行、保險、發電、水壩和大型灌溉網絡、廣播電視、郵務、電報和電話業務、航空、航運、公路、鐵路，其諸如此類者」。以上這些產業均為國有，由國家經營管理。至於私人領域，它是附屬於國家和企業兩個領域之下，僅為補充性質。美國始終堅持：各國應迎合美國的投資者、銀行家和企業，創造開放的機會；然而，伊朗的經濟絕對談不上是對商業友善、親外國的投資環境。

伊朗憲法也載入許多經濟權利，再一次抵觸美國的經濟信條。有史以來，華盛頓方面對於公民和政治自由上的人權，都限制了它的定義。為了和反種族主義的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一爭高下，美國才被迫修正，廢除了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隔離政策；雖然當時南方各州還沒有發明「種族隔離」這個詞。但是在法律意義上，這項修正直到 1960 年代中期才算徹底竣工。美國政府拒絕將經濟自由和資格列為正式承認的權利，伊朗和美國的信條又恰好反其道而行。伊朗定義的「社會安全」，它包括的層面有「退休、失業、老年、殘障、孤兒，以及和受困、事故、保健服務、護理照顧與醫療等有關的受益」，而且認定社會安全屬於普遍權利，應由「國家財政收入及公共捐贈所獲得資金」支付。

以上這些，美國官員可能會支支吾吾地說：這是「蘇俄模式」。

華盛頓的伊斯蘭盟邦
WASHINGTON'S STATE
ISLAMIC ALLIES

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兩個王國，當然是在美國面前百依百順的國家，與美國企業階級的配合更是無以復加。因此，它們都拿到自由通行證。相反地，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下的利比亞，它並不是處處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利比亞的「資源民族主義」激怒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進而讓美國國務院也隨之龍心不悅。

大部分西方人都記得阿拉伯之春，記得這一場抗議活動感動了阿拉伯共和國，從突尼西亞到埃及、葉門，當然也包括利比亞及敘利亞。很少人記得，或者根本不知情：這一場動亂也發生在大部分阿拉伯君主國家。

「沾滿血腥的雙手」

在沙烏地阿拉伯（全世界最大的美國軍火買家）、巴林（從1800年代早期開始，直到1970年代，都駐紮了英國海軍基地；1970年代起成為美國第五艦隊所在地）、科威特和阿曼（兩國均有多處美國的軍事設施），都發生過抗議活動。抗議者要求終結君主政體、過渡到代議民主政體，以及更公平的資源分配。

波斯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埃米爾、蘇丹和國王等，無不是以鐵腕之道治國；華盛頓方面對於這些國家倒是寵愛有加，還與它們互相結盟。針對皇室專制獨裁者而起的抗議活動，在西方國家媒體所受到的關注，相較之下遠遠少於對利比亞和敘利亞國內動亂的報導。媒體報導利比亞和敘利亞這兩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的叛亂時，充滿大義凜然的媒體架勢；論及上述國家的動亂，則一概避重就輕，不再義正詞嚴。我們不斷聽到利比亞和敘利亞政府如何以致命武器弭平國內的失序狀態，波斯灣王國動用國家的武裝力量鎮壓內部的起義行動，卻很少有媒體關心。格達費與阿薩德毅然採用國家的強制力量制伏武裝叛亂，西方國家的記者及評論家紛紛祭出高道德標準，嚴加撻伐；沙烏地王國派出坦克，揮軍進入巴林掃蕩抗議行動，同一批記者和評論家則噤聲不語。西方媒體妖魔化敘利亞和利比亞當局，痛斥它們是野蠻的禽獸，殘忍屠殺剛剛萌芽的民主運動；遇到沙烏地當局的相同行為，他們卻是以「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不拘小節的說詞，為這些君主國家的行為開脫，視之為權宜之道。

例如《紐約時報》記者伊森·布羅納（Ethan Bronner）就從巴林君主政權的角度撰文，寫道：「巴林遜尼派指出，鎮壓是唯一選項」。然而，不僅是《紐約時報》，任何一家西方大報也都見不到從利比亞或敘利亞政府的觀點，刊登過一篇報導。在這些媒體，類似這樣的標題：「利比亞政府指出，鎮壓是唯一選項」或「敘利亞政府指出，遏止伊斯蘭派叛亂是唯一選項」，確實都是難以想像的。

布羅納的角色儼然已是巴林君主政權的公關代表，他解釋道：

「對於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來說，過去一週以來的種種事件：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鄰國的2千人軍隊抵達、宣告戒嚴、珍珠廣場（Pearl Square）強制清空、軍隊接管主要軍醫院，以及隨後惡意拆毀珍珠塔（Pearl Monument），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專制獨裁政府，在絕望之餘做出來的殘忍行為。但是，對遜尼派而言，他們雖占全國公民的三分之一，卻擁有國家的主權公器，當國家面臨的混亂狀態不斷惡化，已經威脅到國家的生計和未來，以上的行動都是遜尼派不得已的唯一選擇。」。

《紐約時報》的記者海琳·庫珀（Helene Cooper）和羅勃·沃斯（Robert F. Worth）做了一篇現實政治傾向的報導。媒體報導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時候，偏愛道德上的口誅筆伐，在這裡卻利用現實政治的遁詞巧妙避開了。他們寫道：

「3月14日，白宮官員遭遇了一次令人不悅的震撼：沙烏地竟然率軍入侵巴林，接著是安全部隊以強力鎮壓的方式清空首都麥納瑪（Manama）的珍珠廣場……歐巴馬總統……對此僅提出含蓄的批評。歐巴馬總統的態度含蓄，其理由十分清楚：巴林就位於沙烏地的海岸外不遠，沙烏地豈容一水之隔處赫然開出民主政治的花朵……而且，美國在巴林設有海軍基地……對於維護當地的石油運輸，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抨擊大馬士革政府動用維安武力遏止動亂，另一方面顧左右而言他，無視巴林君主政權以血腥手腕鎮壓要求民主的抗議者；有這種作風的西方政府不止美國一個，英國也是雙重標準的國家之一。

英國既譴責阿薩德的手段背離正道，又對巴林的鎮壓行動視而不見。但是，英國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華盛頓方面至少對麥納瑪政府有過一番虛情假意的責備，英國卻逆向操作。當巴林版的阿拉伯之春爆發，沙烏地阿的坦克浩浩蕩蕩駛入巴林首都滅火。事成之後不久，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即邀請巴林國王哈馬德（King Hamad）參加威廉王子和凱特·密道頓（Kate Middleton）王妃在2011年4月舉行的大婚典禮。同年5月，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宴請巴林皇儲，在「唐寧街10號」的首相官邸門口親迎貴客光臨。當雙方熱情又堅定地握手致意，直讓「沾滿血腥的雙手」一詞有了全新的意境。

此外，英國皇室成員以及政客更是接踵而至巴林王國，傳達英國的慇懃諂媚。例如：查爾斯王子和卡密拉夫婦、國際貿易部長利亞姆·福克斯（Liam Fox），還有外交部歐洲事務國務大臣艾倫·鄧肯爵士（Sir Alan Duncan），都曾經絡繹不絕於途。記者派屈克·寇克朋因此感到困惑：英國政府投入「如此多的時間和心力，只為了和巴林的統治者培養良好關係」，所為何來？在他看來，巴林這個國家「對於批評者動輒以監禁或酷刑款待，早已惡名遠播」，至於以暴力血腥手段鎮壓要求民主的街頭抗爭活動，更加證實它的臭名並非空穴來風。寇克朋自問自答，指出英國積極和巴林的暴政統治者拉近關係，目的無非是要利用巴林作為它的虛擬航空母艦，長期駐紮在波斯灣。果然皇天不負英國人，巴林的血腥獨裁政權同意英國皇家海軍進駐，為英國海軍基地的擴張買單。

還有一個事實也同樣重要：巴林開放商業市場，所有條款都能讓西方投資家讚不絕口。巴林張開雙臂歡迎外國投資，其他國家堅持外來投資家必須與當地人合資，巴林則是避而不談。關於獲利匯回本國，完全不受設限，在貿易方面也只有少許條件。巴林王國承諾勞動市場會充滿「彈性」，既未規定最低工資，其社會福利計畫也乏善可陳；如此一來即可維持低賦稅，勞工也會急於就業。在巴林除了石油公司，企業不必繳納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則僅有百分之三。銀行業也門戶洞開，全國有超過四百家私人銀行和金融機構成立。在經濟制度上，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民族主義派政府堅定實施國有企業制，外資的企業所有權和貿易範圍都受到限制，還有健全的社會福利方案和累進制稅收制度，在在都和巴林王國的走向南轅北轍。

阿拉伯之春裡的兩種國家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在現實世界，一部分只在抽象的語言文字裡。波斯灣國家的君主政權，歡迎有關利比亞和敘利亞兩國的阿拉伯之春論述，對於發生在自家門前的現實阿拉伯之春，則是務必斬草除根。這些國王的贊助人，從美國官方到廣大的西方世界各個大國，也都有志一同：他們熱愛阿拉伯之春的虛幻詞藻，並且加以提煉、捏塑。他們也確實會衷心捍衛這樣的修辭，再將它行銷全球，就像是賣蘋果的智慧型手機和好萊塢的電影。但是，他們以更大的熱情銷售那一套修辭，而且將它和兩個阿拉伯國家緊緊掛鉤；那兩個國家至今仍不屬於美國的管轄範圍，而且也不願意進入。

至於那些已經歸降美利堅帝國的國家，阿拉伯之春是勢必要被徹底消滅的，從舌綻蓮花的修辭形式到有血有肉的真實行動，任何痕跡都不得留下。在那些國家，無論是要推翻傀儡型國王、對殖民國家奴顏婢膝的埃米爾和蘇丹，永遠都不會得到華盛頓方面以及西方媒體評論家一絲一毫的同情。

一名美國的資深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庫雷格·惠特洛克 (Craig Whitlock)：「不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嚴厲譴責到底」，然而「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給予自由通行證」。姑且不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有多麼娓娓動聽，它的真正主旨，盡在這言簡意賅的一句話中表露無遺。

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兩個王國，當然是在美國面前百依百順的國家，與美國企業階級的配合更是無以復加。因此，它們都拿到自由通行證。相反地，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下的利比亞，它並不是處處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利比亞的「資源民族主義」激怒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進而讓美國國務院也隨之龍心不悅。任何外國政府，若是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堅守石油公司的底線，不但會惹惱美國的石油大亨，美國國務院亦絕對不會善罷甘休。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敘利亞，也是完全不願意歸順美國的國家。它推崇復興黨的三大價值，亦即阿拉伯世界統一、脫離外來勢力控制，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因此，華盛頓方面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的譴責也就不留餘地了。

根據《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大衛·桑格的觀察：沙烏地阿拉伯鎮壓「異己和言論自由」，而且允許「國內的精英階級資助伊斯蘭派極端分子」，然而「美國……往往不願意正視」。反之，在2011年的暴動中，敘利亞政府以武力壓制武裝伊斯蘭派，華盛頓方面即安排管道供輸武器給聖戰士，意圖推翻世俗派政府。《紐約時報》記者馬克·馬徹提 (Mark Mazzetti) 和麥特·阿普佐 (Mark Mazzetti) 指出，沙烏地阿拉伯與華盛頓方面的合作方式五花八門。這些合作關係足以說明：即使沙烏地阿拉伯犯下眾多暴行，「何以美國從來不願意為此公開批評沙烏地阿拉伯」。他們歷數這些暴行，其中即有：斬首沙烏地的傳教士尼姆爾·尼姆爾，因為他領導阿拉伯之春的遊行示威，挑戰沙烏地皇室反民主的暴政；沙烏地的厭女癖（美國一向自詡為世界人權鬥士，應該無法坐視厭女癖吧）；還有，沙烏地「支持伊斯蘭的極端派瓦哈比主義……美國正忙於應付的恐怖主義團體，其中有許多正是受瓦哈比主義啟發的」。馬徹提和阿普佐認為，有三個理由讓華盛頓方面能容忍這些惡行：亦即沙烏地阿拉伯有龐大的石油礦藏；它是穆斯林世界遜尼派的精神支柱；以及它長期以來在情報工作方面與美國的合作關係。

沙烏地阿拉伯蘊藏龐大的石油，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各大石油公司巨大利潤的來源。除此之外，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收入，同樣為了迎合美國銀行和企業的利益，被沙烏地王朝大量用於投資。其中包括美國的軍火工業，沙烏地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戶。他們也用出售石油的巨額收入，資助美國外交政策的各種計畫，例如，支援埃及的軍事獨裁政權和巴林的君主政權，以及在1980年代時為阿富汗的聖戰士購置武器，對抗在阿富汗的蘇俄勢力。其他不勝枚舉。不止如此，正因為沙烏地坐擁龐大的石油儲量，它可以配合山姆大叔和他的企業主階級的利益，自由調節產量，控制全世界的原油價格。

沙烏地阿拉伯自命為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精神支柱，這一角色對於華盛頓方面有雙重意義。歷史學家大衛·莫他德 (David Moradel) 曾經寫道：非穆斯林強權國家捲入伊斯蘭世界之後，均會處心積慮動員伊斯蘭，協助其對抗敵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與鄂圖曼帝國結盟，德國皇帝凱薩·威廉二世 (Kaiser Wilhelm II) 即曾藉由鄂圖曼帝國的最高宗教當局地位，「安排一場泛伊斯蘭聖戰的宣示」，對抗協約國。「在戰爭期間，用威廉二世的話來說，柏林與君士坦丁堡雙方均付出極大的心力，煽動『整個穆罕默德的世界瘋狂反抗』英國、俄羅斯和法國帝國」。¹¹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籠絡了穆斯林世界的各個精神支柱，「在敵軍後方製造動亂不安。其中最著名的，是針對蘇聯邊界不穩定的穆斯林。德國也針對英國（隨後及於自由法國 (Free French) 軍）在非洲、中東及亞洲的殖民統治地區，故技重施」。¹²

「在軍事衝突中」，動員伊斯蘭「於對手或敵軍勢力統治的區域挑起動亂、分裂和叛變，亦可藉機征服及平定被占領區域」，¹³這種作法並非德軍所獨有。「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法國和鄂圖曼帝國均曾經試圖煽動克里米亞半島及高加索地區的穆斯林。」¹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也曾極力動員「全亞洲的伊斯蘭，對抗英國、荷蘭、中國和蘇俄」。義大利曾經為了對抗墨索里尼而吸收伊斯蘭教徒，意圖使他不可能擺出「伊斯蘭保護者」的姿態。¹⁵

為達政治目的而動員伊斯蘭，在這方面美國也不是新手。美國有過一次聞名的行動，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所述：那是「在蘇俄進軍阿富汗之前半年，美國情報機構已經開始援助阿富汗的聖戰士……讓俄國人在阿富汗陷入泥淖」。設計這個圈套的人正是布里辛斯基。1998年時，布里辛斯基告訴《新觀察家》週刊：「蘇俄正式通過阿富汗國界那一天，我致函卡特總統，大意是說：『現在是天賜良機，讓我們為蘇聯雙手奉上一次越戰』」。美國在阿富汗對上蘇俄以及它的世俗派盟邦，沙烏地是美國的作戰工具。1980年，布里辛斯基「和沙烏地達成協議：沙烏地每金援阿富汗反抗軍一里亞爾，美國也會相對投入一美元」。¹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鄂圖曼帝國是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領袖。德皇凱薩即利用德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同盟關係，動員伊斯蘭以謀取德國的外交利益。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為了世俗目的而動員宗教力量，這已稱得上具有悠久的傳統。德國是其中一個實例，華盛頓方面也毫不遜色。沙烏地是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精神支柱，華盛頓方面亦與沙烏地結盟，動員遜尼派伊斯蘭為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效命。

遠方的敵人與鄰近的敵人

沙烏地對華盛頓方面的第二重、也是息息相關的意義，是沙烏地王室具有令人信服的地位，有足夠份量宣告成為遜尼派伊斯蘭的領導人。這一點對華盛頓方面來說非常重要。它的功用之一，是**成為全世界穆斯林的第二名領導者；也就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分庭抗禮**。如我們所見，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迥然不同，對於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領導地位始終嗤之以鼻。

德黑蘭與利亞德兩個政府之間的關係，最好的情況止於相敬如冰。在西方國家的相關論述中，到處可見將它們類比為正統與非正統伊斯蘭教派的古老仇恨，但這是大錯特錯的引申。正統與非正統伊斯蘭誰能合法繼承穆罕默德，成為統治者哈里發，雙方為此僵持不下。但**德黑蘭與利亞德之間的仇恨，並非源自教派之爭。關於穆斯林世界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控制，他們的態度針鋒相對，才是真正的根源**。伊朗革命推翻華盛頓的代理人沙王，突破了伊朗對西方國家唯命是從的處境；伊朗革命代表穆斯林世界對於恢復獨立自主的渴望。沙烏地王室的態度則截然相反：美國的勢力君臨伊斯蘭世界，沙烏地王室絲毫沒有意願帶頭反抗。沙烏地王室能成為阿拉伯的統治者，是因為得到英國的支持，後來又變成美國提攜照顧的附庸小弟。他們接受五角大廈的保護，而且實際上已然躋身美國的經濟精英階級。他們若是反對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控制，將會有百害而無一利。沙烏地人民受王室壓迫而怨聲載道，甚至認為他們的政權不過是一場詐騙。若非美國，誰能保護沙烏地王室高枕無憂？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官員羅勃·巴爾曾經寫道：紹德（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國王「無法保護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同胞，在伊斯蘭受到污辱的時候，則是無助地袖手旁觀，因此飽受譴責」。¹⁸沙烏地人民相信：「石油帶來的財富使王室家族腐化，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領導階層同意美軍堂而皇之進入沙烏地王國的土地，更是褻瀆伊斯蘭信仰」。¹⁹許多具有政治意識的遜尼派穆斯林看破了沙烏地王室的面紗，因而造就蓋

達組織興起，以及穆斯林世界宣稱出現第三名精神支柱，也就是伊斯蘭國。

蓋達組織與它的後裔伊斯蘭國，都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一樣，以反帝國主義為宗旨。這兩個遜尼派組織均致力於削弱西方國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而它們的手段是攻擊海外的西方國家目標（即「遠方的敵人」）。它們的攻擊具有雙重目的：首先，是迫使西方政府從穆斯林世界撤軍；其次，則是施壓西方政府放棄支持當地的政權。這些與西方國家裡應外合的在地政權，名義上是穆斯林政府，其實是西方國家的附庸國（即「鄰近的敵人」）。依蓋達組織的定義，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鄰近敵人的具體代表。

反什葉派的瓦哈比意識形態，對伊斯蘭國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影響所及，雖然什葉派伊朗也同樣是反帝國主義的伊斯蘭，伊斯蘭國卻是完全以人廢言。伊斯蘭國最大的死穴或許在於教派主義，教派主義同時也是它最顯著的特色。蓋達組織的分支對「邪教徒」深惡痛絕，即使是蓋達組織的領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Zawahiri）也對此不以為然；更精確地說，是認為不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自封為哈里發，他曾頒佈一套對伊斯蘭的講解。根據伊斯蘭國的標準，凡不贊同巴格達迪的人，即使是穆斯林也算是無信仰者。

從伊斯蘭國到土耳其

伊朗人很睿智地拒絕教派主義，其理由顯而易見：反帝國主義、團結穆斯林是伊朗革命所迫切要實現的目標，然而喚起教派主義將會摧毀一切希望。（阿薩德和薩達姆等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支持世俗主義，進且成為堅定不移的世俗主義派，他們的理由可以和和伊朗等量齊觀：若非如此，絕無可能將阿拉伯人團結成渾然一體的強大政治

力量，無法使阿拉伯人不僅是一個民族，更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且，伊朗屬於少數族群穆斯林，伊朗的領導者不可能以教派措辭吸引遜尼派這個穆斯林多數派。

在敘利亞的阿薩德亦然：他希望在大馬士革建立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穩定統治基礎，即不可能追求世俗阿拉維派的教派計畫。然而更重要的是：伊斯蘭革命並未訴求教派認同，因為革命的目標無關乎教派。伊朗革命的目標，是先求達到伊朗的經濟與政治獨立自主，其次是及於全體穆斯林的獨立自主，並非獨厚特定的伊斯蘭教派。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第71屆的聯合國大會說：在「穆斯林人民」之間，「任何教派主義以及利用任何手段促進宗教」差異者，「伊朗均不贊同」。這一點和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斯蘭國的目標，形成強烈對比。以沙烏地來說，它非常有必要推廣伊斯蘭的遜尼派原教主義詮釋。正當魯哈尼在聯合國大會否定教派主義，有兩百名遜尼派穆斯林傳教士，包括來自埃及的遜尼派阿茲哈爾大教長（Grand Imam of al-Azhar）艾哈邁德·塔伊布（Ahmed el-Tayeb），也在俄羅斯的格羅茲尼（Grozny）聚會，他們確實也譴責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教瓦哈比主義是在促進教派主義。²¹

終結西方國家在穆斯林世界的優勢地位，是伊朗的首要目標，而在伊斯蘭國則並非如此。它當然也是伊斯蘭國的目標之一，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它只是次要，談不上主要目標。反之，伊斯蘭國最關心的，是使穆斯林世界全面皈依清教主義式的遜尼派伊斯蘭；而且，伊斯蘭國將以武力為手段達成其目的。十八世紀以來，阿布多·瓦哈比和本·阿勒·紹德（Ibn al-Saud）即在阿拉伯世界屠殺無信仰者，伊斯蘭國只是他們的二十一世紀版本。巴格達迪的目標若是全面實現，阿拉伯世界將依中世紀遜尼派所詮釋的伊斯蘭而治國，一如已往的沙烏地阿拉伯。然而，沙烏地是君主政體的政府，而且甘為非穆斯林強權國家的隨從，這些均是巴格達迪的政治伊斯蘭在所反對

的，因此二者大有分歧。

然而重要的是：就巴格達迪的理解，伊斯蘭國最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將穆斯林世界轉化為嶄新的伊斯蘭，而不在於反帝國主義。所以，伊斯蘭國付出極大的努力，以自殺炸彈的方式攻擊什葉派；卻並未投入所有力量對其他敵人宣戰，例如針對穆斯林兄弟會或蓋達組織所分類的「鄰近敵人」和「遠方敵人」。正如約翰·穆勒和馬克·G·史都華（Mark G. Stewart）在《追擊幽靈》（Chasing Ghosts）這本研究恐怖主義監管的書中，對此提出的說明：「伊斯蘭國沒有將心力集中於摧毀遠方的敵人，尤其是美國；反而是以殺害及恐嚇他們厭惡的穆斯林同胞及鄰近的基督徒為主」。²²但是，這其中卻蘊藏著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關鍵。在伊斯蘭國眼中，什葉派是鄰近敵人的一部分。正是這個原因，使華盛頓和台拉維夫兩方面均偏愛伊斯蘭國，勝於對蓋達組織。對華盛頓和台拉維夫兩個政府而言，伊斯蘭國反什葉派的態度根深柢固，讓它無暇分心注意遠方的敵人。而且，也使伊斯蘭國成為伊朗的嚴重威脅。

馬徹提和阿普佐也引述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在情報工作上的長期合作關係，認為這是華盛頓方面偏袒沙烏地王室的原因之一；儘管他們的政府厭女、蔑視民主，而且和反美的恐怖分子糾纏不清，亦在所不惜。這兩位記者真正所指，是沙烏地王朝的實用之處：那就是美國的各式各樣秘密行動，經常是由沙烏地全額或部分贊助。因此，他們寫道：當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3年時暗中授權中央情報局武裝敘利亞的……叛亂分子，這個情報機構很清楚，有哪個伙伴樂意為這項秘密行動買單。幾十年來，CIA在應付遙遠國家的衝突時，一向也都是仰仗同一個伙伴的財力和決定權：那個伙伴正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國」。²³馬徹提和阿普佐補充道：「支援敘利亞的叛亂分子，只是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之間情報工作的新篇章。它們相互配合的關係長達數十年……從伊朗軍售醜聞

（Iran-Contra Scandal）、在阿富汗支援聖戰士對抗蘇俄，再到非洲的代理戰士，事跡不勝枚舉。有時候，這兩國的合作模式就像在敘利亞的例子……稱得上全面照應。至於其他情況，沙烏地阿拉伯……只是負責出錢，由美國負責秘密行動。」²⁴

華盛頓方面領軍採取行動，罷黜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華盛頓方面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促進代議式民主。如我們已經提過的，那只是個動人的虛構說法。

對敘利亞的戰爭中，美國在中東當地的主要盟邦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是絕對君主政體，它對付自己國內追求民主的暴動，是以坦克、斬首和釘十字架等手段鎮壓，卻不聞華盛頓方面曾有些微抗議。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華盛頓方面所自稱的動機純屬捏造。「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中東研究員亞當·庫格爾（Adam Kugel）指出：「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中」，華盛頓方面「似乎總是以經濟利益優先，遠高於對人權的關懷」。²⁵華盛頓方面與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周旋時，同樣也是經濟利益掛帥，人權關懷地位低落。但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的意識形態，強調自決和阿拉伯社會主義。因此，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這些國家即不同於沙烏地阿拉伯，以致美國所要求保障的經濟利益，始終無法得手。

華盛頓方面與大馬士革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交戰，在沙烏地阿拉伯之外，華盛頓方面在當地最重要的盟友應屬土耳其。土耳其是代議制民主政府，但是越來越傾向於獨裁專制。它的目標將是伊斯蘭化的社會，立法的根源是《可蘭經》，民主只是從屬地位。

土耳其逐漸伊斯蘭化，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是重要的領導者之一。1996年，當時埃爾多安是伊斯坦堡的市長。他曾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因為他朗讀一首伊斯蘭詩歌，詩中宣稱「尖塔是我們的刺刀，圓頂是

我們的鋼盔，清真寺是我們的軍營」。²⁷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穆斯林兄弟會有「堅定的伊斯蘭根源」，土耳其內部反對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主要即是源自此處。

派屈克·寇克朋指出：AKP「在2002年贏得第一次全國大選」，從那一刻開始，它的施政綱領是「扭轉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阿塔圖克（Kemal Atatürk）於1923年所建立的世俗化社會。隨著它更穩固掌握權力，即著手逐步瓦解國內的世俗機構，並且鼓勵伊斯蘭化的教育和社會行為，同時尋求機會剔除非伊斯蘭的官員和軍官」。²⁸

《華爾街日報》的中東專家亞洛斯拉夫·特洛菲莫夫認為，在現代伊斯蘭教徒如埃爾多安眼中，「民主本身並沒有價值，它只不過是創造「『真正』伊斯蘭秩序的策略。對他們來說，為了廢除後殖民的世俗系統，經由投票亭是最為可行的途徑。他們的追隨者相信，後殖民的世俗系統從來沒有為一般穆斯林帶來正義和發展」。特洛菲莫夫指出，2005年時埃爾多安曾不小心說出「他只是把民主當作『手段』」，目的是建立伊斯蘭國家。²⁹華盛頓方面也看出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正在「偏離民主政治」。即使這位統治者與穆斯林兄弟會頗有淵源，但是華盛頓方面仍然和他保持緊密的關係，因為他是「重要的策略盟友」。³⁰

敘利亞向西方國家的世俗多黨制民主政治靠得更近，而土耳其靠得更近的對象，是華盛頓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在中東地區的其他盟友，例如反民主的伊斯蘭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它也更靠近華盛頓方面在戰場上的盟友聖戰士，他們企圖推翻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建立以《可蘭經》統治的政權。羅勃·費斯克問道：「土耳其？有一個國家，在那裡警察接管報社而且監禁記者、幾十年來軍隊屠殺了無數庫德族人，還有，那裡的總統越來越像小型的蘇丹。是不是那個國家？」³¹

華盛頓方面宣稱，它擁護敘利亞為了追求民主而奮戰；這樣的說法真是虛弱無力，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也宣稱它們跟同盟國的戰爭是十字軍東征，是為了追求全民作主的政府。協約國的主要成員國之一是蘇俄，它的領導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一名獨裁者。他的等級和沙烏地的國王薩勒滿（Salman）、卡達的埃米爾塔敏（Tamim），以及約旦的國王阿布拉（Abdullah），都是足以並駕齊驅的。華盛頓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它在中東地區的盟邦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承諾，就像沙皇的承諾一樣堅定……美國亦承諾要促進民主政治的傳播，而英國和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也有相同的承諾。以上這些承諾都一樣堅定——一無所有的空洞堅定。

分而治之
DIVIDE ET IMPERA

西方世界對於敘利亞衝突的討論，其預設的前提彷彿是：我們只需要知道當地全是一群凶暴的野蠻之徒，在宗教熱情和權力慾望的驅使之下互相殘殺。而且，他們的行為不適用任何理性分析或是以任何一套能融會貫通的政治信念去理解。

組織群眾運動的方式，可以依據個人身分的各種面向，如種族、階級、宗教、教派、族群、語言、性別，以及工作職位在國際勞力分工中的地位。

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往往以種族為基礎，合理化對於其他國家的控制。他們自視為高級種族，統治世上的「劣等」民族是他們的天命。在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眼中，阿拉伯人即為「劣等」民族之一，居住在大西洋到波斯灣這一片土地上。阿拉伯人在數學、天文、醫學、建築、航海、園藝和哲學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並且建立了偉大的文明。但是，從1516到1918年間，他們是在橫跨三大洲的土耳其帝國統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點燃阿拉伯人對國家的渴望，承諾將會支持阿拉伯人獨立，換取阿拉伯人協助推翻土耳其政權。

英國會深化被統治人口既有的宗教和族群差異，甚至製造新差異，藉以維持大英帝國龐大的全球霸權。然後，倫敦方面即會以仲裁人的角色介入，處理被它刻意加劇或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衝突，表現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彷彿唯有它能遏止殘暴野蠻的當地人毫無節制的激情。英國一向是從民族、宗教方面看待被殖民的社會，不斷強調他們之間的分歧，使被殖民者成為互不相讓、彼此敵視的團體，永遠都是水火不容，隨時可爆發激烈衝突。假使被統治的人民並沒有陷入鬥爭，英國也會設法讓他們變得好鬥。

帝國主義論點：強調異質性，內戰無可避免

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重視阿拉伯人之間的可共同點，然而列強卻是習於強調彼此的差異，它們對於被征服的民族，也是相同的心態。英國否定被它統治的民族與領土的範圍一致，堅信國家只不過是標記領土範圍的地理表現方式，

在領土內則是許多對立的民族。英國是理性、冷靜且文明的強權國家，卻以為被統治的社群因「古老仇恨」而四分五裂；因為這個疏忽，使它自命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力量，欲避免這些社群互相毀滅，捨我其誰。

列強的論點是：**被殖民社會因為內部的民族、宗教歧異，以致殖民地絕對無法交由被殖民者自行治理。**英屬印度的共產黨主義者杜特（R. Palme Dutt）提交給聯合國的一份普查，充分暴露了以上論點的破綻。這份諷刺性的普查指出：

「美國這片次大陸的特色，是氣候與地理特徵具有豐富的多樣性。論多樣性，美國居民的種族和宗教也毫不遜色。我們說到美國時，習慣將它當作單一的實體。對於不太用心的……觀察者來說，如此的談論方式會讓人忽略一個事實：美國是由五彩繽紛的種族和信條共同組合而成的。單以紐約市為例，大概能算出一百種國籍，其中有一些國籍的人數還很多，多到紐約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義大利人城市、最大的猶太人城市，以及最大的非洲人城市。這麼多樣的元素毗鄰相接，形成了肥沃的溫床，那些最令人沉痛的群體衝突，便由此處滋生。在南方各州尤其如此，已引起許多異族暴亂和謀殺事件。……猶他州的摩門教徒、明尼蘇達州的芬蘭人、墨西哥移民……西岸的日本人，他們都是色彩鮮明的族群，因而成為迫切問題。至於原住民……追求生存，那就更不必說了。」

杜特提到，即便是到了美國革命前夕，在英國貴族口中的美國仍舊是一個被民族、宗教徹底分化的殖民地；要說美國人民居然會團結一致，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那裡有大量的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分散在英國人後代之中，使殖民地的異質性特色愈加強烈。他們還包括琳瑯滿目的政治、宗教信仰、商業利益及社會類型。所以直到革命前夕，似乎依然有許多人認為，要美國人民團結是不可思議的。」

在1759到1760年，有一名英國貴族的代表訪視北美殖民地，使這樣的主張更上了一層樓：殖民者親

臨殖民地是必要之舉，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殖民地被「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吞噬。包括美國在內，每個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確實都接受了這個論點，以它合理化對殖民地人民的持續控制。

「北美各群體之間的分歧，更甚於水之不同於火……有不同群體就有性格差異、禮儀差異、宗教差異、利益差異。我想呢，如果我對於人性不至於完全無知，那我可以說：萬一放任他們不管，想必會爆發內戰，從美洲大陸的這一端到另一端，無一處例外。」

同樣的思考風格一脈相承，延續到了二十一世紀，洋溢在帝國主義的論述中。它們同樣強調異質性，也得到相同的結論：深信多個分屬不同民族、教派的社群若共處一地，內戰將是無可避免的後果。美國副總統喬·拜登以及多名美國政客，曾提議將伊拉克一分為三，成為庫德國、什葉國和遜尼國。

我們已經提過：2003年美國和英國聯手入侵伊拉克，隨後美國的殖民總督保羅·布雷默即依據伊拉克人的種族和宗教身分，挑選代表進入治理委員會，使伊拉克的民族、教派分歧正式化。關於敘利亞，西方媒體的記者極為重視它內部的群體差異，也經常引用這些差異解釋國內的衝突。他們所呈現出來的敘利亞，其戰亂的起因是宗教上的古老仇恨，而非國家走向的問題，亦即敘利亞應該成為世俗派國家、追求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目標；或者應該成為伊斯蘭國家，以《可蘭經》和教規作為法律基礎。將敘利亞內部的衝突描繪成教派矛盾，可以模糊華盛頓方面的角色，讓人不去注意它以聖戰士當作代理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挑起戰端。

那些「阿拉維派圈內人」

根據羅勃·費斯克的觀察：「我們總是喜愛四分五裂的中東示意圖。伊拉克的什葉派永遠在底部、遜尼派在中間，庫德族在最上面，記得吧？至於黎巴嫩，我們習慣這麼做：什葉派在底部（一如往常）、什葉派在東部、遜尼派在西頓（Sidon）和的黎波里、基督教在貝魯特東部和北部。西方報紙從來不會刊登一張英國布拉福鎮（Bradford）的地圖，上面標示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區域；或者是華盛頓的地圖，上面劃分黑人和白人區。我們不會，否則不就表示我們的西方文明被部族或種族分割了。只有阿拉伯世界值得我們用民族去切割。」

即使時至2016年6月，《華爾街日報》依然是用「阿拉維派主政的」一語，稱呼敘利亞政府。這種作法類似提到俄羅斯早期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時，總是會稱之為「猶太人領導的」，因為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要員是猶太人。

在美國方面，國務院堅持將敘利亞的內部衝突視為教派之爭，而美國則是和占多數的「遜尼派」結盟。美國官方大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敘利亞的內部衝突，同時還能維持它和多數族群站在同一陣線的假象。美國官員可以這麼說：凡是反對阿薩德政府的敘利亞人，無論是遜尼派、基督教、阿拉維派或者任何族群，美國都一視同仁，全力支持。但是他們捨棄這種作法，反倒執著於使用教派觀點詮釋這場衝突。猜想其中原因，可能是因為這個說法，能夠讓遜尼派極端分子感到正中下懷。畢竟華盛頓和它的盟邦都支持遜尼派，而且遜尼派以阿薩德政府為反抗目標，是因為阿薩德政府堅持世俗派立場，正是教派理由。為了支持捏造出來的教派故事，美國官員繼續加油添醋：由於對遜尼派充滿深仇大恨，阿薩德和他的「阿拉維派圈內人」正在轟炸占人口多數的遜尼派，讓他們備受饑餓折磨。此一說法再透過高超的詭辯技倆炒作，即可得到這樣的結論：若要擊垮伊斯蘭國，就必須先消除阿薩德和他的阿拉維派圈內人。

根據美國杜撰出來的說詞：阿薩德這幫人就是伊斯蘭國存在的根本原因。阿薩德政府的壓迫成為伊斯蘭國興師問罪的口實，而伊斯蘭國之所以演變為一樁運動，目的是為了保衛遜尼派，抵抗敘利亞政府的侵犯。

若是也用「根本原因分析」理解恐怖分子何以攻擊美國目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若應用在華盛頓方面厭惡的政府、運動和團體，那就顯得再貼切不過。無論如何，國務院官員的理解弄攪了因果關係。敘利亞政府不同於華盛頓方面呵護備至的沙烏地君主政權，是世俗派以及非教派主義的立場，任何人企圖煽動教派緊張，都是它絕不寬貸的行為。敘利亞政府奉行反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假使我們竟然相信它會從事反遜尼派行動，簡直就像是聲稱推動免費公共保健服務，以及大幅削減五角大廈的預算，居然有可能是布希政府的政績一樣。事實完全相反：敘利亞國內的衝突，並不是阿拉維派壓迫多數族群遜尼派而掀起的，因為壓迫之說根本子虛烏有；然而，衝突的根源在於遜尼派的政治意識形態，它動員了遜尼派激進分子，其中有許多是來自國外，合力對抗敘利亞政府。遜尼派激進分子的作為有雙重原因：

(1) 因為敘利亞政府是世俗派，亦即重人治而輕真主，是盲目無知的信仰；

(2) 因為敘利亞政府領導者的信仰已遭遜尼派聖戰士斥為異端邪說，必須以死謝罪。更精確的說法是：美國盟友聖戰士所宣戰的對象，是世俗派、基督徒、猶太人、非正統穆斯林；任何人只要是不順從原教主義遜尼派對伊斯蘭的詮釋，即概無例外。

西方機構大肆宣傳神話，栽誣阿拉維派領導的敘利亞迫害多數族群遜尼派，藉此加劇遜尼派與阿拉維派的矛盾。同時，沙烏地散播的瓦哈比主義也加深對什葉派和阿拉維派的仇恨。它激發盲從者以自殺炸彈攻擊什葉派和

阿拉維派學校、清真寺和住宅區。美國宣傳家樂於抹黑阿薩德，將他說成阿拉維派主政的政府首腦。因此這些盲從者也不放過對「邪教徒」阿薩德開戰。

污衊敘利亞政府是阿拉維派領導的政權，如同誹謗美國的甘迺迪 (Kennedy) 政府是羅馬天主教徒的政府。

如果有人試圖暗示甘迺迪政府的主要目標，是推動總統教友們的利益，犧牲占多數的新教徒也在所不惜；很顯然這樣的作法是蓄意助長反甘迺迪的敵意。同理可證：西方媒體不斷指稱敘利亞政府是阿拉維派控制的政權，不外乎也是企圖達到相同目的，亦即在多數族群遜尼派中挑撥反阿薩德的仇恨。

宣稱敘利亞政府是阿拉維派主導的政權，在許多層面上都是大有問題的說法。美國的甘迺迪總統生於羅馬天主教家庭，也遵從羅馬天主教信仰；但是我們不至於因此一口咬定甘迺迪政府就是羅馬天主教政權、羅馬天主教領導或主導的政權。甘迺迪的信仰是一回事，與他決定角逐總統大位沒有直接關係，而他在白宮推動的政策更是另一回事；他也沒有主導美國捍衛羅馬天主教社群的利益。甘迺迪的弟弟也是羅馬天主教徒，甘迺迪總統身為羅馬天主教徒，當他任命巴比入閣擔任司法部長，我們也同樣沒有說他的身邊佈滿教友。甘迺迪總統決定任命親弟弟，主要的考量是基於親屬關係的忠誠，無關宗教。在這項決策中，宗教因素是意外，僅有附屬地位，不是主要動力。

美國政府的領導者均為男性、由男性主導，除了在少數圈子，這個現象很少會因此遭人詬病，斥之為男性政權。「男性政權」(male-regime) 一詞比「男性領導」(male-led) 或「男性主導」(male-dominated) 的寓意更加深遠，它是指政權的組織原則為追求男性的利益並抵制女性的利益。既然美國政府最重要的組織原則乃是在於追求美國產業和金融資本，並非男性利益，那麼即使美國政府係由男性主導，因而稱之為男性政權是很荒謬的說法。由此

可見，封美國政府為男性政權，此舉的企圖不言而喻，正是要引起女性仇視政府。以男性政權稱呼美國政府，是機關算盡的政治行動。

同理，為敘利亞政府貼上阿拉維派政權的標籤，當然也是西方國家官方及新聞媒體所從事的一項政治行動，它期望達成的政治目的是轉移世人的注意力，刻意忽視阿薩德政府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且，可抹黑它是教派迫害的工具，藉此詆毀政府，鼓吹遜尼派反政府的仇恨。

阿薩德任命絕對忠誠的人員擔任國家高層，尤其是軍隊、安全機關和總統禁衛軍的領導職位，其理甚明：軍隊和警察是國家行使公權力的部門，亦是政治領袖的後盾。政治領袖為了維持政治生命，務必擁有忠心耿耿、可充分仰仗的軍隊和警察。領導者若無法得到國家安全部門效忠，遲早地位不保。阿薩德領導的先驅政黨為了完成其政治使命，能否長久保有權力是成敗的關鍵。為了維持權力，除了其他條件，它還必須能在內部的威脅中自保。以親屬和交情為基礎的關係最值得信賴，因此阿薩德任命交和家族成員負責敏感的國家安全職務，可說是合情合理的作法。「阿薩德的領導地位是否可發揮有效的政治作用，非常仰賴於牢固掌控遍佈全國各地的軍隊、內部安全機關和情報組織；這些是現任政權唯一可用以反政變的力量。」。

哈菲茲·阿薩德利用禁衛部隊、反政變軍隊，以及國家安全單位建立起來的網絡，大量聘用親信或者忠誠可靠的人員（雖然他們的忠心程度有時候不盡如人意），使敘利亞的政治穩定進入前所未有的時代。假使國家自從獨立以來始終處於形勢不穩定的狀態，它即需要強而有力的安全機制，足以應付各式各樣的威脅；這是政治上求生的必需品，也是國家穩定的擔保。為了消除猶太復國運動勢力不斷散發的威脅，敘利亞必須有強大的安全機制。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戰爭只是停戰，並非以和平條約告終；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則是仍處於正式交戰狀態。以色列

是個殖民強權國家，以戰爭方式奪取土地、擴張領土的前科纍纍，敘利亞的領土戈蘭高地正是至今仍在以色列的占領之下。

敘利亞外有以色列的侵略野心依舊虎視眈眈，在內部亦有遜尼派伊斯蘭教徒不承認復興黨革命的世俗主義路線，四處展開游擊戰；同時，傳統的經濟精英階級也反對革命帶來的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政策。不止如此，政治反對勢力很有可能進化為政變，這是敘利亞獨立後的政治局面最為顯著的一大特徵；阿薩德務必隨時提高警覺，慎防舊事重演。基於以上種種理由，強大的安全機制是必不可少少的要件，而阿薩德以推心置腹的親信擔任軍事、安全和情報方面的重要職位，同樣也是不能或缺的。阿薩德的各種顧慮付諸實現時，他的家族成員往往也可能正是最親近、最可信賴的盟友；這些人當然和他一樣，連帶也有阿拉維派信仰。在國家安全機制內的阿拉維派成員或許比重過高，但這只是附屬現象；阿薩德並不是為了奠定阿拉維派對多數族群遜尼派的統治，才刻意設計出這樣的結果。

非教派主義的身份用語

吹捧教派忠誠的理念，不利於團結阿拉伯人，因此復興黨的領導人絕不容忍任何人抱持這類想法；他們也非常厭惡被視為教派成員。他們的身分，首先是阿拉伯人，其次才是敘利亞人。我們不妨試想：若是反對黨堅持將約翰·甘迺迪總統的政策解讀為「圖利羅馬天主教」，想必他會怒不可遏；若是影射他會在總統任內出賣美國，接受羅馬天主教統治，他也有十足的權利震怒。若是變本加利，說他身兼羅馬天主教徒和總統兩種身分，因此他

所領導的政權將會藉勢以國家之力迫害清教徒多數族群，他一定會更加勃然大怒，而且理直氣壯。諸如此類無稽之談，都是政治人物企圖抹黑他的技倆。

中東學者漢娜·巴圖圖(Hanna Barutu)指出，依靠親屬關係而組成絕對忠誠的圈內人，相同過程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伊拉克也發揮了作用。當然，同時也在權力核心產生了家族、部族和宗教上的同質性團體。伊拉克的薩達姆為了因應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壓力，也和敘利亞的阿薩德一樣，在身邊佈置了絕對忠誠的親信。如此一來，「伊拉克的統治核心也是名符其實的一家親」，而且它剛好包含「少數族群(遜尼派阿拉伯人)的教派成員」¹⁰。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亦是復興黨政府，所以是徹底的世俗派，堅決反對教派主義。伊拉克並不是美國政治宣傳所說的遜尼派政權：伊拉克的重要職位均是以薩達姆的親信擔任，他的親信恰好是復興黨領導者的親屬，因而都有相同的少數族群宗教信仰。但是，他們能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不是因為遜尼派信仰，而是因為和薩達姆的關係，以致能深獲薩達姆信任。

薩達姆政府的目標也不在於追求教派計畫。身為復興黨的黨員，薩達姆贊同該黨觀點，相信教派主義對於實現阿拉伯人統一的目標有害。復興黨的創黨文告即已宣示：存在於阿拉伯人之中的一切分歧，包括宗教，均是「一時的假象」。薩謬爾·黑爾方特及麥克·布里爾兩位學者的評語說道：薩達姆的願景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他所宣揚的觀點，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能夠緩和門戶分歧與教派主義」¹¹。薩達姆與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有共同的立場，美國和殖民主義的態度則是強調教派並且積極促進分離。因此，雙方是處處水火不容的。

繼續下文之前，有一點應該先聲明：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重要人物，並非全是遜尼派或薩達姆的親屬。

塔里克·阿齊茲(Tariq Aziz)是薩達姆的外交部長兼副總理，也是親近的顧問，他就一名是基督徒。

前文已經提過，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曾經發出逮捕令，捉拿伊拉克政府的55名首要分子；美國還將他們的照片和詳細資料印成一副撲克牌。這55名要犯中，大多數都是什葉派，共35人。美國到處散播的神話說，伊拉克政府已經淪為少數族群遜尼派的工具，專門迫害多數族群什葉派。上述事實竟與美國的宣傳大相逕庭，真是教人難堪。而且，伊拉克復興黨早期的領導者也大多都是什葉派，包括復興黨伊拉克分支的創黨人。

¹²美國官方和西方媒體更是持之以恆，將薩達姆政府塑造成教派政權。例如，2003年美英聯手入侵伊拉克，《華爾街日報》將此次行動形容為「翻轉數世紀以來遜尼派」在伊拉克的統治。¹³根據相同的邏輯，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當選總統，該說是終結185年來清教徒在美國的統治。至於歐巴馬在2009年成為美國總統，那就是結束233年來的白人政權，奠定黑人少數族群的統治。

認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伊拉克政府是由遜尼派領導的，這是流行的誤解。2014年，英國記者彼得·歐伯恩(Peter Osborne)訪問敘利亞，返國之後他也加入質疑流行誤解的行列。他揭露了一個突兀的現實：阿薩德政府的內閣，30人之中僅有2人屬於總統的少數族群教派。歐伯恩的報導說：「阿薩德的三十名中堅內閣中，阿拉維派成員僅占極少數(我被告知是兩人)。」他繼續提到：「總理是遜尼派，內政部長、司法部長、外交部長，甚至國防部長，一概都是遜尼派。」敘利亞政府派赴日內瓦參與和平會談的代表，成員也幾乎清一色都是遜尼派。歐伯恩補充說道：這些代表「可能會拒絕教派主義的用語，寧願認為自己只是敘利亞人」¹⁴。這種態度確實正如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他們強調應克服阿拉伯人之間的差異，因為那是「一時的假象」。

復興黨人、其他許多敘利亞人，以及伊拉克人，他們對自己的身分都偏好非教派主義的用語。只有西方人才

會沿襲殖民主義傳統，堅持在阿拉伯人身上附加教派的標籤。

簡單的西方邏輯，虛構的宣傳

關於敘利亞政府，還有一個說法是：主要的國家安全職位過度重用阿拉維派；即使是這個觀念也稍嫌誇大其詞。哈菲茲·阿薩德擔任總統期間，敘利亞政府有許多重要職務的負責人與他並沒有同教派的關係。例如阿部多·哈林姆·卡達姆（Abdul Halim Khaddam）兼任外交部長和副總統，掌管政治和外交事務，稱得上位高權重，然而他是遜尼派。其他如武裝部隊參謀長希克馬特·席哈比（Hikmat al-Shihabi）、國防部長穆茨塔發·塔拉斯（MUSTAFA Tlas）、總理阿部德·卡里姆·卡辛姆（Abd al-Karim Qasim）、立法局議長馬穆德·阿茲·楚比（MAMMUD AZ Zubi），以及阿薩德復興黨的副黨魁阿部達拉·阿瑪（Abdallah al-Ahmar），他們也都是遜尼派。以上諸人與阿薩德的關係只有一個：他們皆出身普通的鄉下背景，屬於相同的社會經濟階級。英國記者派區克·席爾是哈菲茲·阿薩德的傳記作者，席爾指出：比起教派身分，阿薩德一向更加看重階級結盟。

在巴沙爾·阿薩德總統時期，國家高層的遜尼派比重也不輸前朝。例如國防部長法德·弗瑞吉（Fahd al-Frej）是敘利亞有史以來受到表揚最多的軍官，他是遜尼派；情報部門主管阿里·曼路克（Ali Mamlouk）、穆罕默德·迪布·柴圖恩（Mohammad Dib Zaitoun）和魯斯圖姆·格查勒（Rustom Ghazaleh），也是遜尼派；政治總局的調查部門主任馬莫德·卡圖提布（Mahmoud al-Khatib），以及哈桑·圖爾克曼尼（Hassan Turkmani）和希克馬特·席哈比這兩位參謀長，都是遜尼派穆斯林；軍事參謀長道烏德·拉吉哈（Daoud Rajiha）則是希臘東正教基督徒；至於參謀部，重要成員如羅曼丹·馬莫德·羅曼丹（Ramadan Mahmoud Ramadan）少將和吉哈莫哈抹米德·蘇擔（Jihad Mohamed Sulran）准將，亦為遜尼派穆斯林。

羅勃·費斯克說：「後來才知道，我在敘利亞前線遇見的將軍」，許多都是出身遜尼派，也就是敘利亞的最多數族群。在在美國宣傳所虛構的世界裡，大馬士革沒有半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放眼所見盡是阿拉維派的教派主義分子；現實世界卻大謬不然。

西方世界的一切公共平台，討論到敘利亞的衝突時，可曾提到巴沙爾·阿薩德的意識形態？我們能從中得知他是阿拉維派；此外，關於他也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這一點，即使並非全然不提，卻也是極為罕見的。

談及敘利亞政府時，無數人會稱之為「阿拉維派領導」、「阿拉維派主政」和「阿拉維派主導」等等；正如前文所述，這些全是錯誤的說詞。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絕少討論會涉及敘利亞自居為「阿拉伯主義之地」（*dar of Arabism*）、承諾將採行阿拉伯社會主義路線，創造團結統一的阿拉伯世界，免於外來勢力控制。以上這些事實，對於理解敘利亞衝突的起源和本質，卻是大有幫助。

但西方世界對於敘利亞衝突的討論，其預設的前提彷彿是：我們只需要知道當地全是一群凶暴的野蠻之徒，在宗教熱情和權力慾望的驅使之下互相殘殺。而且，他們的行為不適用任何理性分析或是以任何一套能融會貫通的政治信念去理解。話雖如此，衝突中各個主要政黨的意識形態，如敘利亞政府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反政府戰士的遜尼派政治伊斯蘭，甚至也可以計入美國的資本帝國主義，為能解開敘利亞衝突的迷團，這些線索確實非常有用。

可是，西方國家和媒體討論到敘利亞衝突時，除了提及瓦哈比主義，其餘的政治意識形態則一概避而不談。難道是認為我們只需要知道阿薩德是阿拉維派，反抗分子則主要是遜尼派，如此足矣？在這樣的操作下，眼前的道路已經安排妥當，路程的終點將會走到這樣的結論：

敘利亞的衝突，只不過是古老時代的宗教對抗在第三世界重演罷了。於是，華盛頓方面翩然從天而降，平息這一場浴血浩劫；我們也因之深信美國是舉世最為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們何其有幸！

希特勒再現
ECHOES OF HITLER

依邱吉爾之見，非歐洲民族受到殖民式掠奪乃是無可厚非之事。這樣的說詞是希特勒以及眾多歐洲人士也會擊掌叫好的，甚至包括部分社會民主運動的偉人亦然……

在敘利亞的衝突中，以三種形式重現了希特勒；但是它們均和巴沙爾·阿薩德無關。

我們已經提過，阿薩德被抹黑是獨裁者，西方國家才能師出有名，強迫敘利亞進行政權輪替。美國及其盟友將敘利亞塑造造成阿拉維派領導者的工具，是為了藉此打擊敘利亞的泛阿拉伯主義意識形態。在其論證之中，我們見到了希特勒再現。將政治意識形態影射為宗教少數族群迫害多數族群的隱藏工具，這種手法可以和希特勒相提並論：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闡述了對抗馬克思國際主義的宣傳行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獲得數百萬德國工人擁戴，希特勒一出手就將它定位成猶太人的特洛伊木馬，而其目的是建立猶太人對多數族群德國人的統治。馬克思主義宣揚跨國工人團結一致，讓希特勒深感厭惡。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是「工人無祖國」！並且呼籲「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然而希特勒所鍾愛的理念卻是：德國人乃崇高而且強大的種族，它的天命是統治其他弱小國家。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抵觸了希特勒的理念，因之成為他的眼中釘、肉中刺。希特勒深知，唯有團結的德國人才能實現德國的偉大夢想。借用華盛頓方面的用語：所謂德國的偉大夢想就是德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德國優先，以及德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假使德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信以為真、相信工人無祖國，豈有可能團結一致，共同實現上蒼為德國人安排的天命？馬克思主義認定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發明，並且將它描寫成資產階級手中用來剝削勞工大眾的工具，希特勒乃因此怒斥馬克思主義是蔑視國家、詆毀祖國：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猶太復國運動使他對德國的猶太人改觀。起先，他視猶太人與德國的羅馬天主教徒、路德宗（Lutherans）教徒等人並無不同。他認為猶太人不是種族或國家，只是某個信仰的追隨者。他寫道：「看到猶太人，我看見的是不同信仰的人。因此，基於人類的寬容之心，我反對攻擊信仰不同的人。」，

直到他遇見一名哈西德猶太人（Hasidic Jew）：哈西德是極端正統的猶太教派，希特勒見他的穿著與打扮迥異於其他德國人，才讓他不由得感到困惑，不知猶太人是不是「全然不同的民族」；他回憶說：他終於不再難以取捨，而令他走出困惑的關鍵是「猶太人的一項特定教派活動。那是在他們之中興起的龐大運動，名為『猶太復國運動』。它的目標是賦予猶太教國家特色」。

此後，希特勒堅稱猶太人不是宗教社群，而是一支種族；希特勒也進而相信，或者至少是主張，德國的猶太人與德國毫不相干，是屬於另一個國度的人民。而且，希特勒也宣告猶太異邦人已經展開行動，散播馬克思國際主義的「病菌」，企圖從內部削弱德國種族的力量。在希特勒的引導之下，猶太人和猶太教將會與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政治以及國際主義等觀念難分難解。

希特勒也將猶太人和眾多對象劃上等號，例如國際金融、股票市場、民主政治、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報紙，還有讓他看不順眼的各種事物。比方說，他認為可惡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德國革命，都是如今讓他感到不齒的「種族」因素策動的。希特勒的思考方式在當時遠遠稱不上是異端邪說，在歐洲就有一部分精英階級，每每將社會革命和猶太人掛鉤，包括1789年的法國革命。

抱持這個信條的人，熱愛法西斯主義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即是其中的典型。他鼎力捍衛統治階級的特權，以及對大英帝國殖民地採取獨裁統治。他讚賞墨索里尼，而且強烈傾向於法西斯主義，支持階級、種族和性別歧視，他自己也因歧視而從中得利。反之，布爾什維克黨致力於超越歧視，諸如此類的計畫他則興趣缺缺。

1927年，邱吉爾訪問羅馬之後，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讚不絕口。他興高采烈說道：「墨索里尼是個

了不起的人！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法西斯主義真是造福全世界。」邱吉爾接著又說：假使他是義大利人，「一定會從一開始就義無反顧追隨法西斯主義，對抗列寧主義狼心狗肺的激情，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勝仗」。希特勒掌權四年之後，邱吉爾為了讓人相信自己對國家的忠誠，他告訴英國的下議院，「若是必須在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二選一，我不會口是心非說我會選擇共產主義」。

獨一無二的文明標準

邱吉爾和希特勒一樣都是種族主義者，相信白種人優越論，凡是歐洲精英階級眼中的劣等「種族」和民族，都令他們反感。他曾經把印度人形容為「糟糕透頂的民族，宗教信仰也不堪聞問」；他口中的巴勒斯坦人則是「只吃駱駝糞的野蠻部落」。他自稱「從不認為黑人和白人一樣能幹或者有效率」，而且他很討厭「有眯眯眼和豬尾巴的民族」。勞倫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寫道：「到了二十幾歲時，邱吉爾已經完全吸收了當時的種族教條，確信盎格魯薩克遜人是唯一夠資格的統治者」，這和希特勒的信念只是大同小異。

依邱吉爾之見，非歐洲民族受到殖民式掠奪乃是無可厚非之事。這樣的說詞是希特勒以及眾多歐洲人士也會擊掌叫好的，甚至包括部分社會民主運動的偉人亦然，像是「漸進式社會主義者」（evolutionary socialist）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邱吉爾不以為然地說過：「對美洲的印地安紅人或澳洲的黑人」，並沒有誰犯了滔天大罪；說起來只不過是「有個更強大、更高級、智慧更加發達的民族」，「來到那些地方，拿走了他們的地盤」。這曾經是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如今亦是歐洲殖民主義及其擁護者不折不扣的意識形態；時至今日，這些

擁護者大多仍然備受尊崇及護航，是希特勒無福享受到的待遇。例如，勞倫斯·詹姆斯研究邱吉爾，在其導論的結語中說道：「若是讀者覺得有必要對邱吉爾其人蓋棺論定，我希望是依據他為自己和英帝國設定的標準。」如果有人覺得有需要對希特勒蓋棺論定，很難想像會有人提出類似的警語。

邱吉爾至今依然廣受愛戴，希特勒則不然，因為他扭轉了歐洲殖民意識形態，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他竟將殖民矛頭轉向歐洲本身，妄想在欧洲建立德意志帝國，它的規模就如同美國在美洲大陸開疆拓土，以及英國在遠東地區建立宏圖霸業。歐洲各國的勢力劃分，鮮活地反映在它們對殖民地的影響範圍，它們的意識形態，除了應用的地理區域不同，和希特勒的並沒有兩樣。1942年，流亡的德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卡爾·寇爾希（Karl Korsch）寫道：「納粹黨不過是把同一套方法延伸到文明的歐洲民族，已往這套方法完全是保留給生存在歐洲文明以外的當地人或野蠻人專用」。

法屬馬丁尼克（Martinique）的馬克思主義者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呼應寇爾希的說法，指出納粹主義正是歐洲殖民主義轉向內銷的表現形式罷了。

「人們從震驚轉為震怒。他們說：『太不可思議了！但是不用擔心，這是納粹主義，它會結束的！』於是他們懷抱著希望等待風平浪靜，不願意面對真相。事實上它是野蠻的化身，它的殘暴無以復加，它是一切獸行的淵藪。沒錯，它是納粹主義，然而在他們身受其害之前，他們也是幫凶。他們尚未遭受納粹主義荼毒時，對它百般縱容、諒解，對它不聞不問、讓它合法；直到那時為止，他們以為它僅適用於非歐洲民族，因而不事關己。是他們滋養了納粹主義，不容他們卸責。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巨廈被它的紅潮吞噬殆盡之前，它從每一道細縫涓滴滲入，為時久矣。」¹⁵

塞澤爾補充說，西方人「無法原諒希特勒，不是因為他犯的罪，不是因為他傷害人類、讓人類受到屈辱；而是他傷害白種人、讓白種人受到屈辱。當時殖民主義的操作手法仍然專用於印度的『苦力』和非洲的『黑鬼』，希特勒竟然以那一套手法對付歐洲人，這才是他罪大惡極之處」。¹⁶

在邱吉爾眼中，遠東的印度人令人厭惡；對希特勒而言，東歐的斯拉夫人也同樣一無是處。邱吉爾合理化美洲及澳洲原住民被滅種的下場，他的論點是高級種族取代了低級種族。希特勒奴役斯拉夫人及消滅猶太人，也合理化自己的計畫，聲稱他們都是次等人類，必須讓位給優等種族。史芬德·林德庫夫依斯特（Svend Lindqvist）利用文學暗喻的技巧，以歐洲殖民主義詮釋了納粹的目標與手段何以會在歐洲延續。他寫道：「在黑暗之心的所做為，在歐洲之心重複上演。」¹⁷

對付復興黨人的陰謀論

馬克思國際主義在德國受到廣大無產階級青睞，這位未來的德國領袖（Führer）為了攻擊它的教條，故意混淆工人階級意識形態與猶太教。德國的工人階級大多數信仰羅馬天主教、路德宗，或者是無神論者，因此無法分辨其中的差異。希特勒的構想是為了抹黑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被醜化，成為宗教少數族群所創造的意識形態，而且其目的是欺瞞多數族群，進而獲得優勢。

西方國家的各種機構，大致上就是這樣定位敘利亞政府的。它們將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與阿拉維派信仰混為一談，也由於大多數敘利亞人並不信仰阿拉維派，當然無力辨別。這個構想的目的是扭曲復興主義，同樣將它捏

造成宗教少數族群所發明的意識形態，阿拉維派欲藉此哄騙多數族群並且取得優勢。以上正是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的論點。它的領導者們指稱：阿拉維派社群利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作為掩護，暗中推行阿拉維派的教派計畫，目標是壓迫多數族群遜尼派穆斯林，從敘利亞內部予以摧毀。¹⁸

因為分裂而造成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的區別，少數族群為了統治多數族群，會宣揚平等的意識形態，否定劃分彼此的必要性。這是少數族群的神話。因此，希特勒認為猶太人為了統治非猶太人，才會創造及鼓吹馬克思國際主義。依馬克思國際主義的觀點，工人的語言、民族、宗教乃至國家差異等都是會轉移焦點的因素，忘了工人之間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希特勒將馬克思國際主義說成陰謀，是狡猾的猶太人為了統治非猶太人而籌劃的。同樣地，在復興黨對手的眼中，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也是陰謀，是詭計多端的阿拉維派為了統治遜尼派穆斯林而安排的。

這個觀點問題重重，原因有很多個。

首先，阿拉維派並沒有執政，執政的是復興黨；而且，復興黨的成員，即使是最高層，其他教派的穆斯林均包含在內，遜尼派也不例外。猶太人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階層的代表性，超過他們在俄羅斯人口的比例；但是，這並不意味現實中第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必然是猶太政權，將會以暴政手段統治俄羅斯東正教多數族群。

如果說阿拉維派在復興黨及敘利亞政府的比例過高，並非因為這些組織已經被阿拉維派掌握，藉以壓迫遜尼派及追求阿拉維派的優先地位；真正的原因是宗教上的少數族群易被復興黨吸引。在敘利亞，教派歧視的價值觀深入人心，早在復興黨興起之前，宗教少數族群的地位長期以來即是處於多數族群遜尼派之下。復興黨重視世俗主義以及消除教派歧視，可使宗教少數族群不再飽受鄙視。

因此，敘利亞國內的少數族群會被復興黨的非教派主義意識形態吸引。非教派主義的國家，是他們抵禦宗教多數族群欺壓的最佳工具，其理甚明。

其次，阿拉維派在國家安全機構的代表性過高，這一點與宗教因素沒有內在關係，而是在政治上求生存的必要措施。阿薩德認為，重要的職務必須由忠誠可靠的人擔任。這些人正是和他有關係的親友，因此連帶也會和他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最後一個、也是決定性的理由是：**阿薩德是一名意識形態鮮明的人，而他的意識形態是明確反對教派主義的。**哈菲茲·哈薩德和他的兒子巴沙爾所追求的目標，並非促進阿拉維派的利益，而是提昇阿拉伯民族全體的利益。依據復興黨的意識形態，為能實現這個目標，唯一的途徑是阿拉伯人願意超越各種分歧，包括教派差異。反之，若是在大馬士革建立教派政權，以阿拉維派的計畫為依歸，是絕無希望可言的。

美國的帝國主義派反對復興黨的泛阿拉伯主義，與希特勒不滿馬克斯國際主義的理由正好相同：因為泛阿拉伯主義和馬克思國際主義的目標，都是建立受壓迫人民的統一戰線，聯合對抗共同的敵人。

希特勒寫道：「在1913年和1914年間，我表達了我的意見……關於如何保障德國的未來，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如何消滅馬克思主義。」他提到馬克思主義，明指它是「德國最重要的問題」，而納粹黨在他的領導之下，其存在的理由正是「攔阻馬克思主義勝利前進的腳步」。²¹消滅馬克思主義是希特勒的當務之急，美國的帝國主義恰好足以和他等量齊觀。對美國政府而言，未來美國在富產石油的中東地區能否穩保優先地位，問題在於各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它們追求的目標是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因此務必斬草除根。從華盛頓方面來看，阿拉伯和伊斯蘭民族主義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問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目標也是阻止阿拉

伯和伊斯蘭民族主義派勝利前進的腳步，包括埃及的納塞爾、敘利亞的阿薩德、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格達費、黎巴嫩真主黨的納斯魯拉(Nasrallah)，以及伊朗的阿亞圖拉等一千人。

在德國有廣大的群眾都信服馬克思國際主義的理念，是以呈現在希特勒面前的任務，是說服這些德國人，使他們轉向支持希特勒的觀點：德國人建立了高人一等的國家，它天生即必須不斷擴張生存的空間，代價是犧牲其他弱小國家；若不擴張，德國就唯有滅亡的命運。為了達成說服的任務，他接受猶太復國運動的理念，同意猶太人是一個國家，不只是宗教社群。在現實中，馬克思主義以及德國貴族和資產階級是因階級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政治區隔。希特勒的第二步是將這個政治區隔塑造造成種族分歧，以猶太人「種族」代替工人階級意識形態，以德國「種族」代替德國貴族、工業家和金融家的意識形態。於是，他將馬克思主義烙上「猶太教條」的印記，²²並且標榜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階層「是猶太人」，²³更指稱猶太人控制了社會民主派的報紙。²⁴馬克思國際主義是源自「猶太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在俄羅斯實行的馬克思主義則被希特勒貼上「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Judeo-Bolshevism)標簽。馬克思主義就是猶太教，猶太教就是馬克思主義。依希特勒之見，這兩個名詞只是銅板的兩面。

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和猶太教劃上等號，他的目的是讓**馬克思主義在德國人面前變成非我族類**，是一個小之又小的少數族群所創造出來的產品，並不適用於另一個、也是更優越的國家。從猶太人腦袋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希特勒眼中它還有邪惡的一面：馬克思主義不止是異族的产品，也是猶太「種族」欺騙的手段，藉以達到奴役德國工人的目的。

希特勒說：「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是以系統性的方式將全世界納入猶太人的手掌心。」²⁵對敘利亞的穆斯林

兄弟會而言，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目標則是以系統性的方式，將敘利亞納入阿拉維派的手掌心。

關於敘利亞的衝突以及在伊拉克對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戰爭，西方世界自有一套論述。但潛藏在其論述表相之下的觀念，其實和上述論點相去無幾。西方媒體幾乎不曾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稱呼阿薩德父子及薩達姆，反而是將他們定位成少數族群教派的成員，以及教派政權的領導者。雖然他們從未自稱是某一教派分子，或者直言是以教派計畫指導施政方針，但西方媒體毫不在意這個事實。

與西方媒體所述剛好相反，他們所領導的政府具有明確的反教派目標。馬克思國際主義派的目標，是超越國界而團結所有工人，追求他們共同的利益。帝國主義國家在地圖室裡恣意劃分的國界，將阿拉伯世界裂解成數十個國家。阿薩德父子以及薩達姆也和馬克思國際主義派類似，他們懷抱阿拉伯「國際主義」，目標是超越教派隔閡和一切界限，包括帝國主義造成的國界，團結全體阿拉伯人。然而，在希特勒的用心經營之下，馬克思國際主義在德國被貼上標籤，抹黑成猶太人在德國多數族群面前奪取支配優勢的計畫。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在中東地區的處境亦然：經過美國主導的政治宣傳悉心的操作，它也被誣指為少數族群所追求的教派計畫，目標是獲得凌駕宗教多數族群的地位。希特勒要德國人將馬克思主義派當成猶太人，而非領導工人階級運動對抗德國精英階級的剝削。華盛頓方面想要的，同樣也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被敘利亞的遜尼多數族群視為阿拉維派、被伊拉克的什葉派多數族群當作遜尼派，並不是領導泛阿拉伯運動對抗西方國家的控制。

看來，納粹的宣傳和西方國家的宣傳如出一轍，均是將解放的意識形態捏造成種族及教派控制的意識形態。

華爾街帝國
WALL STREET'S EMPIRE

「美國民主政治最大的兩個障礙，一是窮人普遍都有的幻覺，以為已經擁有民主；另一是富人的長期恐懼，擔心真的得到民主。」¹

——愛德華·道寧 (Edward Dowling)

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帝國，雖然它並沒有帝國之名。美國的帝國之實往往有許多委婉的說法，那些用語不痛不癢，使原本令人無法接受的事實變得無可厚非。例如，美國的外交關係協會是華爾街方面主導的外交關係智庫，向來備受矚目。它的高級研究員史蒂夫·庫克(Steve A. Cook)即曾經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投書中以「華盛頓方面領導的全球秩序」稱呼美利堅帝國。在《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也是不以帝國之名稱呼美國，而是改用「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經過這樣定義之後，《戰略》的作者乃進而認為美利堅帝國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是「世界的正義之師」。古往今來的所有帝國莫不是以如此方式自我標榜。然而，我們要問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讓人有點尷尬：美利堅帝國號稱世界的正義之師，是誰的正義？

美利堅帝國是美國精英的世界正義之師，這些精英寄生在美國社會的頂尖地盤，靠租金、盈利和利息而日進斗金。美利堅帝國與美國企業的盈利要求有密切的關係。在201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及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連帶亦宣告「美國能夠、也將會領導全球的經濟」。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簡直難以分別；或者說得更精確一點：那是美國代表國內企業利益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華盛頓方面的國家安全文件已經宣佈，美國的「計畫聚焦於降低美國產品的關稅，破除對(美國)產品和服務造成的障礙，以及設定更高標準，整平美國企業的……運作環境」。同時，美國也宣佈將會開拓開放市場和整平「美國企業在外國的……運作環境……(以及)……消除全面運用美國創新發明的障礙」，並且確保「未來的全球貿易體系可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如何達到上述目標？在《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中說得很清楚。該文件警告說：「當我們的生存受到威脅……如有必要可單方面動用軍事力量。」美國國防部長羅勃·蓋茨(Robert Gates)坦然讓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以國家之力關切……暢通無礙的經濟發展和商業」；華爾街方面隨時都準備就緒，必要時可利用美國的龐大軍備強制推行它的經濟計畫；這一點在蓋茨的言論中可見分曉。所以，若有任何外國政府蓄意「阻撓」美國企業的牟利活動，它們會受到警告，讓它們知道美國軍隊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確保市場維持開放，而且運作環境也是順暢無阻。如果我們將戰爭定義為某個國家利用造成傷害或威脅的方式，企圖將其意志施加於另一個國家；那麼，從蓋茨的聲明可知：華盛頓方面會藉由美國軍隊將其意志施加在外國政府身上，藉此為美國的企業、銀行和投資家打開市場和投資機會，這已經屬於戰爭行為。

華爾街方面的觸角無孔不入，滲透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國最大型企業、最大間銀行和最頂級投資家追逐利潤的興趣。這些機構和個人有足夠的財力主導外交政策之形成，而且果然善用了他們的財力去影響政策。

有些國家會採用各種作法以管理國內經濟，其措施不盡然有助於美國的出口和投資。華爾街方面追求的世界，是對美國商品、服務及投資全不設防，亦即美國銀行、企業與投資家可以自由累積資本，不會受到外國政府的政策阻礙。舉例來說，外國政府可能會利用公有企業、保護關稅障礙、補貼當地企業、市場進入門檻等等作法，實現其公共利益目標，如減少不平等、提供普遍的物資安全，以及克服落後開發。但是，無論這些政策對當地人民有多少好處，幾乎都會讓美國企業的牟利之路窒礙難行，因此那些國家都成了華爾街方面深惡痛絕的對象。只消翻閱《華爾街日報》或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便可注意到那些國家的作法確實招來了美國富人的嚴厲譴責，證明以上所言不虛。美國企業不止有本事左右華盛頓方面的政策制定，更是身體力行利用它的龐大資源去發揮，其結果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反映了華爾街方面的計畫。

美利堅帝國就是指親華爾街方面的全球經濟秩序，它是靠一個龐大網絡維繫起來的，這個網絡包括美國在全世界的軍事基地，外加十艘可投送兵力的航空母艦，眾多戰爭代理人 and 軍事盟友，還有說服社會大眾的機構，有國營的也有民營的，可用來塑造輿論風向、定義意識形態環境，以及設定公共政策議程。美利堅帝國透過強制手段（軍事和秘密情報機構）、說服手段（媒體、大學、智庫和公關產業），以及它對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控制，行使其霸權。

華爾街以兩種方式表現它在美利堅帝國的核心地位：首先，它提供人才組成了帝國的權力精英，權力精英們成為華爾街利益在政治上的活躍代表，並且在國家高層與企業、銀行界高層的職位之間進進出出。華爾街方面也在定義美利堅帝國的目標時居於核心角色。所以，美利堅帝國不僅是由華爾街方面治國，也是為了華爾街方面而運作。

誰在統治美國？

有許多作者已經清楚指出，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上是由富裕階級控制的，這個階級是指億萬富豪銀行家、富有的投資家和企業巨頭。這些作者順手撿來就有拉夫·米勒班（Ralph Miliband）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威廉·東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的《誰在統治美國？》（*Who Rules America?*）、湯瑪士·傅格森（Thomas Ferguson）的《黃金律》（*Golden Rule*）、以及馬汀·吉冷思（Martin Gilens）和班傑明·沛吉（Benjamin Page）的《美國政治學的試驗理論：精英、網路團體與一般公

民》（*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本書曾多次引用吉冷斯和佩吉的著作，正因為他們的研究如此擲地有聲，值得我們再次概述其論點：「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而獨立的影響力；一般公民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其影響力則是微乎其微或者完全談不上」。吉冷斯和沛吉所提出的是學術分析，但是，只要我們細心閱讀各大報紙，就會發現有無數實例均能呼應他們二人的結論。例如，據《紐約時報》報導，2016年民主黨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政治獻金，有一半是來自158個家族以及他們所擁有或控制的公司，這些公司主要是在金融業和能源業；我們可以由此獲得合理的結論：這158個家族和他們所擁有及控制的公司，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他們的人數（但不是他們的財產）應有的代表性。這是以另一個方式讓我們知道：與其說美國是民主國家，還不如說是財閥國家。美國資產階級的成員人人坐擁龐大的財富，只需要動用收入的一小部分，就能夠以金錢左右選舉。例如，芝加哥避險基金億萬富豪肯尼斯·吉芬（Kenneth C. Giffen），他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捐了30萬美元給共和黨候選人，這是一般市井小民望塵莫及的能耐。不過，吉芬月入6千8百50萬美元，那一筆政治獻金還不到百分之一。

以下是取自美國主要媒體的文章標題，它們更深入指出財富的角色如何形塑美國政治：〈川普提名倡議教育券億萬富豪貝琪·德弗斯擔任教育部長〉；〈川普預期億萬富豪投資家威爾布爾·羅斯舉薦商務部長人選〉、〈希拉蕊·傑布·錢錢錢〉（*Hillary, Jeb and \$\$\$\$\$*）、〈彭博啟動「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尋求全國影響力〉、¹⁰〈歐巴馬預算背後的商人身影〉、¹¹〈你投票給哪些百萬富翁？〉、¹²〈與高盛關係密切，羅米尼公私生活多采多姿〉、¹³〈保守的非營利法案是不能見光的商業遊說者〉、¹⁴〈國會的百萬富翁人數：261人〉、¹⁵〈白宮為

捐贈大戶敞開大門，遊說者趁機混入》、《歐巴馬藉遴選顧問釋放親商信號》、《與華爾街方面關係說不清楚，大傷希拉蕊·柯林頓形象》、《歐巴馬與華爾街方面見面氣氛不熱絡》。最後一則標題似乎是在暗示，華爾街方面對華盛頓方面的影響有所侷限（「見面氣氛不熱絡」）。事實上，那篇文章將美國政治描繪成一場競賽，資產階級的各方面勢力在其中一較高下，設法說服一般選民支持他們偏愛的候選人。這篇文章讓人想起一個充滿諷刺的觀察：政治的藝術在於有錢人如何說服我們其他人，以選票讓他們的代表人繼續掌握權力。

然而，這些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階級，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已大舉擴張到選舉場域之外。富人如何控制美國的政治？已故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艾伯特·齊曼斯基對其機制提出了精要的總結。

齊曼斯基和國家理論²⁰

美國的富裕階級控制了國家和政府，使國家的運作以他們的利益為依歸，違背廣大人民的利益也無所謂。即使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之下人人都有投票權，富裕階級仍然有許多方式能夠主導美國政府。富裕階級至少有七種方式可以控制美國政府：前四種是工具性機制，後三種是結構性機制。工具性機制是指富人直接介入美國政府，結構性機制則是指限制決策過程的各種條件。結構性機制獨立於工具性機制而運作，因此，即使富人不會直接影響政府，政府仍舊受到意識形態環境束縛，必須為了維持企業的信心而避免經濟危機，而且在必要時以軍事力量介入，達到有利於大企業的決策。

直接機制有以下四種：

- 安排富人或企業的高階主管，擔任國家的決策高層職位。
- 透過遊說者施壓民代或負責監管的政府委員，使立法及執政均能偏袒企業的利益。
- 選舉贊助。政客如果想在重大的選戰中獲得所需的政治獻金，即必須因應企業的要求行事。
- 重要政策制定團體的角色，如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外交關係協會、商業協會（Business Council），都是非常有力而且排外的私人組織，它們能利用安排自己人擔任高層職位、舉辦定期會議，以及將各種報告寄交政府等方式，將它們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傳送到政府當局。
- 在華盛頓特區，每一名國會議員都有七、八名遊說者以他們為目標；這些遊說者幾乎都是為大企業跑腿的。

國會人員、政府監管委員會主管及高層將軍在他們公職生涯告終之後，被大企業招攬成為遊說者，收入往往比擔任公職時更加豐厚。他們也深知公職之後的新生涯充滿種種大賺其錢的可能，因此身在政府部門時會盡其所能迎合未來雇主的利益，以確保將來能得到肥缺。

法律並未針對競選活動中金錢的角色設下任何限制，因此富人可以為所欲為，讓認同其利益的政客當選。

政策制定組織的成員，通常有三分之二是企業精英，另三分之一為學者專家、重要知識分子和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人士。這些組織邀請官員參與研討會及各種會議，同時也向政府投送諸多政策建議。

結構性機制有以下三種：

- 意識形態霸權：指企業將各種觀念植入我們腦海的能力，可讓我們的思考模式像他們一樣，而且按照他

們想要的方式行動。

- 企業罷工：指國家政策有損於企業獲利時，企業在司法管轄範圍之外行動的能力。凡利之所在，企業可自由投資資本，這樣的自由限制了政府的施政能力。
- 軍事霸權：如政府施政悖離企業利益，即以軍隊接管。

大多數人都是從主要媒體和教育體系獲知新聞及形成政治價值觀。主要媒體也是私人公司，它們與各大銀行的關係密不可分。媒體不僅本身是私人企業，也依賴來自大型企業的廣告收入。因此，它們對於大型企業有雙重依賴。若是媒體的內容反商，贊助商會隨即縮手。如此一來，我們獲得觀念的方式遂落入了大型企業的雙重控制之下。

大學的董事會通常由商界人士擔任，商界人士也是大學財源的主要貢獻者，因而其地位足以左右學術研究的內容。

由此可見，學校和大眾媒體都脫離不了大企業的掌控。我們從學校和大眾媒體學到政治價值觀和理念，其真正的來源是大企業。

我們以為自己的投票決定是發自內心的自由選擇，然而我們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是大企業藉由它們所控制的大眾媒體及教育體系，灌輸給我們的。所有大眾媒體和大學，它們的立場全部都是親企業的。

假使有個國家將最低薪資提高到三倍，而且給企業六月時間，限期停止污染。企業將會出走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域，在那裡薪資較低，也沒有取締污染的法律。於是，原地區會形成大量失業。到了下一回選舉，選民歸咎

政府造成經濟危機，執政黨會在選戰中敗給右翼政黨。右翼政黨承諾將會通過對企業友善的立法，為選民找回工作。它也可能會一併提議取消最低薪資限制，以及廢除一切反污染的法律。

只要企業可自由決定投資與否，亦即能在經濟方面自由決策，政府即必須建構環境以滿足企業牟利的要求；否則，政府將會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擺脫這種結構性限制的唯一方法，是拒絕私有企業有權自由進行經濟決策。換句話說，就是經濟決策國有化，使資本不會被遷移或閒置、資本之動員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準，而非為了少數富有業主的利益。

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大約有160個。約略從1940年開始算起，則至今只有八個國家的選舉制度和議會形式不曾中斷，它們是英國、愛爾蘭、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瑞士和瑞典；其他所有國家都曾經在某個時候有過專制或軍政府。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即是需要有軍事統治；只有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例外。但是，當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統治面臨嚴峻的危機挑戰時，它就會採取軍事統治。

通常軍隊會先接管政府，然後才又釋出權力。當軍隊接管政府時，平民政府心知肚明，只要他們實施反商政策，軍隊就會再度干預。因此，他們會保持在大企業可接受的政策範圍內，小心翼翼行事。萬一美國真的發生重大危機，威脅到資本家統治，美國的軍事將領必定會如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領袖一樣，挺身捍衛。

外交關係協會

齊曼斯基指出，外交關係協會是主要的精英政策制定組織之一，美國企業對政策的偏好可透過它傳達給美

國政府。勞倫斯·蕭普 (Laurence H. Shoup) 著有關於該協會的研究專書，書名為《華爾街方面的智庫》(Wall Street's Think Tank)。更早之前他曾與威廉·敏特 (William Minter) 合著《帝國智囊團》(Imperial Brain Trust) 一書，前書即是繼本書之後最新的分析。蕭普認為外交關係協會是一重要組織，美國的資產階級利用它奠定了施為能力和指導地位，協會本身已自成一階級。因此，它值得我們深入檢視。

外交關係協會是民間組織，設有主席一名（長年皆由大衛·洛克菲勒 (David Rockefeller) 擔任；至本書寫作時為止，他仍膺任榮譽主席）和董事會（成員通常是身家億萬或接近億萬的富豪），其會員大約有5000名，均是經過董事會篩選始能加入。該組織成立的宗旨，是會聚知識分子、傑出企業人士、媒體界頂尖從業員、國家官員及高級軍事將領，共同組成專屬社團，制定外交政策建議事項，向社會大眾和政府當局推銷。外交關係協會與美國政府有極為深入的關係，蕭普的調查發現，從卡特 (Carter) 政府一直到歐巴馬政府，如國務卿、國防部、財政部、國家安全顧問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等，這些他稱之為重要內閣的職位，有百分之八十都是由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擔任。還有總統（喬治·布希和比爾·柯林頓）及副總統（喬治·布希和理查·錢尼）在當選時是該協會的成員，卡特總統則是在卸任之後加入該協會。

以下是截至2016年為止外交關係協會成員擔任美國重要內閣職位的人數（他們被任命擔任這些職位「之前」往往是該協會的成員）：財政部長10人、國家安全顧問10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9人、國務卿8人、國防部長8人、CIA局長8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4人、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4人、世界銀行總裁3人、總統2人、副總統2人、國家情報局總監2人、國家安全局局長1人。

在歐巴馬政府中，有十七名成員也是隸屬於這個億萬富豪領導的私人社團，他們是小詹姆士·瓊斯 (James Jones Jr.，國家安全顧問)、湯瑪士·東尼隆 (Thomas Donilon，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萊斯 (Susan Rice，國家安全顧問、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提摩西·蓋斯納 (Timothy Gathner，財政部)、傑克·路 (Jack Lew，財政部)、羅勃·蓋茨 (Robert Gates，國防部)、恰克·黑格爾 (Chuck Hagel，國防部)、艾斯頓·卡特 (Ashton Carter，國防部)、大衛·佩區厄斯 (David Petraeus，CIA)、羅勃·鄒立克 (Robert Zoellick，世界銀行)、珍妮·拿破塔諾 (Janet Napolitano，國家安全部)、約翰·布萊森 (John Bryson，商業部)、培尼·普立茲克 (Penny Pritzker，商業部)、厄尼斯特·莫尼茲 (Ernest Moniz，能源部)、席爾薇亞 (Sylvia Burwell，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瑪麗·喬·懷特 (Mary Jo White，證券交易委員會) 和麥克·弗洛曼 (Michael Froman，美國貿易代表)。另外，約翰·凱瑞 (John Kerry) 雖然不是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但他身家近億萬的妻子德瑞莎·海恩茲·凱瑞 (Teresa Heinz Kerry) 則是其會員。

外交關係協會除了安排其會員擔任政府要職，也會主導專為國務卿、部會首長及CIA局長提供諮詢的外部委員會，直接影響政策。例如「外交政策委員會」的功能是「針對美國外交政策事務，為國務卿、副國務卿和政策規劃辦公室 (Policy Planning Staff) 主任提供獨立、言之有物的建議及意見」。它共有20名顧問，以2016年來說，其中有18名為外交關係協會的會員。還有「國防政策委員會」，其任務是「針對重要的國防政策事務，為國防部長、副國防部長、國防政策次長提供獨立、言之有物的建議及意見」。在2016年時，其22名成員之中有14人為外交關係協會的會員。2009年9月10日，當時的CIA局長里昂·潘尼塔 (Leon Panetta) 宣布成立由「傑出人士」組成的外部諮詢委員會，他們將「定期」蒞臨CIA總部，「就CIA之管理以及CIA與重要委託人、合作夥伴和社會大眾的關係，提出寶貴意見」。潘尼塔所提名的14名顧問之中，有10人是外交關

係協會成員，已超過半數。

外交關係協會和其他深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相關組織也有盤根錯節的關係，包括三邊委員會（即國際版的外交關係協會，接觸的範圍超出美國，可達到加拿大、西歐和日本的對口組織）、人權觀察組織及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人權觀察組織與外交關係協會之間有諸多關聯。2016年時，人權觀察組織的共同主席裘·莫特利（Joel Morley）、副主席約翰·史塔欽斯基（John Studzinski）〔投資公司布萊克史東（Blackstone）的全球總監〕、董事麥克·格勒特（Michael Gellert）、執行總監肯尼斯·魯斯（Kenneth Roth）、以及副執行總監卡洛·伯格特（Carroll Bogert），都是外交關係協會的會員。

國際危機組織的人員和外交關係協會有高度重疊。在2016年時它的榮譽主席喬治·J·米歇爾（George J. Mitchell）是外交關係協會成員，以下眾多理事也是其會員：

例如莫特·阿布拉莫維茲（Morr Abramowitz）、山謬爾·伯格（Samuel Berger）、衛斯理·克拉克（Wesley Clark）、湯瑪斯·皮克林（Thomas R. Pickering）、奧林匹亞·史諾威（Olympia Snowe）、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勞倫斯·薩孟爾斯（Lawrence Summers）。還有外交關係協會成員在本組織擔任顧問的，包括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史丹利·費雪（Stanley Fischer）、卡拉·希爾斯（Carla Hills）、史萬尼·杭特（Swanee Hunt）、詹姆斯·金賽（James V. Kinsey）、以及潔西卡·馬修（Jessica T. Mathews）。協會的索羅斯和洛克菲勒還是本組織的大金主。

2016年時，外交關係協會的會員包含各式各樣億萬富豪和商業界傑出人士，如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非暴力推翻政府運動的支持者，也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主席；自由之家是和CIA關係密不可分〕、可分的非政府組織〕、布魯斯·寇夫納（Bruce Kovner）、亨利·庫拉維斯（Henry R. Kravis）、培尼·普立茲克、大衛·魯本斯坦（David M. Rubenstein）、弗烈德利克·史密斯（Frederick W. Smith）、喬治·索羅斯、李奧納德·勞德（Leonard A. Lauder）、摩提默·楚克曼（Mortimer B. Zuckerman）、艾立克·史密特（Eric E. Schmidt）、史蒂芬·史瓦茲曼（Stephen Schwarzman）、約翰·保森（John Paulson）、洛依德·布蘭克芬恩（Lloyd Blankfein）、小艾德格·布洛恩夫曼（Edgar Bronfman Jr.）、傑米·迪蒙（Jamie Dimon）、小路易士·格士特納（Louis V. Gerstner, Jr.）、還有許許多多洛克菲勒、羅斯福以及其他豪門的家族成員。協會成員也包括媒體大亨魯波特·梅鐸（Rupert Murdoch）和大名鼎鼎的記者如湯姆·布洛考（Tom Brokaw）、萊斯理·蓋爾伯（Leslie H. Gelb）、羅伯特·卡更（Robert W. Kagan）、查爾斯·庫勞瑟默爾（Charles Krauthammer）、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路易士·蘭普罕姆（Lewis H. Lapham）、茱蒂斯·米勒（Judith Miller）、佩琪·魯南（Peggy Noonan）、瓦爾特·平克斯（Walter Pincus）、約翰·帕德霍瑞茨（John Podhoretz）、丹·拉瑟（Dan Rather）、大衛·桑格、戴安·索義爾（Diane Sawyer）、喬治·史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和芭芭拉·瓦特斯（Barbara Walters）。外交關係協會不止將它的會員安插在政府的重要職位以及有影響力的民間社會組織，同時也會拉攏頂尖的媒體人，協助將協會的觀點推銷給社會大眾。

瞄準國有經濟體制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每一個被美國干預的國家，不論是直接或假手代理人間接以軍事

手段介入，又或者是進行軍事威脅，那些國家都是具有大規模的國有經濟體制，亦即國家在經濟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要不然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民主化，有生產力的資產被重新分配，從私人（往往是外國來的）投資家中轉往工人和農人。於是，美國銀行、企業、投資家能從中剝削各國土地、勞力、市場和資源的空間，即使不至於完全被禁絕，也已經大不如前。這些國家包括蘇聯及其社會主義盟國，如中國、北韓、尼加拉瓜、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和敘利亞。我們可以預見，美國的外交政策既然是由富有的投資家階級主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這些針對美國牟利而設下的限制，必然招致反彈，成為務必克服的障礙，即使是以其他人的大量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例如，本書已經提過：據1996年時聯合國的估計，以美國為首的制裁措施造成伊拉克500,000名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瑪德琳·歐布萊特（外交關係協會成員）被《60分鐘》（60 Minutes）節目問到對此事的看法，她說：「那是個令人煎熬的抉擇，然而，我認為、我們認為，那是值回票價的」。²¹勞瑟多已經指出：和制裁措施有關的饑餓與疾病造成數十萬伊拉克人民死亡，柯林頓政府所犯的謀殺罪，遠遠超過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被指控的任何一宗罪行。更何況歸咎於史達林的人命傷亡，是因為他決定採取自衛措施的後果。在他掌權期間蘇聯面臨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入侵，以及冷戰，這些侵略性的行動都威脅到蘇聯的生死存亡，為了避免國家淪陷在永久的緊急狀態，史達林不得不然。相反地，美國完全沒有面臨伊拉克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即使如此，為了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在中東地區奠定美國的霸權，協助美國經濟精英持續累積其資本，美國總統柯林頓（外交關係協會的成員）仍然選擇犧牲不計其數的伊拉克人民寶貴的生命。²²

如果史達林被比喻為怪獸，我們必須用什麼比怪獸更巨大的詞彙才能形容喬治·布希、比爾·柯林頓以及喬治·布希？喬治·布希甚至曾經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伊拉克發動（軍事、經濟或雙管齊下的）侵略戰爭。國家面臨重大威脅時下定決心採取因應行動，導致成千上萬人命喪生，這是一回事（如史達林的決定）；為了實現外交政策的相關目標，也就是銀行家、投資家和石油公司能自由追逐盈利，即使毫無受到威脅之虞的情況下仍執意殺害不可勝數的生命，這又是另一回事（如布希和柯林頓的行動）。

美國和它的盟邦介入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國內的鬥爭，我們無需花費太多心思就能確定，它們的動機絕非是出於人權的考量。我們在前面各章已經談到：(a) 在中東地區被美國攏絡為盟邦的國家都是專制政權，它們蔑視人權和選舉權等基本權利，也反對女性有權利駕駛汽車（如沙烏地阿拉伯），其國風可謂舉世無雙。但是，華盛頓方面依然百分之百樂於偏袒這些反民主的君主制國家、酋長國和獨裁政府，願意出售武器給它們、在其領土內建立軍事基地，也保護它們在國際論壇上抵禦譴責、在它們國內免於民主勢力的反抗；以及 (b) 敘利亞是世俗主義、多元及民主的國家，但伊斯蘭遜尼派聖戰士企圖在敘利亞建立伊斯蘭國。美國以及同一幫獨裁國家正是他們的主要支持者。聖戰士攻擊敘利亞時，這些教派狂熱分子的殘暴行為在西方新聞媒體上只會受到機械式的關注，而且只有三分鐘熱度；反之，同等殘暴的行為如果是針對西方國家的目標，必有鋪天蓋地的報導。

因此，2015年11月伊斯蘭國攻擊巴黎時獲得極為廣泛的媒體報導，還被放大成天崩地裂的事件；類似的攻擊事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只是家常便飯。在敘利亞，這些攻擊是「反抗者」的行動，「反抗者」包括被冠上「溫和派」的伊斯蘭分子。總之，發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攻擊事件大部分都會被西方媒體忽視。例如，在2013年8月，伊斯蘭國、努斯拉陣線、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以及其他伊斯蘭狂熱分子，屠殺了超過200名阿拉維

派村民，並且綁架100名以上的婦女和兒童。²³遜尼派伊斯蘭是華盛頓方面便利好用的盟友，沒有西方媒體為遜尼派手下的受害人表示一丁點哀悼之意。

美國透過代理人激進好戰的遜尼派伊斯蘭，支持推翻敘利亞政府。有許多因素相互作用，使敘利亞成為美國的眼中釘，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敘利亞政府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最後堡壘**。阿拉伯民族的傳統範圍從北非橫跨到波斯灣，美國的企業階級從這一片廣大土地攫取金山銀山的能力，竟然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擋道。阿拉伯的國王、蘇丹和埃米爾，其地位的合法性並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依賴華盛頓方面的支持，才能繼續維持獨裁統治。他們知恩圖報，鼎力協助讓這個地區石油資源出售的利潤暢行無阻地流向美國。如果任由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渴望蓬勃滋長，未來這些石油資源將會用在阿拉伯地區的內部發展。從美國外交政策的策劃者看來，務必剷除阿拉伯民族主義傳染病的帶原者才行。

第二個原因：**敘利亞國內經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主要操之於國家**。在華盛頓方面，透過外交關係協會，銀行家、投資家和大型企業可毫不保留地發揮其巨大的外交政策影響力。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機關對於國家控制產業及企業的作法恨之入骨，可說是意料中事。2003年華盛頓方面推翻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之後，一開始所扶植的獨裁者保羅·布雷默（我們不必意外，他也是外交關係協會的會員）就任後第一要務，就是廢除前巴格達政府在進口和外國投資的限制。美國的資本無時無刻不在尋找可以輸出及投資的地點，布雷默的作法絕非意外之舉。於是，關稅被取消、無數伊拉克國有企業被標售、國內經濟大舉開放給外國投資、外國投資家可將百分之百獲利匯返本國，而且稅率經過重新設定，退回百分之15的單一稅率。²⁴

同理，美國對中國的敵意也是日益高漲，從歐巴馬政府的軍力重返亞太地區行動，以及外交關係協會呼籲華盛頓方面應「制衡中國崛起」（意思就是封鎖中國崛起），可見一斑。其敵意的根源，正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經濟上所占的角色。中國對經濟設下的限制，妨礙美國投資家和企業從中國的土地、勞力、資源及市場徹底實現獲利潛能，以致美國的外交政策機關對此咬牙切齒。說華盛頓方面反對國家經濟控制，只是用不同方式表達上述說法而已。美國投資家、企業界及銀行家希望中國是教人讚歎的利潤源泉，此一渴望卻無法充分滿足中國自身的發展策略。

大馬士革方面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者深入管控敘利亞的經濟，犧牲了美國投資家和企業。受大型企業控制的美國外交政策機關決定策動敘利亞的去復興黨化，其決策背後的主要考量，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

常言道，國家之間只有利害，沒有義氣。這句話是否帶有任何民主上或地理上合法的意義，使某個國家可以理直氣壯覬覦其他國家境內的經濟利益？只有帝國主義國家會有超乎國界的經濟意圖，並且會以威逼的手段作為後盾。美國政府官員總是援引「我們的切身利益」一詞，用以合理化對其他國家的干預。這個事實可作為尺度，衡量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肆無忌憚的程度。美國宣稱在中東地區的切身利益，猶如納粹德國宣稱在東歐的切身利益、法西斯義大利宣稱在地中海地區的切身利益、日本帝國宣稱在東亞的切身利益，以及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宣稱在亞洲和非洲的切身利益，同樣都是無稽之談。

只需檢視誰在影響華盛頓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即無可避免會獲致以下結論：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階級產物。藉由工具性和功能性機制而控制美國公共事務的，是銀行家、投資家和美國重要企業的大股東階級。這個階級只關注能否順利無礙地取用全世界的土地、勞力、資源和市場，使自己的身家財產不斷更上一層樓。

這個階級感興趣的利益甚至不侷限於地球。2015年，「歐巴馬總統……簽署使《美國商業太空發射競爭法案》(H.R. 2262)正式生效……承認美國公民擁有小行星資源的權利」。²⁵在美國國會的網站可以找到這份法案，它的內文提到：「(202節)本法案命令美國總統循適當之聯邦機構以……提昇美國商業實體探索外太空與利用太空資源，以及轉讓或出售此類資源之權利，並遵此義務，使免於有害之干預」。美國立法促進企業對外太空的剝削，此舉讓我們想到英國最惡劣的帝國主義者賽西爾·羅德斯爵士(Sir Cecil Rhodes)的話。羅德斯爵士曾出錢出力協助成立一個類似外交關係協會的前身組織，他說過：「這個世界幾乎已經被分配殆盡，剩餘的部分也被殖民者征服之後劃地為王。念及入夜以後抬頭即可看見的滿天繁星，那龐大無涯的世界都是我們永遠無法企及的。若是可以的話，我會併吞那些星球。這個念頭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裡。」²⁶美國的法案固然沒有授權可併吞滿天星斗，但它確實命令美國總統須提昇美國投資家擁有小行星資源的權利。如此一來，這個法案所要達成的目標，正是過去幾個世紀裡併吞行動經常會產生的結果，那就是讓資產階級能進入新領域，因而有機會擴充他們的財產。

由於美國的資產階級，亦即美國企業，他們關注能否順利無礙地取用全世界的土地、努力、資源和市場，使自己的身家財產不斷增多；所以，外國人民若是渴望控制自有的生財資產以滿足自己的目的，他們正是、也一直都是讓美國外交政策充滿敵意的對象。這一點，就算在敘利亞也同樣不假。

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政府代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最後堡壘；阿拉伯民族主義一向不滿美國企業對阿拉伯世界的操控，它在敘利亞的經濟事務上具有重要地位，不惜犧牲美國的投資家。敘利亞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思想，

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特色正好相反。在阿薩德眼中，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民主上和地理上都是正確的，他說：「敘利亞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不會讓人民為西方國家的利益而活。」²⁷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卻是想翻轉阿薩德的想法。

對美國的政策規劃者而言，敘利亞應成為美國的附庸國，與美國串通合謀，讓敘利亞人民為美國精英階級的經濟利益服務；也就是服務寄生在美國社會頂端、迫切想要統治全世界的那些億萬富豪、投資家和大股東。

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其核心是四大勢力的糾葛。第一大勢力是美利堅帝國主義，它有個四平八穩的名稱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利堅帝國主義致力於服務美國企業、銀行和投資家，在世界各地取得完全不受約束的出口與投資機會。至於吸引美國資本家想要進駐、定居和建立關係的國家，當地居民的意願為何，完全不在美利堅帝國主義的考慮之列。諸如經濟自由、自由企業、開放經濟、整平運作環境、消除障礙、克服關稅以及暢行無阻的商業等等觀念，在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策略文件中屢見不鮮，足以證實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要務正是美國企業。

北美地區最富裕的投資家、最具規模的銀行以及最龐大的企業，竟能驅使美利堅帝國主義推行他們的經濟計畫，其理由有二。

第一個理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會迫使美國企業不斷尋求累積資本的機會，永無止境。**企業對於盈利的胃口確實無遠弗屆，無法滿足於國內市場的機會，資本家的擴張慾望甚至不受地球所限。例如賽西爾·羅德斯爵士夢想併吞浩瀚宇宙中的星球，而美國企業亦要求開發各星球商業機會的權利，至少是對小行星的權利。

在美國社會中經濟地位最高的階層，其牟利計畫能穩居於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中心，第二個理由是：**經濟力**

量與政治力量大致上是峰峰相連的。美國的經濟精英階級與其他社會階層競爭時，不見得所向無敵；然而，他們的金錢力量能使獲勝機會大幅提高。2014年，政治學家吉冷思和沛吉針對1700個政策議題進行研究，該研究指出：「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而獨立的影響力；一般公民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其影響力則是微乎其微或者完全談不上」。

左右公共政策與外交事務的階級集團

美國的經濟精英階級亦即資本家階級，他們有非常多手段能發揮金錢的力量，以他們的偏好及迫切想要完成的任務強行干擾美國的外交政策。以美國企業精英的相對人數而言，他們在政府關鍵職位的代表性過高，並且主導了重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例如，美國的國會議員絕大多數是百萬富翁，他們的財富則是來自和他們有關係的企業。（以2012年美國的參議員為例，他們的平均身價超過2百70萬美元。）美國政府任命的內閣成員也大多是企業界的高層出身。

美國有多種不同的機制，讓企業社群得以將他們的偏好加諸於政府當局。首先，它有巨大的遊說者網絡，可代表它們向政府表達其觀點。比如大型公司即設有專職部門，負責施壓政府官員照顧個別企業的利益。各個產業也備有眾多遊說人馬，為該產業公司的共同利益代言。另外還有橫跨多種產業的遊說團體，代表這些產業的全體企業，維護其利益。那麼，當這些企業是在海外營運，它們的共同利益為何？當然是開放市場、平順的運作環境、低廉的薪資和低稅率，以及能夠毫無阻礙地取得投資機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文件中，這些觀念頻繁成爲其

政策目標，會令人感到奇怪嗎？

企業社群擁有大眾媒體和廣大的公關網絡，能在社會上帶風向。它資助政客的競選活動，而且只要他們當權時願意擁護企業的利益，企業即承諾在他們政治生涯結束之後，會有非常誘人的高層主管或董事職缺回報。這就是它控制政客行為的手段。

企業的高層主管們，經常在企業界的高階職務以及公務部門的重要官位之間來來去去。例如，紐約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國財政部的關係繁複，以致它的對手們稱它是「官盛」(Government Sachs)。高盛的前管理高層轉任政府要職的包括羅勃·魯賓(Robert Rubin)和亨利·保森(Henry Paulson)，均是擔任財政部長。同樣系出高盛幫的官方要員不計其數，雖然他們的職位比較不出風頭，卻仍然是在美國或其他地方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說，高盛幫的馬克·卡尼(Mark Carney)是加拿大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總裁，高盛前總裁馬利歐·杜拉吉(Mario Draghi)則是擔任歐洲中央銀行總裁。《紐約時報》指出，投資銀行「有史以來的文化即是鼓勵其合夥人在公家機關取得主管地位」，而且「在高盛銀行內部有一項普遍的共識：不論你賺進來的鈔票堆得多高，除非你能在政壇過水一番，你永遠算不上高盛的明星」。

柯林頓政府和高盛之間有緊密的關係。例如比爾·柯林頓任命高盛的共同主席羅勃·魯賓為財政部長；高盛的主席兼CEO洛依德·布蘭克芬恩(外交關係協會成員)為希拉蕊·柯林頓第一次角逐美國總統寶座募款，並且在希拉蕊離開國務卿職位後，以67萬5千美元的酬勞邀請她在高盛的活動發表過三次演講；布蘭克芬恩也是希拉蕊64歲慶生宴會的座上嘉賓之一。(布蘭克芬恩的前任高盛總裁亨利·保爾森，是小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紐約時報》報導：「二十幾年來高盛不止讓一些最有地位的顧問報效柯林頓政府，也進貢了數百萬美元

的政治獻金與演講費，並且為柯林頓家族基金會的慈善計畫提供金援。」。

然而，不止高盛能在政府當局處處留下足跡，其他還有許多大型企業的前任高層主管也能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

我們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被超級富豪控制，這個觀點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古怪。且看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所寫下的一段話：

「如你所見，有錢人跟你我大不相同：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大。這一部分是政治獻金因素使然，同時也 and 社交壓力有關，畢竟政客們都花費了大把時間和這些有錢人交際應酬。」。

克魯曼又說：

「……確保在意識形態上忠心耿耿的人可以獲得回報，是這個體系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科學家願意否定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經濟學家願意宣稱為富人減稅是經濟成長的要素、策略思想家願意為戰爭提供理由、律師願意為刑求辯護，他們都可以依靠組織網絡在背後支持，而那些組織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各自獨立，實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少數財閥家族資助的。」。

在《紐約時報》的另一篇專欄，克魯曼指出：「政策制定者幾乎完全是在迎合……那些靠資產獲得大筆收入者的利益」。他的結論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唯一的真正受益人」，是「銀行家和富豪，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大量各式債券」。這位經濟學家出身的專欄作家總結說道：「這一點說明了債權人利益何以能在政策中大舉膨脹其地位。這個階級不止是在選舉中貢獻良多，也和政策制定者有私下過從：許多政策制定者卸任公職之後，一穿越旋轉門即投奔他們的門下，克盡犬馬之勞。」。

美國的企業社群長袖善舞，他們在國內事務上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靈活運用在外交事務上，即使沒有更加呼風喚雨，至少也是同樣淋漓盡致。一般民眾對於國內政策的興致較為強烈，因為它的影響立即而直接。由於國內政策處理的事務攸關一般家庭，有其直接影響，所以民眾也比較有可能了解國內政策。相反地，就以美國在海外的軍事任務來說吧，對大多數美國公民而言，那是既遙遠又間接的；若是由特種部隊或無人機在秘密計畫之下執行，那更是全然脫離社會大眾的視線。因此，相較於外交政策（它的影響往往是在遠方，不但間接而且難以釐清），若是國內政策和公民利益唱反調，民眾更有可能起而反對（因為他們對國內政策比較可能目有所見、心有所感，也能深入了解）。其結果就是：企業社群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可享有暢行無礙的場域供其操作，即使美國社會的其他各界有任何反對聲浪，也是微不足道的。

涉及外交政策的高知名度智庫中，有許多個是由企業資助的。接受企業資金的智庫大多數是由企業社群的人員指揮，這些智庫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言亦是反映企業社群的利益。

在企業控制下的智庫和倡議組織（advocacy organizations），會提供「專家」於媒體上評議外交政策事務；記者在報導外交政策時，亦會諮詢這些專家以獲得背景知識。社會大眾所感知到的意見如果是權威而且完全獨立的，最容易影響輿論風向。因此智庫專家所展現出來的專業人士姿態，不僅是具備專業知識，也要是公正無私的，藉此負責引導輿論的發展方向，迎合企業社群所好。

最精細的傳播網路

在此我們就舉戰爭研究所（ISW）為例說明。ISW 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智庫，由美國的軍火工業出資成立。它的贊助人簡直就是武器製造商名人錄，包括雷神、通用動力、諾斯洛普·格魯門（Northrop Grumman）到 DynCorp 等都到齊了。在 2016 年時，它的所長是退休的美國將軍傑克·基奈（Jack Keane）。基奈同時身兼 McLife、厄賴·巴壇保全服務（Allied Barran Security Services）和軍火業巨擘通用動力等三家公司的董事高位。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注意到：ISW 及它的企業贊助人都會有興趣促成美國軍方以武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對這個智庫的贊助人來說，戰爭是發財的好事。

ISW 有兩個角色：一是政策制定，一是輿論塑造。在政策制定方面，有一部分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支持壯大軍力及頻繁用兵的政策建議。至於輿論塑造方面，則有一部分工作是展開宣傳活動，呼籲支持政府提昇強大的軍力。基奈是公開支持軍備的主角，他與大眾媒體合作無間，而媒體則是將他的功能視為「中立」的軍事分析家。伊拉克與敘利亞都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取向的國家，拒絕承認美國自以為是的全球經濟領導者角色，其態度與美國企業的利益悖道而馳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軍火工業是美國企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也是基奈的智庫 ISW 的金主；因此，基奈經常上 CNN（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節目，鼓吹美國以軍事手段介入伊拉克及敘利亞。

其他還有幾十名經常出現在大眾媒體的「中立」專家，同樣也是軍火工業的代表。這份名單包括：退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將詹姆士·瑪蒂斯（James Mattis），他是通用動力的董事；退休的美國上將安東尼·辛尼（Anthony Zinni），他是英國武器公司 BAE 系統的董事；約翰·嘉瑞（John Garret），他是退休的海軍上校，目前是福斯新聞的軍事分析家，也是五角大廈供應商派頓·博格斯（Patton Boggs）的說客；還有詹姆士·馬克斯（James Marks），他是退休的美國陸軍上將，曾擔任 CNN 的軍事分析家三年，同一期間也是武器製造商麥克尼爾技術

(McNeil Technologies) 的資深總裁。

「伊拉克解放委員會」這個組織是另一個例子，可用以說明企業社群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NBC（全國廣播公司）最傑出的兩名軍事分析家巴瑞·麥克考佛瑞（Barry McCaffrey）和韋恩·唐寧（Wayne Downing）這兩人都曾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也都身兼多個重要武器供應商的董事，但NBC從未承認他們與軍火工業的關係。

像麥克考佛瑞和唐寧這類軍事分析家，通常與美國政府都有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是大衛·巴思托（David Barstow）在2008年的《紐約時報》曝光的，他發現大眾媒體的軍事分析家可從五角大廈直接收到談話備忘錄。

巴思托寫道：

「在社會大眾眼中，這些人屬於一個熟悉的團體，他們曾經在電視和廣播中以『軍事專家』的角色現身千百次。過去的長期職務養成他們的能力，可在後九一一的世界針對最為迫切的課題，提出權威且完全不受束縛的論斷。（但是，）他們這些分析家（絕大多數）和軍事承包商有密切的關係，而他們在節目中被要求評論的戰爭政策，可能正好是由那些承包商包辦的。（他們代表）一個龐大的承包商組合，正在爭食（五角大廈在）軍火業製造出來的上兆生意大餅；他們（往往）比新聞網的記者有更多發言時間……能夠引導觀眾如何詮釋各種事件。」。

企業社群用以型塑輿論的網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為大眾媒體備妥虛假的「獨立分析家」。這些分析家塑造觀眾和讀者詮釋各種事件的方式，藉此說服社會大眾支持能迎合企業社群利益的政策。在國內政策方面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是：大眾媒體依賴銀行派經濟學家和CEO，將他們視為經濟政策的專家。不可否認會有一些左翼的聲音能夠進入大眾媒體，但是工人和左派的觀點終究會被大量的親企業觀點淹沒。而且，納入另一方的聲音也讓大眾媒體得以宣稱，它們已經提供了遍及政治光譜的多樣化觀點。

企業社群用以型塑輿論的網絡，最為重要的部分是大眾媒體。大眾媒體本身即是大型企業，同時亦是組成企業社群的一份子。大眾媒體所推動的立場，是能夠與大眾媒體的切身利益相容、而且有利於它們自身和它們所屬的企業社群；這個看法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報紙的所有權屬於工會，它所推動的立場會是迎合工人團體的利益；這一點無庸爭議。再者，如果是環境主義派擁有新聞網，對於利用水力壓裂法（fracking）獲取天然氣以及部署管路設施，會有特定的觀點；此一說法同樣也不會引起太多反對。那麼，當媒體的所有權屬於富有的企業主，媒體即會反映有錢企業主的觀點；這當然是意料中事。既然大多數人認識外交政策的管道都是大眾媒體，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外交政策的了解正好都反映了美國企業精英的觀點。

企業社群塑造輿論的網絡也包含監視輿論的民調公司，以及負責開發風向帶動方案的公關公司。此外，企業社群也會發揮其商業行銷的專業知識，進行政治行銷和型塑選民、立法者及政治決策者等人的意見，贊同能促進企業社群利益的政策。這一切就如同是在操縱消費者的品牌選擇。企業社群已將行銷技巧提昇到科學層次，並且能善用行銷科學鼓動輿論，在國內聲援對企業社群有利的政策。

上述是國家理論的工具機制觀點，另外還有一套對立的國家理論則是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它所架構出來的環境會使得在其中運作的政府，被迫依企業社群的利益而制定政策。這個觀點的涵義之一，是指資本主義國家高層官員的政治取向大體上是毫不相關的元素。根據這個理論的邏輯，資本主義已經架構好了政策範圍，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只能在其中運作，不論保守派、自由派、自由民主派，甚至共產主義派，凡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選舉出來的人，都只能強制在同樣狹隘的政策空間裡運作。這個觀念最重要的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景氣和

穩定性，有賴於私人資本的擁有者賺到足夠的利潤。他們若是無法創造足夠的利潤，就會停止投資，經濟活動也會因之戛然而止。為了維繫社會穩定，政府務必透過政策支持企業群體的盈利活動。否則，經濟危機將會從天而降，政府也會流失民心。所以，政府的抉擇是：支持私人資本擁有者的盈利活動，避免發生危機而動搖持續執政的基礎；或者，利用政策干預資本累積，也因此陷入執政危機，並在下次選舉中落敗，而接替它執政的新政府則是重啟舊政策、支持私人資本擁有者的獲利能力，藉以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性。

結構理論與工具理論代表美國政府運作方式的兩個互補過程，美國政府即透過此兩種過程滿足企業社群裡社會上流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必須維護社會穩定與景氣，因此在現實中的政策選擇乃侷限於支持企業盈利的範圍內；不僅如此，擁有巨大財富的企業社群同時也讓其精英階級能夠利用智庫、倡議組織、遊說者，以及將它們的代表安插在政策決策的重要職位等手段，主導施政歷程，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由於美國政府受到這些資本主義勢力控制，我們可以確信：其他國家凡是追求國內人民的利益優先於美國投資家、銀行和企業的對外投資與出口利益，必然會抵觸美國的外交政策。

大阿拉伯世界是個山雨欲來的可怕夢魘

在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第二大勢力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克服歐洲殖民主義在阿拉伯世界所遺留下來的發展落後和分崩離析，以及面對美國的控制力量 and 經濟計畫時的毫無招架之力。**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與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是水火不容的**，它未將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視為至關重

要、不可或缺，而是代表令人厭惡的剝削，必須群起反抗及抵禦。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美國資本家的價值觀處處格格不入，這個事實再加上美國資本家始終渴望領導、整合全球的經濟秩序，為它們自身的利益效力，終於讓華盛頓方面決心推翻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這三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從1990年開始，美國消滅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企圖心益發強烈。

1990年是意義深遠的一年。蘇聯一向都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的後盾，但是1990年的蘇聯已經在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屈服，正處於解體的邊緣。蘇聯對於去殖民化的貢獻不知凡幾，如今隨著蘇聯即將垮台，美國遂成為舉世唯一的超級強國。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共產主義國家正在自取滅亡，這是天賜良機，讓美國立即展開了它的資本化計畫。美國要將全世界併入由它領導的全球秩序，蘇聯不再，它的計畫即不會受到任何阻力。

十幾年來，以美國為首對伊拉克的戰爭，經由軍事干預、經濟封鎖和最後的公然入侵等手段，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業已被清除殆盡，它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徹底瓦解，更在美國的監督下制憲，永遠禁止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再有機會於巴格達政府掌握具有影響力的地位。伊拉克曾經努力營造阿拉伯人的團結統一，以及在境內促進超越種族、宗教和部族隔閡的和諧。例如，為了克服部族的分歧，復興黨禁止使用部族姓氏。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總統以單名「薩達姆」為人所知，正是復興黨的努力成果之一。但是，美國也重組了伊拉克，將它的政治奠基於民族及教派的劃分之上，破壞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心血。

華盛頓方面多年以來一直與薩達姆政府勾結，意欲剷除共產主義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美國的外交政策機構將它們視為美國在中東地區利益的威脅，其威脅程度甚至高於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復興黨員並非共產黨員，無

論華盛頓方面的強硬派多麼強烈地主張他們是一丘之貉。敘利亞的復興黨雖然同時與國內及莫斯科的共產黨互相合作，卻也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因為對共產主義並非毫無疑慮。薩達姆則是更進一步，和 CIA 聯手對伊拉克境內的共產黨員開戰。對美國來說，薩達姆大有利用價值，可以用戰爭牽制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派。我們已經提過，1979 年以後伊朗人即開始大力反抗美國的領導地位，轉而投入統一伊斯蘭世界及對抗美國控制的計畫。華盛頓方面提供伊拉克武器和情報，協助它對伊朗的戰爭得以進行到底。

然而，伊拉克在 1990 年入侵科威特，此舉大幅升高阿拉伯民族主義對美國在中東地區利益的威脅。從華盛頓方面來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已準備就緒，就要入侵阿拉伯半島，很有可能使半島上豐富的石油利益從此落入阿拉伯民族主義計畫的控制之下。如此一來，將是美國企業在阿拉伯世界的活動遭受一大挫敗。其理由有二。

第一，阿拉伯半島的石油財富將會被用來提昇全體阿拉伯人的生活，而不是讓沙烏地王朝和美國石油公司等少數人變得更富裕。伊拉克的復興黨早已運用國有石油產業改造了伊拉克社會，奠定龐大的新基礎建設，連美國國務院的前官員也認為它所創造的是伊拉克的「黃金時代」：「學校、大學、醫院、工廠、戲院和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就業普及亦使勞力短缺的問題獲得改善。」若是能再加上阿拉伯半島的石油財富，可以確信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成就將更加無可限量。

其次，假使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能利用銷售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島石油的收益，創造出橫跨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島的黃金時代，必然也能鼓舞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世界的全體阿拉伯人可能會重新集結起來，對抗美國企業的勢力。對美國的資本家階級來說，大阿拉伯世界是個山雨欲來的可怕夢魘：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將可能創造「一個非常重要阿拉伯人重心，其影響力遍及全世界」，從此拒絕美國銀行、企業和投資家所要求的

開放市場、平坦的運作環境和親外國投資的政策。

為了應付這項威脅，五角大廈大張旗鼓，不但將伊拉克的勢力逐出科威特，也在阿拉伯半島成立一支軍隊，以備不時之需。後者在奧薩瑪·賓拉登眼中即等同美國入侵伊斯蘭祖國，大舉加速了蓋達組織的成長，使之成為動員聖戰士對抗美國的力量，而不是如同在阿富汗時，與美國結盟的伊斯蘭遊擊隊。（後來，在敘利亞的蓋達組織則是貪圖行動之便，改與美國聯手對抗大馬士革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隨後是長達十年的制裁時期，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在伊拉克所創造的黃金時代被破壞無餘，伊拉克政府受到嚴重的打擊，使它再也沒有反抗之力。2003 年，華盛頓和倫敦兩方面合力入侵伊拉克，迅速對伊拉克政府展開去復興黨化、廢除它的社會主義經濟，並且重新營造企業環境，歡迎美國進口和投資。

石油公司頭痛的合夥人

英國和法國是以前全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國家，現在是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邦。2011 年，華盛頓方面與英法聯手，再加上伊斯蘭遊擊隊，共同推翻了利比亞的世俗阿拉伯派領導者穆安瑪·格達費。格達費於 1969 年推翻英國卵翼下的國王伊德里斯一世，取得政權。利比亞在 1959 年發現石油，但是國家從石油獲得的收入並沒有用來改善利比亞全體人民的生活。利比亞國王和他的隨從，以及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壟斷了利比亞石油的收益，利比亞的國民卻是過著污穢、野蠻而且短暫的人生。

在 1960 年代，利比亞的首都的黎波里仍是一個廣大的貧民窟，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沙漠雄獅」烏瑪

爾·穆克哈塔領導義大利叛軍對抗利比亞的殖民，賈邁勒·阿卜杜·納塞爾則是偉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格達費受到他們兩人啟發，決心解放利比亞，脫離西方國家的擺佈，並且利用利比亞國內的石油財富克服殖民國家所留下來的落後開發。美國繼承鄰近的黎波里的英國軍事基地，但美軍隨之被格達費逐出該基地。五角大廈十分重視那個空軍基地，因為它距離蘇聯不遠。格達費同樣追求阿拉伯社會主義計畫，以國家控制、規劃及指導經濟。藉由銷售石油的收入，利比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很大程度改善了國家的落後現狀，大幅提昇「沿海居民的生活」，使他們的日子「遠遠超乎父親及祖父那一輩的想像」。¹³

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一樣，格達費也挑戰了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些民族主義派坐擁龐大的石油，以致他們的挑戰讓美國感到芒刺在背。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控制著令美國石油大公司垂涎不已的資源，美國石油公司的條件如果不能以當地人民的利益優先，即無法取用這些豐富的自然資源。透過計劃經濟政策，民族主義派可取得石油收入，用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於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會成為令人振奮的榜樣，示範發揮石油財富所能達到的成就。對美國企業來說，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一、獨立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極有可能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被有樣學樣，這是有損美國企業利益的一大危機。

格達費的民族主義立場堅毅無比，是西方石油公司及美國國務院最棘手的麻煩。格達費推行強硬的交易，而且利比亞最多產的油田只限國營石油公司可以開採，導致西方石油公司強烈不滿。美國國務院則是抱怨利比亞正在實施「資源民族主義」，指責格達費政府「在能源業有越來越多民族主義化的政策」。《紐約時報》總結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的不滿，指出：「事實證明」，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是令這些跨國石油公司頭痛的合夥人」。¹⁴過去利比亞國王先和民營的石油大公司簽訂慷慨大方的合約，然後再因為他的「協助」而從中分一杯羹，這種日子

已經一去不返。事實上，阿拉伯半島上那些出身英國精英軍事學院桑德赫斯特的國君、埃米爾和蘇丹，大多數貴族都喜愛這種做生意的模式。這個模式是阿拉伯半島的統治者幫石油公司圍事、華盛頓方面幫這批統治者撐腰，相輔相成，互蒙其利。格達費是民族主義分子，而且受到利比亞自決的夢想激發，他當然無法接受一味討好西方經濟利益的模式。基於這個原因，長期以來他都是西方國家政府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北約是美國企業精英階級的軍事打手，它結合了反對阿拉伯世俗主義的伊斯蘭，終於成功拔除格達費政權。從此以後，在阿拉伯世界僅餘下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那就是「阿拉伯主義之地」敘利亞。

華盛頓方面不滿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敘利亞，正如它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下的伊拉克和利比亞，因為敘利亞將會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戰鬥的焦點，集結反抗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¹⁵阿薩德政府反對美國接收伊拉克，也拒絕配合華盛頓方面將近征服的伊拉克併入美利堅帝國。以色列是歐洲勢力在阿拉伯世界中心扶植起來的猶太人民國家，大馬士革政府對此恨之入骨。大馬士革政府援助為巴勒斯坦自決而戰的團體，並且與真主黨結盟，而真主黨的存在目的正是保衛黎巴嫩政權，抵抗以色列擴張領土。華盛頓方面也對此大表不以為然。

伊朗擁護伊斯蘭世界獨立，否定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竟與伊朗維持結盟關係，更是招致美國官方痛斥。敘利亞與美國所謂的「同行冤家」俄羅斯結盟，同樣也讓阿薩德政府始終得不到美國戰略家關愛的眼神。最後一點是復興黨在敘利亞所建立的經濟體制：據2005年時美國研究員所作的描述，它「以國有為主……由國營部門主導」，而且「主要是以蘇俄模式為準」；¹⁶大幅限縮了美國銀行、企業及投資家的盈利空間。美國自詡有能力領導而且有意願領導的全球經濟，在華盛頓方面的想像中，是開放的市場、整平的運作環境，以

及自由企業。但是，這一切卻被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徹底否決。

阿薩德拒絕臣服於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他眼中其領導地位既不重要更非不可或缺，只不過是致力於優先追求美國的私人經濟利益，忽視以往被殖民的阿拉伯世界，包括敘利亞，對於開發的渴望和需求。阿薩德理直氣壯地宣告：「敘利亞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不會讓人民為西方國家的利益而活。」對那個堅持要當世界盟主的國家，這無疑是重重的一記打臉。阿薩德以及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同伴，都選擇不服從的立場，註定他們必須被剷除的命運。伊拉克已經早一步遭受去復興黨化，敘利亞將會步上它的後塵。

條件轉置謬誤

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居於核心的第三大勢力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伊斯蘭，這是阿拉伯世界遭遇歐洲帝國主義後伊斯蘭教徒的反擊。穆斯林兄弟會係由哈桑·班納領軍，反抗埃及在英國的控制之下逐步去伊斯蘭化。已往埃及的法理是建立在《可蘭經》、教規和先知穆罕默德言行錄等基礎之上，卻日益被凡人所制定的法律取而代，不復以伊斯蘭為依歸。伊斯蘭宗教法庭的治理能力正在衰落，伊斯蘭所嚴禁的高利貸、飲酒等行為則是開始繁榮興盛。穆斯林兄弟會誓言，將要恢復被西方勢力侵蝕的伊斯蘭宗教傳統。兄弟會反對以西方的任何意識形態替代伊斯蘭，成為組織政治、法律和行為的基礎。它所反對的意識形態包括帝國主義、世俗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兄弟會的座右銘宣告「《可蘭經》是我們的憲法」，其使命已經昭然若揭。

由於諸多顯而易見的原因，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很早就與復興黨發生衝突。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主張要建立世俗派國家，而且企圖以共同的民族性為基礎，發起大規模的阿拉伯人運動，對抗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勢力。相反地，兄弟會力主恢復伊斯蘭國家，並以遜尼派對伊斯蘭的基本教義詮釋為基礎，動員阿拉伯人。世俗民族主義派的目標正如同世俗化革命家阿塔圖克在土耳其所做的，是要仿效西方世界的現代性，藉此超脫阿拉伯世界的落後，使西方世界無法再控制阿拉伯國家。世俗民族主義派要建立世俗化社會和西方模式的現代經濟，但是兄弟會之見大不相同。兄弟會認為：伊斯蘭的軍事及經濟力量曾經遠遠高於歐洲，如今穆斯林世界相較於西方世界卻是呈現衰敗的處境，解決之道是重返伊斯蘭的往日榮耀，回到軍事、經濟和科學等方面均不容小覷的伊斯蘭世界。「原教主義派」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共產主義的衰頹必須回歸馬克思的原典才能振衰起敝，這是他們眼中的正道，然而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等等「沉積物」卻領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偏離正道。同樣地，對兄弟會而言，穆斯林世界的地位與西方世界相比之下何其低落，唯一的對症之藥是返回伊斯蘭，一切言行均奉行原始教義的信仰。

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敘利亞的穆斯林兄弟會始終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死對頭，經常發生血腥的巷戰。在某次衝突中，有一名叫作哈菲茲·阿薩德的年輕復興黨積極分子被穆斯林兄弟刺傷。復興黨掌權之後，這兩股勢力之間的仇恨持續蔓延，也變得更加激烈、更加難分難解。

從1970年代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的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一向都是最強大的反對力量。兄弟會為了對抗敘利亞政府，組織了各種遊行示威、暴動和遊擊隊攻擊。復興黨亦努力照顧伊斯蘭分子的需求，卻於事無補，往往必須強力壓制兄弟會，有時甚至是採取血腥鎮壓的方式。他們雙方的鬥爭已經變成你死我亡、不死不休的地步。

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習於操弄分而治之的策略，它們的作法通常是先找出對當地統治者心懷不滿的團體，然後以結盟的方式拉攏這些團體。例如，西班牙在美洲建立過龐大的帝國，它的方法就是「在當地找出屈居次等地位的印地安人，和他們結盟之後，藉由他們的協助推翻每個地區原來的土著統治者」。¹⁸ 在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正是和次等印地安人相同的角色，可作為帝國主義國家備選的盟友。為了扳倒共同的敵人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權，只要是華盛頓方面能提供的協助，穆斯林兄弟會均來者不拒。有證據指出，西方國家早在1980年代即已開始武裝穆斯林兄弟會的遊擊隊。

「維基解密」取得的美國外交機密電報則是顯示：布希政府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推翻阿薩德政府的行動，即使不是更早，至少在2005年時就已經開始了。到了2012年，一份美國國防情報局外流的文件證實，在反抗復興黨政府的叛亂中，穆斯林兄弟會居於第一線，其他共犯還有原教主義派和伊斯蘭國的前身伊拉克蓋達組織。薩義德·庫特布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大師，他的思想對蓋達組織有深遠的影響。與敘利亞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對抗的戰鬥，是由伊斯蘭國和努斯拉陣線這兩個伊斯蘭組織主導的，它們正是受穆斯林兄弟會啟發的蓋達組織後裔。

沙烏地專制政府推出了另一套政治伊斯蘭教條，它是華爾街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第四大勢力。在十八世紀時，巡迴牧師阿布多·瓦哈比與沙烏地王室是政治盟友。瓦哈比主義即是以瓦哈比的思想為基礎，它鼓勵遜尼派穆斯林以遜尼派分子自居，和什葉派「異教徒」對壘。這種分裂思想破壞阿拉伯人的團結，也致使阿拉伯境內的衝突火上加油；唯有阿拉伯世界的壓迫者美國、以色列，以及甘為帝國主義奴才的阿拉伯君主和獨裁者因而大感不亦快哉。沙烏地專制政府耗費鉅資在阿拉伯及伊斯蘭世界推廣瓦哈比主義，為了掌控敘利亞

而發生的戰鬥中，瓦哈比主義的角色極為重要。它鼓吹阿拉伯人分裂，激勵他們為了誰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繼承人而發生而互相殘殺，無暇分心對抗美國的控制勢力和為虎作倀的當地統治者。

美國也致力於深化敘利亞境內的教派鴻溝。在敘利亞內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與遜尼派政治伊斯蘭的衝突，被美國刻意捏造成阿拉維派和遜尼派之間的鬥爭，少數族群阿拉維派是統治者，而多數族群遜尼派不得不起義對抗阿拉維派的迫害。敘利亞的宗教少數族群容易被復興黨吸引，其程度遠大於遜尼派穆斯林。而且，復興黨主政之後，此一失衡現象也反映在政府的人事任用上。美國所炮製的神話即是以這個事實為基礎杜撰而成的。

復興主義對宗教少數族群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復興主義派支持世俗主義**。宗教少數族群有正確的認知，他們相信在世俗派國家能有更加安全的生活，勝於被穆斯林兄弟會統治。在穆斯林兄弟會統治之下，對伊斯蘭的非正統詮釋一律都不會獲得採信，非穆斯林教條也會被視為大謬不然，而且一切政治、行為及法律，都必須根據截然不同的信仰為基礎。

復興主義之所以能強烈吸引宗教少數族群，第二個理由是因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唾棄教派主義**，威信獨尊單一教派的作法有害於阿拉伯統一的目標。宗教少數族群認為復興黨的統治是一道屏障，能遏止多數族群遜尼派迫害宗教少數族群的可能性。

第三個理由在於**敘利亞國內階級和宗教合流的現象**。宗教少數族群多是貧窮、農村和工人階級，相當不成比例。相反地，地主和商人往往都是遜尼派。因此，復興黨對社會主義的承諾感召了最貧窮的敘利亞人，而他們通常都是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族群。至於被復興黨計畫吸引的遜尼派穆斯林，則是傾向於中等出身者。

特定宗教信仰者在政黨內的代表性不成比例，這個現象並非絕無僅有，在其他國家、其他時代也見得到。舉

例來說，從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猶太人和共產主義就是一組流行的聯結關係。猶太人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階層比例過高，而且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有許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也都是猶太人。「在美國有相當多，甚或絕大多數的共產主義者」皆是猶太人。有一份EBJ的推估認為，在1940年代「有百分之50到60的共產黨員都是猶太人」。即使有絕大多數或者許多共產黨員是猶太人，當然不可逕自推論絕大多數或者許多猶太人都是共產黨員。那樣的推論方式犯了形式邏輯上的「條件轉置謬誤」(error of transposing the conditional)。然而有些人，其中或許以希特勒最著名，他們相信可以利用同樣的換位偏誤將猶太教與共產主義這個眾人皆知的聯結大肆發揚光大，抹黑共產主義運動。他們的目標是利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是猶太人這個事實，影射馬克思主義只是個幌子，掩飾宗教少數族群真正的政治計畫。(希特勒譏刺馬克思國際主義是猶太人卡爾·馬克思所研發出來的。)

穆斯林兄弟會採用了相同技倆，稍後連美國官方和大眾媒體也跟進。他們合力經營，要讓世人普遍接受阿拉維派信仰和敘利亞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之間的聯結。於是，復興主義被描繪成偽裝用的面具，其真面目是敘利亞少數族群阿拉維派的政治計畫(穆斯林兄弟會痛斥阿拉維派異教分子哈菲茲·阿薩德和他的兒子巴沙爾，因為這一套偽裝在他們手中更加爐火純青)。以教派的外衣包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遜尼派伊斯蘭的意識形態鬥爭，美國方面的貢獻，是去除了穆斯林兄弟會所使用的語言，那些語言帶有顯著的遜尼派伊斯蘭色彩。例如，美國官方不會用「異教徒」一語抨擊阿薩德。但是，提到阿薩德政府時，則是經常使用「阿拉維派領導」、「阿拉維派主導」和「阿拉維派控制」這類說法，至於叛亂分子卻往往只是用「絕大多數為遜尼派」輕輕帶過。西方媒體記者提及第一任布爾什維克政府時，一向都是稱之為「猶太人領導」、「猶太人主導」和「猶太人控制」，而說到反抗分子則是用「絕大多數為俄羅斯東正教」輕描淡寫。以上兩個實例可謂一前一後，交相輝映。西方政客及大眾媒體企圖型塑世人的理解，讓大家都相信敘利亞境內所發生的是教派衝突，是宗教少數族群積極想要維持教派統治，壓迫多數族群遜尼派。希特勒對馬克思國際主義的手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將它營造為宗教少數族群猶太人的工具，暗中實現對多數族群德國人的迫害。

採取這套技倆的一方似乎是打著這樣的如意算盤：將暴動分子描述成絕大多數是遜尼派，即可誘使人們犯下條件轉置謬誤，誤認為占敘利亞人口多數的遜尼派也絕大多數都反對敘利亞政府。不但沒有證據足以證實這個結論，倒是不乏反證。在暴動爆發前夕，《時代》雜誌的報導說：即使「批評家也承認阿薩德非常受到人民歡迎」，而且他能使「個人廣受社會大眾」愛戴。達拉發生暴動之後一週，《時代》的記者蕾妮雅·阿保柴德指出「敘利亞國內並沒有普遍出現改朝換代的呼聲，阿薩德擁有相對較多的民意支持，也無人要求他下台」。而且，抗議者和教士們提出的各項要求，確實不包含呼籲阿薩德退位；抗議者的人數亦始終達不到關鍵多數。相反地，正如《時代》雜誌所報導的：敘利亞政府依然沉醉在「大多數人民」對領導者「忠心耿耿」的情境中。²達拉暴動發生之後超過一個月，《紐約時報》的記者安東尼·沙迪德寫道：「至目前為止，抗議活動似乎仍見不到埃及和突尼西亞那種全面性的革命動盪」。²

英國的民調公司 YouGov 在2011年的年底進行過一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百分之55的敘利亞人要求阿薩德繼續執政。這個結果證明阿薩德政府仍然深得民心。這項調查幾乎完全得不到西方媒體的青睞，以致英國記者強納珊·史提爾(Jonathan Steele)都不禁要問：「假設有一項值得看重的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敘利亞人均贊同巴沙爾·阿薩德留任總統，難道這稱不上重大新聞嗎？」史提爾將民調結果形容為「難堪的事實」(D,

convenient facts），它之所以被消音，是因為西方媒體對敘利亞事件的報導失去了「不偏不倚」的立場，已經淪為「宣傳武器」。²³

指稱敘利亞政府是「阿拉維派領導的」，不免言過其實。阿薩德政府的內閣成員大多屬於敘利亞的多數族群遜尼派，正如伊拉克的薩達姆政府，它的重要職位也大多數是由伊拉克的多數族群什葉派擔任。儘管如此，這兩個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均遭美國官方栽誣為少數族群教派的統治工具。在敘利亞的安全機構，有許多重要職位係由遜尼派擔任，敘利亞前線的軍事將領，也有許多人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不僅如此，敘利亞阿拉伯軍的士兵以遜尼派占多數，以致敘利亞的軍隊其實正是國內最大的遜尼派軍力。哈菲茲·阿薩德最得力的助手馬斯塔發·塔拉斯（Mustafa Tlass）是任期長達30年的國防部長，他也是遜尼派。巴沙爾·阿薩德的妻子阿絲瑪·阿薩德〔Asma al-Assad，本姓阿卡拉斯（Akhras）〕則是出身荷姆斯（Homs）的遜尼派穆斯林望族。

道德審判阿薩德

阿薩德被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栽誣，說成是少數族群教派的領導者，以教派壓迫為目的。在此之前，阿薩德則是被抹黑成雙手沾滿血腥的獨裁者，鎮壓民主變革運動不遺餘力。這個說法無論如何都是大有問題的。

首先，沒有任何證據顯示2011年發生的抗議行動含有民主訴求。相反地，抗議者的要求是關於釋放政治犯（大多數為穆斯林兄弟）、廢除戰時緊急狀態法，以及終結貪腐。《時代》雜誌的報導說，在抗議行動中伊斯蘭扮演的角色十分突出。²⁴為了回應動亂，敘利亞政府幾乎是立即宣佈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媒體和政黨可以獲得更大自由，並且將檢討緊急統治狀態」。在2011年4月底之前，大馬士革政府已經作廢「立法長達四十八年的緊急狀態法」，並且關閉「國家安全最高法院」。²⁵然而，這些讓步仍無法結束叛亂行動。

其次，阿薩德的統治權是獲得全民同意的。他先經歷過總統候選人公投並且得到大多數選民認可，才能登上總統大位。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是美國對敘利亞戰爭中的重要盟邦，沙烏地的國王和卡達的埃米爾都是靠王位世襲制得到統治權。敘利亞的總統選舉形式固然不是西方國家所贊同的複數候選人制，其民主程度依然遠勝這兩個國家。美國官方迴避了這個事實，即使沙烏地國王的統治方式是朕即王法，卻從未將他形容為獨裁者。當沙烏地國內發生動亂，起義者要求國家從獨裁暴政過渡到代議式民主政治，沙烏地國王則是利用坦克、大規模逮捕以及死刑等手段弭平暴動。沙烏地的專制獨裁者也同樣派出坦克到巴林，血腥鎮壓當地追求民主的揭竿起義。雖然如此，美國官方也沒有提到過沙烏地統治者的滿手血腥。

沙烏地和卡達既沒有全民國會也沒有任何政黨，反觀敘利亞有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其選舉方式為複數候選人制，由許多個政黨分別推派候選人參選。不止如此，敘利亞政府還在2012年修憲，將總統選舉的競選方式改為複數候選人制。此舉跨出了一大步，讓敘利亞政府更近乎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政治，阿薩德即是在選舉中面對其他候選人挑戰而且勝選。因此，2011年當時的敘利亞政府體制接近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其他阿拉伯國家幾乎無一能望其項背。

華盛頓方面在阿拉伯地區的主要盟邦，它們若非君主政權就是軍事獨裁政府，相形之下敘利亞政府更近於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尤其無庸置疑。到了2012年，敘利亞政府離西方模式的民主更近。如果敘利亞境內發生的暴動是出於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渴望，那麼在啟動民主改革之後，何以暴動仍持續不斷？

第三，叛亂分子並非民主派人士，而是伊斯蘭教徒。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伊斯蘭國，其法治基礎不再是民主式的決策，凡事皆以《可蘭經》為依歸。自由敘利亞軍曾經被刻意偽稱是世俗民主派勢力的軍隊，其實也是以伊斯蘭教徒為主。敘利亞全國委員會完全由穆斯林兄弟會主導，自由敘利亞軍即是它的軍事部門。因此，這批反抗軍所聲明的目標無一字提及民主，其理甚明。它明白宣告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推翻阿薩德。此一目標始終是叛亂分子的使命指南，即使阿薩德啟動改革，使敘利亞政府更像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政治，叛亂分子的目標依舊沒有改變。

由此可見，敘利亞境內的衝突遭到扭曲，被捏造成統治階級的阿拉維派少數族群和被壓迫的遜尼派多數族群之間的鬥爭，同時也是專制獨裁者企圖鎮壓全民對民主政治的渴望。遜尼派政治伊斯蘭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勢不兩立，已是敘利亞獨立之後的政治常態；然而西方國家對這一場衝突的論述，卻一概都是無稽之談。西方世界在討論敘利亞衝突時，偶爾會承認並討論美國帝國主義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是美國帝國主義派敵視敘利亞政府的具體理由，始終不曾被明說或暗示過。據我所知，美國官方或美國的大眾媒體從來都不願意承認敘利亞政府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最顯著的是，他們決不會提到敘利亞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不會論及阿薩德為了堅持維護敘利亞的利益和主權，拒絕屈服於美國自以為是的全球秩序領導者的地位。

學者麗莎·史丹普尼茨基 (Lisa Stampnitzky) 關於恐怖主義的研究，有助於我們釐清敘利亞衝突的論述。²⁷ 史丹普尼茨基認為，禁忌型塑造了恐怖主義的論述，避免我們嚴肅地分析這個現象。禁忌阻止我們將恐怖分子看成理性的行動者，具有前後一貫而且清楚明白的目標。反之，「恐怖分子」一詞成為道德譴責的語彙，並要求我們停止對「恐怖分子」的動機、不滿和目標進行任何探討。於是我們將恐怖分子理解為邪惡、不可理喻，最不可思議

的事，是要我們去思考他們或許也有合情合理的不滿和完全理性的目標。

關於敘利亞衝突的論述，「殘暴的獨裁者」和「阿拉維教派」這兩個詞彙的作用足以和「恐怖分子」一語等量齊觀，它們被用在道德裁判以及終結對阿薩德政府的意識形態進行任何探究。於是我們不會從政治角度理解大馬士革政府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不會將他們看成具有目標的行動者、不會知道指引他們行動的目標是促進阿拉伯統一、實現自決，以及利用國有制、指導經濟與計劃經濟等手段，擺脫開發落後的處境。

相反地，西方國家的官方及大眾媒體以投擲道德石塊取代了分析，誘導我們從道德方面檢視阿薩德政府。因此，敘利亞的復興黨贏得「專制獨裁」、「教派分子」和「殘暴不仁」等等標籤，在公共論述中遂幾乎不復見到有任何人嘗試探索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目标、動機和意識形態。就阿薩德政府的行動探究其意識形態基礎，無疑是一大禁忌。

關於敘利亞衝突的論述，採用了所謂的殘暴和邪惡這一套修辭，遮掩阿薩德政府的意識形態和目標，其全部目的就是為了抹黑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阿薩德政府本身也採取相同招式抹黑叛亂分子。阿薩德和政府要員利用恐怖主義論述抹黑敘利亞的聖戰士，正如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抹黑攻擊西方國家目標的伊斯蘭教徒，同樣都是樂此不疲、不遺餘力。叛亂分子往往被妖魔化為「恐怖分子」，甚至是「傭兵」。以「傭兵」一詞辱罵叛亂分子，是影射許多叛亂分子之所以參與造反其實是因為被收買，從資助叛亂的外部強權機構獲取報酬。這樣的表達方式大有問題，因為傭兵只會拿錢辦事，但大多數叛亂分子顯然都是受意識形態驅使的。叛亂分子確實也會採取恐怖分子的手段，而且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無疑也是使用相同的恐怖主義論述抹黑蓋達組織；然而，當敘利亞政府的官員嚴厲譴責恐怖分子，他們的目的除了是表達憤怒，顯然亦是想要影響人們認識這一場衝突的方式。阿

薩德政府想要我們從道德的角度檢視叛亂分子，將他們視為邪惡、不可理喻，而非從政治的角度觀察，認為他們是理性的行動者，只不過對於如何建設國家和社會，有不同的見解。

美國亦採取相同的方式企圖塑造輿論，同樣以道德的角度詮釋阿薩德政府，視之為殘暴、獨裁和教派心態，換句話說，也就是邪惡之至。美國不會希望我們從政治的角度觀看敘利亞政府，將他們當成理性的行動者，但是對於如何組織敘利亞社會以及廣大的阿拉伯世界，與遜尼派政治伊斯蘭教徒及美國帝國主義派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為了解敘利亞境內的衝突，則叛亂分子和統治國家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雙方的意識形態同等重要。但是，在公共論述中僅偶爾才會強調政治伊斯蘭是衝突的一大驅動力。反之，西方國家偏愛的論述，是論及叛亂分子時對之大表道德認同。有關「溫和叛亂分子」的論述從未間斷過，「溫和」和「叛亂分子」這些字眼暗示伊斯蘭遊擊隊與伊斯蘭教徒毫不相干，他們是支持民主的世俗派。然而，當美國國家情報局總監詹姆士·克雷帕指出所謂的「溫和派」是指「伊斯蘭國以外的所有叛亂分子」，這個類別包含了努斯拉陣線、自由沙姆人伊斯蘭運動和穆斯林兄弟會，「世俗民主派」的虛構說法不攻自破。不過，如 YouGov 所作的民調顯示阿薩德政府獲得大多數敘利亞人支持，這個令人難勘的真相卻被壓制了。

華爾街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也是針對美國公民的意識形態戰爭。將敘利亞政府化約成阿薩德個人，再加上不斷痛批他是雙手沾滿血腥的阿拉維派獨裁統治者，即可達成許多項意識型態任務。首先，以華盛頓方面為首強制要求敘利亞總統下台的行動，因此得到了合理化。畢竟，假使阿薩德是隻怪物，那麼由美國挺身而出，領導「國際社群」肩負起這項迫切的任務，既是不容推辭也是理所當然的。其次，華盛頓方面反對敘利亞政府的立場堅定不移，其根源在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拒絕屈從華爾街方面追逐利潤的要求，卻可以從此躲在道德的幌子後面，高枕無憂。人們將會相信：華盛頓方面強迫阿薩德退位，是受到美國（自稱的）支持民主的熱情驅使，絕不是因為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擁抱的計畫，以促進阿拉伯團結統一、提昇獨立自主和追求阿拉伯社會主義為目標，處處對華爾街方面毫不友善。第三，將阿薩德形容為血腥的暴君，於是在推翻阿薩德的行動中，華盛頓方面的角色即儼然成為指標，顯示美國確實是當今世界的正義之師。

不可否認，美國政府是當今世上的正義之師，雖然它談不上是什麼全世界的正義之師；對於世上微乎其微、為數少之又少的一小群人來說，美國的確是正義之師：這一群人就是美國出身的億萬富豪投資家、超級富有的銀行家，以及鉅富等級的企業總裁共同組成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數極少，其財富的力量卻成反比，能對美國的公共政策發揮浩瀚無邊的影響力，確保美國這個強大的機構能夠代表他們，縱橫天下，為所欲為。

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價值觀與美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格格不入，而美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已體現於美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之中。美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鼓勵其他國家擁戴美國的領導地位，奉之為「重要」而「不可或缺」；同時，美國也要求所有國家的經濟環境為美國商品、服務及投資開放，一切條件以迎合美國企業的獲利為最高指導原則。然而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卻與之作對，向學生灌輸阿拉伯民族自決、阿拉伯社會主義和阿拉伯統一等價值觀，完全抵觸華爾街主導的華盛頓方面所謂的「美國價值與利益」。這些價值和利益當然和美國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有關，其目的是保護及提昇美國資本家對於利潤的追求。

美國企業的目標是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能毫無阻礙地進入市場、取得投資機會；至於美國企業為了追求利潤而相中的國家，其人民的意願為何，全然無關緊要。在美國監督之下的全球經濟，所有國家都必須被整合、併入；

如有必要，美國也不在乎採取手段強制其加入。這樣的經濟秩序完全由市場管理，任何政府想要透過經濟計畫而照顧社會大眾的利益，無異癡人說夢。不僅如此，它的運作基礎不是國家，而是以富裕投資家和大型銀行所擁有的企業為依歸，如是美國的投資家和銀行則更好。而且，它的目標是獲利，不在於滿足人類的需求。

在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中，美國資本家階級在權力精英階層的眾多代表人物，例如與華爾街關係密切的內閣官員、官僚體系的高層，以及美國最有聲望的智庫，他們為了達到推翻復興阿拉伯社會主義黨政府的目的，甚至不擇手段，與敘利亞政府的伊斯蘭宿敵結盟，因為敘利亞政府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戰鬥的焦點，集結反抗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²⁸華盛頓已經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其他兩個戰鬥焦點，採取過相同的行動：那兩個戰鬥焦點是伊拉克的薩達姆政府和利比亞的格達費政府。

這三個行動其實是同一場更高層次的戰爭，其目的是有效地重新殖民化這個星球，將阿拉伯世界堅持至今仍然擁護殖民地解放的國家，併入美國所領導的全球秩序：在這個秩序之中，華爾街的利益永遠都是最首要的目標。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Y 2004-2009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USAID Strategic Plan. <http://www.state.gov/s/d/rm/rls/dosstrat/2004/index.htm>.
13.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14. Robert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How Washington Sold Our Soul for Saudi Crude*, (Three Rivers Press, 2003), 127.
15. Ibid.
16. Jay Solomon, “To check Syria, U.S. explores bond with Muslim Broth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07.
17. Robert Dreyfuss, *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 (Holt, 2005), 37.
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19. “President al-Assad: Basis for any political solution for crisis in Syria is what the Syrian people want.” (interview with Argentina’s Clarin news-paper and Telam news agency), Syria Online, <http://www.syriaonline.sy/?f=Details&catid=12&pageid=5835>.
20. J.B.S. Haldane, *Callinicus: A Defence of Chemical Warfare*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25), 5-6.
21. Ibid, 49.
22. John Mueller and Karl Mueller, “Sancti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23. Ibid.
24. Stephen Gowans, “Rethinking chemical Weapons,” *what’s left*, June 27, 2015.
25. John Mueller and Karl Mueller, “Sancti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26. 「美國國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於 1993 年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在絕對理想的條件下，將一噸沙林毒氣完美投放於人煙稠密而且完全沒有任何防護的地區，可造成 3,000 到 8,000 人死亡。若是條件略微不如理想，例如吹起和風或出現陽光，則死亡率最高僅有其十分之一。」 [John Mueller, *Overblown: How Politicians and the Terrorism Industry Inflat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Why We Believe Them* (Free Press, 2006), 18.] 據聯合國推估，在 2013 年有多枚有效負載為 11 和 16 加侖化學藥劑的火箭，攻擊敘利亞的古塔（Ghouta）。（“Syria chemical attack: What we know,” BBC, September 24, 2013.）以美制一噸為 358 加侖計算，假設平均有效負載為 13 加侖，那麼在絕對理想的條件下，將 13 加侖的沙林毒氣完美投放於人煙稠密而且完全沒有任何防護的地區，可造成 108 到 290 人死亡。
27. Mueller & Mueller, “Sanctions.”

前言

1. “Syrian rebels elect head of new military command,” Reuters, December 8, 2012.
2. Bassem Mroue and Benn Hubbard, “Syria rebels create new unified military command,”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8, 2012.
3. Inti Landauro and Stacy Meichtry, “Rebels in Syria move to show moder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7, 2013.
4. Belen Fernandez, review of *The Jihadis Return: ISIS and the New Sunni Uprising*, by Patrick Cockburn, *The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3, 2014.
5. Craig Whitlock, “Niger rapidly emerging as a key U.S. partner,”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4, 2013.
6. Alfred B. Prados and Jeremy M.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Iraq Wa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8, 2005.
7.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September 2004, Office of the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quoted in Glenn Greenwald, “when the State Department tries to choose Muslim thought leaders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The Intercept*, December 15, 2015.
8.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Fall, 2014.
9. Statement by Robert Mugabe at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1, 2016.
10. Fisher, “Obama acknowledging.”
11. Barack Obama,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3, 2016, <https://www.whitehouse.gov/sotu>.

22. S.A. Smit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erling, 2002), 118.
23. Albert Szymanski, *Human Rights in the Soviet Union* (Zed Books, 1984), 210.
24. Domenico Losurdo, *War and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20th Century* (Verso, 2015), 258.
25. Samuel Black, "The changing political utility of nuclear weapons: Nuclear threats from 1970 to 2010," *The Stimson Center*, August 2010.
26.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27.
27.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Fall 2014.
28. "A Letter to G. Myasnikov," *Lenin's Collected Works*, 1st English Edition, vol. 32,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504-509.
29. David M. Herszenhorn, "For Syria, Reliant on Russia for weapons and food, old bonds run dee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12.
30. Zeina Karam, "In rare public appearance, Syrian president denies role in Houla massacre," *The Associated Press*, June 3, 2012.
31. Bashar al-Assad May 19, 2013 interview with Clarin newspaper and Telam news agency.
32. Ibid.
3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34. Ibid.
35. U.S. State Department website, Accessed February 8, 2012, <http://www.state.gov/r/pa/ei/bgn/3580.htm#econ>.
36.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3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3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2006.
39. William R. Polk, *Humpty Dumpty: The Fate of Regime Change* (Panda Press, 2013), 279.
40. Polk, *Humpty Dumpty*, 275.
41. Polk, *Humpty Dumpty*, 278.
42. Polk, *Humpty Dumpty*, 281-282.
43. Benoit Faucon, "For big oil, the Libya opening that was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4, 2012.

第一章

1. William R. Polk, "Understanding Syria: From pre-civil war to post- Assad," *The Atlantic*, December 10, 2013.
2.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3. Polk, "Understanding Syria."
4.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3.
5.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eacon Press, 2007).
6. Leila Khalid, *My People Shall Liv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3).
7. Martin Kramer, "Arab Nationalism: Mistaken Identity," *Daedalus* 122.3 (1993): 171-206.
8. Polk, "Understanding Syria."
9.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ebruary 2015.
10.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2006. <https://www.comw.org/qdr/fulltext/nss2006.pdf>.
1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2006.
12. Greg Muttitt, *Fuel on the Fire: Oil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Iraq*, *The New Press*, 2012, p. 73.
13. Ibid.
14. Ibid.
15. Muttitt, *Fuel on the Fire*, 75.
16. Samuel Helfont and Michael Brill, "Saddam ISIS? The Terrorist Group's Real Origin Sto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2, 2016.
17. Muttitt, *Fuel on the Fire*, 78.
18.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123.
19.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193.
20.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CBC Enterprises, 1965), 26-27.
21. Domenico Losurdo, *War and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20th Century*(Verso, 2015).

66. Albert Szymanski, *The Logic of Imperialism*, (Praeger, 1983), 167.
67. Szymanski, *Imperialism*, 166.
68. Muttitt, *Fuel*, 74.
69. Muttitt, *Fuel*, 87.
70.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Order Number 1, May 16, 2003, http://www.iraqcoalition.org/regulations/20030516_CPAORD_1_De-Ba_athification_of_Iraqi_Society_.pdf.
71. Muttitt, *Fuel*, 229.
72. Polk, *Understanding Iraq*, 205.
73. Polk, *Understanding Iraq*, 206.
74. *Ibid.*
75. Marjorie Cohn, "Want endless war? Love the U.S. empire? Well, Hillary Clinton's your choice," *Truthdig*, February 1, 2016, http://www.truthdig.com/report/item/want_endless_war_love_the_us_empire_hillary_clintons_your_choice_20160201.
76. Ian Cobain, "Britain's secret war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8, 2016.
77. *Ibid.*
78. *Ibid.*
79. *Ibid.*
80. *Ibid.*
81. *Ibid.*
82. Jamie Merrill, "Major British defense deal with Oman comes under fire," *Middle East Eye*, May 20, 2016.
83. Yohann Koshy, "The Middle East correspondents who predicted the rise of ISIS tells us about his 30-year career," *Vice*, March 25, 2016.
84. Polk, *Humpty Dumpty*, 248.
85. Shirley Ceresto,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inequality,"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Spring 1982.
86. David Vine,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Metropolitan Books, 2015).
87. Craig Whitlock, "Niger rapidly emerging as a key U.S. partner,"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4, 2013.
44. Guy Chazan, "For West's oil firms, no love lost in Liby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5, 2011.
45. Steven Mufson, "Conflict in Libya: U.S. oil companies sit on sidelines as Gaddafi maintains hold,"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0, 2011.
46. *Ibid.*
47. *Ibid.*
48. Clifford Kraus, "The Scramble for Access to Libya's Oil Wealth Begin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11.
49. Greg Muttitt, *Fuel on the Fire: Oil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Iraq* (The New Press, 2012), 315.
50. *Ibid.*
51. Bruce Cumings, Ervand Abrahamian and Moshe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The Truth about North Korea, Iran, and Syria*, (The New Press, 2004), 185.
52. Blair Shewchuck, "Saddam or Mr. Hussein?" *CBC News Online*, February 2003.
53. Muttitt, *Fuel*, 113.
54. William R. Polk, *Understanding Iraq* (Harper Perennial, 2005), 127-128.
55. Polk, *Understanding Iraq*, 127-128.
56. Polk, *Humpty Dumpty*, 248.
57. *Ibid.*
58. *Ibid.*
59. Dreyfuss, *Devil's Game*, 99.
60. Bernard Lew is, "Rethinking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 1992.
61. Laurence H. Shoup, *Wall Street's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Empire of Neoliberal Geopolitics, 1976-2014*,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5, p. 215.
62. Amy Harder and Colleen McCain Nelson, "Obama administration rejects Keystone XL pipeline, citing climate concer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6, 2015.
63. Juan Forero, "Center of gravity in oil world shifts to A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5, 2012.
64. Juliet Eilperin, "Canadian government overhauling environmental rules to aid oil extra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 2012.
65. Clifford Kraus and Eric Lipton, "U.S. inches toward goal of energy indepe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12.

24. Patrick Cockburn, "Confused about the U.S. response to Isis in Syria? Look to the CIA's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The Independent*, June 17, 2016.
25. Jay Solomon, "To check Syria, U.S. explores bond with Muslim Broth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07.
26. Liad Porat,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Asad Regime,"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December 2010, No. 47.
27. Solomon, "To check Syria."
28. Ibid.
29. Porat,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30. Ibid.
31. 一份洩露給「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 Inc.)的國防情報局文件。「司法觀察」是一個保守、非政黨性質的教育基金會，其成立宗旨是促進政府、政治和法律的透明、權責化和誠信。該文件請見司法觀察網站：<http://www.judicial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Pg.-291-Pgs.-287-293-JW-v-DOD-and-State-14-812-DOD-Release-2015-04-10-final-version11.pdf>。
32. Alfred B. Prados and Jeremy M.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Iraq Wa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8, 2005.
33. Andrew Browne, "Rodrigo Duterte throws a grenade in Washington's China strateg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7, 2016.
34. Max Fisher, "Obama acknowledging U.S. misdeeds abroad, quietly reframes American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16.
35. "Addres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0, 2016.
36. Fisher, "Obama acknowledging."
37. Fisher, "Obama acknowledging."
38. Alfred B. Prados and Jeremy M.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Iraq Wa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8, 2005.
39. Ibid.
40. Ibid.
41. Ibid.
42. Ibid.

第二章

1. "Resources of hope," *Al-Ahram Weekly* (631), April 2, 2003.
2.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207.
3. Ben Fenton, "Macmillan backed Syria assassination plot,"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7, 2003.
4. Ibid.
5. Ibid.
6. Dreyfus, *Devil's Game*, 199-200.
7.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182.
8. Dreyfus, *Devil's Game*, 199-200.
9.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183.
10. Jay Solomon, "To check Syria, U.S. explores bond with Muslim Broth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07.
11.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183; Dreyfus, *Devil's Game*, 200.
12. Gareth Porter, "The real U.S. Syria scandal: supporting sectarian war," August 30, 2016, <http://www.middleeasteye.net/columns/real-us-syria-scandal-supporting-sectarian-war-1378989458>.
13.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207.
14. Nikola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ath Party*, (I.B. Taurus, 2011), 98.
15. Van Dam, *Struggle*, 107-108.
16. Dreyfus, *Devil's Game*, 200-201.
17. Robert Fisk, "Conspiracy of silence in the Arab world," *The Independent*, February 9, 2007.
18. Dreyfus, *Devil's Game*, 205.
19. Polk, "Understanding Syria."
20. Dreyfus, *Devil's Game*, 205.
21. Ibid.
22. Polk, "Understanding Syria."
23. Van Dam, *Struggle*.

2007.

66. Ibid.

6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eptember 2002.

6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2006.

69. “Addres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7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0, 2016.

第三章

1. Aryn Baker, “Syria is not Egypt, but might it one day be Tunisia?” *Time*, February 4, 2011.
2. Rania Abouzeid, “The Syrian style of repression: Thugs and lectures,” *Time*, February 27, 2011.
3. Rania Abouzeid, “Sitting pretty in Syria: Why few go backing Bashar,” *Time*, March 6, 2011.
4. Rania Abouzeid, “The youth of Syria: the rebels are on pause,” *Time*, March 6, 2011.
5. Ibid.
6. “Officers fire on crowd as Syrian protests grow,”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11.
7.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8. Robert Fisk, “Welcome to Dera’a, Syria’s graveyard of terrorists,” *The Independent*, July 6, 2016.
9. “President Assad to ARD TV: Terrorists breached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from the very first hour, Syrian Army refrained from retaliating,” Interview, SANA, March 1, 2016.
10. Ibid.
11. “Officers fire on crowd.”
12. Rania Abouzeid, “Arab Spring: Is a revolution starting up in Syria?” *Time*, March 20, 2011; Rania Abouzeid, “Syria’s revolt: How graffiti stirred an uprising,” *Time*, March 22, 2011.
13. “Officers fire on crowd.”
14. Rania Abouzeid, “Arab Spring: Is a revolution starting up in Syria?” *Time*, March 20, 2011.
15. “Thousands march to protest Syria killing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11.
16. Rania Abouzeid, “Assad and reform: Damned if he does, doomed if he doesn’t,” *Time*, April 22, 2011.
17. “Officers fire on crowd.”

43. Alfred B. Prados, “Syria: U.S. 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3, 2006.

44. Ibid.

45. Ibid.

46. Ibid.

47. Ibid.

48. Prados and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49. Ibid.

50. Ibid.

5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rch 2006.

5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eptember 2002.

53. Prados, “Syria: U.S. 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54. Ibid.

55. Ibid.

56. Nada Bakri, “Sanctions pose growing threat to Syria’s Assa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1.

57. Joby Warrick and Alice Fordham, “Syria running out of cash as sanctions take toll, but Assad avoids economic pai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4, 2012.

58. Patrick Cockburn, “U.S. and E.U. sanctions are ruining ordinary Syrians’ lives, yet Bashar al-Assad hangs on to power,” *The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16.

59. Ibid.

60. Prados, “Syria: U.S. 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61. Jay Solomon, “To check Syria, U.S. explores bond with Muslim Broth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07.

62. “U.S. admits funding Syrian opposition,” *CBC News*, April 18, 2011.

63. Craig Whitlock, “U.S. secretly backed Syrian opposition groups, cables released by WikiLeaks show,”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11.

64. Patrick Cockburn, “Syria in 2016 will be like the Balkans in 1914 as explosive violence breaks out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12, 2015.

65. “Gen. Wesley Clark Weighs Presidential Bid: ‘I Think About It Every Day,’” *Democracy Now!*, March 2,

38. James R. Clapper, "James Clapper on Glob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March 2, 2015. J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homeland-security/james-clapper-global-intelligence-challenges/p36195>.
39. Rania Abouzeid, "Sitting pretty in Syria: Why few go backing Bashar," Time, March 6, 2011.
40. Rania Abouzeid, "The youth of Syria: the rebels are on pause," Time, March 6, 2011.
41.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42. Anthony Shadid, "Security forces kill dozens in uprisings around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43. William Blum, "The Anti-Empire Report," No. 146, November 6, 2016.
44. Samuel Black, "The changing political utility of nuclear weapons: Nuclear threats from 1970 to 2010," The Stimson Center, August 2010.
45. Craig Whitlock, "U.S. secretly backed Syrian opposition groups, cables released by Wikileaks show,"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11.
46. Lenin, "A Letter to G. Myasnikov," 504-509.
47. Patrick Seale, "In Syria, this is no plan for peace," The Guardian (UK), May 27, 2012.
48. "President Assad to ARD TV: Terrorists breached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greement from the very first hour, Syrian Army refrained from retaliating," Interview, SANA, March 1, 2016.
49. Nicholas D. Kristof, "Bahrain pulls a Qaddafi,"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11.
50. Nick Cumming-Bruce, "U.N. accuses Yemen of using deadly force in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2011.
51. "Saudi response to increasing violence in Eastern Province," Stratfor, January 17, 2012.
52. Steve Chase, "Saudi Arabia's al-Qatif a growing hotbed of opposition," The Globe and Mail, May 13, 2016.
53. Steven Chase, "Saudis use armoured vehicles to suppress internal dissent, videos show," The Globe and Mail, May 11, 2016.
54. Kareem Fahim, "As hopes for reform fade in Bahrain, protesters turn anger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12.
55. Alex Delmar-Morgan, "Protests, investigator pressure Bahr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9, 2012.
56. Greg Miller and Karen De Young, "Secret CIA effort in Syria faces large funding cut,"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2, 2015; Greg Millar and Adam Entous, "Plans to send heavier weapons to CIA-backed rebels in

18. Aryn Baker, "Syria is not Egypt, but might it one day be Tunisia?" Time, February 4, 2011.
19.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20. Rania Abouzeid, "Syria's Friday of dignity becomes a day of death," Time, March 25, 2011.
21. Ibid.
22. "Syrie: un autre éclairage du conflit qui dure depuis 5 ans," Be Curious TV video, May 23, 2016. <http://www.globalresearch.ca/syria-aleppo-doctor-demolishes-imperialist-propaganda-and-media-warmongering/5531157>.
23.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24. Anthony Shadid, "Security forces kill dozens in uprisings around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25. Rania Abouzeid, "Syria's Friday of dignity becomes a day of death," Time, March 25, 2011.
26.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Houghton Mifflin, 1999) p. 33.
27. "Seymour Hersh's latest bombshell: U.S. military undermined Obama on Syria with tacit help to Assad," Democracy Now, December 22, 2015.
28. Fabrice Balanche, "The Alawi Community and the Syria Crisis,"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y 14, 2015.
29. Anthony Shadid, "Syria broadens deadly crackdown on protest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2011.
30. Rania Abouzeid, "Meet the Islamist militants fighting alongside Syria's rebels," Time, July 26, 2012.
31. Rania Abouzeid, "Interview with official of Jabhat al-Nusra, Syria's Islamist militia group," Time, December 25, 2015.
32. Robert Fisk, "Syrian civil war: West failed to factor in Bashar al-Assad's Iranian backers as the conflict developed," The Independent, March 13, 2016.
33. Anthony Shadid, "Syria broadens deadly crackdown on protest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2011.
34. Nada Bakri, "Syria allows Red Cross officials to visit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1.
35. Nada Bakri, "Syrian opposition calls for protection from crackdow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1.
36. "President al-Assad to Portuguese State TV: International system failed to accomplish its duty... Western officials have no desire to combat terrorism," Interview, SANA, March 5, 2015.
37. Yohann Koshy, "The Middle East correspondents who predicted the rise of ISIS tells us about his 30-year career," Vice, March 25, 2016.

10. Anne Barnard, "Syria opposition group is routed and divid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2.
11. Charles Levinson, "As Syria strikes kill scores, opposition seeks back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0, 2012.
12. Greg Miller and Joby Warrick, "In Syria conflict, U.S. struggles to fill intelligence gap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3, 2012.
13. Malas, Parkinson and Solomon, "Nations pledge aid to rebels in Syria."
14. "As Assad Makes Gains, Will New U.S. Strategy for Syria Change the Dynamics?" *PBS Newshour*, June 14, 2013,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orld/jan-june13/syria2_06-14.html.
15. Patrick Seale, "Syria's long war," *Middle East Online*, September 26, 2012.
16. *Ibid.*
17. Bassem Mroue and Benn Hubbard, "Syria rebels create new unified military command,"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8, 2012.
18. Michael R. Gordon and Anne Barnard, "U.S. places militant Syrian rebel group on lis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2.
19. Rania Abouzeid, "Syria's secular and Islamist rebels: Who are the Saudis and the Qataris arming?" *Time*, September 18, 2012.
20. Bassem Mroue and Benn Hubbard, "Syria rebels create new unified military command,"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8, 2012; "Muslim Brotherhood undermining Syrian rebel unity," *AFP*, August 20, 2012.
21. Neil MacFarquhar and Hwaida Saad, "As Syrian war drags on, Jihadists take bigger rol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12.
22. Inti Landauro and Stacy Meichtry, "Rebels in Syria move to show moder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7, 2013.
23. Rania Abouzeid, "Syria's secular and Islamist rebels: Who are the Saudis and the Qataris arming?" *Time*, September 18, 2012.
24. Sam Dagher, "Militants seize oil field, expand Syrian dom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3, 2014.
25. Maria Abi-Habib, "Al-Qaeda emissary in Syria killed by rival Islamist rebe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3, 2014.
26. Sam Dagher, "Syria's Bashar al-Assad Tries to Force the West to Choose between Regime, Islamic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9, 2015.
27. Asa Fitch, "Syrian rebels issue demands for U.N. hostag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 2014.

Syria stall amid White House scepticism,"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3, 2016.

57. Margherita Stancati and Nathan Hodge, "Karzai's Afghan legacy rests on fragile un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8, 2014.
58. Henry Fountain, "Researchers link Syrian conflict to drought made worse by climate chang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5.
59. Aryn Baker, "Syria is not Egypt, but might it one day be Tunisia?" *Time*, February 4, 2011.
60. 一份洩露給「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 Inc.)的國防情報局文件。「司法觀察」是一個保守、非政黨性質的教育基金會，其成立宗旨是促進政府、政治和法律的透明、權責化和誠信。該文件請見司法觀察網站：<http://www.judicial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Pg.-291-Pgs.-287-293-JW-v-DOD-and-State-14-812-DOD-Release-2015-04-10-final-version11.pdf>.
61. Yaroslav Trofimov, "Jordan's election poses a test for Muslim Brotherhood's chan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5, 2016.
62. David N. Gibbs,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Retrosp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2 (2000): 241-242.

第四章

1. Country study, 256.
2. Porat, 2010.
3. *Ibid.*
4.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5. Nour Malas, Joe Parkinson and Jay Solomon, "Nations pledge aid to rebels in Syr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 2012.
6. Nour Malas, "Friends' of Syria expected to spar over arming rebe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12.
7. Karen DeYoung and Liz Sly, "Syrian rebels get influx of arms with gulf neighbors' money, U.S. coordin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2.
8. Robert F. Worth, "Egypt is arena for influence of Arab rival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9, 2013.
9. Nour Malas and Siobhan Gorman, "Syrian brass defect, buoying rebe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9, 2012.

47. Farnaz Fassihi,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votes to adopt France's counterterrorism resolu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5.
48. Sam Dagher, "Syria's Bashar al-Assad Tries to Force the West to Choose between Regime, Islamic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9, 2015.
49. Michael R. Gordon and Anne Barnard, "U.S. places militant Syrian rebel group on lis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2.
50. Neil Mac Farquhar, "Questions linger over Russia's endgame in Syria, Ukraine and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6.
51. Anne Barnard and Michael R. Gordon, "Goals diverge and perils remain as U.S. and Turkey take on ISI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15.
52. Karen Zraick and Anne Barnard, "Syrian war could turn on the battle for Aleppo,"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16.
53. Karen de Young, "U.S. Russia hold Syria cease-fire talks as deadline passes without a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2016.
54. Patrick Cockburn, "Britain is on the verge of entering into a long war in Syria based on wishful thinking and poor information,"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1, 2015.
55. Ben Hubbard, "A look at the Army of Conquest, a prominent rebel alliance i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15.
56. Andrew E. Kramer and Anne Barnard, "Russian soldiers join Syria figh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5.
57. Jay Solomon and Nour Malas, "U.S. tries to isolate Syria's militant Islamis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5, 2012.
58. Ibid.
59. Tim Arango, Anne Barnard and Hwaida Saad, "Syrian rebels tied to al-Qaeda play key role i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2012.
60. Patrick Cockburn, "Syrian ceasefire begins—and the U.S. and Russia have the power to make sure it sticks,"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12, 2016.
61. "James Clapper on Glob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 2015, <http://www.w.cfr.org/homeland-security/james-clapper-global-intelligence-challenges/p36195>.
62. Maria Abi-Habib, "Islamic State remains unchallenged from its sanctuary in Syr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0, 2014.
28. Rania Abouzeid, "Meet the Islamist militants fighting alongside Syria's rebels," *Time*, July 26, 2012; Rania Abouzeid, "Interview with official of Jabhat al-Nusra, Syria's Islamist militia group," *Time*, Dec 25, 2015.
29. Bassem Mroue and Benn Hubbard, "Syria rebels create new unified military command,"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8, 2012.
30. Rania Abouzeid, "Interview with official of Jabhat al-Nusra, Syria's Islamist militia group," *Time*, Dec 25, 2015.
31. Ibid.
32. Alice Fordham, "As Syria prepares to vote on new constitution, some still support Assa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5, 2012.
33. Patrick Cockburn, "Syria and Iraq: Why U.S. policy is fraught with danger,"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9, 2014.
34. Anne Barnard, "Syria opposition group is routed and divid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2.
35. Greg Miller and Joby Warrick, "In Syria conflict, U.S. struggles to fill intelligence gap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3, 2012.
36. Jabhat al-Nusra, Australian National Security website, <https://www.nationalsecurity.gov.au/Listedterroristorganisations/Pages/Jabhatal-Nusra.aspx>.
37. Scott Shane, "Saudis and extremism: 'Both the arsonists and the fire-fighter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16.
38. 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2005), 54.
39.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127.
40.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105.
41. Solomon, "To check Syria, U.S. explores bond with Muslim Brothers."
42. Ayoob, *Political Islam*, 72.
43. Eric Schmitt, "Al-Qaeda turns to Syria, with a plan to challenge I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6.
44. Sam Dagher, "Militants seize oil field, expand Syrian dom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3, 2014.
45. Siobhan Gorman and Maria Abi-Habib, "Syria airstrikes roil rebel allianc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6, 2014.
46. Jay Solomon, "U.S., Russia agree to implement Syria cease-fi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2, 2016.

- Standard, November 19, 2015.
81. Robert Fisk, "David Cameron, there aren't 70,000 moderate fighters in Syria—and whoever heard of a moderate with a Kalashnikov anyway?" *The Independent*, November 29, 2015.
82. Ben Hubbard, "Warily, Jordan assists rebels in Syria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14.
83. Adam Entous, Siobhan Gorman and Nour Malas, "CIA expands role in Syria f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13.
84. Greg Miller and Karen De Young, "Secret CIA effort in Syria faces large funding cut,"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2, 2015.
86.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87. Greg Miller and Karen De Young, "Secret CIA effort in Syria faces large funding cut,"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2, 2015.
88. Erin Banco, "Syrian rebel groups merge to take on Assad in Dera'a, but deep divisions rema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une 26, 2015.
89. Robert F. Worth, "Egypt is arena for influence of Arab rival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9, 2013.
90. Mazzetti, Barnard and Schmitt, "Military success in Syria."
91. Liam Stack, "In slap at Syria, Turkey shelters anti-Assad fighter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11.
92. Yaroslav Trofimov, "Porous Syria-Turkey border poses challenge in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9, 2015.
93. Jay Solomon and Nour Malas, "Qatar's ties."
94. Seymour M. Hersh, "Military to Militar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 January 2016.
95. Erin Banco, "In Syria's north, opposition is making a comeback thanks to one rebel group, and to Turke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une 19, 2015.
96.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97. Patrick Cockburn, "Egypt plane crash: This attack shows that Russia is hurting ISIS," *Independent*, November 7, 2015.
98. Ben Hubbard, "Warily."
99. Mark Mazzetti, Anne Barnard and Eric Schmitt, "Military success in Syria gives Putin upper hand in U.S."
63. Matthew Dalton, "Reports on Islamic state plans in Europe fueled French move to prepare Syria strik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5, 2015.
64. Patrick Cockburn, "Government has no strategy, no plan and only 'phantom' allies in Syria, scathing Commons report reveals,"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2, 2016.
65. Anne Barnard and Hwaida Saad, "ISIS fighters seize control of Syrian city of Palmyra, and ancient rui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5.
66. Patrick Cockburn, "Chilcot report: Tony Blair, the Iraq war, and the words of mass destruction that continue to deceive," *The Independent*, July 4, 2016.
67. Robert Fisk, "I read the Chilcot report as I travelled across Syria this week and saw for myself what Blair's actions caused," *The Independent*, July 7, 2016.
68. Patrick Cockburn, "A young price may cost Syria and Yemen dear," *The Independent*, April 5, 2015.
69. Jay Solomon and Nour Malas, "Qatar's ties to militants strain allia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3, 2015.
70. "Vice President Biden Delivered Remarks o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 video, (see quote at 53: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KVCtg5dxM>.
71. David E. Sanger, "John Kerry adds voice to those urging bigger push against Islamic State i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15.
72. Patrick Cockburn, "Syria conflict: Turkish threats of intervention after Ankara bombing taken seriously by Barack Obama," *The Independent*, February 20, 2016.
73. Patrick Cockburn, "Syrian civil war: Jabhat al-Nusra's massacre of Druze villagers shows they're just as nasty as Isis," *The Independent*, June 14, 2015.
74. Ewen MacAskill, "Who are these 70,000 Syrian fighters David Cameron is relying on?" *The Guardian*, November 30, 2015.
75. Ian Cobain, Alice Ross, Rob Evans and Mona Mahmood, "How Britain funds the 'propaganda war' against Isis in Syria," *The Guardian*, May 3, 2016.
76. Ben Hubbard, "Islamist rebels create dilemma on Syria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3.
77. Ibid.
78. Nour Malas, "Islamists gain momentum in Syr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7, 2013.
79. Thomas L. Friedman, "Obama on the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4.
80. Patrick Cockburn, "The West has been in denial over how to tackle the threat of Islamic State," *Evening*

第六章

1.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Briefs, 2013), ix.
2. Ethan Bronner, "Crackdown Was Only Option, Bahrain Sunnis Sa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11.
3. Ibid.
4. Helene Cooper and Robert F. Worth, "In Arab Sprint, Obama Finds a Sharp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2.
5. Patrick Cockburn, "Saudi Arabia is the flagging horse of the Gulf—but Britain is still backing it as an answer to Brexit,"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0, 2016.
6.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ix.
7. Craig Whitlock, "Niger rapidly emerging as a key U.S. partner,"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4, 2013.
8. David E. Sanger, "U.S. struggles to explain alliance with Saudi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6.
9.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10.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1.
11.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8.
12. Ibid, 3.
13. Ibid, 9.
14. Ibid, 8.
15. Ibid, 6.
16. David N. Gibbs,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Retrosp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2, 2000, 241-242.
17.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100.
18. Baer,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xxxii.
19. Ibid.
20. Statement by Dr. Hassan Rouhani at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2 September 2016.

proxy war,"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16.

100. Karen DeYoung and Liz Sly, "Syrian rebels get influx of arms with gulf neighbors' money, U.S. coordin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2.
101. Yaroslav Trofimov "To U.S. allies, Al-Qaeda affiliate in Syria becomes the Lesser Evi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1, 2015.
102.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103. Seale, "Syria's long war."
104. Ibid.

第五章

1. Kenneth Katzma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4, 2016.
2. Ibid.
3. Ibid.
4. Hazem Baloushal, "Iran increases aid to PFLP," *Palestine Pulse*, September 17, 2013.
5. Aresu Egbali and Asa Fitch, "Russian raids on Syria from Iranian air base finished, Tehran say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2, 2016.
6. Domenico Losurdo, "Zielscheiben des Westens," *Junge Welt*, January 27, 2016; "Washington Views Russia, China as Its Main 'Targets'," *CaribFlame*, January 30, 2016.
7. Adam Taylor, "It's not just Hiroshima: The many other things America hasn't apologized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6, 2016.
8. Kenneth Katzma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4, 2016.
9. "Iran's top leader says U.S. should not be trusted," *Xinhua*, June 3, 2016.
10. William R. Polk, *Understanding Iran: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From Persia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From Cyrus to Ahmadinejad*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12.
11. "CIA World Factbook, Ir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ccessed May 29, 2016,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r.html>.

- Journal, June 9, 2016.
7. Maria Abi-Habib,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call for strikes against Syria's Assa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6, 2016.
 8. Thomas Collelo, ed., *A Country Study: Syria*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86.
 9. Van Dam, *Struggle*.
 10. Hanna Batatu,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s ruling, 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 *Middle East Journal*, 35.3, 331 – 344.
 11. Samuel Helfont and Michael Brill, "Saddam ISIS? The Terrorist Group's Real Origin Story," *Foreign Affairs*, June 12, 2016.
 12. Muttitt, *Fuel*, 78.
 13. Tamer El-Ghobashy and Nour Malas, "Iraq says military has retaken central Fallujah from Islamic St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7, 2016.
 14. Peter Osborne, "Syria: As the bombs fall, the people of Damascus rally around Bashar al-Assad," *The Telegraph*, April 17, 2014.
 15. Thomas Collelo, ed., *A Country Study*.
 16.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7. Kamal Alam, "Why Assad's army has not defec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2, 2016.
 18. Robert Fisk, "Syrian civil war: West failed to factor in Bashar al-Assad's backers as the conflict developed," *The Independent*, March 13, 2016.

第八章

1. Adolph Hitler, *Mein Kampf: The Official 1939 Edition*, (CODA Books, 2011), 26.
2. Hitler, *Mein Kampf*, 41.
3. Hitler, *Mein Kampf*, 34.
4. Hitler, *Mein Kampf*, 42.
5. Hitler, *Mein Kampf*, 44.
6. *Ibid.*

21. Robert Fisk, "For the first time, Saudi Arabia is being attacked by both Sunni and Shia leaders,"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2, 2016.
22. John Mueller and Mark G. Stewart, *Chasing Ghosts: The Policing of Terro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6.
23.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U.S. relies heavily on Saudi money to support Syrian rebel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6.
24. *Ibid.*
25. Jay Solomon, "Obama's Mideast plan faces a new hurd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2016.
26. Bulens Aras and Omer Caha, "Fethullah Gulen and His Liberal 'Turkish Islam,'" 149 in Barry Rubin (Ed.),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ers: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27. Ayoob, *Political Islam*, 96.
28. Patrick Cockburn, "Is Erdogan using the coup to make Turkey a fully Islamic country?" *The Uniz Review: An Alternative Media Selection*, July 18, 2016.
29. Yaroslav Trofimov,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Isla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2016.
30. Carol E. Lee and Thomas Grove, "Joe Biden attempts to smooth relations with Turke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4, 2016.
31. Robert Fisk, "The 'one for one' refugee policy means we're picking and choosing among desperate people," *The Independent*, April 8, 2016.

第七章

1. 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eacon Press, 2007).
2. R. Palme Dutt, *The Problem of India*, 91.
3. *Ibid.*
4. R. Palme Dutt, *The Problem of India*, 91-92.
5. Robert Fisk, "Alawite history reveals the complexities of Syria that West no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Independent*, March 3, 2013.
6. Yaroslav Trofimov, "Can victori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last without support of Sunnis?" *The Wall Street*

- S.J.,” Catholic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http://www.catholiceducation.org/en/faith-and-character/faith-and-character/father-edward-dowling-s-j.html>.
2. Steve A. Cook and Michael J. Koplw, “Turkey is no longer a reliable al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0, 2016.
 3. Thom Shanker, “U.S. and China soften tone over disputed sea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10.
 4.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Fall 2014.
 5. Nicholas Confessore, Sarah Cohen and Karen Yourish, “The families fund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5.
 6. Nicholas Confessore, Sarah Cohen and Karen Yourish, “The families fund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5.
 7.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6.
 8.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 2016.
 9.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15.
 10.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2012.
 11.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3, 2012.
 12.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12.
 13.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2.
 14.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12.
 15. *CBS News*, November 17, 2010.
 16.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12.
 17.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1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15.
 19.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2.
 20. 艾伯特·齊曼斯基演講的錄音檔逐字稿。該錄音檔已無法從網際網路下載。
 21. *60 Minutes*, May 12, 1996.
 22. Domenico Losurdo, “Flight from history?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etween self-criticism and self-contempt,”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2000, 1393: 457-514.
 23. Sam Dagher and Raja Abdulrahim, “Russian fighter jet downed in region with diverse mix of rebel

7. Hitler, *Mein Kampf*, 148.
8. Michael Dickenson, “Winston Churchill: The Imperial Master,” *Counterpunch*, January 28, 2015.
9. “The Churchill you didn’t know,” *The Guardian*, November 28, 2002.
10. Garikai Chengu, “Winston Churchill: Britain’s ‘Greatest Briton’ left a legacy of global conflict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Global Research*, January 23, 2016.
11. Richard Toye. *Churchill’s Empire: The World that Made Him and the World he Made*. St. Martins Griffen, 2011.
12. Lawrence James, *Churchill and Empire: A Portrait of an Imperialist* (Pegasus Books, 2015).
13. Garikai Chengu, “Winston Churchill: Britain’s ‘Greatest Briton’ left a legacy of global conflict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Global Research*, January 23, 2016.
14. David Olusoga and Casper W. Erichsen, *The Kaiser’s Holocaust: Germany’s Forgotten Genocide and the Colonial Roots of Nazism*, Faber and Faber, 2010, 329.
15. Aimé Césaire,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36.
16. Césaire, *Discourse*, 36.
17. Svend Lindqvist, *The Dead Do Not Die: 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 and Terra Nullius*, The New Press, 2014, p. 178.
18. Liad Porat,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Asad Regime.”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December 2010, No. 47.
19. Hitler, *Mein Kampf*, 106.
20. Hitler, *Mein Kampf*, 106.
21. Hitler, *Mein Kampf*, 235.
22. Hitler, *Mein Kampf*, 49.
23. Hitler, *Mein Kampf*, 46.
24. Hitler, *Mein Kampf*, 47.
25. Hitler, *Mein Kampf*, 25.

第九章

1. Edward Dowling, *Chicago Daily News*, July 28, 1941, cited in Heather King, “Father Edward Dowling,

14. Clifford Kraus, "The Scramble for Access to Libya's Oil Wealth Begin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11.
15.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207.
16. Alfred B. Prados and Jeremy M. Sharp, "Syria: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Iraq Wa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8, 2005.
17. Bashar al-Assad Interview: with Clarin newspaper and Telam news agency," May 19, 2013.
18. Alan Taylor, *Colonial Americ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3.
19.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Houghton Mifflin), 1999, 92.
20. Ibid, 93.
21.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22. Anthony Shadid, "Security forces kill dozens in uprisings around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23. Jonathan Steele, "Most Syrians back President Assad, but you'd never know from western media," *The Guardian*, January 17, 2012.
24. Nicholas Blanford, "Can the Syrian regime divide and conquer its opposition?" *Time*, April 9, 2011.
25. "Thousands march to protest Syria killing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11.
26. Rania Abouzeid, "Assad and reform: Damned if he does, doomed if he doesn't," *Time*, April 22, 2011.
27. Lisa Stampnitzky, *Disciplining terror: How experts invented terror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8. Cumings, Abrahamian and Ma'oz, *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207.

- group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4, 2015.
24. Shoup, Wall Street's Think Tank, 220.
25. "President Obama Signs Bill Recognizing Asteroid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Into Law," *Planetary Resources*, November 25, 2015, <http://www.planetaryresources.com/2015/11/president-obama-signs-bill-recognizing-asteroid-resource-property-rights-into-law/>.
26. Laurence H. Shoup &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uthors Choice Press, 2004) 6.
27. "President al-Assad: Basis for any political solution for crisis in Syria is what the Syrian people want," <http://www.syriaonline.sy/?f=Details&catid=12&pageid=5835>.

結語

1.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3 (2014): 564.
2. Russ Choma, "Millionaires' club: For first time, most lawmakers are worth \$1 million-plus," *opensecrets.org*, 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January 9, 2014.
3. Julie Creswell and Ben White, "The Guys from 'Government Sach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8.
4. Nicholas Confessore and Susanne Craig, "2008 crisis deepened the ties between Clintons and Goldman Sach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6.
5. Paul Krugman, "The angry rich,"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0.
6. Paul Krugman, "Fear and favo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10.
7. Paul Krugman, "Rule by rentier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9, 2011.
8. Lee Fang, "Who's Paying the Pro-War Pundits?" *The Nation*, September 16, 2014.
9. Ibid.
10. David Barstow, "Behind TV Analysts, Pentagon's Hidden Han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08.
11. William R. Polk, *Understanding Iraq*, Harper Perennial, 2005, Pp. 127-128.
12. Dreyfuss, *Devil's Game*, 99.
13. Polk, *Humpty Dumpty*, 278.

敘利亞戰爭

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

Washington's Long War on Syria

Copyright © 2017 by Baraka Books, Montreal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Briefing Press, a Division of AND Publishing Ltd.

大寫出版

書系——知道的書 Catch On 書號——HC0082

著者——史蒂芬·高塞斯 (Stephen Gowans)

譯者——黃開

行銷企畫——郭其彬、王綬晨、邱紹溢、陳雅雯、張瓊瑜、蔡瑋玲、余一霞、王涵
大寫出版——鄭俊平、沈依靜、李明瑾
發行人——蘇拾平

發行——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33 號 11 樓之 4)

大雁出版基地官網：www.andbooks.com.tw

電話——(02)27182001 傳真——(02)27181258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 andbooks@andbooks.com.tw

劃撥帳號：19983379 (戶名：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2017 年 08 月

定價 ◎ 4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95049-4-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敘利亞戰爭

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

史蒂芬·高塞斯 (Stephen Gowans) 著, 黃開 譯

初版臺北市／大寫出版：大雁文化發行／2017.08

299 面：16×22 公分 (知道的書 Catch On: HC0082)

譯目：Washington's long war on Syria

ISBN 978-986-95049-4-2 (平裝)

1. 美國外交政策 2. 敘利亞史 3. 地緣政治

578.52 106011334

Printed in Taiwan ·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如遇缺頁、購買時即破損等瑕疵，請寄回本公司更換